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中册

沈志华/主编

★ 具有93年历史、执政达74年的超级大党一瞬间瓦解了!

★ 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半世纪的超级大国神话般消失了!

★ 悠久与短暂，强盛与虚弱，历史的变换究竟说明了什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 卡廷事件：对波兰军官的坑杀与战前苏波关系

★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

★ 苏捷关系：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演变的典型案例

★ 大国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 掌握核武器：苏联的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研制

★ 支持以色列建国：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立场的变化

★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上架建议：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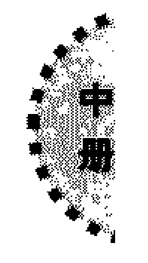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7-0926-9
定价：148.00元（共三册）

www.ssap.com.cn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a Superpow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沈志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097-0926-9

Ⅰ．一…　Ⅱ．沈…　Ⅲ．苏联-历史-研究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7879 号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上、中、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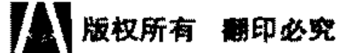
主　　编／沈志华

出 版 人／谢寿光
总 编 辑／邹东涛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　　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010）59367215
电子信箱／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宋月华
责任编辑／周志宽　杨　群
责任校对／单远举　仪莉霞　冯振华
责任印制／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市场部（010）59367028
排　　版／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77.25
字　　数／124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0926-9
定　　价／148.00 元（共三册）



目　录

上　册

中　册

下　册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

——“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吴伟

1939年9月17日，苏联继德国之后出兵侵入波兰。苏军在兵力上的优势和波兰腹背受敌的处境，使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十天时间就达到了消灭波兰国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既定目标。苏联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迫切问题，一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波兰战俘，二是怎样把所占领土彻底变成苏联“合法”的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之间既互相影响，又有一定的联系。以前由于苏联档案材料的限制，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并不很清楚。在对近年来解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笔者感到，它们的解决并不完全是某个人意志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苏联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

苏联对波兰战俘最初的处理措施

应当说，苏联对战俘问题从一开始就有所考虑。就在出兵当日，贝利亚致信莫洛托夫，转达了红军总参谋部提出开设8个战俘接收站和两个分配站的请求，同时建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解部队负责战俘接收站和分配

站的守卫和解运工作。为此他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通过关于将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并实行动员的决议。[①] 次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防委员会根据贝利亚的建议通过的决议，自9月20日起，白俄罗斯、乌克兰特别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的押解部队转入战时状态。[②]

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台了处理战俘问题的又一个重大举措，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战俘事务的机构——战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鲁年科少校被任命为战俘管理局局长，谢·瓦·涅霍罗舍夫为该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约·米·波卢欣为副局长。根据随后制定的战俘管理局条例，它“直接领导战俘营的组建及对战俘的配置、接收、登记、关押和使用战俘劳动，制订战俘接收站、战俘营的条例，颁布战俘营关押及内部规章制度的细则和指示。”[③]

战俘管理局在俄罗斯联邦的奥斯塔什科夫、科泽利斯克、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奥兰、尤扎，乌克兰的科泽利相斯克、旧别尔斯克共设立了8个关押营。每个战俘营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各部门的职能等，在9月23日颁布的《战俘营条例》中做出了规定。

在战俘营的机构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别科。它的职能是对战俘实施肃反工作。贝利亚在批准成立战俘管理局的命令里，特别强调了要在各战俘营开展肃反工作。9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给各战俘营特别科下发指示，要求他们在对战俘进行登记时，要建立专门的战俘间谍案卷和侦察案卷，“对进行反苏活动、有间谍活动嫌疑、与波兰社会党、毕苏斯基分子、国民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反革命政党和组织有联系的战俘，以及所有军官，都要建立履历案卷，这些案卷要登记在一个专门的簿册里。”特别科还应每月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和第一专门处提交业务报告，说明战俘营中关押战俘数目，其中军官数、宪兵、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人员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历案卷数量、获得的谍

① 8个战俘接收站分别设在日特科维奇、斯托尔布齐、季姆科维奇、拉多什科维奇、亚尔莫林齐、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舍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两个分配站是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по вопросу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23 – 1944 гг.，М.：Логос，1997，с. 94.

③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74，75.

报数量、招募的暗探和情报员数量、被逮捕的人数有多少。[1] 可见，从一开始，战俘营中的这个机构就被赋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营规模计算，至 10 月下旬，8 个战俘营最多能关押 68000 名战俘，这与前线部队实际俘获的战俘数量相差甚大。这种情况，势必给战俘营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另外，根据贝利亚 9 月 19 日的命令，各战俘营的展开要用 10 天左右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组建战俘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和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延误，各战俘营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准备就绪，都还是问题，这与苏军在波兰境内的迅速推进形成了强烈反差。它将给战俘营初期的战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带来诸多影响。

前线部队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着由于战俘人数巨大而带来的种种问题。9 月 21 日，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报告，由于没有准备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战俘，部队无法向他们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战俘也牵扯了部队大量人力。“部分战俘由铁路从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对此他建议“政府应发出指示，将那些被俘的乌克兰籍和白俄罗斯籍俘虏在登记后遣散回家……”[2]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拉·福·察纳瓦也向莫斯科报告：“西部各地区聚集了成千上万逃离前线的士兵，挤满了街道，靠行动小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们隔离起来。红军部队没把他们当成战俘抓起来，结果，谁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审查，波兰士兵到处自由走动。”[3]

库利克的建议，反映出前线部队对短时间内俘虏这么多战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地释放部分战俘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如果在作战与看管战俘之间权衡，常理上毫无疑问要优先保证前者。9 月 23 日，伏罗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复库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议：“被俘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农民如果能够出示文件，证明他们的确是被波兰人征召入伍的，可以将他们释放。”[4] 但是此举却立即遭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质疑。他在 9 月 24 日给斯大林

---

①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76、77.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83.

③ РГВ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Ф. 33987，Оп. 3，Д. 1213，Л. 197。

④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 Пленники необъявленной войны，Россия，XX век，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1997，с. 16.

的信里，描绘了大量被遣散的战俘堵塞了几乎所有道路的情景，并说其中许多人企图前往由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其中混杂了不少军官和警察。[①] 看来梅赫利斯的信对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为第二天伏罗希洛夫又下达了一道命令，撤销了两天前释放农民战俘的命令。这样，分流战俘这一途径被堵死了，数量众多的战俘在短时间内涌向苏联境内几个刚刚成立的战俘营。十几天内，一些战俘营接收的战俘接近了计划规定的容纳数额[②]，另一些则大大超过了原定数额。[③]

尽管展开各战俘营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达，但各战俘营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完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各营所做的准备在大量涌入的战俘面前变得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了。这就直接导致了各战俘营接收工作的被动与混乱。到9月底，普季夫利战俘营的战俘囚舍“还是用木板建的，缝隙没有堵塞，没有天花板和炉子”；“营内没有消毒室，战俘没有内衣”；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拨单没有发下来，“战俘的正常饮食没有安排好”。建在岛上的奥斯塔什科夫营，由于没有与岛外的电话联系，汽艇用油无法保证，因而“物资供应已经中断”；维修战俘囚舍的材料如木板、油毡、钉子等均告缺乏；全营尚缺8000条床垫，只能由国家调拨，因为“在本地组织缝制这么大数量的床垫既不可能也无材料”。[④] 科泽利相斯克营内的许多建筑物“呈半损毁状态，窗户上没有玻璃，房顶漏水，连通铺都无法架设”，就是这样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战俘，另一部分战俘或是睡在夏季帐篷里，或是被安置在猪圈里。[⑤] 尤赫诺夫营的许多战俘不得不在3℃～7℃的气温下，“住在凉台上、马厩里、窝棚里”，甚至“许多人连一个坐的地方

① РГВА，Ф. 37977. Оп. 1，Д. 161，Л. 80.

② 据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科泽利斯克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旧别尔斯克营计划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达11262人；奥斯塔什科夫营计划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还要往这里送5000人。只是在营领导人一再坚持下，这批战俘才被转送其他营地。到10月29日该营已有12235名战俘。*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09。

③ 尤扎营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这里的战俘多达11640人；奥兰营原定只能容纳4000人，10月1～3日实际接收了7063人。ЦХИДК（历史文献收集保管中心），ф. 1/п，оп. 2е，д. 2，л. 242。

④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 2，л. 106－107、108.

⑤ ЦХИДК，ф. 1/п，оп. 2е，д. 2，л. 158－162.

都很难找到"。[1] 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一些战俘营因陋就简，提出搭建3层和4层床铺，索普鲁年科无奈之下同意在房间空间允许的地方制作3层床铺。[2]

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如何处置大量波兰战俘问题需要苏联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10月1日，一个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牵头的委员会讨论了战俘问题。显然，在讨论中有人认为库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罗希洛夫赞同的遣散士兵战俘的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不失为缓解战俘营压力的有效办法。在由这个委员会成员贝利亚和梅赫利斯会后联名向斯大林提交的报告里，建议对战俘进行分类处理。他们把战俘基本分成6类，并作出不同处理：对居住在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战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战俘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乡被划归德国的波兰领土上的士兵战俘暂时单独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战俘营，待与德国人谈判解决了他们的遣送问题后再送其回家；为被俘军官建立单独战俘营，中校到将军的军官以及军政要员，关押在沃洛格达州扎奥尼凯耶营，其余军官关押在尤扎营；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单独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关押至英、法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其中军官应单独安置；关押他们的是旧别利斯克战俘营。[3]

从保留下来的原始档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几处批改。其中对捷克战俘的处理，他批改为："释放，但每人都应立下字据，不同苏联作战"；在波兰军官战俘营的安排上，他改为"安置在南方（旧别尔斯克)"。[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据上述报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5] 又过了一天，苏联人民委员会也做出了相同

① ЦХИДК, ф. 1/п, оп. 2е, д. 3, л. 5–9.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09.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17–118.

④ РГВА, Ф. 3, Оп. 5, Д. 615, Л. 228–230。到10月底，处理捷克战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统计，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经过罗马尼亚去法国，82人愿意去罗马尼亚。所有人都签字保证不在居住地参加反苏战争。*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404。

⑤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94–95.

的决议。[①] 同日，贝利亚按照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下达了执行命令。[②]

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苏联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体现出苏联政治制度的特征，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态度，是苏联出兵波兰目的的延伸。文件中虽然没有提出是本着“阶级原则”对战俘进行分类的，但这一原则通过在军衔上的区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和对人们的政治属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选使用“阶级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并不具备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准确合理区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苏联政治家们用来作为解决复杂问题的“合理”办法，而且是很“有效”的办法。在决定释放哪些战俘和不释放哪些战俘时，对苏联领导人更有意义的，不是军衔上的差别，而是阶级上的差别。伏罗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复库利克时，在允许遣散的对象前特意强调“被俘的农民”，有其特定的内在含义。这种含义在当时的苏联几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并不是一概反对遣散这类波兰战俘，只是担心一些军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征召来的农民”脱逃。可以说，到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战俘，某种意义上不是因为他们比那些被留下来的战俘表现“好”，而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下，他们成了“幸运儿”。相反，那些被留下的军官和军政要员最终成为一起悲剧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们全都表现出特别仇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样政治制度下一种教条的政治理念的牺牲品。

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以及根据这一看法确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兰国家作为一个异己的对立物，放在了要消灭的位置上。在苏德两国合作共同瓜分、占领了波兰领土之后，除了先在巴黎、后在伦敦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说波兰国家从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为了彻底消灭这个国家，占领其领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国家机器也非常重要。而军队、警察、监狱系统，正是每一个国家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保护该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军队、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构中的高级领导和官员，是贯彻统治阶级

① РГВА, Ф. 5446, Оп. 57, Д. 65, Л. 84 – 85.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20 – 122.

意志的核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中坚力量。消灭了这部分人员，无异于打断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脊梁”。波兰的情况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波兰统治阶级历来是仇视苏维埃国家的；波兰军队的军官、警察、司法系统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员，都属于统治阶级范畴，或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过程中，与其达成了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对苏联来说，他们的危险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们与普通士兵一道释放回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只能给那里正在进行的“苏维埃化”社会改造，增添麻烦与阻力。

由此可见，对波兰战俘的最初处理，受到了苏联特定的社会政治观念的影响，这种政治观念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是苏联领导层，而是成为教条式的行动指南。就处理波兰战俘而言，这种政治观念决定了波兰战俘的命运，并造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差别。因此，谈到波兰战俘的处理，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发生在波兰战俘中的悲剧本身，并把责任简单地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而疏于研究这一悲剧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看不到这一悲剧只是苏联在处理波兰战俘上产生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导致悲剧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波兰战俘的关押和使用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9 年 10 月 2 日的决议而对战俘进行的分类处理，到 11 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士兵战俘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释放捷克战俘的准备工作，苏联方面在 10 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释放的捷克人要求进入罗马尼亚时，罗马尼亚政府并没有马上发给他们签证。直到 1941 年春，签证问题才得以解决。[①]

对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波兰战俘的遣返和从德方接收部分波兰战俘的工作，也从 10 月中旬开始启动。10 月 11 日，贝利亚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议，“将居住在原波兰的德国部分的全体被俘士兵约 33000 人，在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404.

最近转交给德国当局是适宜的，为此应当与德国政府开始谈判。”① 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与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就交接程序举行了谈判，双方商定交接工作从10月23日开始，预计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苏方交给德方42492名波兰战俘，同时从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战俘。②

同年11月、12月，苏联还完成了从立陶宛接收波兰战俘的工作。据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统计，在它们那里拘押着近14000名波兰战俘，其中有3000名军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这些出生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战俘送回他们的出生地。③ 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分别通过决议，“从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愿意返回家乡的原波兰军队战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遣返回家；军官、警察和官员送往战俘营“仔细审查”；但对此项规定“应严格保密”。④ 在此项工作完成时，有21名军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诺夫营。⑤

与被遣返回家的战俘相比，被留下充当劳动力使用的那部分战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确定留下的25000名战俘，被用于修筑沃伦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这批战俘一半的罗夫诺营改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建筑营。

战俘劳动力的使用范围很快扩大了。10月14日，战俘管理局与苏联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签订了使用战俘协议，1万余名战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下属的8个矿务局、矿井和铁路公司从事劳动。集中这批战俘的主要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三个营地，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克里沃罗格营、顿涅茨克州的叶列诺—卡拉库布营和扎波罗热州的扎波罗热营，每个营又都在矿山和企业所在地设立了许多分营。虽然根据协议这些战俘的劳动保护、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都将与通常的雇工相当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们仍要在警卫看管下进行劳动。⑥ 这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普通的劳动者，而是被强迫接受劳动的劳动者。

不管是筑路还是采矿，战俘从事的劳动都相当艰苦和繁重。有文件证

---

①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41.
② ЦХИДК，ф. 1/п，оп. 1е，д. 1，л. 38、43、92.
③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83.
④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87－188.
⑤ ЦХИДК，ф. 1/п，оп. 01е，д. 3，л. 4.
⑥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47－148.

实，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业并未履行协议中规定的条款，没有为战俘创造应有的生活及劳动条件。[①] 战俘的不满情绪还因11月初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并入苏联而加剧。那些居住在上述两地区的战俘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已成为苏联公民，再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和使用违背了最高苏维埃的有关法令，他们联名致信斯大林，表达他们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②] 也有不少战俘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工地，据西乌克兰一号筑路工程指挥费久科夫少校报告，整个筑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战俘，几乎占在这里劳动战俘人数的10%。[③] 尽管改善了战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强了警戒，但逃跑现象并未完全制止。这说明战俘的不满不仅是针对生活及劳动条件的，政治上的歧视性待遇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考虑到战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并入苏联的地区引起“不满情绪，为敌人进行反苏宣传提供子弹”[④]，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发出命令，对在各企业劳动的战俘规定了新的使用办法。新办法规定，“凡有劳动能力的战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时将他们的工资改为与非军人雇用工同等的计件工资。战俘中的不完全劳动力在战俘营内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后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并根据该工业部门现行的计时工资制确定他们计时工资。”新办法还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产技能并且政治合格，以便“作为你们企业的固定工人”。对经常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战俘，经专门审查并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批准后，可以撤销对他们的看管。办法还规定了战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费不得低于5卢布[⑤]；另外，要给他们“创造必要的生产条件（固定的工作地点、系统地指导，等等）、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居住生活条件。要进行解释工作，以保证所有的战俘都能完成生产定额”等。[⑥]

---

① ЦХИДК, ф. 1/п, оп. 2е, д. 8, л. 28; оп. 2в, д. 2, л. 4–13.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82.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86.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27.

⑤ 1938年2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对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员规定的每日生活费，可以作为这个标准的参照。在“古拉格”系统的监狱和移民营平均每人每天3卢布49戈比，建筑营3卢布90戈比，被拘留人员5卢布11戈比，儿童教养营7卢布58戈比。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2003, №3, с. 105。

⑥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36–237.

新的使用办法规定的对战俘待遇虽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战俘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说，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强制从事劳动的劳动力。同时，新的待遇从规定到落实，还有一个依责任心大小和检查督促机制是否完备而决定其长短的过程。战俘们在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又得不到令他们满意的解释的情况下，怠工、以各种借口旷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们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罗热州劳动的战俘，每天有将近 100 人因各种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战俘中怠工、酗酒现象普遍，以致有时一天的计件工资高的达 30～40 卢布，低的只有 23 戈比。另外还有 3 名战俘逃跑。[①]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种部队加强看管并逮捕了 16 名被认为是怠工煽动和组织者的战俘后，激起了战俘们更强烈的抵触情绪，1940 年 1 月下旬，这里的 1570 名战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过 370 人；还有不少战俘宣布绝食。他们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们回家。[②] 1939 年 12 月 20 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矿务”托拉斯劳动的战俘举行罢工和绝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惊动了贝利亚。他于 12 月 31 日特地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特工处）处长季什科夫，会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特派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州局局长，对在当地各企业劳动的战俘“大量不出工的情况”和“逃跑事件”，进行调查和侦察。[③] 1940 年 1 月 3 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此事写了专门报告，在他列举的上述两个企业战俘罢工和绝食的原因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战俘们要求与大多数被俘士兵一样释放他们回家。[④] 霍赫洛夫报告，对反抗的战俘采取了强制性措施，“减少食物，剥夺通信权利”；并“将 250 名破坏生产分子除名，送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对“老实干活的战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于 2 月 7 日再次签订了新的使用战俘协定，减少了使用人数，并把使用的战俘分成两类：对其中一类明确规定实行工资制，每天的最低工资也比 10 月 14 日的规定提高了 2 卢布；战俘营对战俘的生活和伤病治疗也明确了相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66.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421.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79.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02－303.

应的保障。[①] 这部分在劳动营里的战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的主要兵源。

苏联对所占波兰领土的处理

随着苏德两国在波兰军事行动接近尾声，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马上开始了。这种处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进一步确定了双方在“原波兰领土”上占有的地区。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苏德虽然划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但在是否还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它的边界如何划定上，并没有最后敲定，而“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②] 苏联的出兵以及波兰在苏德两国的合击之下迅速崩溃，使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发展”出现了重大变化，解决上述“遗留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苏德两国领导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义表示，苏联放弃让“波兰剩留部分独立存在”的主张，同意由苏德两国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一线分割波兰。[③] 舒伦堡在向里宾特洛甫汇报时认为，苏联的主张“完全符合德国的观点”。[④] 但德国领导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尔诺夫策的铁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后进攻波罗的海地区和苏联所必需的。里宾特洛甫还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奥古斯图夫及其森林划归德国。[⑤] 苏联并没有顺从德国的要求，它坚持桑河上游一直是乌克兰人的领土，“哪个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苏联内部文件中，奥古斯图夫省无论是从民族、经济还是防御角度看，“对苏联都具有头等意义”。[⑥]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29 – 330.

② Художник *Длугий В.*. Обложка *Капелянa Г.*.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Розы Гросс и Любы Брукс. 1939 – 1941, 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ариж-Нью-Йорк: Третья волна, 1983, с. 93;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г., Т. XXII,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2, с. 632.

③ 1939 – 1941 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106.

④ 1939 – 1941 Советско-нацис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107.

⑤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 с. 610.

⑥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7, с. 27.

苏联还提出要德国把已经占领的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作为交换后者让出包括卢布林省和华沙省部分地区的赫尔姆申诺。

为最终确定对波兰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斯大林和舒伦堡也参加了会谈。双方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补充议定书。两国签订的条约指出，“苏联政府和德国政府在原波兰国家瓦解之后，认为在这片领土上恢复和平和秩序，保证居住在那里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们的民族特点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担负的任务”。为此，它们将确定“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国界”，双方承认这一国界为最终边界并排除第三国对此进行的任何干扰；在确定的“界线以西领土上必要的国家改造由德国政府进行，该线以东领土上的改造由苏联政府进行”；双方认为“上述改造是进一步发展苏联人民同德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1] 同时签署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涉及了居民迁移、行政机构改建和双方在各自占领地区内的义务。这份议定书对双方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补充议定书”中划定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把立陶宛归入了苏联利益范围。双方还明确，每方都“不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针对另一方领土的波兰宣传。双方将消灭自己领土上这类宣传的萌芽，并互相通报为此而采取的恰当措施。”[2] 10月4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一份调整上述边界的补充议定书，对边界作了仔细的描述。[3] 通过这些文件，苏德双方不仅确定了各自在波兰领土上的利益范围及其界线，而且承担了对各自利益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改造”和保护对方利益的任务。在提到波兰时，文件精心选用了“原波兰”的提法，意在强调两国现在瓜分的已是一块“无主”的土地了。不仅如此，它们明确地把划定的界线说成是最后的边界并排除别国的干涉，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调它们强占并瓜分波兰不是非法行动，相反，谁要对此提出异议倒是对两国利益的一种非法干涉。但是，这个条约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没有引起肯定的反应。

为使所占领的地区合法化，苏联第二步就是启动国内法的法律程序，对这一结果加以认定和保护。1939年10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①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 с. 134－135.

②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 с. 135－136.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39 г., с. 154－157.

通过决议，预定10月26日在西乌克兰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罗斯的比亚威斯托克同时召开人民会议，人民会议应确认9月17日后在这两个地区所发生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变革，并通过加入苏联的决议。一切相关的文件分别由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准备。① 为了选出出席人民会议的代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两地要在10月22日举行选举。候选人只能从城市和农村中成立的临时机构——市临时管理委员会和村农民委员会以及工人赤卫队里产生。地区临时机构由4人组成：两人来自共产党组织，一人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人来自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② 27日，西乌克兰人民会议在利沃夫发布关于西乌克兰国家权力的公告，宣布在西乌克兰全境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苏维埃乌克兰共和国的请求。③ 两天后，西白俄罗斯人民会议在比亚威斯托克也发布了与上述内容基本一致的文件。④ 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满足上述两地区人民会议的请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颁布法令，接受两地区加入相应的共和国。⑤ 12月2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确认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的所有公民为苏联公民。⑥ 至此，经过这些法律程序，两地区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两地区现有的居民也就成为拥有苏联国籍的苏联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间，各战俘营开始大批释放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士兵战俘。这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释放战俘也是一项“配合行动”。

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本属国际问题的问题单方面转换成内政问题，找到了可资凭据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释权。这种

① ЦХИДК, ф. 17, оп. 3, д. 1014, л. 57－61.

② *Волков В. К.*,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Отв. ред.*)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между Гитлером и Сталиным 1939－1941гг., Москва, 1999, с. 184、192.

③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ом VII, М.: Наук. Ин-т, 1973, с. 178－180.

④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ом VII, с. 181、183.

⑤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ом VII, с. 185、186.

⑥ 但在1941年12月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又说，苏联政府愿意作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波兰族人当作波兰公民。

移花接木的办法，使苏联多少摆脱掉了在此问题上的被动地位，并逐渐形成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即：维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要求民族统一的权利，坚持苏波边界要以 1939 年 9 月 17 日以后的现状为基础予以确定。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几乎没有放弃过，而且越到后来，越发不可动摇。它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包含的不再仅仅是领土问题，而且还有民族问题，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问题，以及苏联政府的荣誉问题。这样，围绕这个问题，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原则分歧，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而且尖锐。

在并入苏联的地区建立苏维埃制度，或曰推行“苏维埃化”，是苏联对这两地进行处理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就在红军部队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推进的同时，一批由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派的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也跟随部队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他们每 15～20 人为一组，负责在被苏军占领的城市和农村组建新的管理机构，组织“工人赤卫队”，一方面维持当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来的军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机构要员。那些被他们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处决。[①] 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特别行动组领导并参与了“清查”活动，仅第一行动组就在乔尔特库夫、戈罗杰茨、克罗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 1923 人。在利沃夫，到 9 月 28 日前，就已审结了 10 起“组织反革命队伍”案，一批波兰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被逮捕。[②]

为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0 月 1 日决议和准备人民会议选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加紧在两地区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几千名党、团积极分子在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和红军干部带领下来到这两个地区。因此，还在两地正式加入苏联之前，党、团和工会组织系统就已经在这里建立起来了。10 月 2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 12 月 24 日在这两地区举行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选举。不过，在开始选举的前 20 天即 12 月 4 日，政治局就已经确定了党的区委局和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内务人民委员会区机关领导人或是进入

① *Полян П. М. и др*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иала”, Вып. 1, Москва: Звенья, 1997, с. 49.

② *Ямпольский В. П. и др* (*сост*)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1, Москва: Русь, 1995, с. 88－90.

了党的区委局，或是进入区苏维埃执委会。[①]

按照联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对两地的银行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对企业实行国有化。不仅对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而且那些业主已逃跑和进行怠工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1939 年 12 月 3 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法令，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实行广泛的国有化，工业、商业企业，交通、文化和医疗机构，学校和居民建筑都要在两个月内实现国有化。[②] 1940 年 1 月 20 日，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又决定在两地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国营机器拖拉机站，并利用地主和定居者[③]土地建立国营农场。[④] 这实际上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对有产者的一次剥夺。

苏维埃化的实施，极大地触动了部分当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为保证社会改造的进行，苏联党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强行进行居民迁移，以改变当地居民结构。还在 10 月 3 日，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授予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军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和原波兰军队军人作出极刑判决的权力”。[⑤] 两个月后，政治局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建议，“逮捕所有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基干军官”。[⑥] 两个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仅在西乌克兰地区就逮捕了 570 名波兰军官；另有 487 名军官在早些时候作为“反革命队伍”成员而被捕。[⑦] 被投入监狱的还有“社会异己分子”和各个“反动的”、“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另外一些企图越境离开苏联和从德国占领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的越境分子也被判处 3～8 年不等的徒刑。根据贝利亚 1940 年 3 月 5 日提供的数字，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各监狱内关押的各类犯人有 18623 人，其中波兰人有 10685 人。[⑧] 内务人民委员部同年 3 月 22 日

---

① ЦХИДК, ф. 17, оп. 3, д. 1016, л. 57－59.

② ЦХИДК, ф. 17, оп. 3, д. 1016, л. 99－100.

③ 即“осадник”，这些人参加了 1919～1920 年的波苏战争，20 年代波兰政府把根据里加条约得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部分土地分给他们。从形式上说，他们与哥萨克有些类似。

④ ЦХИДК, ф. 17, оп. 3, д. 1019, л. 44－47、57－59.

⑤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96.

⑥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97.

⑦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 134－135.

⑧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89.

的命令记载，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罗夫诺、沃伦斯基、捷尔诺波尔、维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诺维奇等9座监狱，就关押了6750名波兰犯人。[①] 可见，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苏联当局的打击力度是相当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属迁往北极地区从事林业工作。之后对被迁移者的利用又扩大到了矿业开采。[②] 结果，有139590人被从这两个地区迁出，其中18岁以上的男子占24.1%，其余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③] 此后，苏联政府又于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对两地的居民三次进行迁移。据贝利亚1944年5月提交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到1941年9月，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送往苏联后方劳动及被流放的人员达389382人。[④] 应当说，这些波兰人的境遇是非常艰难的。

苏联对波兰战俘和所占领土的处理，带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在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后，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迅速启动国内法律程序，完成了对所占领土的归并，并在这些地区推行“苏维埃化”，短时间内便把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了这里。如果说，苏联与这些地区的关系，在出兵时仅能从历史的和民族的意义上解释的话，那现在又多了一层“法律”上的意义（在战争后期又加上了保证苏联安全的意义），这就使它对这些地区的兼并看上去更加彻底和“完美”了。因此，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维持1939年9月17日以后苏联边界——主要是西部边界的状况，也就成为苏联外交要加以捍卫的一条基本原则。在苏联日后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中，这一原则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微调，具体化成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寇松线”，并且成为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苏联对所占领土的处理无疑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它对这些地区的归并没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作为波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代表，波

---

① РГВА，Ф. р－9401，Оп. 1，Д. 552，Л. 207－210.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98.

③ РГВА，Ф. 9479，Оп. 1，Д. 61，Л. 34－39.

④ Konfliky Polsko-Sowieckie 1942－1944，Warszawa，1993，s. 168。也有的统计为近32万人。参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тала.，с. 114－136。在波兰学者的著述中，这一数字从40万人至200万人不等。

兰流亡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承认这种处理的结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反法西斯大国之间在此问题上亦有争议。接受还是反对苏联的"寇松线"，无论是对苏波两国政府，还是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不得不面对、但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之一。

分类处理后在押的波兰军官

如前所述，苏联出兵波兰后的12天作战行动中，被苏军俘虏的波军官兵近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10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相同决议后[①]，对这批波兰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一部分原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士兵战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士兵战俘则等待着交还给德国当局；一批战俘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战俘中的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集中关押到指定的战俘营。正是这后一类人，成为后来所谓"卡廷事件"中无声的主角。对"卡廷事件"的调查和研究，国外已有不少成果[②]，但大都由于缺乏苏联方面真实的材料，而对苏联当局在此问题上的决策过程解释得不甚清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批有关在苏联的波兰战俘以及对其进行处理的档案，使人们有可能更直接地了解到事实真相。本文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通过对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决策过程的分析，探究导致苏波关系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的深层

---

① *Костюшко И. И.*（*Ред.*）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94－95.

② 有关这一事件最早的叙述是1943年9月由德国新闻总署发表的《卡廷大屠杀案的正式材料》（*Amtliches Material Zum Massenmord von Katyn*），这是德国收集到的证据的详细摘要。波兰流亡政府所属专门委员会于1944年在伦敦编辑的Fac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Prisoners of War，Captured by the U. S. S. R. during the 1939 Campaign，Compiled in 1944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Under the Council of Minister of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也提出了大量关于这一事件的材料。对卡廷事件最详细的调查材料，是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编辑发表的Hearings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to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s，Evidence，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共7卷，1952年在华盛顿出版。涉及卡廷事件的著述有Joseph Mackiewicz，*The Katyn Wood Murders*，London：Hollis & Carter，1951；J. Coutouvidis and Jaime Reynolds，*Poland* 1939－1947，New York：Holmes & Meier，1986；George V. Kacewicz，*Great Britain*，*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olish Government in Exile*（1939－1945），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1979。

原因。

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将军、军官、军政要员、间谍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关押在指定的旧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个专门战俘营。[①] 1939 年 11 月初，进行并很快完成了相应的调动。此后直到 1940 年春，这三座战俘营及其关押对象都保持稳定。

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营，关押的基本是波兰军队的原军官，他们的军衔从将军到上尉，军种也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军事技术人员如军医、教授，以及记者、画家和随军神父等。奥斯塔什科夫营主要关押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苏政党和团体的积极分子、地主、公爵、工厂主、定居者和难民等。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情况见下表。[②]

表 1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3 月旧别尔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1939 年			1940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31 日	1 月 9 日	1 月 20 日	2 月 4 日	2 月 23 日	3 月 16 日
随军将军	8	8	8	8	8	8	8
上　校	57	55	55	55	55	55	55
中　校	130	130	130	130	127	127	126
少　校	321	320	320	320	316	316	315
上　尉	853	854	854	851	847	845	845
其他军官	2519	2528	2528	2528	2529	2529	2528
随军神父	12	12	12	12	18	18	9
地　主	2	2	2	2	2	2	2
政府要员	5	5	5	5	5	5	5
其　他	2		2	2	2	2	3
总　计	3909	3914	3916	3913	3909	3907	3896

① 见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20, 157, 161。

② 表格资料来自 *Лебедева Н.* Катынь: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и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Культура, 1994, с. 325 – 328。

表 2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3 月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1939 年				1940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29 日	1 月 9 日	1 月 20 日	2 月 4 日	2 月 22 日	3 月 16 日	4 月 1 日
海军将军	1	1	1	1	1	1	1	1
陆军将军	4	4	4	4	4	4	4	4
上　校	24	27	27	27	27	27	26	26
中　校	79	76	76	74	74	73	72	72
少　校	258	240	240	236	235	232	232	232
大　尉	653	663	663	652	651	653	647	647
海军上校	2	2	2	2	2	2	2	2
海军中校	3	3	3	3	3	3	3	3
海军少校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其他军官	3419	3439	3436	3404	3437	3485	3482	3480
随军神职人员	7	1	1	1	1	1	1	8
地　主	4	28	28	6	6	9	9	9
国家要员	43	43	43	33	33	61	61	61
应遣散的士兵	78	173	173	134	134	5	5	5
难　民	131	54	54	76	82	1	37	37
总　计	4718	4766	4763	4665	4702	4569	4594	4599

表 3 1939 年 11 月至 1940 年 3 月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关押战俘一览表

	1939 年			1940 年			
	11 月 29 日	12 月 31 日	1 月 9 日	1 月 20 日	2 月 4 日	2 月 22 日	3 月 16 日
警察、宪兵军官	199	246	281	281	283	282	288
警察、宪兵下级军官	603	615	742	740	827	780	775
普通警察、宪兵	5016	5026	4878	4932	4964	5007	4924
狱　吏	104	110	111	111	114	114	189
谍报人员	2	5	6	6	7	8	9
应遣散的人员		145	140	82	72	72	72
随军神职人员		11	11	5	5	5	5
定 居 者		27	27	27	35	35	35
难　民	35	93	89	93			
其　他		1	1	1	71	64	67
总　计	5959	6279	6286	6278	6378	6367	6364

三个专门战俘营关押人员的人数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对这批“特殊”战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统计表明，上述三个战俘营共关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数略有减少，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对他们最终的处理决定后，3月16日的一份人数统计为14854人。不过，这并不是最后被处决的人数。

随着战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轨，一开始在这三个战俘营反映比较普遍的生活待遇问题慢慢减少，另一类问题，即战俘们要求给予他们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来。

战俘们对把他们作为战俘关押提出质疑。曾在1939年9月指挥了利沃夫保卫战，后向苏军投降的弗·尤·西科尔斯基将军，1939年10月20日从被关押地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致信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说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曾许诺给我们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是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他提请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们尽快获得自由”。① 1940年1月7日，关押在同一个战俘营的一批波兰上校上书战俘营领导，要求确定他们的地位和按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这次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我们请求根据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就应当“使我们有可能自由求见受权驻苏联政府、负责保护波兰公民利益因而也保护战俘利益的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有可能与在苏联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布战俘名单，释放没有应征入伍的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他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他们是被拘捕（拘留）者，“请向我们说明，我们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况且，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55.

我们是在波兰领土上被拘捕的"。[1] 另外，一百多名军医和药剂师也致信伏罗希洛夫，声明他们是在"履行医生职责时被苏军俘获的"，他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国际公约关于军事行动期间医生和药剂师权利的有关规定，将他们送往中立国家。[2] 但是，这些呼吁和要求在苏联当局那里不是遭到拒绝，就是不予回应。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种方式，是对关押制度的抵制与抗拒。旧别尔斯克营的梅·约·埃韦特大尉、路·亚·多梅尔少校、斯·亚·克沃列格等人，组织了"文化学习活动"小组，鼓动"只用波兰语交谈"，"不为战俘营上工"，"战俘营的情况越糟对我们越有利——我们以此让战俘营管理当局和战俘营制度，在很快就要到来的国际调查小组面前出丑"。这些言论在战俘营的上报材料和战俘管理局的通报中，被定性为"进行旨在反对战俘营内部制度和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反革命活动"。[3] 在奥斯塔什科夫营，一些战俘以蹲禁闭室为荣，能够"不去干活，而且说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干活"，在他们的"同事"看来这差不多是"功劳"。[4] 在该营 1940 年 1 月上半月统计中，各种违反战俘营制度的事件有 75 起，其中拒绝干活的约占 1/5。[5] 在科泽利斯克营，1940 年 1 月 21 日，大批战俘开始绝食。虽然绝食的起因是因为战俘营伙食质量低劣，给战俘食用变质食物，但是导致这一情况的直接原因，是苏联有关部门中断了对战俘营的供应。据该战俘营政委马·阿列克谢耶夫报告，上级 1 月份没有给该营及时发来食品，又不允许以集中方式领肉，"所有这一切不仅使战俘伙食变差，而且简直有中断战俘伙食的危险"。[6] 还有一些战俘暗中准备逃跑。1940 年 2 月 19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总局特别处第二科科长洛尔基什报告，在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发现了一系列企图逃离战俘营的事实。一些战俘策划在夏天逃出战俘营，而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芬兰，因为"它正与苏联打仗，如果我们出现在芬兰领土上，何况我们还是军官，芬兰人将不会出卖我们，相反，会接收我们参军，委以军官职务"。为此，战俘们设法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98.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73.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42, 286.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55.

⑤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55.

⑥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08.

买到了地图，“开始研究苏联西部的地形，即他们从战俘营逃跑时路经的那些地方”，“并将通往原波兰与芬兰边界的所有居民点、公路、铁路作了标记”。有些战俘讨论逃离战俘营计划时认为，需要用卡车逃跑，因为卡车离开战俘营时任何人都不会认真检查。除准备实施单人和小组逃跑外，某些战俘还有组织全部战俘大规模逃跑的企图，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①] 对这一情况，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②] 这种情况在科泽利斯克营也发现过。[③]

战俘中表现出的爱国情绪，也受到了苏联战俘管理当局的极大关注。在各战俘营上报的材料中，有不少这类事例。战俘们在交谈时认为，“波兰还会像过去的波兰一样存在”。他们寄希望于英法两国来帮助“波兰复兴”，关心“未来波兰”执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并表示出对“正在为波兰的独立而拼杀”的士兵的崇敬。[④] 与这种爱国情绪很容易联系在一起的，是对苏联的不满。一些战俘结合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指出，“苏联成了红色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用嘲讽的口气向战俘营政治指导员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为什么与芬兰打仗？”“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国与芬兰那样一个小国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仗？”还有的战俘自己编辑了“充满了反苏精神”的报纸，在战俘中秘密传看。[⑤]

应当指出，上述情况并不是战俘营普遍的现象，或者说不是各战俘营汇报材料里反映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上述言行被战俘营管理当局处理的人员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数量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全部。正是在这些似乎不是普遍发生的问题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与波兰战俘之间的矛盾。在对战俘进行了“分类处理”后，从苏联的政治观点看，留在这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人员，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类人。这就注定了这些战俘势必成为苏联战俘管理体制下被管制的重点和这一体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苏联已经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并且坚持

---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42.

② ЦХИДК, ф. 1/п, оп. 3а, д. 2, л. 312.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89.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83, 284, 287.

⑤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43, 325.

原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管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使他们失去复兴“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能力。甚至反映出这种渴望的言论和说明具有这方面潜在能力的举动，都会对苏联的现状构成威胁，因而为这一体制所不容。对此，战俘管理当局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在战俘中招募暗探①，来掌握战俘的思想动态和地下活动，并对发现的“反苏和反革命分子”严厉处理。从这批被关押的战俘角度看，他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②，对此战俘们从心里很难接受。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之所以落入现在的境地，并不是由于和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决定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的现行活动，而仅仅是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具有的职衔。另外，这三个战俘营的战俘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使他们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个人目前的处境与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形势以及与苏联政治体制之间的种种关系，从而具有更强烈的爱国情绪和复兴波兰国家的愿望。这种感情和愿望以及由此引发出的言行，正是苏联战俘管理体制要严加防范的，也是苏联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在这三个战俘营中反映出的矛盾，不仅仅是关押者与被关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进一步分析，不难看出，苏联战俘管理当局无疑处于这对矛盾的主导地位。它握有选择解决矛盾方式的决定性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权力掌握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最高决策者手中。苏联当时的体制提供了这种可能，即他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和论证，仅凭个人意志来使用这一权力，包括选择用最极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这样的体制下被置于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面，对这部分波兰战俘来说，发生在他们绝大多数人身上的悲剧，实际上是无法抗拒的。

---

① 1939 年 10 月 8 日，贝利亚指示各战俘营，要求在战俘中建立暗探情报网，“以便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同时，暗探还要报告苏联当局“感兴趣的人”的情况和负责“查清和预防战俘从战俘营逃跑的企图”。*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135－136。

② 这里之所以没有用“剥夺”，是因为战俘们还保留了一点有条件的“自由”，如每月一次的通过战俘审查的通信。另外他们超过规定的私人财物，从规定上不是被“没收”而是由战俘营代为“保管”等。

苏芬战争和贝利亚的指令

1939年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苏联召回驻芬大使，声明与芬兰断绝外交关系，不断恶化的苏芬关系终于彻底破裂。30日，苏联军队开始进攻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这是苏联继9月出兵波兰后两个半月内第二次针对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这次没有其他国家像德国那样配合行动，但苏联领导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时间内再次取得战争的胜利。[①] 按照常规，苏联将不得不又一次面临随之出现的大量战俘问题。为给接收战俘早做准备，贝利亚于12月1日签署命令，指定在摩尔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列宁格勒州境内建立9个战俘接收站；并要求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达州的格里亚佐维茨等战俘营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卡拉干达劳动营准备安置26500名战俘。[②] 前几座战俘营刚刚把关押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波兰战俘处理完毕，接收一部分芬兰战俘（按贝利亚的命令是11000名）应当不成问题。不过，在上述贝利亚估计的芬兰战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批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对这些人员与普通士兵区别开来处理，正是苏联当局处理战俘的既定政策。那么把这批芬兰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里呢？

这是贝利亚需要考虑的问题，他的选择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众多选择中，比较容易操作、也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这部分战俘集中到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一个去。因为，无论是从看管环境、管理人员配备、警卫力量、保障系统等“硬件”上，还是从管理者的经验、相关规章制度的健全等“软件”上，已有的三个专门战俘营都有其他战俘营暂时不具备或不全具备的条件。贝利亚和苏联战俘管理部门选择这三个战俘营中的一个作为将来关押芬兰“要害分子”的地点，应当是很正常

① 有关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芬兰抵抗能力的估计以及制订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详见由俄罗斯和芬兰学者共同编写的著作，*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Вехвиляйнен О.* (*Отв. ред.*) Зимная Война 1939 - 1940, Книга. 1,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с. 145 - 151。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27 - 228.

的。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在11月下旬，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在对三个专门战俘营进行实地调查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这些战俘的建议。战俘管理局局长先简单介绍了他所管辖的各战俘营（包括从事劳动的）波兰战俘的数量，接着讲到在释放了一部分前波兰军队士兵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作出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归并苏联的决议后，战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绪急剧增长，有鉴于此，他建议：“一、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第5次非常会议的决议精神，可将在苏联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矿山管理局劳动的战俘转为雇佣工人；预先在他们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愿意作为同苏联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矿山工人。二、遣散一号工地的所有战俘，以各战俘营中关押的警察取而代之。这类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反正迟早要让他们学会劳动。对于这些警察要加强警卫。三、应着手将关押在战俘营的军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来自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以分类，以便确定哪类军官可以在何处使用。”①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里虽然没有提到安置芬兰战俘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贝利亚还有这么多波兰战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么事也没有干”，近9000名军官有待进一步确定对他们的使用。现有的材料还无法准确地说明贝利亚当时的想法，也许这永远是一个谜了。然而，现有的材料却表明，贝利亚和战俘管理局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对关押波兰军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员的三座专门战俘营，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先是12月4日往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斯·叶·别洛利佩茨率领的侦查组，到当月月底这个侦查组已经达到14人。② 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尽快准备好该营全体战俘的侦查案卷，并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有关材料。特别会议成立于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决议，对案件进行最终审理的机构。30年代中后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27.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50, 274.

下进行的。一旦特别会议做出判决，即成为终审判决，被告和辩护人无法上诉。因此，命令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的案卷上交特别会议，这就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已经决定对这些战俘要进行最后的处理了。战俘管理局对别洛利佩茨侦查组的工作高度重视，索普鲁年科于 12 月 4 日、7 日和 23 日三次亲自指示奥斯塔什科夫营，除了“保证侦查组的工作条件并执行别洛利佩茨同志的业务指示”，“为其安排住处，必要时并提供制服”外[①]，为防止侦查组工作期间，“营内关押的警察、宪兵及其他战俘可能有所举动及过分行为”，他还特别要求战俘营“加强对战俘的监视”，“加强营地四周的值岗及巡逻”，甚至“从战俘住所收走斧头、铁镐及其他劳动工具”。[②]由此可见，战俘管理局对此事丝毫不敢怠慢，它从侧面反映出这次行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被派到奥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组也同样不敢懈怠，到 12 月底，他们办理完成侦查案卷 2000 份，给特别会议发去 500 份。全部工作预计在 1940 年 1 月底结束。[③]

12 月 31 日，贝利亚连续发出指令，三个专门战俘营均被涉及。贝利亚命令索普鲁年科率领 10 名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员前往奥斯塔什科夫，其任务主要是：第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组对原波兰警察战俘案件及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提交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改进侦查组的工作，使之能在 1 月份内办完所有在押警察战俘的案件”。第二，“从全部警察战俘中挑出有业务价值的人员的案件，就这些案件认真侦查，查清他们在苏联国内和国外的全部联系，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当时派往苏联的原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第三，了解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特别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9 年 10 月 8 日命令进行的间谍情报工作情况。“注意现有情报工作的质量和据此对各类战俘的情绪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贝利亚还要求对战俘与营外的联系，搞好战俘营登记机关的工作，保证登记质量，战俘营的警卫状况和战俘的纪律情况等进行检查。[④]

---

①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50.

②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51.

③ 从工作人员的报告看，这项工作并不简单：“这项工作十分费劲，第一，许多战俘不懂俄语。此外，警官们气焰嚣张，因此花在一个人身上的时间有时达三四个小时。”常常“从早上一直忙到夜里 3 点”。*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74，423。

④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75－276.

同一天，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罗季奥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命令战俘管理局副局长约·米·波卢欣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雅·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其任务与索普鲁年科基本相同。[①]

贝利亚如此兴师动众派“要员”亲临战俘营，目的绝不仅仅是检查工作。从贝利亚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真正关心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其一，对战俘侦查案卷和登记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战俘中寻找和发展谍报人员工作的进展。就前者而言，侦查和登记的过程，也就是确定战俘真实身份、核实其以前的工作经历、发现和揭露战俘中所谓“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后一个环节，可以为在特别会议上最终决定战俘们的命运提供“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换句话说，贝利亚要的是上报给特别会议的“材料”，至于这些材料在他规定的时间内——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时的真实准确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与完成前项工作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贝利亚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达的一道指示，在这道“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战俘营在战俘中进行业务和肃反工作的指示”中，规定要在战俘营“建立间谍情报网以查明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情报机构要查明并特别注意一些特定人员[②]，对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进行登记，为他们建立谍报档案并保证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以及他们与国外的联系。[③] 因此，落实这道指示，本身就是为第一项工作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对已有的情报网进行检验，从而发现一些确有利用价值的情报人员，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这也是对战俘的一种进一步处理，尽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战俘，但对贝利亚及其领导的部门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

说穿了，这两件事就是这些波兰战俘的“去”和“留”的问题，即哪些战俘应该从战俘营中清除出去，哪些战俘可以留下来继续发挥作用。它

---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77－278, 33.

② 指示中把这些人员分为9类即原波兰谍报人员、暗探机构人员、警察、狱吏、边防军人，情报人员，波兰军事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成员，法院和检察院工作人员，外国谍报机构的间谍，境外白俄恐怖团体成员，原沙俄暗探局奸细、混入波兰共产党的奸细，从苏联逃到波兰的富农和反苏分子。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136－137.

们关系到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每一个战俘的命运，这个命运在一个月内就要由从莫斯科来的内务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员作出初步裁定。当然，最终的判决还要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但要知道，特别会议仅仅是面对整理出来的材料做出判决。

贝利亚在1939年最后一天下达的指令，已经很难说与正在进行的苏芬战争有多大关系了。就在贝利亚下达上述指令的前两天，战俘管理局向副内务人民委员瓦·瓦·切尔内绍夫报告，按贝利亚命令准备好了6个可容纳27000名芬兰战俘的战俘营，另3个营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战俘。但由于现在芬兰战俘很少（150名），因此战俘管理局请求批准只保留两个战俘营工作人员的全编制，其他各营只保留10%~20%的编制。[①] 这就是说，为新的战俘腾出营地的问题现在并不迫切。苏芬战争也许只是一个契机，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波兰战俘的注意，并联系到各战俘营出现的种种反抗现象，开始着手全面、彻底解决波兰战俘问题。[②] 但是，仅从贝利亚的命令中，还无法看出苏联当局准备用什么方式解决战俘“去”的问题。从以往的结果看，即便是送到特别会议的案卷，也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保全了性命。[③] 这就是说，从贝利亚向三座专门战俘营派去内务部工作人员到决定对上述战俘营中的绝大部分战俘处以极刑，这之间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即需要有可以给这些战俘判定死罪的“材料”。

战俘营情况通报与“减轻负担”建议

其实，在整个12月份，各个战俘营就已陆续上报了一些“反面材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72.

② 与此相关的其他措施还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逮捕全体登记在册的原波兰军队基干军官；要求把三个专门战俘营以外的波兰军官、警察、狱吏等送往科泽利斯克营和奥斯塔什科夫营；把一批有待进一步进行侦查的战俘送往被捕地点；12月31日贝利亚命令战俘管理局第一处处长阿·瓦·季什科夫前往叶列诺－卡拉库布营，调查那里战俘罢工和逃跑事件，逮捕为首分子等。参见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с. 97；*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61、265、269、273－274、278－279。

③ 例如1938年特别会议把36865人送入劳改营，1939年送去109327人。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 9414，оп. 1，д. 1155，л. 8。

料"。在科泽利斯克营11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战俘的政治精神状态，说有些军官表现爱国主义情绪，有信教和从事宗教活动的企图。旧别尔斯克营在相同的总结中报告了所查明的4起"反革命活动"：战俘们组织了"文化教育小组"和"互助会"，进行祈祷，以及诬蔑苏联等。12月7日战俘管理局就科泽利斯克营战俘巴·安·扎哈尔斯基自杀事件给贝利亚呈送一份专门报告，说他因思念家乡和家人长期情绪消沉。12月10日，据科泽利斯克营报告，他们三天前挫败了一起战俘逃跑企图，三名战俘受到惩处。此外，在扎波罗热营、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各劳动营，也都出现劳动纪律松弛，战俘逃跑，拒不出工和怠工等现象。[1] 从各种报告上看，上述事件和现象还是个别的，涉及的战俘人数不多。

但是，在贝利亚12月31日指令下达后，情况有了变化，无论是战俘管理局还是各战俘营，对各营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件的注意程度都大大提高。战俘管理局很快整理出一份"1939年12月1日至31日期间各战俘营政治思想状况中的不良现象和特殊事件"的长篇通报[2]，列举了各营反苏情绪和言论、自杀和企图自杀事件、逃跑和企图逃跑事件以及各营工作人员情况。虽然通报中的材料都是从各营工作报告里汇总起来的，但把此类材料集中在一起，对战俘管理局来说，还是第一次。它所产生的"集重效果"，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换言之，正是由于通报不是对战俘营情况的全面反映，而是某一个方面问题的汇总，所以它在无形中就把这类问题放大了，很容易使人形成"问题严重"的感觉。1940年1月9日，战俘管理局副局长霍赫洛夫就奥斯塔什科夫营在侦查中不断发现一些战俘的真实身份指示该营领导人，要求把战俘构成方面的变化"反映在相应的登记案卷中"，并把"定性材料有改变的战俘名单"上报局里。[3] 11日，战俘管理局就"尼科波尔锰矿"和"十月采矿"发生的战俘罢工和绝食事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写出专门报告，其中列举了"拒绝出工的战俘

---

① 参见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33－234、242－244、352、261、266、270。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286－291.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00－301.

中的反苏挑拨性言论”。[1] 13日，就罗夫诺营战俘企图逃跑事件大大增加，战俘管理局下文指示该营“严格战俘关押制度”并“立即给战俘管理局写一份战俘逃跑的专门报告，说明逃跑发生的次数、促成逃跑的原因”等。[2] 22日，战俘管理局又收到科泽利斯克营的紧急政治报告，反映部分战俘因食物质量差而绝食并“造成了混乱”。[3] 31日，按照贝利亚一个月前的指令来到旧别尔斯克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组也大有收获，他们“在战俘中查出了许多原波兰各种政党的成员，以及许多边防军、定居者、地主、富农等等。”[4] 2月1日，被派往奥斯塔什科夫的索普鲁年科也向贝利亚报告，对关押在这里的警察的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办理了6000份案卷”，“已着手将案卷发给特别会议”。[5] 4日，科泽利斯克营在例行报告中再次谈到战俘中的“错误情绪”和“反革命现象”。[6] 这类情况在旧别尔斯克营的例行报告中也占有相当的篇幅。[7] 19日，一份关于奥斯塔什科夫营战俘准备逃跑的专门报告，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整理完成。[8]

原来只在各战俘营例行报告中以“政治思想状况”为题出现的那些内容，现在直接换成了“不良情绪”、“反革命现象”、“特殊事件”等字眼，而且被汇集起来写成了通报和专门报告，这恐怕就不仅仅是文风上的某种转变了。它如同一架风向标，指明苏联领导人开始对哪类材料感兴趣。这种兴趣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事实证明，它与苏联当局处理波兰战俘问题的决策密切联系在一起。

到1940年2月中下旬，苏军在苏芬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击溃了芬军在主要防御阵地“曼纳海姆防线”上的抵抗，苏芬战争接近尾声。苏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俘获的芬兰军人仅1100人[9]，就连为芬军战俘准备的若干战

---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03.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05.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17 – 308.
④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12 – 313.
⑤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18.
⑥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25 – 328.
⑦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34 – 336.
⑧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41 – 342.
⑨ *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Вехвиляйнен О.* (*Отв. ред.*) Зимная Война 1939 – 1940, с. 326.

俘营中最小的格里亚佐维茨营，容纳这些战俘都绰绰有余。[①] 显然，为接收芬兰战俘而处理波兰战俘的必要性已不存在。按说，关押在三个专门战俘营里的波兰战俘可以继续关押下去了。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大大小小干部在三个专门战俘营“蹲点”一个月整理出来的材料，仍然按照已经启动的程序向上传送着。看来，不管苏联当局原来是怎样设想的，自从贝利亚把一批干部派到战俘营去，对波兰战俘的处理就被纳入了一条单独的轨道，至少它不会仅仅根据苏芬战争的结果改变运行方向了。

1940 年 2 月 20 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请示，要求给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减轻负担”。在贝利亚 1938 年 11 月 25 日接任内务人民委员后，给其管辖的监狱和各种集中营“减轻负担”，是他推行的一条“新路线”。1939 年，在这条路线指导下，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监狱的在押犯人数量下降了近 1/3。[②] 因此，索普鲁年科提出为战俘营“减轻负担”的建议，完全符合贝利亚的政策。在报告中，索普鲁年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将军官中的重病人、完全残废者、结核病患者、60 和 60 岁以上的老人（约 300 人）全部释放回家。将家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材料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与技术员、教师释放回家。据初步材料估计，这类人员可能释放 400 ~ 500 人。”对另一类人员即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波兰军事组织”和“射手”[③] 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原波兰总参谋部二处军官、谍报军官（约 400 人），他提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审查”。战俘管理局负责人还建议，“对这类人员的侦查，最好由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若不行，则将上述所有人集中到奥斯塔什科夫营进行侦查。”[④] 实际上，这是

---

① 在 1939 年 12 月 29 日战俘管理局的报告中，按照贝利亚的命令为接收芬军战俘准备的各战俘营分别可容纳：尤扎营 6000 人，尤赫诺夫营 4500 人，普季夫利营 4000 人，格里亚佐维茨营 2500 人，奥兰营 4000 人，捷姆尼科夫营 6000 人。参见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72。

② 1939 年 1 月 1 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各监狱共关押着 352507 名犯人，4 月 1 日，下降到 281891 人，7 月 1 日前为 196854 人，10 月 1 日前为 178258 人。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3，с. 114。

③ “波兰军事组织”是由约·毕苏斯基在 1914 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起初主要针对沙皇俄国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后并入波兰军队。“射手”即“射手联盟”，成立于 1919 年，是以波兰青年为对象的军事爱国团体，受波兰国防部领导，在政治上支持毕苏斯基派。

④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43.

又一个分类处理方案，但却不是涉及两个战俘营全体战俘的方案。被建议释放的700~800人，加上需要继续审查的人员，不过1100~1200人，只是两座战俘营人员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战俘——主要是军官——怎样处理，索普鲁年科没有提及。也许，在索普鲁年科的意识里，军官和上述那些人员也要区别对待，前者除老弱病重者外，不在“减负”之列。

索普鲁年科的建议受到贝利亚的重视，他召来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就此事进行协商。[①] 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发现留下文字记载，但很有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位领导人就“减负”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做出了决定。仅仅两天后，即2月22日，梅尔库洛夫便指示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转达了贝利亚的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商人及大私有者全部转押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都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侦查部门进行侦查。这些案卷今后如何处理将另作指示。”[②] 次日，战俘管理局给各战俘营下达了相应指示，要求在5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上报人员转送的地点，并继续在营内查找相同人员。战俘管理局的指示特别强调：“将战俘转送至监狱的全部工作都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③]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没有涉及军官战俘。

把上述指定人员送往监狱，对战俘营来说当然是“减轻负担”，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不过是把他们从一个关押地点转送到另一个关押地点，并没有真正“减负”。从真正“减负”的意义上看，索普鲁年科2月20日建议的前半部分似乎更切合实际，可是贝利亚并没有采纳，而是把战俘管理局建议释放的人员也统统送入了监狱。以往的实践表明，监狱也可以进行“减负”，这里“减负”的出路无非就是三条：释放、送劳动营和处决。在无法了解贝利亚当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仅有的材料和常理上去揣摩贝利亚下达如此命令的意图。如果他觉得这些人员最终可

---

① 在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上留有贝利亚的批示：“梅尔库洛夫同志，请来我处谈谈。”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50.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58 – 359.

以释放，那么把他们转送到监狱并在那里继续侦查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如果是打算把这些人员送往劳动营，且不说没有必要非经过监狱绕一个圈子（那些现在仍在一号建筑工地和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所属企业劳动的波兰战俘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其中的那部分老、弱、病重的战俘，也明显地不适宜。这也就是说，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对索普鲁年科建议的第一个正式反应，就已经显露出要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这部分波兰战俘问题的意图了。

处理战俘范围的扩大和政治局决议

2月下旬和3月初，战俘管理局的中心工作就是督促三个专门战俘营上报关押人员的分类统计数字和战俘个人履历登记材料。战俘的登记工作从战俘一入营就开始进行了，为此各战俘营的机构序列上还专门设置有登记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各营登记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尚不能准确、详细地反映战俘真实情况。在贝利亚1939年12月31日的指令下达后，战俘管理局“为了获得各营中关押的战俘的完整资料”，又制订了一份补充履历表，于1940年1月5日下发各营，要求为战俘逐人填写。这份表格分为5栏，除要填写战俘在原波兰军队和其他机构担任的最后一项职务和掌握的外语外，还应“十分详细地填写战俘在苏联居留的地点和时间，以及在苏联居留期间从事何种工作”；“战俘在苏联生活的所有亲属和熟人的情况”，以及“战俘在国外（原波兰境外）的情况，必须写明具体地点、起止日期及从事的工作”。在给各营的指示中强调，应特别注意后三项的填写。[①] 2月下旬，战俘管理局连续下令，要求战俘营在近期内完成此项工作，“须知此项工作不容拖延”。[②] 战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罗舍夫和第二处（登记处）处长伊·鲍·马克利亚尔斯基在2月27日同一天致电科泽利斯克营，要求立即上报该营在押军官的登记材料和侦查材料。[③]

---

①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93.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62－363.

③ 马克利亚尔斯基要求把所有军官的登记材料寄来，而随后涅赫罗舍夫又要求立即派信使送来四五份已经填好的登记案卷。可见，后者比前者更急于拿到这些材料，哪怕是几份也行。*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63。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俘管理当局准备进行处理的战俘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在2月20日索普鲁年科的报告中，他是把军官战俘与警察、狱吏等类战俘区分开来，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后者身上的话，那么现在前者——原波兰军队军官——也被纳入了“视线”。有两个事实可以作为佐证。其一，2月底3月初，战俘管理局整理了一系列的统计材料，统计范围不仅包括三个专门战俘营的全体在押战俘，而且对军官进行了单独分类。其二，3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警卫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国界”的决定，其中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今年4月15日起，将被镇压和关押在战俘集中营中的原波兰军队军官、警察、狱吏、宪兵、情报人员、原地主、工厂主和原波兰国家机关高级官员等的家属，共22000~25000户，悉数迁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各地区，为期10年”。[①] 可见，无论是对待被关押的战俘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苏联当局都对他们“一视同仁”了。

上述材料说明，苏联当局在1940年2月下旬已经决定了对三个专门战俘营中的战俘一并处理。这是不是前一阶段整理出的专门“材料”起了作用，目前尚无法证明；但有了这样的“材料”，无疑使苏联当局更有理由做出对这些战俘给予最严厉处理的决定了。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作出的决议，直接导致了三个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和关押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监狱内囚犯的悲剧命运。贝利亚的信和政治局的决议几乎完全相同[②]，而且是在同一天完成的，这说明苏联最高决策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③]

---

①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99.

② 一处比较大的修改是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从负责审查这些案件的3人小组中划去了，并代之以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这样，加上原有的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弗·尼·梅尔库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3人小组中没有部级正职。这种改动耐人寻味。

③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盖·贝利亚在1994年出版的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申辩，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里唯一一个反对处决波兰军官的人。因为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波兰军队的军官是反希特勒斗争中的潜在同盟者。"谢·贝利亚提出下面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即"无论在1940年3月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材料中，还是在其他文件中，都没有我父亲的签字。"见谢·贝利亚《我的父亲贝利亚》，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编译，群众出版社，2001，第403页。如果谢·贝利亚说的是真实的，那么斯大林把贝利亚的名字划去就好解释了。但现有的材料并没有给谢·贝利亚的观点更有力的支持。因此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第一个签名并写下"同意"，对这个决议如此顺利获得通过，也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1]

政治局的这个决议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1）对战俘营中14700名原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谍报人员、宪兵、定居者和狱吏的案件；（2）以及对逮捕和关押在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11000名各种反革命间谍组织和破坏团体成员、原地主、工厂主、原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分子的案件——以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对他们采用极刑——枪毙。……

审理案件时，不须传唤被告，也不提起公讼，不出示侦查终结书和判决书，而采用以下程序：（1）对战俘营战俘案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材料审理；（2）对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的囚犯，根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出具的材料审理。

三、由梅尔库洛夫同志、科布罗夫同志和巴什塔科夫同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2]

政治局的决议没有说明对上述人员采用极刑的理由，不过贝利亚在自己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所有这些人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视，是苏维埃政权的万恶敌人。"战俘营中的军官战俘和警察战俘，"他们每一个人都等待着获释，以便有机会积极地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西部地区的机关，破获了一系列反革命暴动组织。在这些反革命组织中起积极领导作用的是原波兰军队军官、原警察与宪兵。在拘捕的越境分子和国境线破坏分子中，也查出大量反革命间谍和暴动组织的参加者"。[3]

贝利亚没有进一步列举这些反革命组织、间谍和暴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的具体事例，这就使他的"理由"更接近定性性质，而不是论证性质。仅凭这些人们似乎无法判断这些人"对苏维埃制

---

① 此外，原件上还有莫洛托夫、米高扬、伏罗希洛夫的亲笔签名；另有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字样。

② *Костюшко И. И.* （*Ред.*） Материалы "Особой папки" Политбюро, с. 100～111.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85.

度的仇视”的程度和“反革命活动”的规模。如果政治局委员们没有从别的途径和渠道了解到更多有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情况——可惜，这样的途径和渠道至今还没有得到文件的证实——而只凭贝利亚这样一段文字，就在决定剥夺 25700 人生命的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极其轻率的！

执行政治局决议的行动在以后两个月内紧张地进行。战俘们的个人案卷、侦查案卷和补充履历表由战俘营送到战俘管理局，经审查合格并签署处理意见后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在这里复审，其中一部分提交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进行裁决；其余的则由按照政治局 3 月 5 日决议成立的三人小组处理。由梅尔库洛夫、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总局局长巴·扎·科布罗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专门处处长列·佛·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最多时一天“处理了”1287 份案卷，这使他们哪怕对案卷进行稍微细致的研究都不可能。可以想象，他们能够做到的恐怕就只有在一份份名单上加盖印章了。既然政治局已经作出了决议，谁又能追究他们这种草率行事的责任呢？

5 月中旬，据战俘管理局统计，从三座专门战俘营被送去执行枪决的共 14587 人[①]，加上其他地方送来的战俘，一共枪决了 15131 人。另有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监狱关押的犯人 7305 名，也一并被处决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枪毙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埋在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并在三年后成为这一悲剧事件的第一批无声的揭露者。[②] 另有 395 人未被处死，而是转送到了尤赫诺夫营。在这些幸运地被“留下”的人员中，应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的 47 人，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 258 人，应德国和立陶宛要求留下的 66 人，其中德国人 24 名。[③]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苏联战俘当局认为“值得信任的人”和

---

①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597.

② 1959 年 3 月，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在阅读了保存在克格勃的有关绝密案卷后，给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写信，汇报了枪毙波兰军官、警察、间谍的情况。根据他提供的数字，在卡廷森林枪毙了 4421 人，在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分别枪毙了 3820 人和 6311 人。见 *Райский Н. С.*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и судьбы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с. 136－144。

③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598.

“有用的人”。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关部门执行贝利亚 1939 年 10 月 8 日命令的工作成果。

苏联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决定对上述人员实施肉体消灭呢？这是一个就现有材料还难于做出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贝利亚所说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当然，考虑到在此之前汇集起来的那些通报和专门材料，不能说贝利亚的话毫无所指，完全是凭空捏造。但正如前文所述，这是战俘与战俘管理制度之间矛盾的正常反应，是战俘管理体制运行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来的现象。因此，对三座专门战俘营的大多数战俘来说，给他们扣上这样一顶定了性的“帽子”，是不公正的。

可以说，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战俘命运，从决定对波兰战俘实行“分类处理”的时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成了苏联体制下最难以信任和接受的分子。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国家的看法，对从波兰“收并”回来的地区进行改造的需要，都使他们对这些战俘身上隐藏着的“潜在威胁”格外警惕和敏感。苏联领导人也许一开始对“改造”这些战俘还抱有希望，因此没有在抓获他们的最初几个月就处决了他们。[①] 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只能说明苏联领导人在“改造”这批不是一般意义的战俘上缺乏应有的耐心。缺乏耐心，说到底，还是信心不足。前面说过，在苏联当局与被关押战俘这对矛盾中，前者处于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战俘的抵制甚至反抗固然增加了取得“改造”成果的难度，但这不是导致以肉体消灭方式解决矛盾的主要原因。苏联领导人对“改造”这些战俘丧失了信心，对所建立的战俘管理制度能够和平地解决与战俘之间的矛盾丧失了信心，才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① 俄国学者指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借助于工作人员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兰军官和警察虽然在十分艰难的被俘条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却并没有被摧垮。他们并未背弃自己的祖国，未背弃自己的宗教，也未背弃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道德价值观。苏联领导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军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36。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①] 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 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 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 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 途中的业务工作；5. 后勤保障。”[②] 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③] 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

① 进人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如 *Лебедева Н. С.* О трагедии Катынские голоса; Катынь: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я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Парсаданова В. С.* К истрии катыского дела; *Абаринов В.* Катынский лабиринт; *Зоря Ю. Н.* Режиссер Каты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сборнике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 О. В.* Катынская драма: Козельск, Старобельск, Осташков: судьба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

②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83.

③ *Пихоя Р. Г.*, *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 Катынь, с. 383.

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①] 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②] 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

① 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

② 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80、587。

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1] 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 6 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 15 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2]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 年 4 月 13 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一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 1943 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

---

① *Пихоя Р. Г.*，*Козлов В. 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 21 – 522.

② 1940 年 10 月 26 日，贝利亚签发第 001365 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 125 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 人提高了月薪，81 人每人一次性奖励 800 卢布。见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00，№5，с. 110。

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①]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

① 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

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①]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摩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

① 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

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 1939 ~ 1940 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 4 月 8 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 1919 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 11 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 1942 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 1943 年 4 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 ~ 1943 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

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①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中断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

柏林电台在1943年4月13日就卡廷森林的发现播发的消息，对波兰流亡政府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多少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确切验证那些被害者的真正身份，但流亡政府曾多次请苏联政府查找一些著名军官的下落而一直没有得到答复这一事实，以及在苏联宣布释放几乎全部战俘后这些人仍无音信的不正常现象，已经足以使它对这些军官的命运作出最坏的推测了。因此，德国人公布的消息，在伦敦的波兰人直觉上感觉是可信的。加上在此之前，由于安德尔斯的军队以及苏波双方在大使馆代表问题上的摩擦，苏波关系已经日益紧张，它们之间已经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来容纳这一突发事件了。4月17日，流亡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准备向国际红十字会寻求帮助，以弄清真相。同时，还由国防部长库基耶尔

① 这两份材料均出自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Ⅲ From 1940 through 1945 Europe Volume 5 Central Europe April 1943 - March 1944*,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8, pp. 109 - 110、105 - 106。

出面发表报告，介绍了波兰方面为寻求一批军官下落多次努力未果的情况。流亡政府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调查此事的书面文件与德国一份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几乎同时送交到瑞士洛桑的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这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客观上它使波兰流亡政府陷入了被动。在苏联政府的猛烈攻击之下，流亡政府只好又于4月30日宣布，它们认为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已经失效。[①]

与此相反，苏联政府在这件事上却由被动转为了主动。应当说，“卡廷事件”对苏联政府完全是一个意外。在1940年春处理这批波兰人时，大概没人会想到出现这样的结果。4月16日，苏联政府在沉默两天之后才发表公告，对德国的宣传给予反击。公告中说，“德国法西斯恶棍在自己新的荒谬绝伦的臆想中并没有停止散布最荒诞不经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他们企图利用这些谎言掩盖由他们自己制造的滔天罪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②] 苏联反击的理由是，第一，在1941年夏，在红军撤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从事建筑工作的波兰战俘和大批苏联公民一起落入德军手中；第二，德国人所说的发现大批遗骸的格涅兹多沃村是历史上有名的“格涅兹多沃墓葬”考古挖掘地，而德国的宣传对此避而不提。

客观地说，苏联提出的上述理由并不具有多大的说服力。被德国抓住的波兰战俘和被苏联处死的波兰战俘，完全有可能是不同的两批人[③]，因此在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批人的情况下，德国人所说的被害者和苏联所说的被抓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对立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当在苏联组建波兰军队时，波方数次询问过一批波兰军官的下落，当时苏联当局——包括斯大林的回答，都是苏联已经释放了这些

① 见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第224～233页。

② Известия, 16 апрель 1943г..

③ 在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后，按照调查德国占领者罪行特别委员会的指令，一个调查“卡廷事件”的专门委员会立即着手展开调查。从1943年10月5日至1944年1月10日，该委员会询问了95名证人，审查了17份证词。其中很多证人证实，在1941年春夏，即该地被德军占领前，他们看到过从事建筑劳动的波兰战俘。不能说这些证人的证词都是伪造的，因为这些证词在由专门委员会负责人之一A. C. 苏希宁中校起草的一份绝密文件中也被引用了。见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0, №11, c27～34。

人，而从没有提起过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人们会问，如果真是这样，苏联当局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波兰政府这一点呢？至于考古挖掘的理由就更经不起推敲，证明哪些是年代久远的遗骸，哪些是刚刚掩埋了两年的尸骨，对于法医和生物学家来说并不困难。这种漏洞当时就被戈培尔及其宣传机器抓住了。在4月17日由戈培尔主持的会议上，纳粹宣传部长说，"布尔什维克昨天犯的一个大错就是他们编造了'考古遗物'。在那里国际委员会将进行考证并将戳穿这一无耻的谎言。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说到的那些成了德国俘虏的波兰军官，就是现在波兰人多次、甚至向斯大林本人问询过下落的那些军官。"戈培尔因此建议，"现在我们应当等待国际委员会，我们自然不应信口开河，而应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① 苏联在公告上出现的明显不利于自己的漏洞，再次说明了这件事对苏联来说，的确来得突然，令它措手不及。

但是苏联迅速利用了自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获得的，并由刚刚结束不久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大大巩固的有利地位，把任何对自己不利的东西统统与希特勒分子的恶意污蔑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污蔑发生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更显得合情合理。虽然流亡政府在最初的声明中就有意划清自己与戈培尔之流的界限，但苏联仍把它指责为与希特勒分子同流合污。② 在一时无法确切得知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已有的和公认的事实出发进行判断，在这一点上，纳粹政权以往犯下的桩桩罪行，倒是比什么都更具说服力。另外，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在这件事情上的大做文章，也在无形之中帮了苏联的忙。还在4月6日，即德国正式公布卡廷森林发现前的一星期，戈培尔的亲信就决定要把"取证立即用于宣传目的"，并希望找来在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红十字会的人。③ 4月14日戈培尔指示："我们宣传的中心近几天将更集中于两个题目：大西洋壁垒和布尔什维克卑鄙的屠杀。要用不断提供新的事实向世界证明苏联的这一兽行。在评论中就像经常作的那样，应当特别指出：这就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信任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改变了政治信仰。这就是已经从英国人那儿得到统治和向欧洲进

①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0, №12, с. 33.

② Правда, 19апрель1940г..

③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0, №12, с. 31.

行布尔什维克渗透绝对权力的布尔什维克。"[①] 戈培尔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不仅要用卡廷事件攻击布尔什维克，而且还要以此"在敌人阵线里制造巨大的分裂"。[②] 这就足以引起反法西斯盟国的警觉了。这种警觉是与战争的结局，换句话说，是与盟国的整体利益和当时最大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像卡廷事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真相一时无法弄清楚的时候，孰轻孰重是不难做出判断的。尽管这些判断现在看来并不准确，但在当时也只能如此。

就是凭借这些因素，苏联不仅变被动为主动，而且首先反戈一击：4月25日，莫斯科照会新任波兰驻苏大使罗梅尔，宣布苏联政府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照会除了指出，波兰政府的一系列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与德国政府之间"在进行敌视苏联的运动中有接触和勾结"，而且还把此事与苏波边界问题挂上钩，认为波兰流亡政府是要借此"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作出损害苏维埃乌克兰、苏维埃白俄罗斯和苏维埃立陶宛利益的领土让步。"[③] 这就表明，苏联已经看到，在与流亡政府不能进行军事合作之后，也不可能跟它解决边界问题了。

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保持外交——其中包括军事合作关系——的33个月中，苏联曾试图解决"波兰问题"，包括确定苏波边界、解决未来波兰领土问题，以及建立苏波军事联盟对德作战等。但最终上述问题都未能彻底解决。可以说，苏联的尝试是失败的。究其原因，其一，是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在整个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使它不可能把战后的政治安排问题放在首位。而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也使它在谈判中至少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并不像以后那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苏联提出的某些设想，如让战后的波兰"向西移"等，也因德国法西斯风头正劲，而在现实性上打了折扣。其二，"波兰问题"既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大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苏联在战争

①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0, №12, с. 31.

②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0, №12, с. 33.

③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ом Ⅶ, с. 356 - 357.

初期非常需要英美的支援——从提供武器装备到开辟第二战场，这就增加了英美两国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分量。无论是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还是在安德尔斯军队撤出问题上，英美两国都没有支持苏联的立场，相反，它们借助某些问题向苏联施加压力。[①] 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缺少了主要盟国的认可与合作，是难以办到的，更不用说它们的掣肘和反对了。其三，波兰流亡政府无论是在边界问题上，还是在苏联境内的军队问题上，立场坚定，态度顽强。这固然有西方大国背后支持的因素，但也应看到，从它的立场上看，两个问题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一则，作为一个由四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二则，在这样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将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直至断送整个政府的政治前途。同时，历史上俄国对波兰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的一系列做法，也确有伤害波兰民族感情的地方，这对流亡政府的决策也会产生一定作用。

尽管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有益的结果，但这段经历对它来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至少体会到，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对按苏联的意愿解决“波兰问题”多么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波兰流亡政府虽然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缔结军事合作协定，也可以联合签署友好互助宣言，但从骨子里还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维护的仍然是战前波兰政权所维护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执行的对苏政策也自然难有根本的改变。“两个敌人”的口号虽然不再公开宣传，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弃。那些曾经积极推行反苏政策的人仍然在流亡政府中占据高位要职，在流亡政府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这样，对苏联来说，解决“波兰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逐渐清晰了：苏波两国的武装力量要共同对德作战，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奠定战时与战后苏波对德同盟的基石；未来波兰边界的确定首先要保证苏联的安全利益，同时波兰的领土可以考虑用从德国收归部分领土的方法向西扩展，这是解决波兰边界领土问题的最佳方案；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

---

① 英国在安德尔斯军队撤离问题的做法如前所述。而罗斯福也曾在1941年11月中旬让租借事务总统特使艾·哈里曼捎信给斯大林，表示美国对把波兰军队转向西方大国指挥感兴趣。

友好的政府，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关键，也是建立苏联概念中的民主、独立新波兰的必备条件；另外，在解决“波兰问题”过程中，争取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也是必要的，这是由于“波兰问题”本身与这场战争、与战后的政治安排已经密切联系在一起了。它不仅仅是波兰内政问题，更是一个国际问题。

大迁徙：苏联的特殊移民政策及其后果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师建军

20世纪30～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政策将数百万人口强制迁移到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整个30年代，特殊移民政策以“流放富农”为主。30年代中期以后，当局加强了对部分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从40年代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和一些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针对特殊移民的监管体制不断强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开始着手解决特殊移民问题。时至1965年，特殊移民群体基本不复存在。特殊移民政策的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对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族际关系等各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是导致苏联最终瓦解的诸多因素之一。

80年代中期以前，与特殊移民相关的问题一直是俄国学术研究的禁区。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和大量官方档案馆对外公开，俄国学界在特殊移

民研究领域才有了巨大的发展。[①] 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学者在相关文章和专著中都涉及了苏联特殊移民问题[②]，但时至今日仍没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近年来虽然有学者在文章中对苏联特殊移民现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即使在苏联特殊移民的概念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区，如认为特殊移民只是指流放富农。事实上苏联特殊移民的范围还应包括斯大林执政时期被当局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现象涉及苏联农民和民族两大问题，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苏联当局在特殊移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违法乱纪、不尊重人权、违反人类社会一般道德原则等行为，充分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弊端，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和国家分崩离析的重大原因之一。即使是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至今仍为这一政策的恶果——国家农业的落后和民族间的纷争而大伤脑筋。通过研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不仅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而且对判断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本文运用近年来俄国解密以及国内外学者论著中所提供的苏联—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相关文献[③]，对苏联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后果作一初步的探讨。

---

① 从事这方面专题研究的俄国学者主要有 В. Н. 兹姆斯科夫、Н. Ф. 布卡依，前者主要从事特殊移民史研究，后者主要从事民族驱逐史研究。

② 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史方面的学术著作，只有一本关于俄国时期移民的著作（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该著作以1861年至1917年以前沙俄时期的西伯利亚移民为主，对苏联特殊移民问题只是稍有提及。涉及苏联时期移民问题的论文有谭继军的《试析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和冯佩成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3期）。

③ 本文参考和引用的资料包括俄文著作：*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М.：НАУКА，2005；*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 Вашему указанию..."，М.：АНРО-XX，1995；*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проблемы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2002，以及俄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文资料有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徐天新、叶书宗、郑异凡、杨存堂等《中国史家论苏联》，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1861～1917）》等。

一　关于特殊移民的基本概念

特殊移民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

移民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移民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分为自愿性移民和非自愿性移民两大类别。自愿移民是指人口主动地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例如15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内西欧大量人口自愿迁往美洲新大陆；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阶段东部人口大规模向国家西部迁移；20年代初在政府的鼓励下俄国大量人口自愿迁往东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地区和森林草原地区等地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开发和发展各边疆地区和落后民族地区，政府在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活动的同时，也鼓励各民族居民自由迁移，据苏联学者估计60～80年代中期国家内部共有1500万人自由迁移。[①] 非自愿性移民是指由于人口受到外力的强制作用而发生的一种移民运动。根据所受到的外部强制力（地震、瘟疫、战争、私人强制和国家强制等）的不同，非自愿性移民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例如，17～19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被大量"强迫迁移"到南、北美洲；苏联30～50年代由于战争等原因而出现的"撤退（эвакуация）人口"、"撤退回迁（реэвакуация）人口"、"遣送回国（репатриация）人口"和"驱逐出境（депортация）人口"等各类型的非自愿移民。

苏联特殊移民[②]与上述移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殊移民属于移民活动中的非自愿性类型，但与其他非自愿性移民又有一定区别。它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相对其他非自愿性移民群体，苏联特殊移民具有如下特点：①规模大。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3年被当局以特殊移民

①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1946～60年代初）》第6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第485页。

② 苏联在表述这一概念时，使用过三个俄文词，即 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三者为同义词。

方式发送到苏联东、北部边远地区的人口共计600万左右。[①] ②持续时间长。此类移民活动实际持续时间达20余年——从30年代持续至斯大林去世，直到1965年苏联特殊移民群体才基本不复存在。③苏联特殊移民的历史总体呈现出以"流放富农"为主逐渐向驱逐少数民族方向演变的发展轨迹。30年代初，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镇压富农的高潮中便有一些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族等）作为富农遭到了强制迁移；30年代中期以后"流放富农"力度趋缓，当局开始强化对国家西北、西部、南部和东部诸边境地区一系列少数民族的驱逐政策；40～50年代初，当局在大量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同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驱逐少数民族的活动，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数量逐渐在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中占据主导。④涉及面广。特殊移民几乎涵盖了苏联时期以农民为主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了俄罗斯族人在内的大多数苏联民族；既涉及农民问题，又涉及民族问题；对苏联乃至当今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诸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民族纷争（如车臣战争的爆发）均与苏联政府当年的特殊移民活动不无关系。[②]

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产生的"特殊人口"群体之一

20世纪30～50年代初，在斯大林的强力镇压政策的指导下苏联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强制移民活动制造了一个规模庞大而稳定的"特殊人口"[③]群体。特殊人口由多个不同的丧失了自由的子群体组成。它具体包括：关押在监狱、劳改营和集中营中的囚犯，流放犯（包括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拘留民，检查—过滤营（ПФЛ）犯人，劳动军中的动员民，特殊移民和行政移民，等等。

一般而言，囚犯（заключеные）、刑事流放犯和政治流放犯都是被法庭判决有罪的人，均有一定的服刑期。囚犯是指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或政治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М.：НАУКА，2005，с. 283.

②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2页；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4～388页。

③ "特殊人口"一词最先见诸于古拉格相关文件。据最低估计，1929－1953年苏联国内此类人口共计3200万人，其中被送进劳改营、教养院、监狱和苦役营的人数至少有1800万人。参见*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4，№3，с. 134。

原因被法庭判处监禁而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等固定设施内服刑的没有行动自由的人口。刑事流放犯指由于触犯国家法律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政治流放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法庭判决流放的人口。但在斯大林时期，当局在处理流放案件时往往是根据有关部门的指令或决议来执行的。例如 1937 年当局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937 年 6 月 15 日指令，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索契、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顿河地区的如下人口实施了政治流放：1934 年 12 月 1 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的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派、其他“反苏维埃”组织成员及其家属；1934 年 12 月 1 日被开除俄共（布）党籍，从事反苏活动和反动宣传等分子及其家属；因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遭到政府镇压并被判处 5 年以上徒刑者及其家属等。[①] 1942 年，当局根据国防委员会 1942 年 5 月 29 日第 1828cc 号决议又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 1 万名“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政治流放。直到 1952 年底，这些政治流放民才被转为特殊移民。[②]

拘留民：指因存在通敌嫌疑而被关押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所属集中营中的苏联公民。这些人在经当局审查后，如果查无实据便会被发往特殊移民区。[③] 例如 1950 年春季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新类型“来自波兰的拘留民”便属于此类人口。这些人因被当局怀疑与红军为敌而在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的集中营内被关押了 6 年。1951 年 3 月 6 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 684－343cc 号决议他们均被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

检查—过滤营（проверочно-фильтрационных лагерей）犯人：主要都是些被当局怀疑曾在德国军队和警察部队中服过役的、从国外被遣返回来的和有叛国嫌疑的人口。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这些人口可能获释或直接被转为特殊移民。例如 1946 年出现的一支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符拉索夫分子”中的多数人就是在经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检查—过滤营的审查后才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

劳动军中的动员民：劳动军又称劳动营，是古拉格文件中的一个专用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9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8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3.

词汇，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个机构，管理体制类似集中营。被迁入该机构的人口被称为动员民，主要包括特殊移民中的年轻力壮者和军队遣返人员。整个战争期间被动员进入此类劳动营或劳动军的各类人口共计4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德意志族人。对于那些适龄入伍的德意志族男性来说，进入劳动军就算服军役和上前线。1945～1946年，劳动军被当局撤销，应国家动员而进入劳动军的一部分德意志族动员民被当局就地转为特殊移民，另一部分人则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相关决议被迁入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

行政移民（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высланный 或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ссылка）：行政移民早在沙皇时期便已存在。18世纪20～30年代，沙皇政府根据相关指令将没有人认领的逃奴和流浪汉、被缉拿归案的企图偷渡到国外的人、制造金银物品成色不足者、伪造和倒买金银物品者、酗酒或赌博的工场主和工匠等从原居住地迁往另一地区。斯大林时期，行政移民均拥有"完整的"苏联公民权。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式的特殊移民登记册，但可能随时被转为特殊移民。当局对于此类移民的管理相对宽松，后者甚至可以自由地出入移民区范围，只是不得返回原迁出地。例如1937年被当局从远东地区强制迁移到中亚地区的朝鲜族人，1938～1939年被从阿塞拜疆迁移到哈萨克斯坦的伊朗人，1942年3月根据列宁格勒前线军事委员会相关决议被从列宁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迁移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区的因盖尔曼兰德人（ингерманландцы），等等。[①]

在苏联社会中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处于普通公民（如农民或行政移民）和"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关押在监狱、古拉格集中营中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刑事犯）、战俘、被拘留者、检查—过滤营犯人等之间，与由于政治和刑事原因遭到流放的流刑犯也有所区别。与普通公民相比，特殊移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权利受到更多的限制，并受到当局的政治歧视（如特殊移民初期政府规定：特殊移民没有选举权，不能参军，在企业工作的不能参加工会；特殊移民受到移民区管理部门的严格监督，不得随意离开移民区范围，否则便会遭到罚款、拘留、逮捕、关进监狱或集中营；一些被驱逐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即使在获得解放之后仍无权返回原迁出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83.

地）。在经济上，特殊移民比一般农民承受的压力更重（例如当局相关法令规定：凡特殊移民工资的5%应扣除，用于支付移民区的管理费用）。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区多分布在国家边远地区，气候等自然条件极其恶劣。

与“特殊人口”中其他成员相比，特殊移民的社会地位又相对较高。在政治方面，特殊移民至少在特殊移民区内的行动自由是不受限制的，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后特殊移民的选举权得到了政府表面上的承认。在经济方面，特殊移民一般均能得到国家信贷和物资方面的扶持，1944年当局撤销了扣除特殊移民工资5%的规定。当其他类型特殊人口在监狱或集中营服刑期满后，作为一种“优惠”政策当局往往会将其转为特殊移民。在生活方面，特殊移民可与家人一起居住，只要不离开移民区，其生活方式基本上与强制迁移前无太大差异。

特殊移民和流放民都属于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不过，他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流放民（ссыльнопоселенец/ссыльные/высланные）属于由于一定的政治和刑事原因被判刑而在监外服刑的犯人。特殊移民一般都是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遭流放的，主要由被当局以富农名义镇压的农民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强制迁移的苏联诸少数民族组成。流放民都有一定刑期，期满后可获释或被转为特殊移民，而特殊移民则包括有期、不定期和无期等三种类型。当局针对流放民所实行的监管制度比特殊移民更为严厉。[1]

特殊移民在发展中的不同类型

整个20世纪30年代苏联特殊移民只有一种类型，即流放富农—特殊移民。40年代以后，当局不断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强制迁移，特殊移民类型逐渐呈现多元化趋势。根据不同的标准，特殊移民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

第一，如果从迁移的对象来看，截至1954年1月1日特殊移民整体上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2]

---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6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29. 附表44《截至1954年1月1日苏联特殊移民人口状况》。

30年代的流放富农——1930～1933年的流放富农、由于在国家粮食采购和其他运动中从事破坏和消极怠工而被法庭判决迁移的人口、因公民证制度和拒绝迁往距莫斯科、列宁格勒等中心城市101公里以外地区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三项”决议遭到强制迁移的城市无业游民（主要发生在1933年）、根据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决议从边境地区被迁居的人口（主要包括：1936年的波兰族移民，1937年来自苏联—伊朗和苏联—阿富汗边境等地区的移民）、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法庭判刑（主要发生在1932～1933年）3～5年并在囚禁地区服刑期满后又被发送到特殊移民区的犯人。

40～50年代初被驱逐的多个少数民族，这里包括：德意志族移民（普通移民、遣返民、当地民、动员民等），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移民（车臣族、印古什族、卡拉恰耶夫族、巴尔卡尔族），来自克里木的移民（鞑靼族、希腊族、保加利亚族、亚美尼亚族等），1944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土耳其族、库尔德族、赫姆申族等），卡尔梅克族移民，伊朗族移民，卡巴尔达族移民，战前和战后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诸州的移民、来自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移民（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1950年来自普斯科夫州的移民，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其他社会组织和集团包括：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希腊族、“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族等），“奥乌诺夫分子”，“符拉索夫分子”，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安捷尔斯分子”，“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巴斯马奇分子”，“正宗东正教徒”，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斯克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居的移民，以及1944～1945年来自波兰领土的被拘留者。

第二，从移民期限上，苏联特殊移民又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别。

永久性移民——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格鲁吉亚等地的移民，卡尔梅克族移民，德意志族移民，“奥乌诺夫分子”，战后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

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除外），来自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耶和华教派，"巴斯马奇分子"和"安捷尔斯分子"。

未注明期限的移民——属于"遣返民"、"当地民"和"动员民"诸类型的德意志族移民，1945～1948年来自立陶宛的移民，1936年被强制迁居的波兰人，1937年从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被强制迁移的移民，正宗东正教派，1929～1933年被迁移的流放富农，"福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部分来自克里木的"其他"类移民，1945年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遣返民。

有期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的移民，1942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符拉索夫分子"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

第三，从特殊移民的人口来源和历史演变总体进程等综合因素上，特殊移民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

在同一时期，针对不同类型的特殊移民当局所实施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例如4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已变得较为宽松。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解除迁移限制，但波兰族阿萨特尼克[①]即使在移民区内也不得自由改变住址。当局为少数民族—特殊移民所制定的管理制度更加严厉。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所生的子女从出生之日起便是自由人，即使那些随父母一起迁入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子女，如果年满16周岁要到外地求学便会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则没有这样的待遇，他们从出生之日起便被登记为特殊移民身份。

对于同一类型特殊移民，在不同时期当局的管理体制也会发生变化。30年代初，当局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管理相当严格。例如1931年10

① 1940～1941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人。阿萨特尼克（осадник）主要是波兰军队退役人员。他们由于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表现英勇，作为奖励于1920～1930年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聚居的地区获得了大量土地。阿萨特尼克对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肩负着警察职能。1939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并入苏联，阿萨特尼克及其家属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流域、乌拉尔、苏联欧洲北部等特殊移民区。

月7日一份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Г.Г.雅戈达签署的《关于特殊移民义务和特殊移民区内行政机构职能的临时条例》的文件便规定：“凡特殊移民不得离开移民区，不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允许，无权变更居住地点和居所；取消其个人和家属生活不得侵犯权、私人住宅不得侵犯权、通信保密权、国家事务的参与权（特殊移民不能参加选举）和自由集会权；特殊移民必须接受强制劳动，其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派出机关负责；在企业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① 而到了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的决议则规定：“擅自离开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如果在离开政府指定移民区的最近三年内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政府将不再追究其从移民区逃跑的责任和强迫其返回特殊移民区。”②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苏联特殊移民是一个极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现象，要想为它作出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过我们至少可作出如下基本定义：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国家专政机关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个非自愿性移民群体；特殊移民属于特殊人口之一，社会地位较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但又较其他特殊人口优越；受到政府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只能居住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不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特殊移民包含有多种类型，但基本上可分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和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两大类型。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

① *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х-начала 50-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27.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 с. 113.

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①]，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②] 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

① 劳动移民，俄文称作 трудпоселенец。它与特殊移民 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ец 或 спецпоселенец 属于同义词，指在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和未经法庭宣判情形下便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制迁移的人口。区别在于：前者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而后者所包括的特殊移民人口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指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包括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0页。

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①]

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 年 1 月 1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 月 26 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 年 2 月 1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 年 2 月 4 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②] 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160 页。

②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 - 198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 295 页。

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M. Д. 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 Я. С. 阿格拉诺夫和 Г. Е. 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①

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② 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③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0.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1960), с. 35.

③ 即集中营管理总局，1934年以前它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辖制，1934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

机关共有工作人员 25000 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 5%（1931 年 8 月前为 25%，1932 年 2 月前为 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 1937 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 1700 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 5% 提留则高达 2740 万卢布。[①]

1930 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 年 4 月 8 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 1932 年 5 月 15 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 1931 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 10 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②]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③]

1930 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④]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1936 年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0.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1.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4.

④ 苏联特殊移民体制存在时期特殊移民所发动的最大规模起义于 1931 年 7 月末在纳雷姆斯克边疆区的巴尔比克斯克警备辖区爆发，参加此次起义的特殊移民共计 1500 人。起义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队、警察和党—共青团积极分子武装的残酷镇压。镇压过程中起义者共损失 105 人。起义的组织者被当局判刑，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参与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在内，共有数百人）被发往遥远的阿列克桑德罗—瓦霍夫斯克惩戒警备区。具体参见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3，1994，с. 128－138。

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 6530 人，1937～1938 年 41215 人，1939～1940 年 5467 人。[1] 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 1935 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 94 户特殊移民（共计 460 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2]

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3] 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只是到了 1930 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来到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自 1933 年 1 月 1 日起在特殊移民中实行了凭证物资供给制度。[4] 1935 年，各移民区特殊移民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 16819 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 295 所，但当地还有 12% 的特殊移民依然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5]

“富农流放”之初，移民区中学教育体制极不健全。1931 年，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特殊移民区内有学龄儿童 12.9 万人，而上学儿童的比重还不到 3%。[6] 直到 1930 年代中期，这种不良状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多数移民儿童已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教育。截至 1938 年 9 月，特殊移民区共建有 1106 所初级中学、370 所不完全中学和 136 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 230 所职业中学和 12 所技校，在校教师 8280 人，其中 1104 人为劳动移民。在校劳动移民子女 217454 人，学龄前教育机构网络中共有特殊移民幼龄子女 22029 人（教师 2749 人）。分布在各移民区内的儿童院共收养移民孤儿 5472 人。移民区内共设有俱乐部 813 所，1202 所图书阅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5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58.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5.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2.
⑥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44.

览室和读书室，440个移动电影放映队，1149所图书馆。[①]

1936年春，当局放松了对“流放富农”子女到高等院校和技校学习的限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1936年4月15日通令和古拉格同年4月20日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凡特殊移民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并得到所报考院校录取通知书者，可从移民区获释；对于那些需要到外地接受入学考试的特殊移民子女，管理部门可批准其离开移民区，并为其开具临时离开移民区的证明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那些考入8～10年级中学且需要离开移民区到外地继续求学的移民青年。[②]

特殊移民的劳动安置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其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③]

1938年初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职工。1935年9月以前，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36年7月27日颁布的《关于特殊移民社会保险和劳动条件》决议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自1931年8月1日起开始计算，此后工作年限才可作为其退休金和津贴发放数量的依据。1931年以前，特殊移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均视作“从事剥削时期”，不计工龄。由于非流放富农出身的劳动移民中有一些人已有多年受雇用的历史，根据1937年8月11日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对上述决议作了如下的更正：只有流放富农出身的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不计1931年8月1日以前的工作年限。[④]

根据相关决议，1934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费。[⑤] 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均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特殊移民经营状况极其恶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4。

③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48。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1.

⑤ 针对北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生产的特殊移民，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一直持续到了1935年1月1日前。

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例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1933年6月27日决议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935年10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也规定：1935～1936年间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农业自留地经营可免除按国家采购计划应交纳的粮食、土豆和畜产品等义务。[①]

1938年初，特殊移民区共建有非章程特殊移民农业合作社1058个。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②] 另外特殊移民还被用来从事土地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畜牧业。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例如1939年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事务负责人М.Д.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农业人民委员И.А.别涅基克托夫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П.П.洛巴诺夫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说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让特殊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向各工业企业和建筑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党委和基层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特殊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免费证券。如果一定要奖励他们，完全可采用其他方式，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划定的移民区逃跑。[③]

30年代，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无权服兵役。1932年4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经济安置和劳动利用》和《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内后方民兵用于国防—战略意义工作》等决议均强调："不得将特殊移民适龄人口征召入伍。"[④] 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极力通过各种渠道防止特殊移民自发的军事化倾向，禁止向移民青年发放"伏罗希洛夫步兵"和"时刻准备劳动和保卫祖国"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47－48.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51.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57.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61.

徽章。根据古拉格 1932 年 12 月 4 日通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①]

迁移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从 1933 年起，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1933 年 3 月 17 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复富农子女选举权》的决议指出，“流放富农子女成年后，如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举权”。[②] 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经过 5 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1936 年 12 月 5 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其第 135 条款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1937 年 8 月，И. И. 普里涅尔在一份写给 Н. И. 叶若夫的报告中说：“近 3 ~4 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大量特殊移民发来的申诉书。后者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改变。”[③]

还在 30 年代初的流放富农期间，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作为“流放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例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被作为富农遭到了流放。[④] 3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当局开始在国家各边境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民族驱逐活动。先后遭到强制迁移的民族有：苏联西北部列宁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的芬兰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等等。上述事实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已呈现出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的迹象。

1940 ~1953 年的特殊移民政策

这一新政策显示出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控制、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和强化针对特殊移民的管理制度。

从 30 年代初“富农流放”之日起，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61 - 62.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62.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64 - 6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281.

殊移民便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移”、子女求学、根据1938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而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加入，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在90万人左右。[①]

1941～1954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变化的基本趋势

年/月/日	人　数	年/月/日	人　数
1941年10月1日	936547	1948年4月1日	210556
1942年1月1日	911716	1949年1月1日	130463
1943年1月1日	724498	1950年1月1日	108386
1944年1月1日	669687	1952年1月1日	42166
1945年1月1日	631137	1953年1月1日	24686
1946年1月1日	599477	1954年1月1日	17121
1947年4月1日	481186		

资料来源：该表系笔者根据俄国学者兹姆斯科夫的专著和文章中的相关数据编制而成，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98－99、104、149、154、210；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1，с. 131、132。

根据此表的统计数字，从40年代起，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数开始不断萎缩。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战前和战争期间，当局未再延续以前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来源枯竭。

其二，战争期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大量流失。例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芬兰诸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194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便有5250人。[②] 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红军解放该地区之前与撤退的法西斯军队一起走的。

其三，战争期间，大量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青壮年人口应征入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24－125（附表4）。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14.

伍。这些人在战后均未返回移民区，从而导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16周岁以下儿童）人口比重增加，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下降。关于1945～1950年此类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关数据可参见下表。

1945～1950年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比值

年　代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出生与死亡人数比
1945	6532	8196	-1.25
1946	6269	5980	+1.05
1947	2826	3216	-1.14
1948	1165	1980	-1.70
1949	1097	1450	-1.32
1950	357	734	-2.06
1945～1950	18646	21556	-1.16

资料来源：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42（附表13）。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除1946年外，1945～1949年间的其他年份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表明，此类特殊移民的死亡人数多于出生人数。

其四，战后，许多在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族、车臣—印古什族等特殊移民均被根据其民族属性迁入战争期间各被驱逐少数民族所在的特殊移民区，与自己的同族人合并到了一起。例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2年7月1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还有28009人，但其中并没有包括1929～1933年及稍后年代以流放富农名义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德意志族（13898人）、卡尔梅克族（87人）、格鲁吉亚族（1716人）、来自北高加索的少数民族（450人）和来自克里木的少数民族（16人）。[①] 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另一类特殊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卡尔梅克族特殊移民等。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局对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1930～1954гг），с. 136.

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政策。

第一，解除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1942年4月11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颁布了第1575cc号决议。根据该决议，194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的适龄入伍青年35000人”被征入红军。自1942年4月15日起，他们将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补充到作战部队和从前线撤出的步兵师中，另外也可直接用于组建坦克部队和其他特种兵部队”。自战争爆发至1942年11月，应征入伍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60747人。[①] 1942年10月22日，苏联人民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撤销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002303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内“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子和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无条件地向其发放公民证和免除其5%的工资提留”。[②] 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以后，此类红军士兵的战斗士气明显高涨起来。1943年，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的此类人口及其家属共计102520人。[③]

第二，当局认为，在经过数年改造之后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决议和法令。1944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所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不必返回特殊移民区。政府也不再追究其逃跑的责任”。[④] 另外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5月25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⑤] 1946年9月28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从特殊移民区释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条例》的第00868/208cc号法令。其中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放富农具体包括：1）有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加者的家属；2）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295.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 - 1954гг), с. 13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29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296.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Кулацкой ссылки (1930 - 1954гг), с. 132.

的表彰和奖励；3）与非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检察院经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再呈请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特别会议批准。"①

第三，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令仍继续发挥作用。从1941年1月1日到1943年4月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决议②，共有136240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其中1941年62808人，1942年63113人，1943年1~3月10319人，1944~1953年，仅凯梅洛夫斯克州6万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中便有49513人根据该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③

第四，在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过程中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政府机关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俄共（布）新西伯利亚州委书记M.古拉金1947年3月20日给俄共（布）中央书记A.A.库兹涅佐夫的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沃洛郭特州向中央提交的类似申诉和1949年11月阿穆尔州执委向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递交的关于彻底解放本州境内流放富农的文件等，均提出了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问题。他们的理由归结如下：大多数流放富农已近中、老年，已适应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他们在战争期间表现积极，未从事任何反苏活动，不再对社会构成危害。根据以上申诉，苏联部长会议出台了1947年5月7日第1413－375cc号决议，其主要内容包括：解放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沃洛郭特、莫洛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诸州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从1946年8月到1952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依据各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提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决议。根据这些决议，苏联28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不包括其中的德意志、卡尔梅克和车臣等民族）几乎全部被撤销特殊移民身份。同期，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发出的特别指令被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408391人。④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96.

② 1938年10月22日决议规定，凡"前富农"—特殊移民子女，在16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定，当其年满16周岁以后，其特殊移民身份将被注销，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6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33－134.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37.

根据所颁布的一系列解放法令，1941～1952年被当局解放的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数量共计882622人。其中1941年1月1日到1948年1月1日810614人，1948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21824人，1949年10月1日到1950年1月1日7628人，1950年到1952年42556人。[①]

早在1947年末，苏联内务部领导层便有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打算。[②] 不过苏联内务部提出的关于彻底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建议并未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另外各地区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也遇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部委的阻挠。例如1947～1951年，俄共（布）凯梅罗夫斯克州委和州执委就解放当地流放富农的问题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便遭到了苏联煤炭工业部的反对。后者担心此举可能造成自身劳动力的大量流失。[③]

稍后，内务部在全面解放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方面还作过一些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53年4～5月间，苏联内务部拟定了关于解放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根据该草案，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理应在1953年8月以前全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不幸的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贝利亚在1953年6月23日被逮捕了，从而使所有既定计划都落了空。1953年8月，苏联内务部领导层曾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请示是否实施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可一直未得到明确的答复。[④] 尽管这样，40年代到1953年以前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的人数仍一直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从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全面转向诸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西伯利亚。1940～1941年，当局将波兰阿萨特尼克的难民（38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土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97.

② 内务部曾起草了苏共中央《关于特殊移民》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与相关书面论证报告均一起转交苏联中央行政机关和贸易—财政机关诸部委审议。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97。

③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51。

④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29。

耳其等11个民族数百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1943年12月27日）、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1944年3月7日），将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1944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州（1943年10月）；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1]

除上述被整体迁移的少数民族外，当局还在40～50年代初对一些社会组织和集团实施了强制迁移。这些被迁移的人口大都带有少数民族特征，而且在特殊移民数量方面均比上述遭到整体迁移的苏联少数民族要少，因此基本可归入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类型。主要有如下类型人口。

（1）战争期间与德意志族人、来自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一起被迁移的“其他”类人口。

战争期间，当局在对德意志族、北高加索、克里木和格鲁吉亚等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施强制迁移的过程中均包含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口。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局局长 Б. П. 特罗菲莫夫起草的《关于与来自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地区少数民族和德意志族人一起遭到驱逐，目前仍居住在特殊移民区内的其他类移民数量的报告》显示：1941～1942年被迁移的苏联德意志族人中“其他类”移民共有1721人，其中俄罗斯族662人、乌克兰族355人、波兰族124人、立陶宛族11人、拉脱维亚族104人、芬兰族58人、奥地利族34人、爱沙尼亚族33人等；1944年与克里木鞑靼族一起被驱逐的“其他类”人口共计3628人，其中俄罗斯族1280人、茨冈族1109人、德意志族427人、无国籍土耳其族272人、乌克兰族257人等；同年来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其他类”人口包括土耳其族676人、阿扎尔族411人、格鲁吉亚族224人等；1943～1944年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类”人口共计1602人，其中库梅克族485人、阿瓦尔族311人、达吉斯坦族235人、塔夫林族186人、阿巴兹族52人、奥塞梯族49人、诺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12。

盖族 41 人、俄罗斯族 35 人、达尔金族 34 人等。[①] 上述这些其他民族人口便构成了被整体驱逐各少数民族中的“其他”类型特殊移民。

（2）1942 年来自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的移民。

根据 1942 年 5 月 29 日国防委员会第 1828cc 号决议，当局对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的所有“社会有害分子”实施了迁移。此次迁移包括了很多民族，人口至少在 1 万人以上，以希腊族人居多。因此这次移民也可称作针对上述地区希腊族人的驱逐活动。截至 1952 年底以前，这些移民主要以政治流放民身份存在，直到 1952 年末才被转为特殊移民。[②]

（3）卡巴尔达族特殊移民。

1944 年，Б. 科布洛夫在从纳尔奇克发给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的电报中称，根据 1944 年 5 月 25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关于迁移德国法西斯走狗、叛徒、卖国贼、自愿与德国人一同离开者家属》的第 00620/00190 号命令，有关部门已决定在 6 月 20 日对卡巴尔达族人实施迁移行动，预计迁移人口为 2492 人。所有这些人的移民地都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江布尔州和南哈萨克斯坦州。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在 6 月已批准了这项移民计划。[③] 6 月 20 日凌晨 4 点，迁移行动正式开始。共有 165 名精干工作人员和 400 名红军战士参加了这次行动。根据原定计划，首批应迁移 710 户（2467 人）。但由于一些红军服役人员家属和 70～90 岁的老人被免迁，最终首批被迁移人口仅用 53 节车厢，发送人数 2051 人。[④]

（4）“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

苏德战争期间，许多苏联德意志族人没有从西部地区撤离，这些人随后便被当局宣布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1944 年 8 月 2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从高加索地区的城市和疗养区驱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的第 001036 号命令。该命令具体内容如下：

---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9.

② *Бугай Н. Ф.* 40 – 50 – 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91, №1, с. 129.

③ *Бугай Н. Ф.* 40 – 50 – 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 130.

④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15.

“1）从高加索温泉地带的城市和疗养区向新西伯利亚州迁移德国人帮凶、祖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家属378户（共计850人）。此次行动将于1944年8月31日正式开始，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特卡琴科同志负责实施。2）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阿尔卡季耶夫同志向各特殊移民始发站调拨迁移行动所需的闷罐车。3）责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押运管理局局长巴奇科夫少将负责派出必要的警卫人员，以确保移民行动的运输安全。4）责成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切尔内绍夫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调拨3吨汽油并确保特殊移民旅途中的饮食和医疗服务。5）责成新西伯利亚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局长国家安全委员彼得罗夫斯基同志负责将这批移民分送至各指定特殊移民区并为其安置工作。”[①] 根据统计资料，1945年初实际迁入新西伯利亚州的“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共计674户（1490人）。[②]

（5）“奥乌诺夫分子”。

“奥乌诺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是1929～1940年初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出现的一个法西斯组织，其前身为乌克兰军事组织。“奥乌诺夫分子”曾积极协助法西斯分子，反对西乌克兰与苏维埃乌克兰合并。苏德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奥乌诺夫分子”联合乌克兰匪帮—叛乱组织并在德国人帮助下不断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紧张局势。仅在1944～1953年，乌克兰西部各州便发生了14424件匪帮分子袭击事件，其中恐怖和破坏事件5099起，解除苏维埃工作队武装457起，焚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1004起，等等。在以武力清除当地匪患的同时，当局决定对“奥乌诺夫分子”实施强制迁移。1944年3月3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由贝利亚签署的《关于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的命令。该命令要求将被判刑、被俘或在冲突中被击毙的“奥乌诺夫分子”骨干及其家属中的所有成年人在剥夺财产后全部流放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和伊尔库茨克诸州。贝利亚要求立即执行这些命令。他在相关文件中写道：“自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流放奥乌诺夫分子的决议公布之日起，各地应立即展开驱逐乌克兰民族主义

---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03.

②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с. 134.

者联盟分子及其家属的行动，不必再等待特别会议的决定。"[①] 1942～1952年，当局共迁移"奥乌诺夫分子"及其家属 171566 人（成年人口 131319 人）。[②]

（6）"正宗东正教徒"。

1944 年 6 月初，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计划。1944 年 7 月 7 日，贝利亚在向斯大林呈递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了关于"正宗东正教徒"的活动情况："该教派过着寄生的生活，不纳税，拒绝履行国民应尽义务和职责，不允许子女到学校读书。他们对集体农庄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贝利亚建议"将分布在 62 个居民点中的正宗东正教徒及其家属一起迁往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泰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并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监督"。贝利亚请求斯大林批准，"在 1944 年 7 月 15 日开始实施此次迁移行动"。7 月 1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共同签发了《关于迁移"正宗东正教徒"》的第 2683－1/12938 号命令并于 7 月 19 日下发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7 月 20 日，迁移行动首先从梁赞州南部地区开始，共有 489 户（1323 人）"正宗东正教徒"被迁。所有这些人的迁居地都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托木斯克州和秋明州。[③]

（7）"德国人帮凶"。

1944 年 8 月 24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关于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驱逐"德国人帮凶"》的第 001036 号命令。12 月 12 日，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目前已确定迁移的'德国人帮凶'共计 735 户（2238 人）。迁移行动将于 1945 年 1 月 25 日在各地同时展开。请您给予指示。"[④] 不久，根据当局的命令所有"德国人帮凶"都被发往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从事植棉工作。

（8）"符拉索夫分子"。

"符拉索夫分子"——A. A. 符拉索夫将军领导的反苏维埃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成员。其主要是一些受德国法西斯宣传机构鼓惑，饥寒交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05.
②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37.
③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16.
④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17.

迫，对集体化和1937年大镇压不满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族人。“符拉索夫分子”是1946年出现的一个人口规模较大的特殊移民类型。当局迁移此类人员的依据是1945年8月18日国防委员会第9871号决议，1945年12月2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1946年3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将曾在德国军队、军团和警察部队中服役，后经检查—过滤营审查的“符拉索夫分子”迁往特殊移民区》诸决议。上述决议规定：“符拉索夫分子”在特殊移民区的居住期限为6年。此类特殊移民区的地理分布如下：哈萨克共和国、布里雅特—蒙古和科米等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克麦洛沃和莫洛托夫诸州。“符拉索夫分子”主要包括两部分人：经检查—过滤营审查后的查无实据者和从古拉格劳改营获释的囚犯。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0月24日的统计数据显示，1945～1951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符拉索夫分子”共计177573人。[①] 从1951年下半年起，当局开始放松对“符拉索夫分子”的控制，针对这一类特殊移民的解放力度也不断增大。

（9）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被迁移的人口。

1948年迁移“扰乱社会治安犯”的情况

迁出地区	“扰乱社会治安犯”人数	其家庭成员人数	总数	后补迁出的人数
俄罗斯联邦各州	14845	6669	21514	375
乌克兰共和国	8860	2826	11686	33
白俄罗斯共和国	221	21	242	7
哈萨克共和国	1291	1265	2556	—
乌兹别克共和国	982	77	1029	57
吉尔吉斯共和国	143	41	184	13
塔吉克共和国	121	21	142	—
阿塞拜疆共和国	112	—	112	4
亚美尼亚共和国	251	180	431	3
格鲁吉亚共和国	398	15	413	3
卡累利—芬兰共和国	24	17	41	—
总计	27248	11132	38350	495

资料来源：参见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огласноВашемууказанию...”，с. 234。

① 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34.

1948年，特殊移民区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移民人口类型农民——“扰乱社会治安犯”。根据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H.C. 赫鲁晓夫的建议，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出乌克兰共和国》的决议。在H.C. 赫鲁晓夫的鼓动下斯大林决定将乌克兰的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出台了《关于将恶意逃避农业劳动和生活腐化分子迁往国家边远地区》的法令。依此法令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都是所谓未完成最低劳动日义务的集体农庄农民，流放期为8年。此类人口的迁移一般先由集体农庄社员大会组成的公共法庭作出“公议性判决”，经区执委会批准后执行。1948年9月16日，苏联内务部警察总局也颁布了《关于军人因1948年6月2日法令而迁移者均没收其军人证》的指令。

根据上表所示，1948年根据该法令被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38350人，其中来自俄罗斯联邦各州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乌克兰共和国。以后数年，此类迁移活动仍在继续，但规模逐渐趋缓（例如，1949年有4756人，1950年有675人，1951年有240人，1952年有260人）。[①]

（10）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移民。

战后1945～1949年，当局针对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迁移主要根据以下指令：1945年6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指令，1946年12月10日苏联内务部指示，1946年12月18日苏联内务部《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匪帮头目和积极分子等家属》的法令，1948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共和国迁移处于非法状态、在武装冲突中被击毙、被判刑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匪帮帮凶，富农及其家属》的决议，1949年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诸共和国迁移富农及其家属、匪帮和民族主义者等家属》的决议。根据上述法令，1945～1949年当局共从波罗的海沿岸迁移人口143600人，其中来自立陶宛81200人，来自拉脱维亚约41900人，来自爱沙尼亚20500人以上。[②]

---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4.

② *Бугай Н. Ф.* 40 - 50 - е годы: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 с. 128.

（11）来自“黑海沿岸”（希腊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土耳其人等）的移民。

1949年5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迁移“达什纳克党人”、土耳其和希腊等民族》的第2214－356cc号决议。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诸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黑海沿岸（奥德赛和克里木等地区）。此类移民在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相关资料中均被称作“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其中希腊族移民主要被迁入哈萨克共和国，“达什纳克党人”（亚美尼亚族人）被送往阿尔泰边疆区，土耳其人被发往托姆斯克州。1949年，从“黑海沿岸”地区迁入各特殊移民区的人口共计57680人，他们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①

（12）战后被迁移的富农（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9年来自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51年来自西乌克兰的富农、1951年来自立陶宛的富农、1952年来自西白俄罗斯的富农）。

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当局开始在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右岸和北布科维纳等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对当地数万名农民进行了剥夺和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第9局的统计资料，这些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均被纳入战后（1945～1949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达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特殊移民类型，少部分人在迁入特殊移民区后形成了以下四个独立的特殊移民类型：“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0月6日决议）；“来自乌克兰共和国西部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月23日决议）；“来自立陶宛共和国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5日决议）；“来自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决议和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5日指令）。②

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948年来自伊兹梅尔州的富农：1948年10月6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3785－1538号决议当局开始了针对伊兹梅尔州富农分子的迁移行动。根据托木斯克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斯梅什利亚耶夫的通报，11月抵达该州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66.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3－184.

的富农分子共计250户（1100人）。这些人全部被安置在托木斯克州的“德古利杰茨”企业参加劳动。当月底，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写道：“为了对移民实行管理和监督，我们在富农分子居住的各地区都成立了内务部特别管理处。在从伊兹梅尔州迁移这批富农分子的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①

1949年驱逐摩尔达维亚的富农：1949年4月6日，根据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共（布）中央局和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摩尔达维亚迁出富农分子、大地主、德国人帮凶、亲法西斯组织成员及其家属》的第129－467cc号决议。苏联内务部在相关总结报告中指出，1949年从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入西伯利亚各地区的富农分子、地主分子、大商人、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积极帮凶、白卫军分子和反革命党派成员共计35050人。其中被安置在集体农庄的此类人口共计2354户（9679人），在国营农场得到安置的有1878户（7272人）。据阿尔泰边疆区内务部管理局局长沙霍夫6月的通报，当地内务部机关依照苏联内务部1949年6月11日命令对来自摩尔达维亚的1172户富农分子进行了劳动安置。另据该州内务部管理局局长尤金报告，同年7月一批来自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移民（共计1439人）迁入克麦洛沃州，同年8月又有摩尔达维亚族移民998人迁入阿穆尔州。移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很多人都居住在不适于人居住的窝棚里。②

迁移乌克兰的富农：根据1951年1月23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的《关于从乌克兰西部诸州迁移富农及其家属》的第189－88cc号决议、9月5日第3309－1568cc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12月20日命令，乌克兰境内1700名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被强制迁往托木斯克州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1952年2月11日，又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共1057人被迁往秋明州。负责这批移民安置工作的是苏联内务部长C. H. 克鲁格洛夫和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③

迁移立陶宛的富农：1951年9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立陶宛共和国中敌视集体农庄的富农及其家属实施永久性迁移》的决议。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5.

②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38.

③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 с. 244.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截至1952年1月1日登记在册的来自立陶宛的特殊移民共计16833人，同年7月1日其数量已增加到18027人。①

迁移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9月18日第3538－1645号决议和1952年3月25日第6435号指令，1952年4月7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了第436号决议，决定将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富农分子及其家属迁往国家东部地区。1952年4月23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长巴斯科夫在给苏联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的通报中说："从1952年4月18日开始的驱逐富农分子的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原计划迁移1170户（4082人），实际共迁移1194户（4298人）。"关于此，伊格纳季耶夫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我们在4月18日深夜开始了迁移富农分子的行动，整个行动持续了一昼夜，共迁移移民家庭1194户（4298人）……为运送这批移民我们共动用了5个专列。"②

（13）"巴斯马奇分子"。

"巴斯马奇分子"——苏德战争期间在塔吉克斯坦出现的一个亲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Г.О.巴斯马奇。1950年1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从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移"巴斯马奇分子"》的第135－26cc号决议。根据苏联内务部1950年3月1日第00157号命令，巴斯马奇分子及其家属共2795人于该年8月被迁入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科克切塔夫州特殊移民区。③

（14）"安捷尔斯分子"。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2月13日第377－190cc号决议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法令，当局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境内安捷尔斯所领导的波兰军队军人及其家属强制迁往伊尔库茨克州。截至1952年7月1日，"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共计4548人。④

（15）耶和华教派（现耶和华显灵派）。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3月3日第667－339cc号决议，当局对居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56.

②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48.

③ *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 133.

④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58.

住在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摩尔达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耶和华教徒”及其家属实施了强制迁移。根据苏联内务部1951年3月5日第00193号命令，这些“耶和华教徒”均被发往位于伊尔库茨克和托木斯克州的特殊移民区。[1]

（16）1944～1945年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

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是1951年春新出现的一个特殊移民类型，人数仅70余人。根据1951年3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684－343cc号决议，当局将1944～1945年在波兰领土上被拘留、被俘和从战俘—拘留民事务管理总局获释的苏联公民中的大部分人都发往位于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区。[2] 官方文件中称此类人为“源自波兰领土的拘留民”。

（17）1951～1952年来自格鲁吉亚的移民。

1951年11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对格鲁吉亚“反动分子”实施迁移》的第4893－2113cc号决议。被纳入“反动分子”范围的人包括：苏侨直系亲属，叛国者家属，居住在国外并从事反苏活动的叛逃分子家属，1946～1949年从法国、伊朗和中国返回格鲁吉亚的归侨，被当局怀疑与土耳其间谍机构有染的人员，等等。此类特殊移民共计11643人，其中包括亚述里亚等民族。[3]

事实上，苏联当局在20世纪30～50年代所实施的强制移民活动还有很多。我们这里只是着重列举了一些与特殊移民有关的人口强制迁移活动。当局在放宽对前富农—特殊移民限制的同时，还不断强化针对驱逐民族—特殊移民的监管制度。

第一，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1945年1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35号法令要求所有具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或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3日内向所在移民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

① *Бугай Н. Ф.* Л. Берия-И-Сталину，с. 245.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3.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4.

备部报告。①

1948 年 6 月 3 日苏联部长会议第 1841 - 730c 号决议，要求各地方机关严肃追究那些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相关刑事责任。仅在 1949 年苏联内务部所属特别委员会便因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罪而给予 303 名特殊移民劳动教养 8 年的判罚。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8 年 11 月 26 日法令和 1949 年 6 月《内务部特别警备部为各地方警备机关在移民—特殊移民中开展工作而制定的行动细则》规定，德意志、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克里木鞑靼、克里木希腊、克里木保加利亚和克里木亚美尼亚，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及迁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口（包括 1949 年遭到迁移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驱逐民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均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 20 年苦役、剥夺人身自由 5 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无权返回原居住地，如果擅自逃离指定移民区，将被判 20 年苦役”的保证书。永久性移民（男性和女性）与非迁移民结婚者，其本人不得解除特殊移民身份。③

第二，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谍报工作。

当局极其重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间谍和情报员的工作。例如截至 1945 年 3 月 1 日当局在源自克里木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务—情报网便有 519 人，其中，特务头目 5 人、特务 12 人和 502 名情报员。同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里木—特殊移民中——2730 人，相应数据分别为 15、82 和 2633 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1945 年末仅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中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安插了 16 名特务和 23 名情报员。与此同时，特殊移民中的“老居民”，即“前富农”—特殊移民中当局所培植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情报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据相关资料，截止到 1944 年 12 月 1 日，该情报网络共计 13325 人，其中特务头目 174 人，特务 561 人，情报员 12590。截至 1953 年 1 月 1 日，特务 33463 人，秘密接头处所 468 个，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121。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 18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 - 1960），с161.

十户长94246人。[①]

第三，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

截至1953年1月1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员共计10752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1861人，监视人员2801人，别动—辑查分队成员1217人。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时注册和各项规定制度的具体实施，截至1953年4月10日当局共设立了51个特殊移民部、19个特殊移民分部、2916个特别警备机构和31个行动—缉查分队。[②]

第四，针对特殊移民的镇压。

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0月1日被当局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移民便有1.3万人以上。[③] 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4月1日期间，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7907人，其中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罪1612人，叛国罪1104人，参加反苏组织和集团罪285人，匪帮45人，怠工罪45人，间谍罪21人，实施恐怖和恐怖企图罪12人，危害社会罪7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6人，从事破坏活动罪4人，违反军纪17人，渎职罪20人，其他犯罪4729人。[④]

自1949年以后，鉴于1948年11月26日法令的强大威慑，特殊移民逃跑人数急剧下降。1949年从移民区逃跑的人数缩减到了1948年的1/4。1948年因逃跑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3746人，1949年8636人，1950年2872人，1951年423人，1952年345人。1949～1950年6月间因逃跑而被当局判刑的2776名特殊移民都是根据1948年11月26日法令定罪的，即服苦役20年。[⑤]

第五，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和战后，诸类型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继续受到当局的各种歧视性待遇。

其一，根据相关法令，诸遭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子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16周岁之后，仍以个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0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7.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09－110.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8.
⑤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92.

释。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间劳动移民管理部门从劳动移民中共划分出12574个家庭。当局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1938年10月22日关于解放劳动移民年满16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1944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前富农”一特殊移民中如下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①]

其二，诸遭驱逐少数民族一特殊移民不得参军。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人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类人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都被动员进入了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所谓劳动军。[②]

其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理应与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视，不能与自由雇佣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长C. H. 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坚科与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施卡坚科所得工资数量为7000卢布，而埃依涅尔仅得700卢布。”[③] 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例如1951年托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读；1952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269名特殊移民子女去州首府求学；1952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④]

综上所述，苏联移民政策呈现出从流放富农逐渐转向民族驱逐的趋势：20世纪30年代以流放富农为主；40年代的重心转向解决民族问题。30年代，斯大林发动特殊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国家集体化政策的成分，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建立集体农庄。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00.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92。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59.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71.

虽然当时苏联国内民族问题同样严重，但并非国家的当务之急，因而期间只有部分民族遭到驱逐。40 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富农问题退居其次，在苏联最高领导人看来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借口“维护国家安全”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①] 在放松对前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国家针对诸驱逐民族的特殊移民政策却愈益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 30 年代已逐渐开始的民族驱逐的逻辑终结。如上文所述：30 年代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特殊移民区，3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各边境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 40 年代初局部民族驱逐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则，不得人心，因而难以持久。随着苏联政权的更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　特殊移民问题的解决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后，“解冻”的征候开始在苏联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新的国家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继续维持特殊移民体制已不可能。1950～1953 年，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料。这些国家权威性机构的负责人均认为继续在国内推行以往的镇压政策已是“危机重重”。如果说，1937～1938 年在企业和机关发布关于镇压“人民公敌”的消息还会赢得群众热烈拥护的话，那么，在 1950 年代初苏联民众的思想状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关于镇压的消息已不会再激起人民的响应，相反大部分群众都会“谨慎地”对待此类事件。苏联领导人已觉察到危机的信号，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妙变化。为了稳定政局和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做法便是不再进行新的镇压，并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放和平反等活动来尽

① 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融合。当时虽然各边远少数民族中存在叛国情形，但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红军的。如果仅仅由于少数人叛国，便对整个民族实施惩罚的话，那么，俄罗斯族人中也有叛变者，是否也应将俄罗斯人整体迁移。如此结论当然非常荒谬。具体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47；*Вормсбехер Г. Г.* Немцы в СССР// Знамя，1988，№10，с. 143。

可能地挽回民心。

1954～1960 年，苏联特殊移民制度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从 1953 年起国家基本停止了针对国民的强制性驱逐活动，特殊移民的源头枯竭了。其次，在政治“解冻”的社会环境下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最后，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苏联社会一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严重的抵触。另外，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因。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会离开移民区，不会破坏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殖民成果”。①

特殊移民的解放

1953～1965 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活动共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阶段：①1953～1954 年中，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酿。②1954 年中至 1956 年末，绝大多数特殊移民已被解除人身限制，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居地，特殊移民实际转变为行政移民。③1957～1958 年，当局对前一阶段的特殊移民解放政策作了一些修正，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重返故乡并恢复其在被驱逐前所拥有的民族自治地位；对剩余多个类型特殊移民实施了解放。④1959～1960 年，以最新颁布的刑事基本法为依据当局对当年一些没有具体过失，只是由于与“反苏分子”存在亲属关系和社会出身等原因便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人给予解放；1961～1965 年，对特殊移民区内犯有“各种具体罪行”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匪帮领导人等逐步予以解放。

事实上，截止到 1953 年初有些特殊移民类型（例如 1940～1941 年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波兰族阿萨特尼克一难民和 1937 年被从远东地区迁往中亚的朝鲜族人）已经不复存在，还有一些特殊移民类型（如流放富农一特殊移民，当时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 24686 人）在人数上已大量减少。因此这时苏联政府准备解放的主要是 40 年代以后被强制迁移的各少数民族一特殊移民。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33.

（1）“特赦令”的颁布和解放特殊移民的前期准备（1953～1954年）。

1953年初，苏联特殊移民共计2753356人（其中成年人口1862222人）。[①] 1953年，当局已不再大量向特殊移民区发送新移民，但也未出现特殊移民被大规模解放的情况，只有少量特殊移民被解除人身限制。[②]

当局实施宽容政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颁布了大规模特赦囚犯的文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实行大赦》的法令。大赦法令几乎未涉及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依据该法令当局提前从古拉格集中营和劳改营释放了1201738名囚犯（比重占截至1953年4月1日古拉格在押囚犯总量的53.8%）。[③]

1953年4～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贝利亚和苏联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原计划在1953年底以前解放170万特殊移民。但是，由于贝利亚的被捕，该计划并未实施。苏共中央认为贝利亚在1953年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计划是有害的，因为这将导致大范围的人口迁移和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既定目标的实现。苏共中央决定特殊移民的解放问题应在以后数年内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

1953年下半年，当局只是放松了对各特殊移民区的监管力度。苏联内务部1953年11月18日指令规定，内务部各地方机关有权不加限制地向因公务和私人事务需要在移民区范围内迁移的特殊移民发放允可证。[④] 苏共中央主席团责成由苏联总检察官Л.А.鲁坚科、内务部长С.Н.克鲁格洛夫、苏联国家安全部长И.А.谢罗夫和司法部长К.П.格尔申宁等组成的委员会首先对解放特殊移民的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苏共中央作出汇报。鉴于苏共中央主席团如此决定，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5月又制订了一个解放特殊移民的新计划，并提交给该委员会审核。经商议，委员会认为近期内可以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人口具体如下：不满16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16周岁以上且在学校读书的特殊移民子女，1929～1933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c. 210－211－212（附表43）。

② 1953年被当局注销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共计88363人。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c. 225。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c 228.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c 230.

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德意志族动员民和当地民。

（2）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1957年）。

从1954年中起，当局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①]开始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1954年，被解除人身限制的特殊移民有：1929～1933年遭到强制迁移的流放富农，1936年遭到迁移的波兰人，1937年来自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移民，1940～1941年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的移民，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当地民、动员民和遣返民，1942～1944年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罗斯托夫和克里木诸州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的帮凶”，卡巴尔达人，“正宗东正教徒”，以及未年满16周岁子女和年满16周岁仍在学校就读的上述特殊移民子女。在解放了上述人口之后，特殊移民的总体数量几乎下降了1/3。特殊移民各类型人口数量也有了大幅缩减，仅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便有将近40万人。[②]从1955年1月1日起，苏联内务部特别4处的登记册上再未提及流放富农—特殊移民类型。

1955年，当局继续颁布一系列特殊移民解放法令。[③]根据这些法令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有：特殊移民中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和苏联奖章及勋章荣获者，因与特殊移民——当地民或克里木鞑靼、车臣等诸被驱逐少数民族男性拥有夫妻关系而被一同迁移，尔后又终止了此类婚姻关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民族妇女，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单身残疾人和不治病症患者，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家属，高校教师，“符拉索夫分

---

① 1954年3月27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关于逐户解放特殊移民子女》的法令；1954年5月14日苏联内务部《关于注销在连续农业集体化期间遭到迁移的德意志族流放富农人口的特殊移民身份》的第44/4－19636号指令；苏联部长会议1954年7月5日《关于撤销特殊移民法律地位方面的一些限制》的决议；1954年8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的前富农及其他人口的限制》的第1738－789cc号决议；1954年8月20日苏联内务部第00713号法令。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35.

③ 1955年5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内苏共党员、预备党员及其家属》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1月24日颁布的《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决议；1955年9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对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与占领军当局合作的苏联公民实施大赦》的法令；1955年11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1949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希腊族苏联公民予以解放》的指令。

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卡巴尔达人，1949 年来自“黑海沿岸”的移民（21269 人），1949 年来自格鲁吉亚的希腊族移民。由于上述法令的实施，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数已约占同期特殊移民人口总量的 2/3。[①]“符拉索夫分子”、“费尔克斯多伊奇分子”、“德国人帮凶”和卡巴尔达人等四个特殊移民类型也基本被消灭。此时，仍滞留在移民区的特殊移民主要与其民族特征有关，如“符拉索夫分子”中未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德意志、克里木鞑靼、车臣、印古什和卡拉恰耶夫等族人。

1955 年末，当局开始解放诸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特殊移民。1955 年 12 月 1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撤销对德意志族特殊移民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德意志族特殊移民中的普通移民和遣返民均被解除了特殊移民身份，但这些人在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之后均无权返回原迁出地区和向国家索要自己在迁移过程中被剥夺的财产。[②]

1956 年，根据当局相关法令[③]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1946 年至 1955 年以“符拉索夫分子”身份被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军官、高校教师、卫国战争的参加者、苏联奖章和勋章获得者等家属、已被解除限制的特殊移民家属、被驱逐少数民族中的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卡拉恰耶夫族等特殊移民。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36.

②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53。

③ 1956 年 6 月 29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清除在对待前战俘及其家属问题上粗暴违反法律的影响》的决议；1956 年 1 月 17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对 1936 年从乌克兰共和国苏波边境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波兰族人实施解放》的决议；1956 年 3 月 12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放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的补充规定》的决议；1956 年 5 月 15 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解除已从流放区获释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族人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的决议；1956 年 3 月 17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卡尔梅克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 年 3 月 27 日颁布《关于撤销对特殊移民区内希腊、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等族人及其家属法律地位的限制》，1956 年 4 月 28 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一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 年 7 月 16 日颁布《关于解放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等族人及其家属》，1956 年 9 月 22 日颁布《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一些外国侨民、已取得苏联国籍的无国籍者和前外国国民实施解放》等法令。

（3）修正以前所颁布的相关法令和继续解放特殊移民（1957～1958年）。

1957年，当局对上一年所颁布的特殊移民解放法令作了一些修正，允许一部分少数民族—特殊移民返乡和恢复以前被取缔的民族自治区。关于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审判机关、检察院和内务部机关等均颁布了相关法令。例如1957年1月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组建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州》，《关于将卡巴尔达自治共和国改建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关于将切尔克斯自治州改建为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和《关于重建俄罗斯联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法令。这些新颁布的法令承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6年3月17日、4月28日和7月16日所颁布诸法令中的部分内容（即禁止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卡尔梅克、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车臣、印古什等族人及其家属返回原迁居地等）已丧失原有法律效力。[①]

1958年，由于当局所颁布的相关法令[②]而被解除特殊移民身份的人口包括："奥乌诺夫分子"，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地区的特殊移民[③]，"达什纳克党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特殊移民区内的苏维埃代表，工会和共青团机关人员，受家属赡养者，在被迁移时年龄不满16周岁的特殊移民子女，等等。

1958年，当局所颁布的解放法令和其他相关决议的实施结果如下：战争前后来自西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的特殊移民人口数量剧减；战后由被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54－255。

② 1958年1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对特殊移民区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来自波兰领土的拘留者和战俘等实施解放》的决议；1958年3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给予解放》的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5月19日法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58年8月2日法令。

③ 战后遭到当局驱逐的"奥乌诺夫分子"、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等特殊移民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匪帮帮凶"，"匪帮帮凶家属"和"富农—民族主义者及其家属"。其中"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特殊移民也分为五种类型：镇压过程中被打死匪帮家属，逃避集中营关押、劳动教养、监狱诸惩罚者或被判处极刑者家属，从集中营、劳动教养所、监狱等获释后迁入特殊移民区人员家属，拥有非法身份者家属，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中居住地不明者。

人和爱沙尼亚人等构成的5个特殊移民亚类型也缩减至两个，即“匪帮和民族主义者”和“匪帮—民族主义者家属”；截止到1958年6月“达什纳克党人”仅剩42人；“巴斯马奇分子”，“安捷尔斯分子”和“达什纳克党人”等类型特殊移民已全部被解除人身限制。[①]

（4）特殊移民解放问题的基本解决（1959～1965年）。

由于一系列解放法令的颁布，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体数量急剧减少。截至1956年1月1日，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为904439人，截至1956年7月1日为611912人，1957年1月1日为211408人，1957年7月1日为178363人，1958年1月1日为147741人，1959年初只有近5万人。[②]

在对特殊移民实施大规模解放的同时，当局还对监督他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削减。特殊移民区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呈逐年下降的态势（截至每年1月1日)：1952年15778人，1953年10753人，1954年8838人，1955年5282人，1956年3778人，1957年780人，1958年只剩下705人。[③] 1958年2月3日，苏联内务部特别四处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近4年来（1954～1957年），根据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决议特殊移民人口下降了94%，而同期对特殊移民实施监督的内务部工作人员数量也缩减了95.5%。”[④]

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发生在1960年初，其依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1960年1月7日法令。1960年1月7日解放特殊移民法令的实施使战后从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右岸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各特殊移民类型仅剩：“匪帮和民族主义者”，耶和华教徒、少量“正宗东正教徒”和根据1948年6月2日法令遭到迁移的特殊移民。

1960年代上半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接连颁布了3个法令：《关于解放特殊移民区中18周岁以下因所犯罪行而被判刑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和民族主义武装匪帮前成员》（1961年4月18日)，《关于对一些类型特殊移民实施解放》（1963年12月6日)，《关于解放“耶和华见证会”、“正宗东正教会”、“英诺肯提乙派”（1908年出现在俄国的东正教派别）

① 参见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2。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4.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5.

④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78.

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员—特殊移民及其家属》（1965 年 9 月 30 日）等。至 1965 年，在册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到 1 万人。苏联特殊移民的解除人身限制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特殊移民的遗留问题

苏联当局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活动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实施的，而赫氏本人当年也是特殊移民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以他为首的苏联政府所进行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必然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与特殊移民有关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一，当局没有对 20 世纪 30～40 年代斯大林的强制移民活动作出公正的评判，没有从政治上对特殊移民给予彻底平反。在自己所颁布的解放少数民族—特殊移民的法令中当局总是极力回避对以前所实施的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行为作出正面评价。政府相关法令根本没有提及为诸遭驱逐民族进行政治平反的问题，只是强调强制迁移“与战争状态有关”，而如今之所以解放这些人似乎只是由于继续将其限制在特殊移民区内“已没有太大必要了”。根据这一逻辑来推理，这些遭到驱逐的民族仍是有罪的，政府以前所作的所有强制驱逐活动都是有其“必要性的”。

第二，当局没有对特殊移民在强制迁居期间被剥夺的财产予以应有的经济补偿。当局在所有颁布的法令中均指出，在解放这些特殊移民的同时政府不承担返还这些人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的义务。例如 1956 年 4 月 2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的《关于解除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被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等族—苏联公民，库尔德、赫姆等族人及其家属的限制》的法令中便规定：“鉴于对 1943～1944 年被从北高加索、格鲁吉亚共和国和克里木等地区迁入特殊移民区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继续在法律地位方面实施限制已无必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1）对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内的克里木鞑靼、巴尔卡尔和土耳其、库尔德和赫姆申等族人给予解放，并撤销苏联内务部机关对他们所实施的行政监督。2）规定：对符合本法令第一条款的特殊移民给予解放并不意味着政府将承担返还其迁移期间被充公财物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当局还要求所有被解放的特殊移民均必须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画押，声明自己将不希望政府返还自

己在迁移时被充公的财物。①

第三，当局在解放了近乎所有特殊移民和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如车臣族、印古什族和巴尔卡尔族等）返乡并重建原民族自治区的同时，拒绝给予其他一些被驱逐苏联少数民族（如德意志人、克里木鞑靼人等）上述同等权利。德意志和克里木鞑靼等被驱逐民族的返乡和自治区重建问题久拖不决，迫使这些民族在此后的40年间一直在为恢复本民族的应有权利而抗争。②

第四，当局以搞政治运动的行政命令方式，简单化地处理特殊移民的返乡问题。以来自北高加索地区的被驱逐少数民族—特殊移民为例。1956年11月2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自治区》的决议。1957年2月21日，俄联邦部长会议也通过《关于对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重建提供帮助》的决议。上述决议规定：在1957年内应让1.7万个车臣—印古什族家庭迁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可是苏共中央和俄联邦关于恢复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帮助车臣人、印古什人返回家园的决议没有在相关的苏共州委中进行研究和作出安排，甚至也没有在相关的区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和进行具体安排。例如车臣—印古什原州委班子和第一书记雅可夫列夫便对即将返回的大批人的居住、工作以及其他紧迫的安顿问题毫无计划和安排。恢复后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共有14个区，可所有区的区委书记对车臣、印古什人的返乡情况均一无所知，持袖手旁观的态度。③

1957年初，大批的车臣人、印古什人潮水般地涌回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他们大多拒绝接受政府部门为他们安排的新居住区，坚持回到原来被强迫迁出的旧住所，从而与当地现有居民发生严重冲突，导致人心惶

---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254.

② 参见 *Айспельд А.*（ФРГ）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мцы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6，№3，с.135；*Волобуев О. В.* Крымскотат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К КПСС（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50－х－середина 80－х гг. XX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4，№6，с.121；*Бугай Н. Ф.* 40－50－е годы：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ородов（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архивы НКВД-МВ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91，№1，с.87；1992，№1，с.35等相关内容。

③《1957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387页。

惶，大批俄罗斯人、达尔金人、阿瓦尔人和奥塞梯人纷纷逃离。斯大林集体农庄出逃的庄员有一百多户。莫洛托夫集体农庄的庄员在几天之内就拆毁住房和农庄建筑物，然后出逃。到 1957 年 5 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已有 1298 户庄员出逃，其中 971 户是俄罗斯人。①

面对这一情形，当地的区委，甚至州委领导，则拒绝接受将他们的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更拒绝接受或安排返回的车臣人、印古什人。1957 年 1 月 14 日，舒拉加特区列宁集体农庄召开庄员大会，州委书记马卡罗夫和切尔克维奇也出席了大会。965 人参加的庄员大会通过决议，集体请愿，拒绝接纳返回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决议说："庄员全体大会请求苏共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委员会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向联盟政府提出在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的编制中保留我们区的问题。全区集体农庄和全体集体农庄庄员都深信：我们无法与车臣人共同生活和工作。"② 苏共舒拉加特区区委第一书记阿布杜拉耶夫也明确表示：无法为迁回的车臣人安排工作。类似的事情在安达拉尔区、里特良布区、维杰诺区以及其他区都不断发生。苏共中央只是简单地给予阿布杜拉耶夫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便草草了事。

自 1957 年春车臣人、印古什人以及其他被强迫迁徙的人口返回家园开始，群殴、集体械斗、集体逃离等事件层出不穷。直至 70 年代初，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几乎没有间断过不同规模的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1973 年 1 月，格罗兹尼发生大规模车臣人聚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流血冲突。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为此上报苏共中央，请求向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增派特种警察部队，重新部署苏联军队和加强暴力措施。1973 年 3 月 13 日，苏共中央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以及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增强国家安全机构，加强现有技术装备，以确保社会治安。③

① 《1957 年 6 月 4 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 388 页。

② 《1957 年 5 月 15 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机关部关于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形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转引自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 388 页。

③ 参见叶书宗《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第 388 页。

苏共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这场让被迫迁移民族回归家园的运动，不仅无助于消除昔日强制移民所造成的民族感情创伤，反而犹如在已渐结疤的创口上搓一把盐；更严重的是，这场回归运动不仅使当年被迫迁移的民族再受伤痛，同时也伤害了当年从其他地区迁到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要知道，当年也不是他们自愿迁来这里的；他们也是被行政命令动员来的，或者被“按计划分配来的”。他们在新居住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了十几年后，却遭遇了苏共中央人为的一场劫难。

第五，在解除对特殊移民人身限制的过程中新的苏联国家领导人不但没有吸取特殊移民活动的历史教训和彻底清算斯大林错误民族政策的遗毒，而且沿习斯大林的民族高压政策的旧辙，继续在执政期间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它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其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其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木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其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其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民族分离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最大。

平心而论，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家政治大环境的改善，在思想禁锢有所缓解的情况下，苏联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发生反弹和各少数民族提出扩大民族自主权等要求本也无可厚非。作为国家新领导人的赫鲁晓夫本

应吸取斯大林的错误教训，运用民主、法制和政治方式合理解决民族矛盾。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承袭过去的传统做法，继续采取压制和动武方法来处理发生的民族冲突。例如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而赫鲁晓夫决定把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部分权力收归联盟中央时，1959 年 8 月以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别尔克拉夫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便抵制联盟中央的决定，主张共和国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对此正当要求大为恼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党政机关进行清洗，以强制手段打击民族自主的要求。在不到半年时间，当地就有 24 名主要领导被解除了职务。1961 年 12 月，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这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他怀念的表现，赫鲁晓夫本应采取疏导办法处理这一事件。可他却下令出动军警进行镇压。1961～1964 年，乌克兰出现了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地下组织“乌克兰工农联盟小组”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其主张维护乌克兰共和国独立自主权，反对联盟中央集权制。根据苏联当局的旨意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成员卢克雅连科、康巴吉、魏伦、利鲍维奇等人均被捕入狱，受到审判和被判以重刑。苏联当局甚至于把基辅大学师生要求保护乌克兰语言文化传统，青年师生和市民举行纪念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的活动也视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活动”加以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同期，其他共和国也出现过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传统的活动，但都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①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也继续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例如 1965～1967 年在乌克兰出现了主张扩大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和市民多次集会要求保护和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了《国际共产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把这些事件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并逮捕和关押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开除党籍，判处重刑。1968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奇尔奇克市的克里木鞑靼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返回家园和恢

①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 153～154 页。

复民族自治实体。但在当局的镇压下最终有300多人被捕入狱。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了批判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党组织的工作的决议，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等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结果，200多名对苏共民族政策不满和主张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党政干部被撤职查办，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了歌颂和维护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被当局免职，受此株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州、市、区委干部还有50多人。1974年5月，苏联当局审判了“亚美尼亚统一党”成员托夫马相等20多人，同年12月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缅尼克等十几人。1975年4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党委书记阿鲁久尼扬因“庇护民族主义”被批判和解职，其他多名州委干部均受到牵连。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舰上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族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而遭到当局镇压。1976年，贾巴里泽因在格鲁吉亚作协八大上批评强制推广俄语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出作协。[①]

总之，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在解放特殊移民和以后执政过程中仍将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继续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在民族关系中播下不和的种子。由此导致苏联内部的民族离心倾向不断发展，民族问题最终演化为点燃苏联剧变的导火索之一。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

①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56页。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①] 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②]

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A. A. 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③] 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

① 罗·麦德维捷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2页。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第103页。

③ *Фанасьева Н. А.*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й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6，с. 284.

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①] 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②] 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③] 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05页。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2页。

③ 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①] 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②]

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③]

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87页。

②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第190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7页。

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①] 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 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 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 40 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 30 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②]

早在 1917 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 300 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 319～320 页。

② 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 172 页。

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 年 B. B.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 75 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 15 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 3300 万的严重后果。"① 俄国在 21 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 20 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 30 ~ 50 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 300 万农户（1500 万人）。② 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 1929 ~ 1940 年从 5370 万下降至 3410 万，损失了约 1/3。③

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

①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е в 1939 – 1959гг, Проблема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развития, М.: ИРИ РАН, 2002, с. 3.

②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 272 页。

③ 李英男主编《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道路》，外文出版社，2004，第 18 页。

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①] 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②]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③] 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④] 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⑤]

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M.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⑥]

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

① 《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第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② 1988年9月16日《真理报》，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③ 《东欧中亚问题译丛》1992年第6期，第122页，转引自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④ 《乌克兰共产党人》1989年第11期，第47页，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146页。

⑤ 康克维斯特：《悲哀的收获：苏联集体化运动和令人恐怖的饥荒》，伦敦，1986，第306页，转引自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33页。

⑥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9.

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①] 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②] 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③]

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④] 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 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

①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9.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9.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281－282.

④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1959гг，с. 205.

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①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 X. 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 1944 年 2 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 5 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②

关于特殊移民在移民区内的生活状况，1933 年 7 月 3 日古拉格负责人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工农监察局的报告中指出：“……随着物资供应标准的下降，在林业部门（尤其是乌拉尔州和北部边疆区）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生存状况也急剧恶化了……北部边疆区和乌拉尔州林业部门的特殊移民中普遍存在以粮食代用品充饥的情形，甚至有人吃猫、狗和死亡牲畜的尸体……由于饥饿，特殊移民的患病和死亡人数剧增……有人因饥饿而自杀。由于营养不良特殊移民根本无法完成劳动定额，一些人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特殊移民在生产过程中或在下工返回的途中便因饥饿而死亡……”③

特殊移民除了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物资供应和生活资料匮乏之外，精神上还要忍受行政警备人员和小头目们的欺压和污辱。后者可随意提高移民的劳动定额或压低其工作量评估，克扣其口粮，取消孕妇的物资供给，将丧失劳动能力者指责为装病并指使爪牙对其任意实施殴打。乌拉尔州执委主席 1931 年 5 月 9 日在一份《关于特殊移民的迁移、经济安置

---

① 1989 年 11 月 25 日《消息报》，引自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183。

② *Бугай Н. 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народов СССР в 30－40－х годах//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6，с. 14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 34－35.

和劳动利用》的文件中指出：地方上出现了大量针对特殊移民的“犯罪和污辱事件”。在很多移民区均存在这样的事实，“移民区管理部门……不给特殊移民发工资（如楚索夫斯克林业局），给移民制定根本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不给在工区工作的移民发放食物和必要的服装，拒绝向患病的特殊移民提供救助，强制驱赶快要临产的孕妇和儿童参加劳动，任意对移民实施打骂，等等”。[①] 一些企业领导者经常会公开表示对移民的恶感。例如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应国家动员而参加劳动军的德意志族人经常会受到管理人员公开的歧视。1943 年 8 月索里卡姆斯克纸业联合企业工厂的德意志族人在食堂吃午饭时，有关部门刻意将其安排在最后用餐，而且不给他们吃第二道菜。第二工段的负责人巴尔科夫斯基有意将原先应给德意志族人的补餐券发给了其他工人和犯人，并宣称：“你们，德国佬！还加什么餐！”[②] 1948 年 12 月 2 日“莫洛托夫森林纸业”托拉斯姆基辛斯克林业局副经理在工人大会上便曾这样答复移民关于改善生产和物资供应状况的请求：“即使死上 10～15 个人（指移民），我们也无所谓。”[③]

当局在特殊移民期间的残暴和不人道做法，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伤了广大民众的心。特殊移民大量的申诉信充分反映了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纳兹拉尼村特殊移民 С. Ш. 伊兹马伊洛夫便写道：“我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要让他知道，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没有人性地对待整个民族的事件。”卡尔梅克族人 А. У. 巴德马耶夫和苏塞耶夫说，“当局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实际上是一场旨在灭绝印古什、车臣、鞑靼、卡尔梅克诸民族的犯罪活动。斯大林所颁布的宪法是彻头彻尾的样子货”。“我真不明白，在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等民族被如此摧残的情形下斯大林又怎么能说出关于苏联民族大团结的话来呢?！难道，在经过这一切之后还可能存在所谓的民族统一和巩固的国际主义吗?！”[④]

第五，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集体农庄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

① *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3, с. 130 – 131.

② *Суслов А. Б.* Системный элемен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ца 20 – х – начала 50 – х годов: спецконтингент, с. 130.

③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 (1930 – 1960), с. 170 – 171.

④ *Бугай Н. Ф.* Правда о депортац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и ингушского карод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0, №7, с. 42.

极性，扼杀了农民的个性和主动精神，导致农业发展丧失了革新的活力，农业长期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改革举步维艰，国家陷入危机；特殊移民活动对苏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国家领导人对农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活动。但他们没有废除斯大林当年通过镇压农民手段才得以建立的集体农庄农业体制，没有改变庄员对国家的依附地位。因而成果是暂时的，危机不断加深，最终导致农业问题积重难返，陷于停滞。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苏联农业长期低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产量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1986～1990年苏联谷物年均产量为1.965亿吨，比上一个五年计划略有提高，但低于1976～1980年的2.05亿吨。棉花、甜菜的情况也相类似。棉花年均产量是840万吨，低于70年代的855万吨。甜菜为8730万吨，也低于70年代的8870万吨。1991年的情况更糟，谷物产量直线下跌到1.6亿吨左右。[①] 农业的停滞倒退，再加上收购供应渠道的日趋瓦解，国家掌握的农畜产品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增多，对高脂肪高糖高蛋白食品的需求明显增加，结果导致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市场上每一卢布货币只有0.12～0.14卢布的商品。农业捉襟见肘，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安定局面无法维持，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但改革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改革年代，斯大林当年镇压富农、消灭个体农民阶级的特殊移民举措的恶果逐渐显现。这在苏联解体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长期在行政命令和农庄制度的保护下从事生产活动，苏联农民的个性遭到窒息，没有了劳动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多数农庄庄员已不会独立进行农业生产，习惯于一切依赖农庄和安于现状。相当一部分庄员甚至不知离开集体农庄后如何生活。他们害怕竞争，惧怕变革，特别是那些前景不明的变革。据1990年1月对823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显示，只有40%的人希望独立经营生产。当问及获得土地后想做什么的时候，44%的人回答要种蔬菜瓜果，26%的人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3页。

想建私房，很少有人想进行大田生产。至于农村干部，则大多数都反对或抵制发展私人经济。1990年最高苏维埃开会讨论《土地法》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们几乎一致反对平等对待集体经济和私人经济。① 农民个性和主动精神的丧失，成为苏联农业变革的巨大障碍。

改革的最大危险更来自民族问题。由于特殊移民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和苏联新国家领导人继续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等原因②，自60年代起在"解冻"的条件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国家已是进退维谷，岌岌可危。按说，苏联有耕地2.15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达0.79公顷，比美国多5%，粮食本应自给有余，但如今却要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3000多万吨粮食。政府为弥补外贸赤字，每年不得不减少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大量出口石油、木材等原料。恰逢当时世界石油和黄金价格急剧下滑，苏联欠西方的外债高达800亿美元。经济陷入困境，政府被迫向外国进行粮食借贷，结果使国家的债务愈加沉重。苏联对国外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依赖，迫使她不得不经常向西方作出妥协，政治上沦为西方资本的人质，改革受到西方国家的钳制。随着冷战对峙的日趋缓和，公开性、民主化思潮的广泛传播，农民已很难再忍受斯大林体制，更不愿向国家交售自己的产品。国家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社会主义威望不断下滑。人民对改革的兴趣直线下降，对政治家们的活动越来越冷漠。一些政治家为转移人民对生活状况及其政绩的不满，极力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导火索。1991年，苏联农业再度跌入低谷，城市供应明显紧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也被煽动到顶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终于导致国家的瓦解和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

在历数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广大特殊移民在国家边远地区经济开发方面所作出的成绩，在促进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和对苏联东西部人口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数百万特殊移民的牺牲换来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如期建立和国

① 徐天新：《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第172页。

② 导致民族问题成为引发苏联解体的导火索的因素很多，除特殊移民政策对民族关系的负面影响外，还包括联邦制变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大民族主义、历任苏联国家领导人在民族工作中的错误、经济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等（参见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第三、四、五章相关内容，第76~229页）。

家工业化的顺利实现。特殊移民政策促使农业集体化制度的迅速建立。虽然这种制度没有效率，但它的确将苏联粮食的商品率从1929年的13%增加到1933年的40%。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从而基本满足了国家对粮食的需要，有力地支援了工业化。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来看，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也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期间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基本完成。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长了12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5倍，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①] 苏联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其次，特殊移民促进了俄国东西部的人口平衡。

在特殊移民运动过程中，当局将600多万人迁往国家东、北部边远地区。虽然，随着特殊移民的解放，大量移民返回了原迁出地，但最终还是有100多万此类人口留在了移民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东西部人口的不平衡状况。

再次，特殊移民政策促进了俄国边疆地区的土地和经济开发。

特殊移民在迁入移民区后便被大量利用于国民经济领域各部门参加劳动，并创造了相当大的业绩。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开发方面。例如截至1938年1月1日劳动移民共开发各类土地3035644公顷，其中，耕地和有耕种能力土地1128194公顷，刈草地287431公顷，牧场590789公顷，宅基地44914公顷，其他土地984316公顷（沼泽地2988公顷，可灌溉土地12857公顷，生荒地243161公顷，特殊移民通过挖掘树根，铲除和清理灌木丛而开发出的新土地183416公顷等）。其中俄罗斯联邦境内由特殊移民所开发的土地便有1662280公顷，其他联盟共和国——1373364公顷。截至1938年初由特殊移民铺设的土质道路共计7294公里，在农村地区架设桥梁21400米，开掘水井1578口。[②]

不过从总体来看，苏联当局通过特殊移民政策而得到的这些“成绩”和“积极作用”的代价过于高昂，有些得不偿失。特殊移民政策充分体现了斯大林动员型发展模式竭泽而渔、急功近利的特点。它对国家的长远利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新编苏联史（1917～1985）》，第239页。

②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в СССР（1930－1960），с.53.

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特殊移民现象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是斯大林时期苏联产生的诸多悲剧性重大历史现象之一。它既与斯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历史现象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政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既是对俄罗斯帝国传统的沿承，同时也与斯大林对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对马列主义关于暴力运用的经典论述的片面理解密切相关，另外还涉及斯大林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政治家"为求大善不避小恶"的善恶价值观及其暴戾的个性，等等。[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俄国爆发，本身就是俄罗斯传统与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合流[②]，因此这期间所产生的一切历史现象必然会带有俄国历史和传统的印迹。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导致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及其实施。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农业问题和民族问题成为国家分裂的重大诱因的前车之鉴无疑对当今的俄罗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善待农民、慎用暴力。农民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亡。苏联领导人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有善待农民，最终导致工农联盟的破裂和农业的破产，在人民的冷漠中葬送了整个国家。其次，谨慎对待民族问题。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民族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苏联当局的特殊移民活动不但未能解决苏联旧有的民族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特殊移民的痛苦经历成为苏联少数民族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苏联国家领导人没有谨慎地对待民族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他们试图以简单的人为"组织"或"融合"等强制手段来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

① 师建军：《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深层原因》，《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第86页。

② 黄军甫：《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及其当代意义》，《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59页。

在经过动荡不安的9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在处理国内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方面已变得成熟起来。有理由相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在解决民族问题时绝不会再犯苏联那样的错误——把步子迈得太急和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式，而会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与发展、促进社会繁荣富强的高度，以更加谨慎和务实的态度来重视和解决俄国当前所面临的农民和民族等敏感问题。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1943年5月，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突然宣布解散，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组织形式而言，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党只是它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独立了。虽然到中苏分裂之前，国际共运还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继续存在，但是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共产党情报局只是欧洲九国共产党的协调和指挥机构，而苏共二十大以后各国共产党都是通过召开会议来统一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就斗争任务而言，共产国际在理论和逻辑上始终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己任，而在共产党情报局那里，所谓世界革命战略充其量只是莫斯科动员各国人民支持和援助苏联的口号，苏共二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①]

① 笔者对上述问题的论述详见《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然而，由于缺乏档案材料，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纳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俄国档案的解密为人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的契机，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现。① 目前俄国学者的研究，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过程，但对这一事件的原因和意义的探讨却显得不够深入。斯大林为什么要在1943年5月迫不及待地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4年的庞大机构是怎样解散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对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乃至世界革命意味着什么？这些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势在必行

最初，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② 共产国际正是为了推行世界革命这一战略任务而诞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就在期盼和准备世界革

① 苏联解体后，随着档案的解密，有关研究论著便在俄国开始出现，如 *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4，№5；*Ширина К. 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Адибеков Г. М.*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1943－1944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7，№7；*Адибеков Г. М.*，*Шахназарова Э. Н.*，*Ширина К. 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Коминтерна，1919－194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7。这些论著分别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的情况。至于涉及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文件，主要收集在俄国出版的三本档案集中：*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Ⅱ，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8；*Чубарьян А. О.*（*отв. ред.*）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1919－1943，Докум. Очерки，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Адибеков Г. М. и т. д.*（*сост.*）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и Коминтерн：1919－1943гг.，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此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来源：*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中译本参见《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1页。

命。由于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胜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支持这个路线，在托洛茨基起草的宣言中强调："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尽管列宁试图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对"左"倾冒险主义展开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数共产国际领导人仍然坚持在欧洲各国全面发动进攻。[①]

1923～1924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趋向繁荣。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在把革命推向东方的同时，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联盟的尖锐批判。反对派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在苏联党内斗争中运用的政治策略不敌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斯大林的主张更具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②] 随着对世界革命路线的偏离以及斯大林在党内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开始逐步从一个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世界性组织机构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再次唤起革命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大会提出的战略是：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在法西斯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实行议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总体上，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民主的组织，能给资本主义以打击，至少能加剧革命局势"，而社会民主主义则是更危险的敌人。于是，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要经常揭露和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懈地争取无产者的大多数。[③]

---

① *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 46－48。有关的详细档案文件，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5、6卷的相关专题文件。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8、9卷，人民出版社，1956、1954，特别是下列内容：《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和结论等。关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还可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特别是第81～124页）和第9、10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③ РЦХИДНИ，ф. 495，оп. 18，д. 767，л. 76，*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 52－53.

1933 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为对苏联安全的更大威胁。1935 年 7～8 月共产国际在七大期间提出，法西斯主义剥夺了民主，摧毁了人类赢得的巨大社会权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会议上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所面临的，“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因此，配合苏联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的外交路线，各国共产党必须转向拥护民主，动员群众，建立起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①]

然而，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能的警惕以及与英法谈判陷入僵局的结果，使斯大林再次改变了策略。为了保障苏联的安全，苏联决定与德国联手。[②] 1939 年 8 月苏德秘密条约签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大林要求共产国际淡化反法西斯的宣传，取消人民阵线和民族团结的口号，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必须坚定地宣布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于是，几年来依靠人民阵线与本国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发展的欧洲各国共产党，被迫对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采取了不合作立场。因为“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图的真假试金石”。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党：“凡与此看法抵触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线。”[③] 其结果，不仅各国共产党再次受到政权当局压迫，共产国际本身也成为众矢之的。在欧洲以外，1941 年初，皖南事变引起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分歧，美国共产党也退出了共产国际。[④]

面对艰难的处境，1941 年 4 月在苏联领导层便出现了有关共产国际是否还要存在的议论。[⑤] 4 月 20 日，斯大林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现在，“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各国共产党作为从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

---

① *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4－55；马细谱：《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转变》，《世界历史》1997 年第 4 期。共产国际组织的国际纵队对西班牙内战的干预成为这一方针的实践。

② 关于苏德秘密接触和谈判的过程，以及签订的秘密协定等文本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刊载的相关专题文件。

③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181－185；*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6－57。另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第 56、5～6 页。

④ 详见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209－213、202、227。

⑤ *Чубарьян А. О.*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Адибеков Г. М. и т. 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с. Ⅷ.

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已经成为障碍”，这种形式使各国党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响的两个西欧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和多列士传达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并成为真正本国的政党。[①] 5月1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与共产国际两巨头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活动决议的起草问题。在讨论中，他们担心这样突然的变化会在共产党内引起沮丧和混乱，同时被敌人攻击为“一种手腕”或说共产党人放弃了世界革命。因此，他们认为，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应该强调：“在现阶段，各国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本国的政党来发展。在今后的阶段中，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将使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更牢固、更广泛的基础上获得新生。”此外，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匆忙行事”。他们还为解散共产国际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①使反共产国际公约失去其基础；②打掉资产阶级手中的重要王牌：共产党都是服从于某国外中心的本国的“叛徒”；③各国共产党将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国人民的政党；④吸引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入党。[②]

由此看来，使斯大林感到共产国际应该解散的最初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各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和方针、政策围绕莫斯科的意图左右摇摆，其结果不仅使共产国际的威信和作用受到极大损伤，成为各国政府攻击的目标，而且把各国共产党搞得晕头转向，失去信心，而这种组织形式最终带给他们的只能是伤害。第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人们根本看不到世界革命的前途，无论是与英法结盟，还是与德国联手，苏联都必须借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力量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共产国际因此很难再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作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共产国际存在的逻辑基础已经动摇。至于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虽然给莫斯科带来了眼前利益和脱身于战争的短暂时机，但是，却在道义、信仰以及国际力量的聚合等方面从根本上打击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样的情势下，斯大林不得不考虑脱掉这件无用的外衣。尽管6月21日希特勒的突然进攻打乱了共产国际的工作部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 227 – 228.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 233 – 234.

署，但是，这场以保卫苏联为中心的战争开始以后，一方面共产国际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向民族国家利益，世界革命自然无从谈起；另一方面，苏联与英美在反法西斯基础上建立的联盟，随着战争的进程有不断加强和长期化的趋向，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莫斯科推行其对外政策的严重障碍，于是，斯大林决心踢开这块绊脚石。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①] 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②] 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③]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235 - 236; РЦХИДНИ, ф.495, оп.18, д.1335, л.1 - 3,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I, с.91 - 92.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236 - 237;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18, д.1335, л.16,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I, с.110 - 102.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238 - 239.

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 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②]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③] 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

①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169 – 170、233 – 234; *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8.

② *Ширина*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 58;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16 – 317;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57 – 358.

③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259 – 260;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73, д. 112, л. 24,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164 – 167;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с. 28.

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集会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①]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 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②] 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③]，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 1942 年 1 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④]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 1941 年 12 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

---

①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0а, д. 433, л. 1 ~ 3,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0.

②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Москва: Гея, 1996, с. 255.

③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 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 69 页。

④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 3，оп. 63，д. 237，л. 1－3、4－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6 卷，第 665～667、668～671 页。另参见 *Данилов А. А.*，*ПыжиковА. 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с. 15－16。

"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①] 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②]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③] 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

①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Европа: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1939 – 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1, с. 85 – 86.

② 尽管莫洛托夫和迈斯基认为英国的条约"是空洞的宣言"，苏联不能接受，但斯大林在5月24日的回电中指出，"它是重要的文件"，至于涉及苏联安全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可等待将来"以武力解决"。详见 *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 Встречи, Беседы, Дискуссии, Дакумен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и (1941 – 194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с. 153 – 157; *Визит В. М.* 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 А. 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1, с. 164 – 189。

③ 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273～274、278～279、297～306页。

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1]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2] 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3]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

---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32.

②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89～90、91、98～99页。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4～427页。

③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宗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63页。参见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6。

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①] 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②] 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③] 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斯大林突然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1943年初，随着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转入反攻，共产国际的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为了在数万名轴心国战俘中组织反法西斯力量，配合红军打出国境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迁回莫斯科后，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工作人员也猛增了几百人，还不断召开会议，下达各种指示。[④] 5月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822次会议，讨论改进民族广播电台的工作，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限令5月15日投入工作。[⑤] 这样热火朝天的场

① 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第117－128页；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8－429页；*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5－86.

② 斯大林后来与丘吉尔争论时说，波兰对英国只是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 с. 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140页。

③ 1943年5月9日塔斯社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已批准成立一个以波兰爱国者科希丘什科（Костюшко）命名的波兰师，并将开往前线与苏军并肩作战［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40－241页；*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6］。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西方猜疑的举动。

④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0；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65, д. 131,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с. 28、30；*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1－372.

⑤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18, д. 1340, л. 75－76,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II, с. 350－352.

面，很难使人想到这个机构的命运即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然而，就在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们通报了斯大林的意见："作为各国共产党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在目前形势下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独立发展和执行其独特任务的障碍"，因此应该解散，并且现在就开始制定解散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①] 根据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并于5月11日提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当晚，斯大林召见了他们（莫洛托夫在场），并对决议草案表示满意。接着斯大林与他们讨论了解散这个机构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团会议上审核决议草案，并作为向各支部的建议予以通过；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这个机构的哪些职能以及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的问题，交由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斯大林最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域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但这也不要急于行事。[②]

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将决议草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各书记作了传达，大家认为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决定第二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最后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还决定向各大党领导人通报决议草案：波立特（英国）、毛泽东（中国）、铁托（南斯拉夫）、芬德尔（波兰）、杜克洛（法国）、白劳德（美国）、林德罗特（瑞典）。[③] 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给波立特的电报，其中说到，"该文件暂不可在任何地方对外宣扬"。[④] 其他通报很可能当时没有发出，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团开会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①这件事你们不要急。你们把草案提出来讨论，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两三天时间进行考虑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几点修改意见。②草案暂时不要送往国外。至于何时发

---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2;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1.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2; *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1;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6）-ВКП（6）и Коминтерн, с. 812、草案文本见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3, д. 174, л. 1。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2 – 373;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1.

④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74, д. 56, л. 92,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52.

送，我们以后会作出决定。③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外国领导同志赶走了。这些人将在一些报社继续工作。应该开办4种报纸（德文、罗马尼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还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员会。[①] 事情确实有些急迫，对问题的处理也显得有些慌乱。5月15日《消息报》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则报道，或许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该报道指出：5月14日丘吉尔到达华盛顿，与在那里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澳大利亚外长埃瓦特进行了会晤，并将会晤罗斯福总统，英美是否于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与此次会议的结果密切相关。[②] 看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对外急需让西方盟国得知消息，对内又担心引起各国党的涣散，斯大林的复杂心情可想而知。

在5月13日有共产国际下属各国党代表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强调，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这一机构，这是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及时举措。多数与会者在发言中对解散共产国际持完全赞成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统一民族阵线。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这一草案。我们共产党人既没有成功地粉碎社会民主党派别，阻止一些国家建立法西斯政权，也没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将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强盗式的战争。（事实证明），旧的工人国际联合组织已经过时。"科拉罗夫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老的委员之一，他对解散共产国际没有任何怜惜之情，"其实，共产国际早就不能发挥领导机构的职能了。原因在于，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是在急风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来的。随着迅速革命论的破产和苏联作为一种新兴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国际已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多洛雷斯则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任何残余组织。因为毫无疑问的是，国际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些党成长壮大，就必须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些在本国影响较小的共产党代表对解散共产国际有些惋惜，皮克担心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尚未成熟到能够独立地解决本国问题。他认为，就德国共产党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经验更为丰富的苏联朋友的帮助。拉科西建议在文件中增加关于无产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3.

② Известия, 15 Мая 1992 г..

阶级联合起来的条款，“以便使我们在国外的同志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捷克共产党人施维尔玛的发言代表了与会者很多人的复杂情感，他说：“当我了解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之后，心情难以言表。我是在共产国际中成长起来的，我的全部生活都与国际息息相关。但情感归情感，（我最终还是认为），草案中关于解散国际的政治决定是正确和英明的。”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将草案作为未来决议的基础，并确定草案修改的最终期限为6月17日。[①]

5月17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再次召开会议，逐条讨论了解散国际的决议草案，并提交专门成立的编辑委员会进行整理、校订。会议还讨论并决定了该决议付诸实施的方式，即在决议内容最后确定之后，由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通报，各支部则以登报方式予以确认。各支部所发表的声明即意味着接受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②] 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组成的编辑委员会整理和校订了主席团修改的决议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时呈送的还有主席团会议记录和编委会讨论记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该决议已通过电台发给了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和库西宁，他们表示完全同意决议的内容。[③]

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苏联领导人开会。显然是想推卸责任，斯大林在对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时特意指出：需要说明，解散国际的问题是一些支部在战争期间提出来的。会议商定：要预先告诉各支部，将要公布这样一个决议；决议应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决议要由联共（布）中央主席团成员日丹诺夫和马努伊尔斯基签名；收到各支部中央批准该决议的决定后，发布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彻底解散的公报。[④] 大概感到10天后公布决议太迟，20日上午，斯大林即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难道不能今天就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登报公布？应当尽量加快此事的进程。”季米特洛夫解释说，密码无线电台只能够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

① 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40，л.78－8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 Ⅱ，с.353－357.

② 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40，л.89－97，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6）-ВКП（6）и Коминтерн，с.8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2－83，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3－374。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3.

④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74.

定时间向各党领导人电传决议内容，而他们要破译电报和了解具体内容，最快也得到5月21日。在此之前，我们不宜将决议内容公开。已定21日晚将决议全文交付印刷，这样22日晨可以见报。[①] 当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将公布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内容，分别用密码电报发给各国党领导人。电报称：作为国际联合的集中管理的组织模式，共产国际已不能适应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因而，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各共产党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议，并将讨论结果上报。[②]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宣读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后，斯大林对此做了一番详细的解说：实践证明，即使马克思和列宁，在目前情形之下也无法用一个国际中心来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实施领导。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情况如此复杂——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败主义策略，而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共产党则相反，他们的目标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尽快地消灭敌人。当共产国际建立之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我们有能力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失误。如果让国际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对国际的声誉造成损害。而这种情形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产国际还有一个原因，这在决议中没有明确提及。那就是，作为共产国际分支机构的各国共产党均受到了无端的指责——似乎他们是别的国家的代理人。这对他们在本国群众中广泛开展工作造成了消极影响。而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敌人也就丧失了藉此指责共产党的口实。国际的解散无疑会巩固以民族工人党面目出现的各国共产党的地位，并加强各族人民的国际主义意识，而后者则是苏联赖以维系的根基。斯大林讲话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就有关国际解散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③]

尽管季米特洛夫向共产国际各处领导人说"解散工作将会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国共产党支部回复意见，5月22日《真理

---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4 – 375;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6.

②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4, д. 56, л. 94,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70.

③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5.

报》便公布了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所做的解释是，由于战争环境，无法召开会议，只得通过报纸将这一建议提交各国支部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报上标明的决议通过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① 这显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个细节。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举行了“答记者问”。斯大林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是为了驳斥纳粹分子和工人运动中其他敌人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外国的命令。② 当然，斯大林这些话主要也是说给正在华盛顿会晤的英美领导人听的，以此进一步证明苏联愿意与西方保持长久合作的诚意。5月28日，斯大林在书面答复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的问题时，再次解释说：解散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关于“莫斯科企图干预别国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谎言；粉碎共产主义敌人关于各国共产党不顾本国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来命令行事的诬蔑；便于动员各国进步势力，不分党派和宗教信仰，联合成统一的民族解放阵营，以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便于把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联合成统一的国际阵营，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③

5月31日前，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经回电，表示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它们是：英国、法国、中国、瑞典、南斯拉夫、叙利亚和黎巴嫩、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古巴、哥伦比亚、瑞士。另外，还收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支持解散国际的政治决议，这些党的领导人就在莫斯科。5月31日季米特洛夫通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内在收到波兰工人党，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和希腊等国共产党组织的回电之后，即可发布公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已得到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可。④ 接到报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

① Правда，22 мая 1945г.，决议的英文本见 Lane Degras（ed.），*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Vol. 3，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477－479。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46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2，с. 104－105.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 376－377.

④ РЦХИДНИ，ф. 495，оп. 73、д. 174，л. 49－50；оп. 18，д. 1340，л. 123－144，*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 87.

烦了，于6月2日夜间给季米特洛夫打电话问："需要收到所有共产党通知之后才发表公报吗？"季米特洛夫回答说，因有些党将于6月7~8日召开代表会议，应该再等几天。斯大林只好作罢。①

6月5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在共产国际41个支部中，已有29个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还未递交报告的共产党支部包括：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卢森堡、希腊、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印度、日本、巴西、新西兰。季米特洛夫决定，即使不再收到此类报告，仍打算在6月8日召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并在会议上审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批准公报。此前，公报草案将发给斯大林审阅。公报的见报日期拟定在6月10日，即英国工党会议开幕（6月13日）前夕。季米特洛夫还报告说：在此次大会上除了要确认关于解散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书记处和国际监督委员会等机构的决议外，还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马努伊尔斯基、皮克、埃尔科利以及经济活动管理局局长苏哈列夫（任秘书）等人组成的委员会，具体负责清理共产国际原有机构及其财产的工作。整个工作结束日期限定于1943年8月1日前。②

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了最后一次（第826次）会议。会议确定，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一致批准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没有任何支部对此提出异议。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报告的计划进行的。③ 6月10日，《真理报》刊登了31个赞成解散国际的共产党支部的名单，以及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④

解散共产国际并非一场骗局

俄国学者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只是"名义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实际上其机构大多经更改名称后保留下来（如第99、100、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9.

②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73, д. 174, л. 52 – 53,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77 – 378.

③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18, д. 1340, л. 106 – 107,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78 – 379;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80.

④ Правда, 10 июня 1943г.;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80.

205 研究所及通讯社等），其骨干成员都被充实到这些机构中，并统一由新成立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领导，这个部的实际负责人仍然是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个弥天大谎”。[①]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这关系到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究竟只是一种策略或权宜之计，还是某种带有战略性质的选择？或者说，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是否意味着苏联在战后对外政策方针上会重新定位？

从共产国际解散的过程及善后工作安排来看，执委会机关及其下属机构的某些职能确实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来。共产国际的职能部门在组织革命运动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通过共产国际第一部（通讯部）负责人莫罗佐夫 1943 年 5 月给马林科夫的报告可以得知，该机构的任务包括：与苏联境外的各共产党组织和各联络站保持秘密无线电联系，并为其培养无线电技术骨干；培训各国党务工作人员如何开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证件、使用密码和专业设备、书写密信等；向各联络站点派送搜集军事情报的人员；组织对各国播放当地语言的节目；从事无线电侦听业务等。与第一部长期保持联络的境外无线电联络站有：波兰 5 个，荷兰（同时负责德国境内业务）5 个，中国 3 个，比利时 2 个，法国 2 个，丹麦、瑞典、奥地利、蒙古、伊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游击区、英国和美国各 1 个。尚在筹建的联络站还有：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和德国，计划设立的联络站有：匈牙利、叙利亚、保加利亚和印度。通过该部，1942 年共产国际共收到各联络站发来的电报 5300 份，仅 1943 年 1～4 月就有 3586 份。[②] 即使在准备解散共产国际的过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直到 6 月下旬，还不断有共产党员、地下工作人员和物资被派送到各欧洲被占领国或游击区。[③]

从开始筹备解散共产国际之日起，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的命运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5 月 19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讨

---

① *Адибеков Г. 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1947 – 1956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4, с. 226;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с. 30.

②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3, д. 182, л. 16 – 25、28,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3.

③ РЦХИДНИ, ф. 495, оп. 73, д. 195, л. 108 – 119, *Лебедева*, *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с. 83 – 84.

论了与共产国际解散有关的一些组织机构问题。关于对各国的无线电广播，所有与会者均表示应继续发挥各民族广播电台的职能，因为该电台正在为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真实信息、政治指导和心理支持。关于各国党的国外局，季米特洛夫列举了苏联境内的兄弟党国外机关及成员后，多数与会者赞同：有必要利用现有技术装备维持境外机关与本国党组织的联系，否则，敌人便会在当地建立类似的虚假机构来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关于"苏普列斯"通讯社、外文出版社、共产国际和各党的档案资料以及图书馆，与会者均主张保留，但其归属问题由联共（布）中央决定。负责培养各党干部的党校在本期培训结束后关闭，《共产国际》杂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办，以后是否继续，交由联共（布）中央考虑。至于云集在共产国际的各国干部的去留问题，也由联共（布）中央决定。季米特洛夫最后总结说，共产国际的这些职能均应以某种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势下按联共（布）中央的系统予以安排。① 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将会议记录发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② 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与马林科夫商定：保留对各国的广播，对有关国家的广播交由相应的共产党国外局负责；保留"苏普列斯"通讯社，由联共（布）中央监管；保留联络服务处（电台联系、护照技术等），归属和管理问题待定；图书馆改为马恩列研究所分支机构；档案移交联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继续工作，作为联共（布）中央的一个单独出版社；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工作由联共（布）中央负责安排；其他经济实体移交联共（布）中央秘书局处理。③ 到7月中旬，有些机构的归属又有所改变：所有经济实体，其中包括位于罗斯托基诺的两幢大楼，均移交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苏普列斯"通讯社转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特殊技术部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校和无线电学校解散。④

①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73, д. 174, л. 51 – 55,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66 – 369;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4.

②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ВКП（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с. 814 – 817.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78.

④ РЦХИДИН, ф. 495, оп. 73, д. 174, л. 70,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Ⅱ, с. 392 – 393。该文件编者加有注释称："专门培训外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最后不仅没有解散，而且还扩大了招生规模，并开设了一些与游击斗争有关的新课程。"另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87。

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释，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这一事实，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议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①] 12月27日又作出进一步决议，组建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Иностранный отдел），任命季米特洛夫为部长，马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将原共产国际的所有对外联系工作均集中到国际部统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负责国际部的领导工作。[②]

1943年7～8月，相继成立了隶属于国际情报部（国际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别接管了共产国际原机构的业务。205研究所负责广播和宣传工作，每年出版数十种小册子，并使用28种语言对47个国家进行广播（1947年），前共产国际报刊和广播部负责人格明杰尔任该所领导人。100研究所是在共产国际第一部的基础上组建的，领导人仍是莫洛佐夫，该所负责同各国共产党进行特殊联系，并向境外输送武器装备、医疗器械、药品、宣传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时负责为各党培训干部。此前还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负责在战俘中开展工作。[③] 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国际部的机构设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根据呈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该部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对境外的宣传和反宣传工作；同各国反法西斯活动家和组织保持联络，并对他们给予支持；帮助苏联的工会组织、文化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发展和巩固与盟国、中立国相应机构的关系；向联共（布）中央提供国外反法西斯组织和活动家的情报；培训和监督在苏联或国外工作的国际主义者。[④]

的确，正如俄国学者所说："共产国际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没有

---

①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81;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с. 817.

② РЦХИДН, ф. 17, оп. 162, д. 37, л. 112,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с. 817.

③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с. 33 – 38; *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с. 252; *Поляков Ю. А.*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1, с. 108 – 109.

④ *Адибеков*,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с. 39 – 40.

停止，反而拥有了更大的规模。"[①]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认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或国际部就是共产国际的继续。从国际部所担负的任务看，基本上都是与战争期间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事务，而与作为共产国际宗旨的革命主张已经没有关系。至于说共产国际的机构和功能，早在战前已经沦落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国际部在某些职能上取代了共产国际，也只是承认了一个现实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几次谈到解散共产国际是一次认真的行动，应尽量避免人们再想起这个机构。这说明，从本意上讲，斯大林决不想让西方看到共产国际组织在苏联的复活。为了在苏联抹去共产国际的一切痕迹，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许多细节：1920年得名的"共产国际路"（лу. Коминтерна），现在已改名为加里宁路（лу. Калинина）；一直作为苏联国歌的《国际歌》，现在也被取消，而仅留作党歌了。[②]

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表面形式，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动机可以看出，这一决定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从国家层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权力后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保障苏联的安全和发展，输出革命和鼓动造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这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过是顾及意识形态延续性和鼓舞人民士气的一句口号。斯大林已经考虑并正在准备让苏联作为重要成员加入国际社会，加入一个既有约束力又能提供机会的体制，而加入这个体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弃革命的传统。1944年10月斯大林在与丘吉尔的著名对话中一语道破天机——丘吉尔坦诚地对斯大林说，"在1919～1920年时，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回答说："现在世界不会再吓得发抖了"，因为"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③]

---

① *Чубарьян*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c. 257.

② *Поляков* После роспус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c. 108；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274页。

③ АПРФ，ф. 45，оп. 1，д. 283，л. 18～21，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7～720页。

第二，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失去了从组织上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合理依据，虽然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国外局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两年左右），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返回国内领导本国的重建工作，国外局和国际部陆续被取消，而让位给对外联络部。通过这个机构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根本无法与共产国际相提并论。否则，在冷战兴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会想方设法去组建共产党情报局了。①

①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参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北京大学　王洋

农业生产始终是苏联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为苏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沉重的年度计划负担、无法满足需要的预算投入等因素，导致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也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整个经济的发展。对于苏联农业的研究，无论是从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借鉴的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40年代苏联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和艰难的战后恢复，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农业所面临的冲击以及苏联政府的回应政策。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冷战形成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关于战后初期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尚无有分量的著作问世，而俄国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深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历史档案公布之后，苏联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扎实的学术专著。[1]

① 苏联时期的作品，诸如 *Арутюнян Ю.* Сос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Вылцан М. А. и т. 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3.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转下页注）

同时，苏联学者对纷杂的档案进行筛选整理，出版了一些专题档案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①

本文选取了三个相对独立又有紧密联系的问题加以探讨。战争期间苏联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维持农民生活还是在支援前线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这种与公有制相对立的经济成分，却从根本上动摇着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战争结束后，苏联着手恢复经济，并曾一度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束缚，出于对西方不信任的安全考虑，苏联经济战略再次走上了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主的老路。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战时个人经济发展引起的集体农庄制度的松动，苏联政府选择用镇压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从而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完成年度计划。此外，在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为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苏联政府还通过货币改革从富人和农村居民手中夺取了大量战时积累的财富，其结果，在农村严重打击了战时通过发展个人经济而富裕起来的农民。本文将分别探讨战争时期个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对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冲击；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货币改革及取消票证制度对于农业的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更准确地向读者展示在冷战形成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是如何调整政策，完成农业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

（接上页注①）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 – 194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却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20 世纪 90 年代后，出现了一批利用新公布档案的著作，如 *Попов В. 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 – 1953 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 ТГТУ, 2000;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4. Экономика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горячей" 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 Москва: ИздАТ, 2004; *Зима В. Ф.*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 – 1947 годо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1996;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в 1939 – 1959 гг.,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2002; *Чуднов И. 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 Кемерово: ГУ КузГТУ, 2002。

① 如 *Попов В.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 (1945 – 1953):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Прометей, 1993; 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 – 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 *Зубкова Е. Ю. и т. д.* (*сост.*)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 – 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有关俄国档案的中译本，可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 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苏联农村的主导地位，从此大大小小的集体农庄遍布苏联农村。① 二战前夕，全苏大约有23.69万个集体农庄，有1870万农户生活其中，而在当时个体农户只有134.67万户。② 集体农庄的庄员需要参加社会生产并获得一定的工资，此外，每户还会分得一块供自己支配的份地，但同时也要为这块份地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个人经济（亦称为宅旁地经济）是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农民生活的支柱，同时也因为其“私有”性质而受到苏联政府的格外“关注”。

在集体农庄体制下，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规定，集体农户可以拥有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二分之一公顷的宅旁园地。在农业地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1头奶牛，2头以下仔牛，1口带仔猪的母猪或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认为必要时2口带仔猪的母猪，总数10只以下的山羊和绵羊，数目不限的家禽和家兔，20箱以下的蜂群。在畜牧业发达而农业落后的地区，个人经济被允许养殖牲口的数量相应增加。《章程》中同时还规定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各项缴纳义务。③ 尽管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限制，并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压力，但在30年代，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的规模仍然自发地扩大了。30年代末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土地清查，共清查出了面积达254.22万公顷的私占土地。为限制个人经济的发展，在这次普查中，严格按照《章程》限定农民的宅旁地面积，凡是超出标准的都划归集体农庄所有。1939年苏联政府改革了农业税的征收标准，由原来的固定税额改为按收入标准征收累进税；1940年改革了义务粮收购标准，以往是按照农户播种面

① 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1941－1945：В 2－х кн. Кн. 2. Москва：Наука, 2004, с.51.

③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人民出版社，1977，第2－3页。

积以及饲养牲畜数量来决定，现更改为统一按照农户耕地面积的多少来计算，也就是说义务粮的征收完全不考虑农户个人经济的收成情况。税收制度的变化既满足了政府增加农业税收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经济的发展。[①]

30年代苏联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1940年，借助良好的气候条件，无论是播种面积、粮食收获量以及粮食采购量，都达到了苏联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和平发展的时间并不久长，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苏联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受到了冲击。战争引起的特殊形势为农村个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争的头两年，与军事溃败的同时，苏联农业也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中斯拉夫等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区共包括9.8万个集体农庄（战前总数的41.7%）、1876个联合农庄（44.9%）和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41.3%）。这些地区在战前拥有苏联差不多一半的农业机械设备，出产的谷类占全苏产量的38%，甜菜占87%，养殖的牛占45%，猪占60%。[②] 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很大一部分农业机械被转交给红军，大量的农民也应征入伍。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的损失，也使苏联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全苏谷类作物总产量为9550万吨，1943年降至战时最低水平，仅收获了2940万吨，1945年恢复到4720万吨。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战时大大下降了。1940年谷类作物每公顷收获8.6公担（1公担=100公斤），1943年下降到每公顷4.2公担。[③]

伴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压在农民肩头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战争伊始，苏联政府就颁布法令，增加了农业税（针对农民）和个人所得税（针对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42年1月，政府增设战争税，而取消了增收的农业税和所得税。战争税是人头税，其覆盖面超过了战前的任何一个税种，所有有收入的居民以及被赡养者都需要交纳该税，包括在后方的军

---

① 参见 *Попов В. 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 - 1953 гг. Москва-Тамбов: ТГТУ, 2000, с. 161。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о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 - 194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Т. 3, с. 147.

③ 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1990, с. 91 - 93.

事人员也要缴纳战争税。1944年在370亿卢布的征收自居民的直接税中，战争税占了210亿。战争期间，仅战争税一项，苏联的预算收入就达721亿卢布。[①] 战争结束后，战争税被取消。总的来说，战争年代农村居民如果家里没有优待，那么平均每户所缴纳的税增加了5倍。除农业税和战争税之外，战争公债是农民的另一项货币支出，在1942～1945年间国家发行了四次战争公债，以此从居民手中征集了897亿卢布的资金。[②] 认购国债是苏联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按规定是以自愿为原则，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带有强制色彩。

和战前一样，农民不仅要缴纳货币税，还要缴纳实物税。根据《劳动组合章程》集体农庄农户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份额的粮食，以实物形式支付机械拖拉机站的报酬，偿还贷款，之后的剩余才能供农民自己支配。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立刻加强了粮食动员工作，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不断发布关于加强粮食收获和粮食收购工作的决议，更派遣沃兹涅辛斯基、加里宁、柯西金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地方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监督。1942年2～4月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相继发布决议，提高土豆、蔬菜、肉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交售额。[③] 1942年11月2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及个体经营者未完成义务交售任务的责任》，根据这一决议，国家粮食采购部的特派员在追讨农民所欠义务粮时，可以不经由法庭直接没收农民财产。这一法令的颁布，改变了1937年确定的以司法手段处理没收农民财产问题的规定，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恢复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在粮食义务交售工作方面，1942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布决议，禁止搜集实际资料，而以中央统计局预估资料为标准来评估粮食收成，从而制定该年粮食收购计划。这使得国家在制定收购标准时，根本不考虑各地农业的实际播种收获情况，由于中央统计局编制的预估收成资料远高于农业地区的实际收获量，所以农民所承担的义务交售任务更加沉重了。[④] 从具体数字上看，战争时期农民的实物交售义务比之战前大大增加了，以谷类作物为例，

---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243.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1941～1945, с. 64～65.

③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238.

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决议，并不仅仅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性措施，在战后仍保留下来。

1940 年国家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谷类作物占全国收获量的 38%，而 1941 年增加到 43.5%，1944 年达到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43.9%。[①] 虽然由于大量农业机械转交到红军作军事使用，农民给机械拖拉机站的粮食支付比之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新增加了军事粮食捐助，所以总体来看，农民的实物缴纳的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以尽可能有效地分配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在农业地区只有机械拖拉机站和联合农场的工人和职工享有国家统一的粮食配给，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却不在其中。所以，和战前一样，农民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集体农庄社会劳动获得工资，另一个就是从事宅旁园地的生产。[②]

如前文所述，战前苏联的农业政策的方向是"引导"农民更加关心社会生产，尽量限制农户个人经济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初，苏联政府的政策指导仍然没有改变。1941 年 11 月在机械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建立了政治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的政治工作，在拖拉机站、联合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强化纪律和秩序，以保障及时完成农业工作计划。"[③] 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生产工作，1942 年 4 月 13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户最低义务劳动日的决议"，并且首次将这一规定在 12～16 岁的青年中推行。根据这一决议，庄员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组合的每个成员必须每年工作不少于 100～150 个工作日，而 1939 年是 60～80 个工作日。12～16 岁的成员每年的义务劳动最低时限不少于 50 天。没有完成最低劳动任务的庄员，将被开除出劳动组合并剥夺宅旁地，还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并处以 6 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决议简化了驱逐不满劳动任务、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懒惰庄员的手续。没有将上述庄员交付法庭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工作队长，自己将受到法律审判。[④]

---

① 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 91－93.

② 参见 *Вылцан М. А. и т. д.* （*ред.*）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3.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накануне и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1945.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7，с. 353。

③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 54－55.

④ *Попов В. П.* Паспор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СССР（1932－1976 гг.）//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8，с. 3－8.

尽管战争开始后集体农庄农户参加社会生产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但农民来自集体农庄社会生产的工资却大大减少了。

表 1　1940～1945 年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日平均实物工资

单位：千克

年　份	1940	1941	1942	1943	1945
谷　类	2.0	1.6	1.0	0.8	0.7
土　豆	1.2	0.4	0.3	0.5	0.3

资料来源：*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1941－1945，с. 63。

表 2　1940～1945 年集体农庄劳动日货币工资的分类比重

单位：%

年份＼工资	0.6 卢布以下	0.6～1 卢布	1.01～2.5 卢布	2.51～4.0 卢布	4 卢布以上	不支付工资	平均工资（卢布）
1940	54.8	12.6	15.5	1.7	2.8	12.6	0.98
1942	38.2	12.8	15.1	4.9	4.7	24.3	1.03
1943	33.9	13.5	16.1	5.6	6.1	24.8	1.24
1944	30.8	12.5	15.4	5.6	5.9	29.8	1.12
1945	35.5	10.5	14.0	4.9	3.8	31.3	0.85

资料来源：*Зинич М*，Будни военного лихолетья，1941－1945. вып. 1. Москва：ИРИ РАН，1994，с. 64。

从表 1、表 2 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农民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所获得的实物收入骤减，1943 年时实物工资水平不足战前水平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时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停止，1945 年的实物工资水平更加低了。与实物工资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庄员从社会劳动中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平均值则略有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表 2 中显示，战争期间日工资在 0.6 卢布以下的人群比重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各等级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甚至与 1940 年相比，日工资在 4 卢布以上的人群比重在 1943 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显著的是，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工资的人群比重增加得更多，战争爆发后这一人群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弱至三分之一弱之间。这说明集体农庄发展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特

征。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商品零售价格急剧升高，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降低。因此，货币工资的些微增长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表 3　1940～1945 年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种植面积占全国种植面积比例变化

单位：公顷

年　份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全国农业种植面积	15041.4	10812.4	8771.4	9410.9	10985.1	11360.1
集体农庄个人经济种植面积	450.3	319.3	263.7	371.5	484.4	493.7
%	3.0	2.9	3.0	4.0	4.4	4.3
全国谷类种植面积	11057.1	8142.3	6728.9	7060.1	8199.9	8518.7
个人经济谷类作物种植面积	87.2	58.9	49.5	121.1	153.3	154.3
%	0.8	0.7	0.7	1.7	1.9	1.8
全国土豆种植面积	998.5	583.6	500.1	699.1	994.1	1056.3
个人经济土豆种植面积	312.3	238.3	204.1	224.1	300.8	308.2
%	31.3	40.9	40.8	32.0	30.3	29.2

* 1941、1942 年关于个人经济的统计数字，包括了农村地区工人职工的个人经济以及农村个体经济的种植面积。

资料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 104。

从表 3 可以看出战争爆发后，集体农庄个人经济农业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不断扩大，在谷类作物种植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945 年全国农业种植总面积与 1940 年相比减少了 24%，而同期个人经济播种总面积却增长了 10%，而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更是提高了 77%。个人经济的发展还体现在单个农户所持有宅旁地的平均面积略有增加，同 30 年代的情况一样，农民

出于生计考虑想方设法地扩大宅旁地的面积，尽管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核查集体农庄的土地，可是违法私占的行为却无法遏制。农庄家庭的多余土地虽然不断地被没收、充公并停止耕种，但1944年仍有7.7%的集体农庄家庭有多余土地。[①] 1940年全苏平均每个集体农户宅旁地播种面积为0.24公顷，而在1945年为0.28公顷。此外，农民的家庭养殖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1940年每100个集体农户有95头牛，而到1945年则增加至104头。[②] 从绝对数字上看，个人经济的发展幅度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当时苏联的农业状况，这种发展足以体现出个人经济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个人经济的发展首先体现的是满足农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根据统计数据，1943年农民个人消费的谷类同1939年相比下降了35%，肉类下降了66%。而土豆的消费量增长了100%，蔬菜增长了24%。只有奶的消费还停留在战前水平。[③] 土豆、蔬菜是农民宅旁园地里的主要作物，而牛奶、鸡蛋则是家庭养殖业的主要产品。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表明，战争时期个人经济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食物的主要来源。

如前文所述，战争时期农村居民的缴税负担十分沉重，为此农民不得不努力增加货币收入。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同战前相比明显减少了，1941年农民外出务工所得收入占所有货币收入的11%，而在1942年只有3.3%，1944年为4.5%。[④] 农民从义务交售中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微薄收入，因此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成为农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集体农庄市场是30年代全盘集体化之后出现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农产品，它是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重要补充形式。集体农庄市场在战前得到了一定发展，商品流通总量1932年为7.5亿卢布，到1940年增长到了29.1亿卢布。[⑤] 但是苏联政府一直推行降低商品零售价格的政策，农民从市场贸易中获利不断减少，这大大限制了集体农庄市场的发展。1932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占全国流通总量的17%，1940年则下降到14%，而同期国营零售贸易的份额

① I. V. Karasev, "The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in Pskov Oblast' 1945 - 1953", *Soviet Studies*, 1991, Vol. 43, №. 2, p. 303.

②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о, 1941 - 1945, с. 63 - 64.

③ *Зинич М*, Будни военного лихолетья. 1941 - 1945, с. 75.

④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360.

⑤ 乔木森：《苏联的集体农庄市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83年第3期，第19页。

则从30%增长到63%（见表4）。[1]

表4　零售贸易中各经济成分的比重变化

单位：%

	贸易总量			食品类贸易量		
	1932年	1940年	1945年	1932年	1940年	1945年
国营贸易	30	63	42	26	62	38
合作社贸易	53	23	12	48	18	11
集体农庄市场	17	14	46	26	20	51

在实行票证配给制度后，面包、米、肉等食品以及丝织品、皮鞋、香皂等工业品需凭配给证定量购买，这一制度逐渐在全国城市地区推行。但是战争开始后苏联国营和合作社贸易中流通的商品量大大减少了，1942年减少到1940年的44%左右，这使得城市地区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2]例如，1944年由于前一年粮食歉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商业机构经常减少向各厂工人供应处供应的米、肉和鱼等食品”，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小学大部分教师持有配给证但却“无法领到任何食品”。[3]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就成为城市居民购买、交换食品的一个重要场所，它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市场在40年代上半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表4可以看出，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流通量（按市场价格计算）大幅度增长，尤其是食品流通量在1945年甚至超过了国营和合作社贸易的总和。农民将大量的粮食产品投入到市场中。当然，集体农庄市场份额的增加与价格因素有关，票证配给制度下国营贸易中配给价格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而集体农庄市场上自由贸易价格却不断上涨，考虑到价格因素，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的份额并没有表4中那么高。同样影响表4数据的因素还有两个，首先，1944年苏联政府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的情况下，国营商店

①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за 40 лет в цифрах. Москва: Госстатиздат, 1957, с. 338.

② 统计数字来源：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 185。

③《贝利亚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食品短缺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4年10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735－736页。

开始实行价格昂贵的议价贸易，其议价价格比同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还要高。其次，战争时期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因此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换形式。1942 年 2 月莫斯科市委大会上就曾指出，“集体农庄农民不是把土豆出售，而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①] 因此，尽管表 4 内容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出集体农庄市场和国营贸易中商品流通数量的对比，但战争期间农庄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高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集体农庄市场主要是用于出售农民个人经济中的农产品。1944 年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流通总量为 1934 亿卢布，而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占了 1501 亿卢布，集体农庄出售的产品只有 140 亿卢布，不足农民出售量的1/10，如果考虑到市场上许多仅用于实物交换的商品，那么农民投入集体农庄市场的商品份额就会更高。集体农庄市场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战争时期市场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给农民带来了大量货币收入。战争时期，集体农庄市场上的商品零售价格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波动。战争的头两年，战场上的溃败也使苏联的经济遭受重创，1943 年苏联经济跌入最低谷，但这一年也是转变的开始，苏联政府开始着手经济复兴和解放地区的重建，从 1944 年苏联经济得到了较大的恢复。集体农庄市场上商品价格也在战争开始最初三年里不断攀升，1943 年达到最高点，1944 年开始慢慢回落，详情见表 5。

表 5　1941～1945 年苏联集体农庄市场价格走势（以 1940 年价格为 100）

单位：%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1945 年
面包类	117	1045	2155	2360	948
土　豆	91	1049	1628	1143	493
蔬　菜	97	710	1151	900	471
植物油	112	723	1684	1214	677
肉	115	684	1229	987	538
奶	99	1004	1529	1108	587
鸡　蛋	88	747	1140	962	637

资料来源：Но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с. 197。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 252.

与战前市场价格相比，主要粮食商品的价格在 1943 年上涨了 10 倍以上，面包价格更是增长了 20 倍。尽管 1945 年市场价格下降许多，但仍保持在 1940 年价格的 4～10 倍之间。高涨的市场价格给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收入，农民来自市场的收入成为其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见表 6）。战争前夕，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只占农民货币收入的1/3，而在战争后期，已接近农民全部货币收入的2/3，相比之下农民通过义务交售所获得的收入则微乎其微。从总体上看，农民在战争中积累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货币收入。根据苏联财政部的统计，战前城市居民持有的货币量约为 73 亿卢布，农村居民约为 70 亿卢布，到了 1945 年城市居民手中的货币量为 195 亿卢布，而农村居民则增长到了 342 亿卢布。①

可以看出，集体农庄市场在农民个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集体农庄市场在票证配给制度下的特殊地位，成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贸易纽带，加强了农民同城市居民的经济联系，从而为农村个人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表 6　出售农产品得到的货币收入占农民全部收入比重的变化

单位：%

	1940 年	1942 年	1944 年
交售粮食类产品所得	1.0	0.4	0.2
交售畜牧业产品所得	0.6	0.4	0.7
出售农产品所得	30.9	58.8	64.5

资料来源：*Зинич М*，Будни военного лихолетья 1941－1945，с.66。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规模扩大了，它成为农民得以熬过战争艰苦时期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使得个人经济在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变化对苏联集体农庄的发展以及苏联政府的农村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集体农庄农户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所获得的工资不断减少，而从个人经济中获得的收入相对增加，出于生计考虑，农民更加关注宅旁地的发

① *Попов В. 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после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6－1953)，Москва：Изд-во РАГС，2002，с.38.

展。1942 年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义务劳动的最低时间增加了，而政府则加强了对于未完成劳动任务庄员的处罚。即使这样，仍然有大量没完成劳动义务的现象出现，仅在 1942 年的 5 个月中（6～10 月），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法庭就审理了 15 万起没有完成劳动义务的案件。此时的集体农庄，作为国家在农村的生产单位，常年无法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作为农民赖以依靠的生活资料来源，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可以说，集体农庄无论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还是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地位，都大大地削弱了。用当时苏联政府上层的评论来说，"集体农庄制度基本崩溃了"。[①] 农民对于集体农庄也不抱有太多的期望，甚至希望能解散集体农庄。在 1943 年库尔干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布）州委书记的报告中，专门汇报了关于集体农庄中散布的近期将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人们认为解散农庄主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传言美英提出解散集体农庄、开放教堂等几项要求，苏联如果能够完成，那么美英将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许多农民相信不久后集体农庄将会被解散，牲口、土地将分发给各个农户，以后播种、生产将由农户自己经营。农民们对于解散集体农庄满怀期待，认为解散集体农庄后，"我们将有足够的粮食，边远地区粮食储藏站里有很多粮食，到时将分发给个人"，生活将"回到从前"，"将变得更加幸福"。[②]

个人经济以及集体农庄市场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作用，显然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在艰苦的形势下，政府竭力挖掘每一分可以动员的力量，一方面加强集体农庄的纪律，增加劳动时间和交售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鼓励发展集体农庄市场，这些都间接地促进了农民个人经济的发展。1943 年斯维尔德洛夫州统计局局长的报告认为，"在战争条件下国家统一供给无法充分保障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对于工业城市和地区的居民来说，这（集体农庄市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报告还建议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农户参与集体农庄市场，系统地保障市场定期有组织的开放。[③]

①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Война и обществo, 1941－1945, с. 55－59.

② ГАОПДКО（库尔干州社会政治运动国家档案馆），ф. 166, оп. 1, д. 162, л. 44－47, 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с. 425－428。

③ ЦДООСО（斯维尔德洛夫州社会组织文献中心），ф. 4, оп. 38, д. 227, л. 144－149, 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с. 532。

战争时期苏联农业地区个人经济的发展，不仅帮助农民挨过了最艰苦时期，也对维持苏联农业经济运作乃至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在饱受破坏的集体农庄体制下，顽强发展的个体经济大有“破茧而出”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层的注意。出于形势的需要，战争时期苏联政府对于个人经济的发展没有做十分严厉的限制，但一俟战争结束，活跃的个人经济就成为苏联领导人眼中破坏集体农庄制度的不和谐因素。个人经济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在固化而又物资匮乏的票证配给制度下，充分表现了它们的活力。战争结束后，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不得不直面战争给集体农庄制度带来的冲击，如何实现制度的恢复或重建，成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抉择。

二　战后初期政府对集体农庄的强化

1945 年 5 月欧洲战事结束，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在对内对外宣传中，这也成为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的直观体现。但除此之外，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巨大的破坏，苏联恢复经济的任务十分沉重，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战争夺走了无数苏联人的生命，1941 年苏联人口约 1.967 亿，1945 年下降到 1.705 亿，不考虑战争时期的新出生人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人口损失达到2600 万以上。[①] 为支援前线，大量的农村居民应征入伍，4 年中苏联农村人口减少了 1390 万，其中大部分是适龄劳动人口，根据专家估算，战争结束时农村的适龄劳动人口比战前下降了 37.2%。[②] 战争结束后大量军人复员返乡，在全国 850 万复员的适龄劳动男子中约2/3来自农村。复员军人补充了农村的劳动人口，但由于战争伤残、留在城里拒绝返乡、返乡男子入城打工等各种具体因素的存在，“战时应征入伍的集体农庄成员并没有给农村劳动力带来实质性的补充，因此 1945 年底农村集体农庄中适龄劳动人口明显地少于战前”。[③] 农业机械的缺乏是战后农业恢复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难题。战争时期大量农业机械都被征调用于军事用途，许多农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я истроня россии, с. 218.

②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с. 346.

③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я истроня россии, с. 351.

机生产厂也改为军用，农业机械数量以及生产能力都大大下降了。以拖拉机为例，1945 年战争结束时，农村使用的拖拉机按功率计算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 58.7%。[①] 劳动力和农业机械的缺乏使战后农业生产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恢复农业的任务十分艰巨。

不仅农业生产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制度——集体农庄制在战争中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争对集体农庄制度的破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德国侵占了大片苏联领土，在占领区强令解散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个人经济在战时的发展以及集体农庄自身无法满足国家与农民二者的经济需要，导致集体农庄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大为削弱，乃至在广大农民中表现出来的解散农庄的愿望不断增强。

因此，战后的农业恢复，并不单纯是提高产量的问题，需要关心的还有建立什么样的农业制度的问题。然而，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考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重建和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政策。

1943 年开始，苏联的战场形势逐渐好转不断收复失地，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着手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1943 年 1 月 23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公布了“关于在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措施”的决议。为了迅速建立机器拖拉机站，不仅归还战争初期撤退到后方地区的农业机械，而且责令各军事部门归还部分征用的农机器械。抽调 3 万左右的农业干部支援被解放地区，并对返乡的人员予以经济上的补助。涉及各地区的工作由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负责，全盘工作由农业人民委员每 5 天向中央汇报一次。[②] 这一决议充分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在解放区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迫切心情。同年 8 月，苏联公布了恢复被解放地区经济的决议，细致全面地落实了恢复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措施。[③] 至 1945 年年底，原被占领区的集体农庄基本上得到恢复，而机器拖拉机站的数量在 1944 年已经超过了 1940 年水平（具体数字

---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 - 1945 гг., Москва: Информацнонноv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ентр, 1990, с. 121.

②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 100～105 页。

③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 151～200 页。

见表7）。[1]

表7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数量变化

单位：个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集体农庄总数	235470	149693	146418	187368	217595	220019
俄罗斯	167291	121303	118423	144401	152812	154641
乌克兰	28374	—	—	13782	27340	27493
白俄罗斯	10165	—	—	1603	9608	9746
机器拖拉机站总数	7069	4898	4441	5921	7290	7471

随着战争的结束，在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农民也表露出对沉重的生产负担和低下的生活质量的不满，他们期待着战后农村体制和农业生产制度的变革。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民在1946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给地主干活一样，因为我们被驱赶着去劳动，不给吃的也不给工资。作为诱饵每天给一勺稀菜汤，50克面包，而且不是经常有，为了不饿死，每周给2～3次……"[2]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一位庄员费多罗夫说："集体农庄里的生活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处在死亡的边缘……应该退出集体农庄。让我们扔下工作各奔东西吧。"[3] 在奔萨州，一个叫舒雷根的人说："一点儿办法没有，除非解散集体农庄。土地荒芜，没有牲畜，谁也不愿劳动……农民讽刺那些对农庄抱幻想的人。"[4] 关于解散集体农庄的传闻在农民中广为传播，普斯科夫地区"火花"集体农庄成员们问来到集体农庄的一名区负责人："是否要立即解散集体农庄？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с. 139－140.

②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 17，оп. 121，д. 547，л. 14－15。引自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 62。

③ РГАСПИ，ф. 17，оп. 117，д. 528，л. 121. 引自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с. 63。

④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 17，оп. 88，д. 469，л. 140。引自 *Аксютин Ю.* Почему Сталин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предпочел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с ними? //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Ин-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1995，с. 55。

假若没了集体农庄，我们会生活得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①] 许多庄员将解散集体农庄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盟友的身上。在普斯科夫风传，“在旧金山会议上，建议莫洛托夫同志放弃布尔什维克和集体农庄。莫洛托夫放弃了集体农庄而不想放弃布尔什维克，所以美国向俄罗斯宣战了”。库尔斯克州情报员在报告中指出，集体农庄庄员之间议论着如下内容：“英国和美国向我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或者你们解散集体农庄，或者我们对俄国发动战争；在旧金山，莫洛托夫一开始拒绝消灭集体农庄，后来回来后又同意了；美国人将从飞机上检查，是否真的解散了集体农庄……”[②]

还有一些人在给上层的信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改革集体农庄的建议。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胜利者”集体农庄主席伊万诺夫在1945年7月议论说：“应当对集体农庄做一些改造，否则会彻底变穷，假若让集体农庄独立自主经营，不干涉它的内部生活，不给任何计划，而只保证向国家上交必要数量的产品，那我们将如数上交。但怎样上交——这是我们的事。我们将少种些地，但种得更好些，那时我们将有粮食，城市也会食品充裕。”[③] 此外，一些农民也提出关于减免赋税、扩大宅旁园地等改革建议。

然而，政府并没有对集体农庄制度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相反却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原有的农业制度。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做法，一方面是在组织上建立新的农业机构，加强对农业生产收购等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是采取严厉措施，惩罚庄员破坏劳动合作章程的行为。

为加强对农业的管理，1946年10月成立了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决议规定：“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可有自己的代表，作为中央的检查员，他们不受地方当局的领导。”[④] 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使

① РГАСПИ, ф.17, оп.122, д.122, л.28。引自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62。

② РГАСПИ, ф.17, оп.122, д.122, л.29。引自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63。

③ РГАСПИ, ф.17, оп.117, д.528, л.120。引自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63。

④ 《关于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1946年10月8日），引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407页。

中央政府得以更加准确、有效地监察和管理地方农业经济的各项工作。

1946年苏联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很不理想，当年收购到谷类作物只有1750万吨，比1945年少了250万吨，只完成了收购计划的76.9%。[①]粮食收购工作的不顺利，主要是因为该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遭到旱灾侵袭，收成大受影响。为改善农业收购工作状况，苏联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联共（布）中央于1947年2月通过决议，在机械拖拉机站设置了政治副站长职位。党组织挑选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活动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这一工作，并给农村政治副站长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如果农庄事务搞得不好，没有完成合同义务，就必须要求集体农庄领导人加强纪律。如果落后的集体农庄庄员们违反劳动纪律而给集体农庄带来危害，就不能坐视不管，而应该为彻底纠正这些现象作斗争。"[②]

同时，因为1946年粮食收购工作的失败，中央统计局及其地方机构也被指责工作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③]为改善统计工作，1947年又成立了苏联国家计委国家产量确定监察总局，在地方上，成立了420个州监察局，每个局平均管8~10个地区。新监察机构被赋予重要的作用，当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苏军复员的一批政工人员为区际产量确定监察员。他们在工作中独立于地方组织，后者不能干涉他们的活动。[④]

从战后初期农业机构调整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在加强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贯彻劳动组合章程、完善收购工作等，尤其是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农业工作中的地位，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农业事务的直接控制，从而保证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各项要求得到彻底实施。

从组织机构上完善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开始对旷工、未完成缴纳任务、盗窃等所有违反劳动纪律、未完成劳动义务的行为处以严苛的惩罚。苏联领导人决定以高压手段挽救战争时期濒临解体的集体农庄制度，从而完成农业经济由战时向和平时期的过渡。

---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360.

② Правда, 11 мая, 1947.

③ РГАЭ（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ф. 1562, оп. 329, д. 2674, л. 35 – 36。引自 *Зима В. Ф.*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46 – 1947 годов, с. 30。

④ Правда, 2 июня, 1947.

战争结束后，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休养的机会。1945年10月，义务交售和税收扩大到以前享受优惠待遇的所有居民，而根据苏联征购部的命令，阵亡烈士家属农户和其他人一样也必须向国家交售粮食。1946年苏联政府出台决议，提高了义务交售的标准，增加了1948年、1952年的农业税标准。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有所减轻，与此同时，他们从集体农庄社会劳动中获得的工资却十分微薄。1946年全苏联75.8%的集体农庄每个工作日只发给不到1公斤的粮食。而7.7%的集体农庄则完全不支付任何粮食。在俄罗斯联邦，13.2%的集体农庄不给自己农庄的农民提供粮食。[①] 本就负担沉重的俄国农民，1946年又遭逢旱灾，可谓雪上加霜，饥荒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旷工和盗窃的行为在农村不断发生。

为打击这些行为，战后苏联政府相继出台了多个相关决议。1946年7月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共同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好无损、不允许浪费、侵吞、糟蹋粮食的措施》的决议，9月出台了《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0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国家粮食不受损失》的决议，194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关于盗窃国家和社会财产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这些法令决议并不包含任何在制度上完善和改善的内容，只是不断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监管，并调整对违反劳动组合章程现象的惩罚力度。[②]

集体农庄管理缺乏民主，行政管理人员编制过多，不正确支付劳动日

① *Вербицкая О. М.* 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от Сталина к Хрущеву,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с. 137.

② 上述决议内容参见 О мерах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сохранности хлеба, недопущению его разбазаривания, хищения и порчи（27 июля 1946 г.）// Директивы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вопросам. Т. 3, 1946 – 1952 годы, Москва: ГИПЛ, 1958, с. 83 – 86; О мерах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нарушении устав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артели в колхозах（19 сентября 1946 г.）// Директивы КПСС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вопросам. Т. 3, 1946 – 1952 годы, Москва: ГИПЛ, 1958, с. 91 – 97; Об обеспечении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хлеба（25 октября 1946 г.）//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Т. 8, 1946 – 1955, Москва: ГИПЛ, 1985, с. 76 – 79; Об уголов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хищ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имущества（4 июня 1947 г.）// Правда, 4 июня, 1947。

报酬等，是劳动组合章程在集体农庄中遭到破坏的主要现象之一，而这一现象主要涉及的是集体农庄的管理者。集体农庄的领导者，尤其是农庄主席，既是由农村居民“选举”产生的首脑，又是“专横独断的官僚”，他作为农庄首脑对农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作为“官僚”又是政府意志的基层执行者，因此对于农庄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后为强化对农村的管理，苏联领导者也将监管惩治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阶层。在1946年9月的决议中，决定对于庞大的农庄行政人员进行精简，对于农庄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①] 随后，裁减了45.6万名闲职工作人员，还有18.2万名与集体农庄没有联系的人，被取消依照劳动日支付工资。[②] 行政人员的精简，使得集体农庄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劳动日支付大为减少。例如在普斯科夫州由行政机关和服务性职工所完成的劳动日的百分比在1946年占14.5%，到1948年减至7.9%。[③]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支付给在田间劳作的普通庄员。在裁减冗员的同时，集体农庄领导者在执行国家计划中的效率也受到严苛的纠察，许多主席因未完成年度计划或其他过失，经常被追究刑事责任。1946年上半年，全国有3322名农庄主席遭到起诉，下半年遭到起诉的竟达6189人。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法律处主任苏里达科夫在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在对待农庄主席的刑事处分上，态度常常表现得过分严厉，有时只为损失些许利益或非故意行为，便将之关人牢房。”[④]

严格限制宅旁地面积，打击侵占公有土地行为，是另一项重要举措。如前所述，个人经济的发展是农民生存的保障，但同时也是威胁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因素。抑制农庄庄员个人经济的发展，严格限定宅旁地面积，是苏联在农业经济中一贯政策的延续，只是在战后初期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194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22.2万个集体农庄中的19.8万个农庄重新丈量了公有土地和宅旁园地，查出侵占集体农庄土地的事件225.2万起，查出侵占公有土地470万公顷。清查出来的被侵占的公有土地全部没

① 《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1946年9月19日），引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391～397页。

② 安尼西莫夫：《苏联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发展》，中华书局，1953，第122页。

③ Karasev, *The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in Pskov Oblast' 1945－1953*, p. 303.

④ ЦГАНХ（国民经济国家中央档案馆），ф. 9476，оп. 1，д. 669，л. 91－98，*Попов В.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 25－29.

收，归还集体农庄。[①]

打击盗窃、侵吞公有财产犯罪是战后法令的另一个重点。根据 1947 年 6 月的法令，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将被处以在劳改营监禁 5～8 年[②]，而侵吞或挪用公有财产则依照 1932 年法律处以 10 年以上监禁。以 1947 年下半年为例，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村地区，以盗窃公有财产罪共审判了 13044 人，其中 71.4% 为农庄普通社员，案件性质多为盗窃粮食。在所有被审判者中，40% 被判处 8 年监禁，32.4% 判处 8～10 年监禁，19.4% 的人判处 10～15 年监禁。在地方上，对于盗窃罪的起诉和审理过程十分草率，量刑往往过重。例如，巴什基尔共和国的一位 69 岁农民被判处劳改 5 年，而罪名成立的根据只是在搜查中发现他家里的黑麦同农庄的黑麦十分相似，而总重才 2.5 公斤。[③] 苏联的司法部门本身纪律涣散，执法粗暴且不近人情。1946 年 8 月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女庄员叶夫多基莫娃给《社会主义农业报》编辑部的信中为其丈夫叫屈，并描述了这次审判的过程。在原定的审判开始后，法官、检察官、辩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的是在别人的搀扶下才得以入场，有的则因醉酒而无法按时参加审判，而所有案件都是在这个“酗酒的法庭”中进行的。后来这封信辗转被送交到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手中，在日丹诺夫的指示下，地方党委才对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重新调查，并对酗酒的司法人员进行了处理。此外，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叶夫多基莫娃在信中所提到的因盗窃 56 公斤粮食而被起诉的庄员（她的丈夫），两年中一直没有得到劳动日工资，集体农庄欠他 1044 公斤粮食。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的报告也承认，“如果这些粮食早一点发放的话，叶夫多基莫夫的犯罪是可以避免的”。[④] 类似因为饥饿而盗窃，进而遭到不合理审判的例子在当时屡见不鲜，但只有部分案件能得到申诉机会并获得重判。

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各项举措，其作用归根结底就是通过严厉的

---

① 安尼西莫夫：《苏联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的发展》，第 122 页。

② *Данилов А. А.*，*Пыжиков А. 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 134.

③ ЦГАОР（十月革命国家档案中心），ф. 9492，оп. 1，д. 531，л. 237－272. *Попов В. П.* П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1945－1953），с. 29－34。

④ РГАСПИ，ф. 17，оп. 117，д. 633，л. 86－91，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с. 435－437、439－440.

镇压手段使农业生产者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仍被迫最大限度地完成国家计划。在战后的农业方面，苏联领导人选择了与民众意愿相背离的政策，其中的原因，一是受到意识形态的传统束缚，斯大林和苏共干部已经习惯于集体经济和“贡赋”理论；二是战后的工业恢复同样需要投资，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发展，核武器的开发研制，以及一度希望发展的轻工业，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因此，亟待休养生息的农业再一次作出了牺牲。而对于农民（其实也包括城市居民，他们同样在饥饿的威胁下高负荷工作）来说，这种牺牲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在经历了饥荒之后，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个人财富的被掠夺。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 1947 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①] 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 1940 年的预算支出为 1743 亿卢布，1945 年为 2986 亿卢布，1946 年增加到 3075 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 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 5395 亿卢布。[②] 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

① 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制度及随后的降价政策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了苏联战后贸易制度的系统改革，本文在重点叙述货币改革的同时，将这三项政策联系起来，探讨它们对苏联农业发展及农民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② РГАЭ，ф. 1562，оп. 41，д. 113，л. 181－182，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с. 501。1945 年数据引自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941－1945 гг.，с. 215。

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 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 1946 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① 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人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②

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 1938～1960 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③ 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 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

① РГАЭ，ф. 7733，оп. 31，д. 211. л. 8～8об，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 554.

② РГАЭ，ф. 7733，оп. 31，д. 211. л. 5，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 556.

③ 1946 年之前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48 年 2～12 月为副财政部长。

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① 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② 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③

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④

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

① *Зверев А. Г.* Записки министра.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3, с. 232–233.

② 参见 *Зверев А. Г.* Записки министра, с. 233。

③ 参见 *Попов В. 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46–1953 гг., с. 82。但由于1943年在战场上取得了转折性胜利，苏联在国内政策上开始着手恢复和发展被占领区经济，在外交上也开始积极安排战后的事务，因此，这时开始考虑战后财政政策的发展乃至货币改革，也是很有可能的。但由于没有确实的档案加以佐证，历史事实如何只能存疑。

④ *Попов В. 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 37.

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如果说增加流通税是关于战后财政改革这一长期任务所提出的方针的话，那么货币改革就是夺取居民的财富，减轻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

从斯大林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货币改革问题并没有引起领袖的关注。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是一个秘密而敏感的问题，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暂时不便表态；另一方面，1946年初经济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制订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把货币改革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交给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以讨论。

1946年6月，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决议草案，在这里兹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货币改革计划。兹韦列夫建议在1947年第四季度实行改革，旧式货币的1卢布折合新式货币的20戈比，也就是说旧币以5:1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同时兑换国债。在实行改革之前，停止提高工人工资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兑换货币的同时，按指定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①

---

① *Попов В. П.* Стал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 38 – 39.

在制订改革计划过程中，关于新旧货币兑换的比率、兑换方式等问题，提出过不同的方案。除上面提及的 5∶1 的方案外，还提出过 1∶1 的兑换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居民可以按票面价格兑换新币，但同时规定了兑换的限额。工人、职员、退休者、奖助学金获得者不许超过半个月的工资，农民为每户 1000 卢布，集体农庄庄员每人 800 卢布。据统计，如果依照这种兑换方式进行兑换，可以从 500 亿～600 亿卢布流通货币中抽取 100 亿～150 亿卢布。由于各地各阶层所持有的货币数目差异较大，这样的兑换方式必然会使部分人损失巨大。此外，关于兑换方式还提出过新旧货币同时流通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仍可用于购买商品，国家通过出售商品、接受存款等方式吸纳旧币，以这种方式逐渐完成货币兑换。[①]

这时，斯大林开始重视货币改革了。面对各种改革建议，斯大林最终采用了以 10∶1 的比率兑换新币的方案。1947 年 5 月 27 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成立了货币改革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国家领导人还有莫洛托夫、沃兹涅辛斯基、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柯西金等人。1947 年 12 月 14 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自 1947 年 12 月 16 日发行新货币，即 1947 年的卢布。一切现金除辅币外一律进行兑换。辅币不进行兑换，并按票面价值继续使用。苏联全境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一周，即 12 月 16～22 日（含 22 日）；边远地区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两周，即 12 月16～29 日（含 29 日）。流通中现有现金兑换新币的比例，为旧币 10 卢布换 1947 年新币 1 卢布。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兑换的旧币，一律作废并失去其支付能力。在发行 1947 年货币的同时，苏联各储金局和国家银行将对居民的存款进行重新核算。存款核算的原则是，少于 3000 卢布的存款按 1∶1 进行兑换；存款在 1 万卢布以内，其中 3000 卢布按 1∶1 兑换，其余部分按3∶2的比率进行兑换；存款超过 1 万，其中的 1 万存款按上面的条款核算，超出部分按 2∶1 兑换。此外，决议还规定了对公债进行兑换的原则以及关于废除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的相关规定。[②]

---

① *Попов В. П.*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посл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 86－87.

②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 年 12 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 536～537 页。

苏联政府给人民更换货币的时间仅为一周。即使如此，在改革开始两天后，12月18日，为了尽量减少旧币的使用，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自12月18日始在商店、货运以及使用公共设施都必须以新币作为支付手段。同一天，财政部发布第1009号法令，货币兑换点减少了1/3，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大大减少了居民兑换货币的时间，使得居民手中的货币无法及时兑换而滞留手中。[①]

根据国家银行的粗略统计，1947年6月流通中的现金总量约为659亿卢布，改革前约为634亿卢布[②]，而实际上只有372亿卢布旧币得到兑换，其中有146亿卢布在城市兑换点兑换，132亿卢布在农村兑换点兑换，有9亿是通过商品销售单位完成兑换。[③] 到货币改革之前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有40亿~60亿卢布在战争中消失而没有进行兑换。计算下来，只有不足70%的货币得到正常兑换。而余下的30%的货币中，部分是通过个人的非法手段转为存款，其余则留在居民手中而失去作用。货币兑换之后，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统计，居民手中共留有约40亿卢布，而1947年底发行的新币总量约为144亿卢布。[④] 此后又发行了大量纸币，1948年1~8月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40亿增加到了258.5亿卢布，增幅达45.8%之多。[⑤] 通过兑换货币，苏联政府达到了缩减流通中货币量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措施，居民的货币没有得到充分兑换，继而增发的货币又使居民的货币迅速贬值，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相对的大大减少了，政府成功地没收了居民在战争时期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

根据12月14日决议，1948年5~8月对以往发行的国家公债进行兑换。战争期间为增加预算收入，国家发行了大量战争公债，1941年1月国家所负担的公债总额为542亿卢布，而到1948年兑换公债之前，则增长到了1879亿卢布。通过变更公债条款降低公债收益率以及兑换公债，国家的公债总数在1948年9月降为865亿卢布。国家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减轻了，

---

① *Чуднов И. 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 с. 127.

② *Чуднов И. 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 с. 156–157.

③ *Данилов А. А.*, *Пыжиков А. 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с. 107.

④ *Фетисов Т. И.* (*сост.*) Премьер известный и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А. Н. Косыгине. Москва: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7, с. 103.

⑤ *Чуднов И. 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 с. 158.

因而支付公债的国家预算支出也大大减少了，根据估算，1948～1955年间国家用于支付公债的支出将节省545.69亿卢布。[①]

此外，通过重新核定银行存款，苏联居民的银行存款从186亿卢布下降到150亿卢布，通过核定集体农庄账目（由59亿卢布下降到47亿卢布）和合作社组织账目（由78亿卢布下降到62亿卢布），国家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中都获得了大量实质性收益。

1947年货币改革是政府经过长期准备的经济改革举措，是苏联战后经济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次改革政府收到了预期的诸多成效。首先，通过货币兑换，增加了货币的购买力，维护了经济的稳定。其次，改革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大量减少，在夺取居民在战争时期积累的财富之后，也为苏联战后发展军事重工业积累了资金。货币改革为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行国家统一零售价格后，商业贸易被有效地控制在国家集中管理之下，在战争中一度活跃的市场因素受到很大的抑制。

由于货币改革“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全面考虑到各种经济政治因素”，所以一直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1946年在国内关于改革的要求最强烈的时候，苏联政府以国内一些地区发生旱灾国家粮食资源减少为由，宣布将货币改革推迟到1947年。[②] 1947年11月下旬即将进行货币改革的传言在苏联居民中开始流传，根据内务部的调查，关于货币改革的消息最早是由财政部门工作人员泄露的。在莫斯科风传将以10∶1的比例兑换新币，而在列宁格勒则传言兑换的比率将是新旧货币以2∶1的比率兑换，甚至有取消货币不进行兑换的说法。关于将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价格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改革的传言在居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③]

由于面临货币兑换、物价提高的情况，居民纷纷从银行中提取存款用以购物保值。从11月28日开始，各地的储蓄所取款的人不断增加，许多地方都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在莫斯科，“如果在平时全城的储蓄所每天支付给储户500万～700万卢布，那么11月28日竟支付了2500万卢布，

① РГАЭ, ф.7733, оп.36, д.2532, л.229－220.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 с.543－544.

② Правда, 29 августа, 1946.

③ 参见ГАРФ, ф.9401, оп.2, д.171, л.354－359,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 с.567。

而且有1800个账户的存款被提空了。这一天各储蓄所收到的存款只有1500万卢布。根据初步数据，11月29日19点前储蓄所向储户支付了5000万卢布。隶属于莫斯科邮政总局的第58储蓄所平时每天提款约80万卢布，而在11月28日这个储蓄所支付了147.9万卢布，11月29日则为250万卢布。"① 在列宁格勒同样出现了储户大量提现的情况，"11月最后5天里储蓄所共存入了7200万卢布，而提出的存款达1.14亿卢布"。②

大量提款的同时伴随着购物的狂潮。"11月25日前莫斯科商品收购机关下的商店每天平均销售额为220万~250万卢布，11月28日的销售额达到740万卢布，而29日16点之前就超过了1300万卢布。"许多贵重物品以前无人问津，但此时销售量大增，以致许多商品脱销。"11月29日将近中午时，中央百货商店的毛皮制品已经销售一空。首饰钟表部所有手表和首饰、音乐部的所有钢琴、运动狩猎器具部的猎枪以及自行车、摩托车都被买光。装潢部平时每天出售2~3张地毯，11月29日售出了60张。11月26日前，中央百货商店平均每天卖2~3张玄狐皮，11月27日和28日卖出了100张，而11月29日一个小时中就卖出了剩下的13张。"③

苏联商业部门在市场出现混乱后不久，就对抢购现象作出反应。"从11月30日起，莫斯科市内购买者对于适合于长期保存的食品（熏肠、干酪、干咸鱼、罐头食品、油、糖果、茶、糖等）的需求增加了。有鉴于此，根据莫斯科食品商店管理总局的指示，从11月30日晨开始，这些商品在所有商店都停止销售"。"12月1日这一系统的商店因为假日而停业。只有第5和第19两个商店营业，这两个商店中商品的出售规定了限额，例如油每人只能购买100克……珠宝贸易管理局辖下的11家商店中从12月1日开始只有3家还在营业。剩余9家都进行停业盘点。"④

11月底出现的银行挤兑、抢购商品的情况，充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担心。由于不清楚改革的具体措施，人们希望以购物的方式守护财产。而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消息灵通者，在很早便知晓货币改革中核定存款方式，先提走大量存款（3万~5万卢布或者更多），其后又将这些钱拆分

① ГАР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01，оп.2、д.171，л.332-336。

②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

③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32-336.

④ ГАРФ，ф.9401，оп.2，д.171，л.354-359。

成更小的份额以多个户头的方式存到了其他储蓄所。[①] 随着改革措施临近，居民反应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储蓄所中的存款开始急剧增长”，莫斯科地区的储蓄所在12月的第一周存款量为135.4万卢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周，存款总量迅速增加到5126.2万卢布。“如此剧烈变化以及存款的小额化趋势证明，民众已经比较准确的知道了货币兑换的规则”。[②]

12月14日改革决议公布后，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盛赞改革，认为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是政府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举措，但也有人抱怨物价提高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对于更换货币，部分人认为这样可以严重打击那些通过投机积攒大量财富的人，因此表示拥护，但很多人对于现金和存款兑换标准不同感到不满。一位居民在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抱怨，他有3000卢布在手中，他的邻居将3万卢布存在银行，货币兑换开始后，他仅仅得到300卢布，而他的邻居损失却很小。[③] 另一位居民气愤地表示，“部长会议到底知不知道，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除了那些投机商、贪污分子、小偷、形形色色的盗用国家公款的人以外，大多数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能在储蓄所存放自己的‘资本’。”[④] 人们在惊讶于手中的钞票变少时，更对将钱分成多个小额户头存储的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

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

① ГАРФ，ф. 9401，оп. 2，д. 171，л. 354－359.

② *Чуднов И. А.* 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1947 г.，с. 89－91。需要指出的是，从各地存款变化来看各地差异很大，对于信息的把握和反应，大城市居民远比其他地区准确而迅速得多。

③ РГАЭ，ф. 7733，оп. 32，д. 328. л. 7.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 575.

④ РГАЭ，ф. 7733，оп. 32，д. 328. л. 99－101.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с. 571.

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①]

在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之后，在1949年3月、1950年3月相继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降价。[②] 随着国营贸易价格的下降，集体农庄市场价格也不断下降，具体如表8。

表8 货币改革后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情况

（年度平均价格，以1940年价格为100）

单位：%

国家零售价格 \ 年份	1947	1948	1949	1950
所有商品	298	253	228	186
食　　品	362	291	254	203
非粮食商品	220	207	104	165
集体农庄市场价格	372	134	103	104

资料来源：*Белоусов 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Книга IV. с. 373。

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降价政策被认为是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物质利益，是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这里主要讨论财政改革对农村和农民产生影响的情况。在战争结束后，虽然取消了战争税，但农民的纳税负担并没有减轻，因为农业税的税额增加了。与战前一样，出售个人经济产品是农民家庭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途径，但货币改革之后，农民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明显减少了。根据1947年12月14日决议中规定，食品类价格普遍比原配给价格低，而工业品的统一价格规定得略高于配给低价，而比原议价价格平均降低了2/3。[③] 这就促成了表8所

①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536～537页。

② 参见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三卷《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第635页。

③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决议，1947年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三卷，第536～537页。

展示的价格走势，即粮食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远远大于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幅度。这一“剪刀差”的特点意味着，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日常所需的工业制品。这一趋势在农庄市场的贸易量上有明显表现，此处列举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商品流通总量在货币改革前后的变化为证。

表 9　1947～1948 年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市场农产品出售量变化

	1947 年	1948 年	%
面粉（公担）	2748	3226	117.4
土豆（公担）	17753	29837	168.0
蔬菜（公担）	8073	13636	168.9
肉（公担）	3962	5016	126.6
奶（千升）	894	901	101.0

资料来源：РГАЭ，ф. 7971，оп. 5，д. 69，л. 59－65，Колхозная жизнь на Урале 1935－1953. с. 753。

从表 9 可以看出，在货币改革之后，该州的农庄市场上出售的主要粮食产品数量均有增加，但是由于市场价格的下降，农民在市场上的收入却相对减少了（见表 10）。

表 10　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集体农庄农民货币收入（卢布/100 人）

年份	工资所得		交售所得		出售所得			退休金及各种津贴	总收入
	来自集体农庄或 MTC	雇佣劳动	粮食	牲畜和家禽	牲畜、家禽、蜜蜂	粮食	其他物品		
1946	11787	13450	709	151	18030	66441	768	8890	120226
1947	15323	15982	946	318	18289	63195	1252	11095	126400
1948	12770	19109	1591	996	13177	29959	718	10689	89009
1949	10599	19941	1774	1108	11752	33930	816	11816	91736

资料来源：*Мамяченков В. Н.* Роковые годы. Матери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лхозн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Урала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1946－1960）.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Изд-во У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2. с. 293。

表10展示了货币改革前后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总体上看，个人经济仍然是家庭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粮食或其他产品的收入远大于参加社会劳动以及交售农产品的收入，这是与战前、战时的特点相同的。但是比较明显的变化是，货币改革前后，农民来自于社会生产、来自于国家的收入稳定增长，而来自于市场的收入却明显下降。这一收入结构的变化是由降价政策直接导致的，这种收入结构的变化，使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削弱了，也使农民更加依赖于集体农庄。

货币改革、取消票证配给制、降低物价，通过这一系列政策，苏联政府彻底改造了国内的商品供应及流通体制，完成了由战时定量供应向国家统一零售价格的自由贸易的过渡。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后贸易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在对农民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新的贸易体制中，农民仍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市场虽然开放了，但是由于实行不断降低的国家统一价格，市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政府手中。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距逐渐拉大的价格差，则使市场成为剥削农民用以维系低廉零售价格的贸易体制的重要一环。市场之于农民作用的变化，严重地削弱了个人经济在农民生活中的作用。经过这一系列改革，将农民束缚在集体农庄中的绳索再一次被勒紧了。如果说用镇压与惩治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是采用行政的手段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的话，那么以货币改革为发端的贸易制度的变革，则是从经济层面稳固了集体农庄制度。

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在战后恢复中，苏联政府并没有顺应下层民众关于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而是更加关注如何消弭战争引起的社会松动，如何使经济制度更加有效地完成不断提高的年度计划。这样的政策导向，既不适应已有的经济现状，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指标都没有达到计划要求，更没有超过战前1940年的水平。这种情况也引起了苏联领导层的关注，50年代初，上层领导开始酝酿对农业生产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与西方合作：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② 笔者对战后苏

① 在这方面，除了过去大量的传统学派著作，约翰·加迪斯的一部名著很有代表性。在这部显然是回归传统的书中，作者强调，斯大林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从来不会放弃世界革命”，因此，只要斯大林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见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pp. 290－293、295。

② 详见：Davi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The Soviet Unio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56),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8; V. 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3, 1995; Aleksei M. Filitov, 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Ⅱ,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转下页注）

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① 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早在1942年初，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了《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国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要求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这个委员会从政治、外交、经济、民族、领土等各方面研究各国状况，并写出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综合报告。② 1943年9

（接上页注②） pp. 3－22；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 Cambridge and La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5－276；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15、21。

①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第55～66页；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②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 3，оп. 63，д. 237，л. 4－8，Вестник，1995，№4，с. 116－118。参见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68～671页。

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①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必然会紧张起来”。②作为一个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著称的“莫洛托夫派”的年轻外交官，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的看法更具代表性。在7月14日《关于苏美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葛罗米柯在列举了未来苏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后，很严肃地总结说：“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困难”，但苏美“两国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的必要性也清楚地摆在眼前。在很大程度上，将来的关系是由其本质决定的，而它早已成形，或在战争期间正在成形”。③ 11月15日，李维诺夫委员会又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可能性的基础》的备忘录。同迈斯基的想法一样，李维诺夫认为，英美的对抗是战后世界的基本特点并将因此为苏美合作提供好的机会。同时，对于必然出现的苏英在欧洲的利益冲突，可能会“迫使英国和我们达成一种协议，而双方只有根据相对接近的原则严格地划分出欧洲安全范围的界线，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协议”。④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世界革命，而只有民族利益和

---

①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49，Вестник，1995，№4，с.118－119。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72～673页。

② 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124－143。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84～713页。该报告还认为，在战后不久的将来，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第712～713页），这个见解对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不无影响。

③ AVPRF，f. 6，op.6，d. 603，p.45，l. 34。转引自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p.8。

④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14，д.143，л.31－89。转引自*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90。另参见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с.19。

国家安全，为此苏联必须与西方合作。正如俄国学者佩恰特诺夫所言：这三位苏联外交官“都希望一种真正的战时联盟的延续——的确，他们认为这是战后苏联维护其利益的先决条件”。他们都认为，美国、英国和苏联可以将世界划分成一些不同的势力范围，而苏联的势力范围“主要是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上来考虑的”，并不是那个“很难被西方盟国所接受的苏维埃化模式”。①

这些建议和报告，或者迎合了斯大林的意愿，或者为斯大林所接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苏联军队准备大举反攻向欧洲推进之际，1943 年 5 月，斯大林迫不及待地提出立即解散共产国际，目的就是要排除苏联与西方合作的这个“障碍”，“为各国人民将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扫清道路”。② 那年秋天，斯大林甚至作出了改换苏联国歌的决定。人们早已经熟悉的《国际歌》现在不再是国歌而只能作为党歌了。斯大林亲自挑选和修改的歌词，突出了“伟大的罗斯”。③ 这些无疑说明，在表现出一种与西方合作的强烈愿望的同时，战后的斯大林更加偏离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

葛罗米柯后来回忆说，1944 年 9 月斯大林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橡树园会议期间，给他下达过明确的指示：苏联赞同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而不是欧洲，目的就是促使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时给葛罗米柯的强烈感觉是：“斯大林确确实实期望在战后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长期的合作”。此外，从与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英国外务大臣艾登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得出了同样的印象。④ 1945 年 1 月 28 日，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

---

①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 pp. 16 - 18.

② *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 372、374 - 375、377 - 378；*Адибеков Г. 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1947 - 1956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1994，с. 6、21。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国际观察》2008 年第 1 期。另参见 *Лебедева Н.*，*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тный жизнь，1994，№5。

③ 罗伊·麦德维杰夫、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王桂香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第 274 页。

④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 18；艾·哈里曼、伊·艾贝尔：《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第 275～276、279～280 页。

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块——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而对于苏联来说，最危险的国家是德国。“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由于腐朽和两个敌对阵营的相互削弱，这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我们必须放弃只能通过苏联制度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观念。它也可以体现在其他的政治制度里，例如民主制和议会共和制，甚至君主立宪制。”① 负责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则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战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② 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莫斯科必须减缓在国外宣传和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③

上述情况说明，斯大林在战争后期集中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和巩固与西方的同盟关系，其目的不仅是要尽快消灭法西斯，也不仅是考虑到战后苏联国力衰落的现实，而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再次使苏联陷入战争的泥沼，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④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所谓“联合政府”的政策，即在那些将要打败和已经打败法西斯的国家应该建立起民主制度，共产党必须与其他各党派实现联合，共同组建政府。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这一政策的内容是有所区别的。

① CDA（保加利亚国家档案中心），Find 147 B，op. 2，ae. 1025，l. 1－6。该文件复印自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收藏的英译本保加利亚档案，下同。

② 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 77，оп. 3с，д. 174，л. 3。转引自 *Марьина В. В.*（*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1944－1948，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 94。

③ 当然，莫斯科并非否定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在1944年1月17日苏联情报局的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耶夫认为，目前宣传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宣传苏联的制度”，但强调这种宣传要避免“公开”和“直接”的形式，而应该“朴实”地进行。РГАСПИ，ф. 88，оп. 1，д. 998，л. 1－2，转引自 *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 94。

④ 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公开讲话中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其目的之一就是“新的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是永久不发生，至少也要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发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第398－399页。

"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战争期间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连历来很小的英国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①] 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在法国解放前已成立的71个省解放委员会中，共产党领导的就占半数以上。1944年2月1日，根据法共的倡议，抵抗运动各种武装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人数达50万人，其中法共掌握的义勇军游击队就有25万人。到6月，法共还建立并领导了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②] 1943年底，意共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到1944年6月，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民族解放委员会还在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初步实行了各项民主改革措施。[③] 在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发展到72500人，并已成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④] 然而，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

1944年10月23日，苏联与英、美两国政府同时正式承认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26%

---

① 费南德·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第3、146页。

② Ronald Tiersky, French Communism, 1920－1972,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18。转引自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05页。

③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4～325页。

④ 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第二卷，第3页。关于战时希腊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情况，详见 David H. Close ed., *The Greek Civil War, 1943－19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97－155; R. Craig Nation, 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125－143。

的选票，社会党与其附属党派获得了25%的选票。[①] 11月19日，长期侨居国外的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谈到党的任务时，斯大林指出，必须与社会党建立起左翼联盟，以便开展政治斗争。至于手中的武器，斯大林说："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已有了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斯大林强调，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这个政治组织的纲领，"首先应当包括恢复国家经济和巩固民主"。[②] 回到巴黎后，多列士提出了"团结、战斗、劳动"的口号，并以法共中央的名义"一再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在多列士的指使下，法共随即下令内地军服从政府命令，分散编入法国陆军。同时，许多领导解放委员会的法共党员，则把权力交给了戴高乐委派的地方官员。[③]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莫斯科对意大利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但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确定了同法国一样的合作方针。[④] 为争取国内反法西斯民主主义改革更加深入，意共领导人曾要求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立即退位，还要求彼·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必须辞职。斯大林在谈话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⑤] 陶里亚蒂离开莫斯科后，3月14日，苏联政府便宣布与巴多利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于是，陶里亚蒂一回到意大利就提出：墨索里尼垮台后，意大利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以巴多利奥为首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民主政府"。

---

① 塞顿·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邵国律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4，第402页。

② АПРФ, ф.45, оп.1, д.390, л.85~93, Источник, 1995, №4, с.152-15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7~737页。

③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13~315页。

④ Silvio Pons,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pp. 1-3.

⑤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495, оп.74, д.259, л.8。转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с.19-20；*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410-411，《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80~282页。

陶里亚蒂还一再向盟国咨询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墨非表示，"共产党的目标"是"要消灭法西斯主义，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① 正因为如此，在10月9日苏英领导人会谈中，当丘吉尔表示担心盟国军队撤离意大利后意共会发动内战时，斯大林一方面表示不反对英国在意大利的政策，一方面轻松地保证说，"埃尔科利是聪明人，他不会去冒险的"。②

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③ 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④ 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⑤ 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

① 《意大利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第90页；马契拉·弗拉拉、毛里齐奥·弗拉拉：《陶里亚蒂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258页。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326～328页。

② *СтрижовЮ. 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 2003, №2, с. 51－52。埃尔科利是陶里亚蒂流亡时的曾用名。

③ 参见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368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234、245～248页。对于莫洛托夫派遣的波波夫小组的任务，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见 *Смирнова Н. Д.* "Гре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мир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8, с. 8－9。

④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99а, л. 40。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6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251页。

⑤ 阿·托因比、维·托因比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622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第247～248页。

认了既成事实而已。[①]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②]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③] 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

① 有关“百分比协议”的俄国档案已经全部解密，包括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1953年6月3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 45－56）、1944年10月10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10月17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 429～438、476－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278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21～726页。

②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881～882、884～886、891、920、933、951～952页。

③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①]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②] 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③] 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④]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⑤]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中国半壁河山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Vol. 7, Washington: GPO, 1969, pp. 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33，д. 14，п. 244，л. 120－125，*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Ⅳ,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37－1945гг.,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с. 37－40。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 0100，оп. 33，д. 14，п. 244，л. 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 Том Ⅳ, Книга 2, с. 68－71。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⑤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①]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无论国共冲突的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中共盼望的“国际援助”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道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把兵力集中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革命”转向和谈。[②] 8月25日，毛泽东决定亲自赴渝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③]

“联合政府”政策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实施

在苏联的周边国家，情况有些不同。根据“百分比协议”和多次会议的谈判，西方承认了苏联在其所占领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范围。不过，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被解放的欧洲国家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问题。[④] 为了保证与西方的合作，斯大林

①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 493；《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1页）。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76）》（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② 《毛泽东年谱》，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④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16页。

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即在这一地区推行选举制和“联合政府”政策，尽管具体做法在各国大相径庭。

保加利亚是战后欧洲共产党控制政府的第一个国家。1944 年 9 月 5 日苏联突然向保加利亚宣战以及三天后的顺利进军，导致保政府迅速瘫痪，以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遥控的工人党为首的爱国阵线借此机会成功地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成立了以格奥尔吉为总理的祖国阵线政府。[①] 通过对军队及政府各部门的清洗，工人党迅速控制了权力。接近 1944 年底时，工人党在爱国阵线委员中的比例已达 54%，在 84 个城市中有 63 个市长，在 1165 个村庄中有 879 个村长，是由工人党员担任的。[②] 然而，工人党的做法引起了莫斯科的不满。12 月 13 日季米特洛夫请求斯大林接见即将返回索非亚的科拉罗夫，并商谈保加利亚问题。斯大林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但却对保加利亚出现的紧张局势提出了严厉批评：“共产党人的调子太高”，科拉罗夫现在回国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们完全会发疯的”。季米特洛夫随即给工人党中央发去密电，指示他们对同盟者“要表现出最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不要唱进攻性的高调，不要摆出共产党人在政府和祖国阵线中起领导作用的架势”。电报强调，“必须避免政府危机，更不能去促成这种危机”，“在当前局势下只有对国家事务实施集体领导才是可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实行某些自我约束”。[③] 不久，斯大林直接告诉保加利亚人：“当我们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时，这也许是错误的。也许其他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国或在一定情况下建立立宪君主政体——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你们已经建立起爱国阵线政府，这是一件好事。它应该得到加强，可能的话还要扩大一些。不要拒绝任何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能够

---

① 详见 Vesselin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273 – 275;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 6, с. 152 – 153; *Валева Е. 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 1944 – 1948 годов//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9, №4, с. 24。

②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275 – 276.

③ CDA, CMF 434, k. 77 – 78.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452.

利用的人。"[①] 到1945年夏天，为抗议工人党企图垄断权力的做法，反对派提出推迟选举，并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季米特洛夫对此愤怒不已，莫斯科则表示必须做出让步。此前，斯大林已经否定了季米特洛夫准备把农民领袖佩特科夫赶出政府的主张。面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政治危机，斯大林又建议工人党同意推迟选举，并允许反对派合法化，以便能够掌握和利用他们："反对派的存在关系到你们的切身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做好工作，那么你们就能够控制住佩特科夫的反对派并在许多场合利用他们。"[②] 正是由于这次让步，波茨坦会议才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问题上做出了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的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这个地区是我们（苏联）的势力范围。"[③] 推迟选举以后，10月30日斯大林接见了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斯大林再次告诫说："你们应该提出这样的观点，没有反对派任何一种政府都不可能是民主的。"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指出："不要忘记，在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通过议会。这条道路很漫长，但实现的目标是一样的。"[④] 后来，季米特洛夫的游说使斯大林相信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已经执行了反苏路线，从而导致莫斯科决心在那里开始采取强硬立场——对反对派不予理睬，也不再进行任何谈判，而用巧妙的行动加以摧毁；拒绝佩特科夫进入政府，而挑选其他党作为反对派取代之。[⑤] 即便如此，斯大林仍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其基本方针。1946年9月2日斯大林再次当面向季米特洛夫指出：因为"所处时代的形势完全不同"，保加利亚将"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不用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

---

①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276－277.

② CDA, f. 1B, op. 7, ae. 398, l. 1.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487、494－495; *Вале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Болгарии, с. 27－30. 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280－281.

③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492；《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50页。

④ CDA, Fond 146B, op. 4, ae. 639, l. 20－28.

⑤ CDA, New Declassified Record, №5032, T. II, p. 10;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252, л. 28－39,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1944－1948гг., Москва: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7, с. 355－36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86～93页；Dimitrov, Revolution Released,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p. 282－283;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518；《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70～371页。

社会主义"，而"不要模仿俄国共产党人"。[1]

由于战前受到西方绥靖政策的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普遍对苏联具有好感，强烈的"慕尼黑情结"使得流亡西方的政府首脑贝奈斯几乎是自动地倒入了斯大林的怀抱[2]，以至1943年深秋贝奈斯向莫斯科提议："我们两国的外交政策是协调一致的。我们应该知道你们对德国的政策，以便我们针对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实行共同的路线。因为此时布拉格应该实行同莫斯科相同的政策。军事上也进行密切合作，使我們的计划适合你们在军事科学上的成果，统一武器装备，建立空中直接联系。"[3] 在194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贝奈斯与苏联领导人详细讨论了边界问题、移民问题、对外政策问题，以及战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合作问题。12月12日，《捷苏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顺利签订。贝奈斯对此十分满意。接着，贝奈斯还会晤了捷共国外局的代表，进一步讨论与红军进行军事合作，以及战后的国家制度问题。后来担任总书记的哥特瓦尔德向贝奈斯转达了共产党关于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和战后政策基本原则的建议。共产党人认为战后组建民族阵线是适宜的，希望解放后的共和国对内以"真正"的民主为基础，对外同苏联建立稳固的友谊。共产党人还声明，将努力通过"民主方式，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4] 在苏联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确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贝奈斯明显而真诚的友好立场，莫斯科非常满意，并以此作为典范。1944年1月11日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论证说：由于亲苏情绪和苏捷条约的存在，"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是有益的"，"应该把它视为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扩大影响的前哨"。[5]

---

①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 534～535；《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85～387页。

②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详见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 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 115～116。

③ *Поп И. И.*，*Россовская М. И.*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хословак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отв. ред.*）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5，с. 92.

④ *Серапионова* Эдуард Бенеш//*Марьина*（*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с. 116～117.

⑤ АПРФ，ф. 3，оп. 63，д. 237，л. 52～93，Вестник，1995，№4，с. 130、138，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93、706页。

波兰对于苏联来说“生死攸关”，正如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时所说，是否能够控制波兰，对英国只是国家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①] 所以，斯大林才亲自张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以此作为未来国家政权的基础。[②] 但是，这丝毫不表明莫斯科要在波兰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43年4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国内领导人芬德尔的密电中，身为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就指示：在波兰现阶段，“确立工人和农民政权”的提法“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斗争的基本口号应该是“确立人民民主政权”。[③] 在翌年4月28日与美籍波兰人奥尔列曼斯基谈话时，斯大林也说，“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波兰的内部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苏联人只是希望未来的波兰政府“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④] 尽管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围绕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与丘吉尔进行了激烈争论，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吸收流亡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政府。会议公报称，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对卢布林临时政府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领袖。[⑤]

此后，共产党和社会党始终掌握着政权，但是作为反对派，米科拉伊奇克及其农民党的影响也很大，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执政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感到一种政治危机，共产党甚至主

---

①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 с. 499 – 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39～140页。

② АВПРФ, ф. 06, оп. 6, п. 42, д. 551, л. 3 – 6,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 – 1953гг., Том. I, с. 52 – 5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31～33页。参见 *Гибиан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 6, с. 152；*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 С.* Вовлечение Польши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бло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проблемы и метод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оль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40 – е годы//*ИВ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90。该委员会设在波兰卢布林，亦称卢布林委员会或卢布林政府。

③ *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с. 364.

④ АВПРФ, ф. 6, оп. 6, п. 42, д. 548, л. 9 – 1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 – 1953гг., Том. I, с. 36 – 4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4～20页。

⑤ *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 с. 499 – 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第166～185、218～219页。

张把米科拉伊奇克从政府中排除出去。面对波兰紧张的政治形势，1946年5月23日，斯大林与波兰总统贝鲁特（共产党）、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举行了会谈。在详细听取汇报后，斯大林回答了波兰人提出的问题。关于要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斯大林虽然认为波兰的安全机关还很薄弱，但明确指出："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波兰，以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使你们不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因此"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至于如何对待米科拉伊奇克，斯大林指出，农民党代表的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线"，而"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反对派"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拉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合作，"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而"应该从政治上孤立"他们。斯大林最后指出，"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拉伊奇克进入政府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理由。"①

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匈牙利共产党是最弱的。到1944年底，加上从莫斯科回国的200名党员，匈共党员总数不过2500人。② 因此，当苏联红军推进到匈牙利境内时，11月13日莫洛托夫向来到莫斯科的匈牙利（非共产党）代表团指出，"苏联政府准备支持成立匈牙利中央机构的想法，其首脑由在坐的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和将军提名"。代表团成员对苏联极其友好和尊重的态度，令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但为了让弱小的匈共在未来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是一再强调，匈牙利政府"应当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并吸收所有政党、所有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又小心谨慎地提出：

---

①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55, л. 33 – 6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 – 1953гг., Том. I, с. 443 – 46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14～136页。米科拉伊奇克与科瓦利斯基原同属一个农民党，后该党分裂。

② 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2.

“在莫斯科有一些匈牙利人，也许他们参加组建的机构是有益的”。[1] 可见，在匈牙利不是共产党如何掌权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在苏联的建议和监督下，12 月 21 日，匈牙利临时国会在德布勒森市召开，成立了由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匈牙利共产党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2] 第二天，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匈牙利政府的组成和政府宣言完全符合我们制定的计划。”[3] 1945 年 7 月，在苏联的干预和压力下，实现了内阁改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新内阁 13 名成员中占有 6 个席位，莫斯科对此结果感到满意。[4]

以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进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引起莫斯科的强烈不满。是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说，匈共脱离了苏联制定的“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的“共同路线”，并指出，“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5] 盟国驻匈牙利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共产党的“‘左’倾情绪十分强烈”，“拉科西缺乏领导群众性大党的经验和国家工作的经验”，对小农党采取了“过火行为”。[6] 但为时已晚，匈共由于其自负和过

① АВПРФ，ф. 06，оп. 6，п. 34，д. 416，л. 9－13，*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 94－98，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10～14 页。

② АВПРФ，ф. 07，оп. 5，п. 43，д. 93，л. 7－8，Т2157，с. 111－112，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18～20 页。另参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第 138 页。

③ АВПРФ，ф. 07，оп. 5，п. 43，д. 93，л. 14，*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 1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21～22 页。

④ АВПРФ，ф06，оп. 7，п. 28，д. 372，л. 6－8；АВПРФ，ф. 077，оп. 25，п. 115，д. 37，л. 44－45，*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 234－236、242－24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23～25、26～27 页。

⑤ АВПРФ，ф077，оп. 27，п. 11，д. 121，л. 25，转引自 *Мурашко Г. П.*，*Носкова А. 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5，с. 79－80。

⑥ АВПРФ，ф. 06，оп. 7，п. 28，д. 371，л. 60－64，*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 271－274，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6 卷，第 34～38 页。

激行为，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遭到失败。在议会中的席位，共产党占17.4%，而小农党占到57%。[①] 苏联不得不再次干预新政府的组成。莫斯科要求，“确保为苏联政府所能接受的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政府成员”，同时努力争取由共产党担任内务部长的职务。总之，“新政府的行动纲领必须无条件地保证对苏联的友好关系”。[②] 结果在苏联的压力下，各党联席会议达成协议，在以小农党蒂尔迪为首的18名内阁成员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有4名（包括内务部长）。[③]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为了保证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基础，为了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起稳定的安全带，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全面推行的确是一项“联合政府”政策。不过，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这一政策表现为劝告共产党放下武器，加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则是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在当时称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莫斯科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政府，都应确保其实行对苏友好政策。

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及其原因

“联合政府”政策最初的失败发生在中国。斯大林为了保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一方面声称要把东北的行政权交给国民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中共军事力量的存在制约国民党，其政策左右逢源，目的就在于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斯大林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苏军撤离之前感到，国民党的反苏情绪以及美国的介入已经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

---

①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 – 1948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 186 – 189；哈里曼、艾贝尔：《特使》，第461～462页。

② АВПРФ, ф. 06, оп. 7, п. 29, д. 377, л. 4、14 – 15、18 – 19,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 – 1953гг., Том. I, с. 290 – 291、293 – 294、299 – 301，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1～42、43～44、45～47页。

③ АВПРФ, ф. 06, оп. 7, п. 29, д. 377, л. 22 – 24,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 – 1953гг., Том. I, с. 303 – 305，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48～50页。

利益，便再次鼓动中共接管东北政权，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也对中共占领区开展了肆无忌惮的大举进攻，于是形成了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的激战局面。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①] 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当然，莫斯科关注的中心在欧洲，就全局而言，1946 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②] 但是，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并非没有影响，从这个角度观察，“联合政府”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似乎已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

在西欧，对斯大林“联合政府”政策的挑战，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首先出现在法国，而是在比利时。在 1946 年 3 月范阿克尔再次受命组成的内阁中，比共的成员由原来的 2 名增加到 4 名。8 月政府改组后，情况依旧。是年秋天，作为议会的第一大党，代表右翼的天主教党改变了以往试图单独执政的方针，宣称准备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恰在此时，共产党无意中犯的一个错误，为天主教党提供了机会。1947 年 3 月，因抗议政府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的政策，内阁中的 4 名共产党人同时提出辞职，并导致首相辞职。再次组成的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排除了共产党。这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 162 个议席，而反对党只有 40 席。[③]

不过，真正引起莫斯科震动和恐慌的挑战确实出现在法国。不同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在形式上是主动退出政府的，而法国共产党却是被右派蓄意赶出政府的。在 1946 年 11 月的大选中，法共获得占总数 28.2% 的选票，在议会总共 619 个席位中夺得 182 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法共自恃在议会中席位居首的优势，要求由党的总书记多列士担任总理并组织政府，但遭到中右派人民共和党的坚决反对，以至引起内阁危机。最后，只

---

① 关于苏联对中国内战爆发的影响，参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②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 1947 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③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 894～895、899～900 页。

得请出德高望重的社会党“教皇”、74岁高龄的雷昂·布吕姆组阁。1947年1月22日，以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为总理的第四共和国首届内阁组成。社会党占有9个部长职位，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各占5个。多列士出任副总理，弗朗索瓦·皮佑（共产党）任国防部长。[①] 但是，表面上阵容强大的三党联合政府，实际上内部矛盾重重。

冲突主要反映在战后的殖民地政策和工资政策两个方面。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支持的人民共和党，以及总理拉马迪埃和海外事务部部长马里尤斯代表的社会党右翼，决心对胡志明所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军事镇压，以此来恢复法国对那里的殖民统治，遂于1946年11月23日炮轰海防市，并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则主张结束战争，通过与胡志明谈判解决问题。1947年3月20日，共产党发言人雅克·杜克洛发表讲演警告说，战争政策“将会耗尽法国的资源，导致法国依赖其他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从而丧失法国的民族独立性”。不过，法共并不想因此失去在政府中的地位。3月22日，当政府就对战争拨款问题要求议会进行信任投票时，法共议员投了弃权票，而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②] 但是在紧接着出现的另一个殖民地问题上，法共则表现出强硬的立场。3月29日马达加斯加岛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法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镇压，并要求取消4名马达加斯加议员的豁免权。在4月16日的内阁会议上，法共部长严厉谴责法军在马达加斯加的大屠杀，同时谴责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并中途退出会议以示抗议。[③] 三党联合政府的内部关系日趋紧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右翼党派决心把共产党踢出政府。

早在3月间，奥里奥尔总统就认为“如果目前这种政府形式维持不下去，不如分裂”，并指责拉马迪埃“行动迟缓”。改组内阁的密谋和计

①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3～39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30页。

② 详见 Mark Atwood Lawrence, Transnational Coalition-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in Indochina, 1947－1949,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6, №3, Summer 2002, pp. 453－480；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阿·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陆伯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48～49页。

③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40～41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32页。

划由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4 月下旬，拉马迪埃与布吕姆商议此事，一致认为“解除共产党人的职务对法国及共和国是生死攸关的”。刚从莫斯科参加四国外长会议归来的人民共和党领袖乔治·比多也向拉马迪埃施加压力，要求他采取行动。4 月 25 日晚，拉马迪埃向其密友、国民教育部长马塞尔—埃德蒙·纳日朗透露：“我已下定决心，要将共产党人赶出政府。”4 月 30 日，拉马迪埃悄悄地征求了法共部长以外所有内阁成员的意见，并取得了一致赞同。与此同时，社会党领导机构——指导委员会在社会党议员的压力下经过激烈辩论，以 10 票对 9 票通过决议，敦促拉马迪埃改组内阁。拉马迪埃还召见了三军参谋长勒韦尔将军，命令他增调部队，加强对巴黎安全保卫的部署，以防不测，法国各军区司令也奉命让军队处于戒备状态。[①]

拉马迪埃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即在工资政策上的争论。1947 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炭产量持续下降，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粉和黄油储备已经用光，肉类来源几乎断绝。面对通货膨胀和工资冻结的严重局面，4 月 25 日，雷诺汽车制造厂基层工会自发地组织了工人罢工。法共和法国总工会都先后表态，支持雷诺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在 5 月 1 日晚奥里奥尔总统出面召开的紧急内阁会议上，多列士声明法共反对政府冻结工资的政策，其他法共部长也都表示支持正在扩大的罢工运动，狄戎还补充说，三个月来法共在所有问题上都同政府有分歧。结果，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此后，法共部长们既不出席内阁会议，也不辞职，试图以此逼迫政府改变政策或集体辞职。5 月 4 日，拉马迪埃在国民议会要求就此问题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所有法共议员及内阁成员都投票反对政府。第二天，拉马迪埃便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公告，终止 5 名共产党内阁成员的职务，并于 5 月 9 日成立了没有法共参加的新政府。[②]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类似，只是排挤共产党的手法有些不同。1947 年 1 月，意大利总理加斯贝利在对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中，了解到美国对意

---

① 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 43～44 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 30～31 页。

② 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 48 页；吴国庆：《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第 41、44、46 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第 30 页。

大利寻求经济援助的要求反应冷淡，主要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在意大利政府中发挥作用。5月1日，美国新任国务卿马歇尔更直接暗示加斯贝利，只有将极左翼从他的政府中赶出去，才有可能谈到美国的援助问题。美国驻意大使邓恩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于是，5月13日加斯贝利以政府内出现众多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当5月31日组成新政府时，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已经被排除在外。①

在法国和意大利接连发生的事件表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破产，这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极为不安和恼怒。6月3日，莫洛托夫给驻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发出指示，要求约见多列士并向他传达所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多列士可以抄写信件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原件要立即销毁。日丹诺夫在信中说："联共（布）中央对近日法国发生的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政治事件非常担忧。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向他们解释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法国的力量对比已不利于共产党感到很担心，这一变化造成的政治后果也令他们不安。但是由于缺乏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明确的答复。……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与联共（布）中央协商过的。你们自己清楚，这是不正确的，对于你们采取的这些步骤，联共（布）中央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后，日丹诺夫强烈要求法共向莫斯科通报信息。② 显然，斯大林担心的不仅是"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已经无法继续，更令他不安的是那里的共产党擅自行动，有脱离莫斯科指挥棒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日丹诺夫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了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受莫斯科主张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影响，东欧党各行其是的现象亦有所抬头。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联合政府"政策的命运同样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如果说在西欧这一政策的破产表现为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那么在东欧则表现为共产党（多数情况下与社会党联合）

---

① 史志钦：《意共的转型与意大利政治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10～113页；Melvyn P. Leff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the Marshall Plan, *Diplomatic History*, 1988, Vol. 12, №3, p. 281；华特生：《从列宁到马林可夫》，第408～409页。

②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92, л. 33～34, *Наринский 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 с. 24～25.

把其他政党排挤出政府。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那里的权力已经完全被共产党垄断，其他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有其要对付的政敌。为了把农民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右翼社会党人驱逐出政府，甚至取消它们作为真正的反对派的资格，各国执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技术手段”和“非常措施”。

所谓技术手段，就是直接修改或伪造选举结果。捷共领导人对待作为体现国内政治民主生活的选举制度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哥特瓦尔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当地表示，“工人阶级、我们的党和劳动人民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手段、工具和方法，来纠正这种机械式的投票……以便获得对工人政党有利的结果。”已经公布的俄国档案证实，至少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1946～1947年的选举中就发生过这种现象。[①] 以罗马尼亚为例，1945年3月6日，在共产党的压力下，罗马尼亚国王批准成立了以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阵线政府。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斯大林与西方达成妥协，吸收民族自由党和全国农民党的领导成员入阁，并准备在全民、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议会选举。然而，对于姗姗来迟的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当时所有的西方观察家和罗马尼亚反对党的政治活动家都一致认为是伪造的，美英两国也公开指责选举没有代表民意。[②] 现在档案材料披露的罗共领导人的言论，可以证明这些指责不是没有根据的。选举前，乔治乌—德治信心十足地对莫洛托夫说，为了确保取得选举的胜利，“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波德纳拉希在苏联使馆的谈话更加明确：“我们希望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可以达到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90%的选票，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段’。”[③]

---

① РЦХИДНИ，ф. 17，оп. 128，д. 901，л. 33，参见 *Мурашко*，*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с. 94－95。

② *Ерещенко М. Д.* История，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Совет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умынии）// *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с. 91；《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76～477页。

③ АВПРФ，ф. 06，оп. 8，п. 44，д. 733，л. 19－20；АВПРФ，ф. 0125，оп. 34，п. 131，д. 16，л. 104～111，*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Ⅰ，с. 535－536、541－546，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548、554页。

所谓非常措施，就是制造政治案件，利用掌握中的权力机关打击反对派。这是比较容易也更为普遍使用的手段。在匈牙利，由于共产党的力量较弱，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①] 在1945年11月的普选中，小农党取得巨大胜利，在议会中占有近60%的席位。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为了履行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小农党同意增加共产党在内阁中的席位，而共产党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取得了内务部长的职位。到1946年4月，利用小农党的分裂，共产党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国防部等关键部门，而且还让更为好斗的拉伊克·拉斯洛接替过于书生气的纳吉·伊姆雷担任了内务部长。到了10月，作为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总理实际已被架空。两个月后，国防部和内务部在既未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在随后几个月对这起“反共和国阴谋”案件的审讯中，大批小农党核心或骨干人物受到牵连，纳吉·费伦茨的密友、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也遭到指控，并被苏联人神秘地逮捕。[②] 1947年1月在与苏联大使普希金的谈话中，费伦茨承认小农党议会党团中确实混有反动分子，但是“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地夸大阴谋，试图利用自己在侦察机关的优势败坏小农党领导人的名声并引起该党的分裂”。“共产党正在没有任何根据地中伤和迫害独立小农党的某些成员”。费伦茨还向苏联人提出，为了给“联合政府的工作创造一个健康的基础”，“希望共产党也做出让步，准许我们小农党的成员进入警察系统和地方政权机关”。[③] 费伦茨哪里知道，匈共的矛头最后就是指向他本人的。在4月29日对莫洛托夫的汇报中，拉科西指出，不仅纳吉·费伦茨总理是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之一，很可能共和国总统蒂尔迪·佐尔坦也与该阴谋有牵连。拉科西还坦言：“很遗

---

① 苏联驻匈使馆在1946年度的政治总结报告中就抱怨，共产党应对“警察局里的过火行为”负责。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24－29，*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09－613，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5～108页。

② 《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509～512、518～520、523～525页；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1，д.11，л.47－49，*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608－609，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3～104页。

③ АВПРФ，ф.077，оп.27，п.120，д.7，л.20－23，*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гг.，Том. I，с.561－562，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90～91页。

憾，在阴谋分子那里没有发现武器仓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加彻底地揭露他们了。我们需要某种紧张的局面。至少，我们希望把关于叛国阴谋的问题再次提到首要地位。"① 一个月后，拉科西便利用费伦茨出访瑞士之机，在突然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提出对他的叛国指控，费伦茨被迫辞职，流亡国外。②

在波兰选举前的几个星期，掌握政府权力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也使用了非常措施："采取了2000多次行动"，逮捕了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并举行了几次审判，旨在证明农民党与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取消那些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选区内农民党候选人资格，禁止波兰农民党组织在22个县里开展活动。③ 结果，农民党在1947年1月的选举中"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工人党向莫斯科报告说，鉴于米科拉伊奇克还有很大影响，"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攻势"，除了继续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外，更重要的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④ 其目的正如社会党领导人贝尔曼所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⑤

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先后发生了清洗和排挤反对

---

①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19, л.7－2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с.613－623,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09～121页。

②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4, л.129－13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с.641－647,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第122～128页。

③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80, л.1－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с.551－555,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9卷，第575页；*Бордюгов Г.*, *Матвеев Г.*, *Косеский А.*,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СССР-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 1944－1949гг., Москва: АИРО-XX, 1995, с.193－198；《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332～334页。

④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284, л.19－2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с.587－591,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0～181页。

⑤ АВПРФ, ф.0122, оп.29, п.208, д.7, л.81－84,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 с.592－594, 中译文参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3卷，第185页。

党的类似情况。[①] 总之，到1947年春天，东欧各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政治基础大大缩小了，即使保留在政府内的非共产党部长，也只能是俯首帖耳。作为一项政策，"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如前所述，东欧各国共产党接受来自莫斯科的这种"宽容"政策，或多或少都带有被迫性，而党的生存及其利益所在，又必然要求他们在政府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破坏"联合政府"的行为最初大多是东欧各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与此同时，苏联也开始渐渐对东欧各国共产党的这种要求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各党基本上是持反苏立场的，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政府的方针和方向，才能保证对苏友好政策的实行。在莫斯科认定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诱使东欧国家脱离苏联控制以后，特别是当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借口共产党无法替代政府做出决定，而试图违背苏联的意旨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斯大林终于决心放弃"联合政府"政策了。[②] 此后，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总体说来，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对于东欧确有扩张性，但对于西方却不具进攻性。"联合政府"政策是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与西方的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制度，斯大林也确曾设想以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模式逐步把各国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因此可以认为，正如斯大林本人向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反复解释的，这一政策推出伊始并非一时之计，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陷入

---

① 详见《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下册，第494～501页。*Ерещенко* История, 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Гибианский*（*отв. ред.*）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 91; *Мурашко, 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с. 97；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徐先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3页。

② 关于对待马歇尔计划的立场上苏联与波、捷的分歧及其解决，参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э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8, с. 67－83; Mikhail M. 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IHP Working Paper*, №9, 1994. 3; Anderson, Sheldon, Poland and the Marshall Plan, 1947－1949, *Diplomatic History*, 1990, V. 15, №4, pp. 473－494。

了一种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充满矛盾的。其次，莫斯科既要东欧各国共产党吸纳内心对苏联持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府，又要各国政府保证与苏联政策的一致性，而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各个政党则都要为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互相争斗。因此，"联合政府"政策必然是短命的。对于冷战的起源而言，"联合政府"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源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另一方面又成为冷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倡导的各国以不同政治形式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也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模式。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共产党情报局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标志着苏联冷战政策的最终形成，但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战略的根本复活。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

——对苏捷关系的个案考察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随着美苏在战后调解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的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增强。为了抵制美国向苏联势力范围进行渗透的企图，斯大林放弃了大国合作战略，随之对东欧政策作出调整。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向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下达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命令，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人以议会外的斗争方式对政权建立垄断。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标志着东欧左转的完成，此后，独揽国家政权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命令走上了全盘苏化道路。

本文拟从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基于如下考虑：捷克斯洛伐克是作为战胜国进入战后时代的，在东欧诸国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化水平最高，战前就拥有深厚的议会民主传统，居民拥有浓厚的亲俄情绪，尤其是贝奈斯总统，倡导融合苏维埃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从而创建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并在战后规划中，把捷克斯洛伐克定位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这一切，

为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制定东欧政策提供了某种启发和样板。当时，通往社会主义的“贝奈斯道路”成为苏联外交部中的流行词语。应该说，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进程比较完整地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轨迹。因此，笔者认为，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个案来考察战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是最有价值的。

一　1943 年苏捷条约的签订

1943 年 12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法西斯德国占领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条约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础，也为斯大林制定对中东欧政策提供了一个范式。因此，探讨 1943 年苏捷条约的形成史，对于理解战后苏联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939 年 3 月，在希特勒德国及其追随者匈牙利的操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肢解为三个部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形式上保持着独立，实质上成为第三帝国的组成部分；依附于德国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斯）[①] 被合并到匈牙利，享有自治权。此时流亡在外的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正以私人身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得此消息后他于 3 月 16 日发表宣言，宣布为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斗争，斗争的目标是“自由欧洲中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②] 是年夏天，贝奈斯返回欧洲领导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任在巴黎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领导人。法国溃败后，民族委员会迁居伦敦并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促使西方国家放弃慕尼黑协定和承认民族委员会为流亡政府，但西方国家不急于为战后欧洲秩序和未来各国边界问题承担责任。[③]

---

① 苏联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称作外喀尔巴阡罗斯。

② *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1,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5, с. 399.

③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 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план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о”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 1944 – 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114 – 115.

正是在流亡期间，贝奈斯反复思考和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政治发生危机的原因问题，寻找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情况的途径。贝奈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今天和明天的民主》[①] 中，贝奈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加速传播面前引起恐慌是 1920～1930 年代民主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他指出自由民主制度具有软弱性，无力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失业。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任务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改造。在构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制度时，贝奈斯计划在"集体化"和"社会化"（非革命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即综合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来完善议会民主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他写道："我不会走的那么远，我相信必须对今天的民主进行改造，我会努力去这样做。"[②] 慕尼黑事件促使贝奈斯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重新定位问题，他提出了让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想。贝奈斯不信任西方，当时西方同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还担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力抵抗纳粹威胁，贝奈斯把捷苏同盟看作是防止德国新的侵略的保障。用他的话来表达就是"50% 面向东方，50% 面向西方，而不是 100% 面向西方"，这就是著名的"贝奈斯公式"。[③]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侨居伦敦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态度。英国在战后构想中给捷克斯洛伐克设定的命运是成立波捷联邦，此举既有防范战后德国复兴再次对外发动侵略的目的，也有反苏的意图。1940 年 11

① 此书是贝奈斯 1939 年 1～6 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上课时所使用的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书的上半部分主要讲述贝奈斯对一战后民主政治崩溃原因的思考，这部分内容有中译本（贝奈斯：《民主政治的新生》，陈和坤、陈丙一译，中国文化事业出版社，1945）。后一部分内容讲述贝奈斯由美国返回欧洲后对战后完善民主制度途径的探索，这部分内容由俄国学者马丽娜译成俄文刊登在《历史问题》杂志上。*Марьина В. В.* Вступл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части книги Э. Бенеша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егодня и завтр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3, № 1, с. 88－108; № 3, с. 129－156。

② *Серапионова Е. 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и его иде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8, №1, с. 13－14.

③ *Марьина В. В.* Э. Бенеш: 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кабрь 1943 г.) // *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отв. ред.*)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ы: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с. 152.

月 11 日，在英国的倡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签订了战后成立联邦的宣言。然而，该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苏联对战后成立捷波联邦的态度，一个是波兰同苏联能否建立友好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英两国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终于 1942 年 5 月在伦敦签订了英苏战时同盟条约。贝奈斯参加了苏英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他对条约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条约“百分之百地符合现在和战后政策”，并“为战后协调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俄国和英国在欧洲的长时期的共同政策”。[①] 贝奈斯希望能以苏英条约为蓝本同苏联也签订这样的条约。5 月 7 日，在发给捷驻苏大使费林格的电报中，他谈到了自己的想法：“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本人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去一次俄国”，“英苏条约签订后，中欧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包括我们和波兰的问题，关于联邦的问题，多瑙河的问题，德国问题。我认为必须及时地同俄国人谈这些问题。”[②]

6 月 9 日，苏联外交部长[③]莫洛托夫在访问美国后再次返回伦敦时同贝奈斯进行了会谈。莫洛托夫向贝奈斯阐述了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现状，他说：“波兰流亡政府不值得信任。”鉴于此，莫洛托夫表达了对组建波捷联邦动机的怀疑。贝奈斯试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解释，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为邻，因此同波兰缔结协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贝奈斯还提到了组建波捷联邦的三个前提条件：“1. 在国外准备的联邦草案只能等到解放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行；2. 波兰必须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结构相近；3. 波兰必须同苏联解决一切纠纷，并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④] 但莫洛托夫不为所动。贝奈斯说：“如果他不得不在苏波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毫无疑问，他会选择苏联。”[⑤]

---

①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ДМИСЧО），Т. 4，кн. 1，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 224，注释 1。

② 贝奈斯关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制度问题给费林格的电报，1942 年 5 月 7 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с. 211－212。

③ 战后苏联进行了国家机构改革，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人民委员改称部长，为保持术语统一，本文一律使用部长。

④ *Поп И.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Москва：Наука，1990，с. 32.

⑤ 莫洛托夫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2 年 6 月 9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6，оп. 4，п. 5，д. 48，л. 15，转引自 Э. 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56。

期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对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波关系恶化。① 由于西方盟国拒绝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发动了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奈斯看来，"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俄国胜利还是失败，俄国将以怎样的情形退出这场战争"。② 因此，他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情况。

苏波关系的恶化使得捷波联邦构想变为不可能，但贝奈斯并未放弃捷波以某种形式接近的努力，他又设计出签订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的方案，并责成捷驻苏联大使费林格把这一消息转告给苏联外交部。在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和副外交部长杰卡诺佐夫就贝奈斯的新建议进行讨论后，费林格向贝奈斯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采取任何类似捷波联邦形式的行动都持反对意见。"③ 贝奈斯对此不死心。1943年3月20日，贝奈斯在同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大使博戈莫洛夫共进午餐时再次进行了试探，他说："我有两个对他本人来说特别重要的问题，希望在访问美国回来之前能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1. 苏联政府是否认为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场战争结束前就签订相互援助条约是可行的？2. 苏联政府是否想以英苏条约的精神签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三方条约？"④

一个月后，苏联的态度发生了改变。4月22日，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发出指示，要求他向贝奈斯转达苏联政府如下意见："第一，我们同意讨论关于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问题，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样建议的话。第二，如果贝奈斯说，他上次同您的会谈应视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签订苏捷互助条约的建议，那么，您应该声明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准备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具体建议。第三，如果贝奈斯声明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建议签订苏英类型的条约，那您就告诉他，我们准备研究这个建议。第四，

---

① 详见吴伟《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36～147页。

② 贝奈斯总统办公室秘书斯姆特内关于贝奈斯对战后苏联地位的看法的记录，1941年7月12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 119。

③ Э. Бенеш: 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кабрь 1943 г.), с. 156.

④ 博戈莫洛夫关于同贝奈斯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的会谈情况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1943年3月20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 280。

鉴于贝奈斯提出关于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订三方条约的问题，请告诉他，苏联政府原则上认为这个条约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现在苏联同波兰之间的关系紧张，显然，讨论三方条约的问题不合时宜。"[1] 4月23日，博戈莫洛夫会见了贝奈斯，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的答复。[2] 这样，苏联在贝奈斯访问美国之前就给他做了答复。

为什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政府的态度会发生如此变化呢？第一，以苏捷条约为样板向中欧其他国家展示自己良好打算的需要。在苏联政府宣布接受贝奈斯谈判条件的两天后，即4月25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断同波兰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波兰同苏联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居民中有浓厚的反俄情绪。波兰流亡政府在苏波边界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卡廷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对波兰失去耐心。[3] 而与波兰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居民中素有亲俄情绪，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而放弃波兰无疑是斯大林中欧政策的最佳选择。第二，向贝奈斯施加压力。苏联中断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实行支持"卢布林委员会"的政策无异于给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下了最后通牒。贝奈斯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命运。第三，向西方盟友施加压力，要求开辟第二战场。尽管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但由于西方迟迟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使得德国再次从西方战线抽调兵力到苏德战场，苏联仍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

贝奈斯没有对苏联的建议作出正面回应，此时，他非常想听听美国的意见[4]，同时也可利用访问的机会争取时间，观察事态的发展情况。这样，苏捷条约谈判就因此中断了两个月。从5月12日开始，贝奈斯在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期间同罗斯福总统及政治家、新闻记者举行了多次

① 苏联外交部就签订捷苏条约问题给博戈莫洛夫的指示，1943年4月22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 295。

② 博戈莫洛夫就签订苏捷条约问题同贝奈斯的会谈记录，1943年4月23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 296。

③ 《苏联与波兰问题（1939～1945）》，第163～175页。

④ 在贝奈斯看来，捷克斯洛伐克要扮演"东西方桥梁"的前提是战后苏联与西方能够继续合作。为此，他想探讨一下战时盟国合作维持到战后的可能性，以及苏联对大国和自己周边弱小国家的政策，从而明确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地位。详见：Eduard Beneš, *Memoirs of Dr. Eduad Beneš, From Munich to New War and New Viectory*, New York: Arno Press, 1972, pp. 240－241。

会谈。按照贝奈斯本人的说法，罗斯福总统赞同他的意见。[①] 此后贝奈斯又去加拿大访问，于6月11日才返回伦敦。

英国对苏捷关系的发展保持着警惕。6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在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同英国驻捷大使尼科尔斯的会谈情况，尼科尔斯问："总统是否打算在访问莫斯科时签订条约？英国政府认为，考虑到波兰问题，这个条约是不符合（英国的）愿望的。"而贝奈斯访问归来后亲自去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后者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签订条约，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在艾登看来，"苏捷条约具有反波兰的倾向"，随后艾登提出了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的条件：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把波兰也纳入条约中，贝奈斯就可以去莫斯科。[②]

于是，6月19日，贝奈斯在同博戈莫洛夫会谈时向后者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三方条约草案。贝奈斯解释说："这是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迎合英国人和美国人，他故意强调条约的友好原则给波兰政府看，条约文本具有三方性质。"博戈莫洛夫明确表示："三方条约草案在形式上不符合现在的局势，应该把捷苏双边条约问题同三边条约问题分离开来"；"现在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很难去研究。"针对贝奈斯对英国政府的疑虑，博戈莫洛夫说："三个国家都是盟国和朋友，如果其中的两方想明确和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那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干涉他们。"[③]

英国提出的理由还是无法打消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打算。此时艾登又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他向贝奈斯指出其同莫洛托夫曾达成协议，战争期间双方不与同盟国中的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④] 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看来，阻止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最好办法是让美国发表声明，澄清贝奈斯对罗斯福态度的误解。早在6月28日，英国驻美国大使哈里法科斯就向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询问贝奈斯同罗斯福的会谈内

① 贝奈斯就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谈情况给马萨里克的电报，1943年5月13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308。

②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с.45－46.

③ 贝奈斯同博戈莫洛夫会谈记录，1943年6月19日。ДМИСЧО, Т. 4, кн. 1, с.317。

④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с.48.

容，韦尔斯向哈里法科斯说：“贝奈斯在美国访问期间从未提过他打算同苏联签订条约的事，他只是说自己打算同斯大林在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复国的问题上达成相互谅解。”① 应英国政府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赫尔亲自发表声明说：“无论罗斯福，还是他本人，都未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一事表示过赞成。”②

这件事对贝奈斯的打击很大，6 月 28 日，贝奈斯致电费林格说：“近几天来，在我们、英国人和博戈莫洛夫之间就我们同苏联签订条约的问题出现了分歧。我向伦敦和华盛顿通告了关于我们在莫斯科签订互助条约的打算，美国人没有反对意见，但艾登要求我目前不要签订条约……博戈莫洛夫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对英国人让步，甚至是在我们感受到英俄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想让俄国人和英国人接近，而不是分开他们，此外，英国人会把一切纷争的后果归罪到我们身上……我让博戈莫洛夫相信两点：1. 在访问期间将会就条约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并发表某种形式的公开声明；2. 如果弄清楚了，英国人确实想阻碍签订条约，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拒绝（签约）。”③ 随后，费林格在 7 月 3 日给贝奈斯的电报中谈到了苏联政府对艾登提出的贝奈斯访问苏联时不签约而只发表宣言一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诺维科夫明确表示：“如果这是你们的最终决定，那您最好不要来，或者推迟此行。”④ 7 月 13 日，苏联副外交部长考涅楚克在同费林格会谈时再次表示：“我期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及其政府能独自解决国家问题。”⑤ 贝奈斯的莫斯科之行被拖延下来。

1943 年夏天，红军取得了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苏军手里，捷克斯洛伐克由苏联解放的前景渐趋明朗。随着红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捷共加大了宣传，在国内的声望与日俱增。苏联在单方面同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后，开始扶植“卢布林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来讲，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地位，防止出现波

①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с. 46.

②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с. 48.

③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 年 6 月 24 日。ДМИСЧО, Т. 4, том1, с. 320。

④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 年 7 月 3 日。ДМИСЧО, Т. 4, том1, с. 324。

⑤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的会谈记录，1943 年 7 月 13 日。АВПРФ, ф. 0138, оп. 256. п. 152, д. 6, л. 36 - 4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2, № 6, с. 27 - 30。

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和战后国内出现革命危险显得迫在眉睫。

7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发表了关于尽快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公开声明。[①] 但英国政府继续对捷克同苏联签订条约一事持反对态度，贝奈斯对此非常生气。8月8日，贝奈斯对尼科尔斯说："你们对我们面向东方一直持反对态度，最终我们别无出路，只能面向俄国。"[②] 尽管没有明说，显然贝奈斯指的是慕尼黑时期英国的绥靖政策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带来的灾难。话虽如此，贝奈斯还是清楚地懂得，没有英国政府的同意他还是不能前往莫斯科，所有期望只能寄托在苏英协调上。

在苏捷条约谈判因英国的阻碍陷于绝境的情况下，莫斯科亲自同英国交涉显得非常有必要。概括起来，英国反对贝奈斯前往苏联签订条约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强调莫洛托夫同艾登有战争期间不同小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条约的协定；二是该条约没有包括波兰。苏捷双边条约势必对英国战后欧洲成立捷波联邦构想造成冲击，此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将会更加艰困；鉴于此，苏联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对所谓的英苏协定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二是强调未来波兰政府加入苏捷条约的可能性。

早在1943年7月26日，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就向艾登转交了一份关于莫洛托夫同艾登之间的"协议"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中说："1942年6月9日，莫洛托夫在伦敦访问期间，艾登建议苏联同英国在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莫洛托夫答应研究这个问题和把这个问题转告给苏联政府。1942年7月15日，苏方在答复备忘录中说，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他的建议，但对此指出，苏联政府想得到英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是，后来英国政府未能提出具体建议，这样，一切仅仅限于意见交流。文件中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遵守1942年5月26日两国政府条约方面尽了自己的义务，在该条约中没有禁止同其他国家签订有关战后问题的条约。"[③] 近一个月后，8月23日，英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做了答复。艾登在备忘录中说："他不记得迈斯基当时提过这个建议，他只是后来再次同迈斯基会谈时才

① Чехов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с. 51.

② Э. Бенеш: 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кабрь 1943 г.), с. 156.

③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 – 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1,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3, с. 409 – 410.

知道这件事。”鉴于此，“英国政府准备重新提出当时艾登向莫洛托夫提的建议。”[①] 针对艾登所说的“不记得迈斯基说过苏联政府在等待英国政府就此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件事”的问题，莫洛托夫指出：“鉴于此，苏联政府再次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审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迈斯基向苏联外交部报告了去年7月他对艾登所做的声明。”针对英国驻苏联大使克尔所说的“英国政府提议两国政府依据艾登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同上述盟国政府签订条约一事——达成了协定”，莫洛托夫指出：“艾登先生的建议中只是谈到了涉及战后的问题，还提到了未经双方相互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其他盟国签订上述问题的协定。此时，在便函中提出不能同这些国家签订任何协定，这与艾登去年的建议是相矛盾的。”[②]

对苏英政府关于以上问题的三份往来照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艾登所提的“未经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不得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这句表述本身就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按照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双方经过“事先协商和达成一致”就不排除可以“同欧洲各流亡政府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的可能性。按照英国政府的理解，就是不能签订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而苏联政府坚持的正是前者。双方的争执一直拖到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才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苏联就签订苏捷条约一事也采取了一些灵活手段。1943年8月22日，贝奈斯向博戈莫洛夫提交了苏捷条约草案，建议进行预先谈判。[③] 9月30日，费林格致电贝奈斯说：“苏联政府同意您8月22日的建议，只是对条约草案作了某些修改，修改意见完全符合您的意愿。”[④] 把经过苏方修改的条约草案同贝奈斯提交给苏联政府的条约草案相比较，核心变化是苏方在条约中加上了第三方（指的是波兰）加入该条约的可能性。[⑤] 贝奈斯对这样的修改意见非常满意，因为他的三方条约思想已部分地得到

①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 – 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c. 422 – 423.

② Советско-англ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1 – 1945，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1，c. 443 – 444.

③ 博戈莫洛夫同贝奈斯会谈记录，1943年8月23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c. 336。

④ 费林格给贝奈斯的电报，1943年9月30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c. 349。

⑤ 《苏捷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草案》，1943年10月2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c. 351 – 353。

实现，同时也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贝奈斯莫斯科之行的前提条件。自然，贝奈斯没有意识到，强调“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与三方条约是有本质区别的。

但是，贝奈斯低估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阻力。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国务部长里普卡在同尼科尔斯会谈时，后者再次表示：“他们不反对苏捷条约的思想，而是反对现在就签订条约。”里普卡在解释贝奈斯的立场时论证说：“我们想通过同苏联签订条约来保障我们内部的独立，因为担心同共产党人对抗，这是其一。其二，通过吸收共产党加入政府进行合作可以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他们也要承担政府责任。”更让贝奈斯气愤的是尼科尔斯表示：“战争结束前我们不可能考虑英国政府发表承担边界问题的宣言。”[①] 10月18日，贝奈斯打电报给费林格说，他不能去莫斯科签订条约了，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同英国的冲突，这种后果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危险的”。[②]

显然，小国领导人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情况，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贝奈斯既不想加剧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分歧，又担心遭到任何一方的埋怨。1943年10月16日，斯姆特内同贝奈斯公开的、详细的会谈证实了这种情况。贝奈斯在分析围绕谈判出现的问题时说：“今天我明白了，苏联说的那些话是想把我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切多么龌龊。他们不惜任何代价来迫使我签订条约；他们的打算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我的关系也就彻底结束了，这样，我只能同他们打交道。”贝奈斯认为：“我们既反对英国也反对俄国”，因为“双方都在同我玩不诚实的游戏”。但是，贝奈斯承认，“从俄国方面来说，与英国相比，他们更为不诚实”，俄国人致力于“把形势弄乱，以便使他们的角色变得不那么明显”。[③]

10月19～30日，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如期召开。10月24日会议研究了关于盟国内部主要国家同小国缔结涉及战后问题的条约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同英美之间在苏捷条约问题上未发生什么争执。莫洛托夫在会议召开两天前已把条约草案送给了艾登和赫尔，艾登声明说：“熟悉了条

---

① 里普卡同尼科尔斯会谈记录，1943年10月6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с. 355－356。

② 贝奈斯给费林格的电报，1943年10月18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с. 363－364。

③ Э. Бенеш：второй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3 г.），с. 161.

约草案后，我感觉这是一项好条约，我对条约没有异议。"[①] 似乎长时间制约条约签订的各种麻烦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态度为什么发生改变？通过对影响条约签订的各种因素和本次会谈记录详加分析后，可以做如下判断：第一，"波兰问题"始终是影响条约签订的核心因素。如果签订苏捷双边协定而把波兰排除，势必给波兰流亡政府的命运带来负面影响。而如今的条约中规定了第三方加入的可能性，丘吉尔所极力倡导的"波捷联邦"尚存在实现的可能；第二，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明确了在同小国缔结条约时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这被艾登看作是防止出现"势力范围"的有效手段[②]；第三，苏捷双方已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贝奈斯态度明确。如果继续向贝奈斯施加压力，势必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倒向苏联。

10月25日晚上，考涅楚克把这一消息告诉给费林格。[③] 第二天，苏联驻伦敦各流亡政府临时代办奥尔洛夫正式向贝奈斯通告了这一消息，并向他转达了苏联政府希望他"尽快来莫斯科签订条约"的愿望。[④] 这样，阻碍苏捷条约签订的各种障碍都被消除了。12月12日，贝奈斯前往莫斯科访问，并于12月16日签订了《苏捷战时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

1943年12月签订的苏捷条约是战争期间苏联同被占领的法西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反映了苏联战后对中东欧政策的基本倾向和目标。1944年1月10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供内部研究使用的呈文中这样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苏联的目标是组建独立的和富有活力的波兰，但我们对出现一个强大的、有实力的波兰不感兴趣。过去波兰一直是俄国的敌人，今后波兰是否会成为俄国的朋友，谁也说不准。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战后组建波兰的问题应该格外谨慎，尽可能地缩小波兰规模，遵循以民族来确定边界的原则。如果波兰愿意，它可以在这一基础上以第三方的身份参加不久前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互助条约。"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时，迈斯基说："组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来对抗波兰，对苏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79～180页。

②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第176页。

③ 考涅楚克同费林格会谈记录，1943年10月25日。ДМИСЧО，Т. 4，кн. 1，с. 376。

④ 贝奈斯给里普卡的电报。ДМИСЧО，Т. 4，кн. 1，с. 377－378。

联是有利的，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政治情绪，以及不久前签订的为期20年的苏捷互助条约，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成为在中欧和东南欧保持我们影响的传导者。"[①] 1943年的苏捷条约是苏联在战时外交中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是大国协调利益的结果。贝奈斯的民主观念及其给捷克斯洛伐克在东西方之间的定位符合斯大林战后对中东欧的战略意图，斯大林接受并推而广之，借助苏军解放中东欧的历史契机成功地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44年末，惊慌失措的丘吉尔急忙飞抵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问题达成百分比口头协议。[②] 其实，此时苏联方面已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二　斯大林在捷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抵抗运动有两支领导力量，一支是贝奈斯领导的驻伦敦流亡政府，一支是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中心。苏联在与贝奈斯流亡政府保持政府层面关系的同时，也在通过共产国际与捷共保持着联系。二战期间，捷共执行联共（布）（经过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掌握了武装，通过建立民族委员会掌握群众，二战后期成长壮大起来，成为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的依靠力量。联共（布）帮助捷共制定了科西策政府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与斯大林从"大国合作"战略出发在东欧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相吻合，纲领的实施也就意味着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政策的实现。

1944年10月，苏军解放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随即出现了要求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的事件。[③] 1945年1月，苏军开始了解放斯洛伐克的行动。贝奈斯担心斯洛伐克也会出现类似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事件，决定同苏军一

---

① 迈斯基致莫洛托夫的信，1944年1月10日。АВПРФ，ф. 07，оп. 9，п. 61，д. 68，л. 14. 转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Польско-чехословакий пограничый конфликт，1944 – 1947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 6，с. 119。

② 斯大林与丘吉尔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а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 Источник，2003，№ 2，с. 45 – 56。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61 ~ 278页。

③ 详见 *Марьина В. В.* Закарпатская Украина（Подкапатская Русь）в политике Бенеш и Сталина，1939 – 1945 гг，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очерк，Москва：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3。

同进入斯洛伐克。经过协商，贝奈斯接受了苏方的建议，准备携流亡政府成员途经苏联回国，并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和捷共领导人会谈。[①]

在贝奈斯访问莫斯科前夕，为迎接同贝奈斯即将举行的谈判，捷共在联共（布）的帮助下积极进行准备。1945 年 1 月 23 日，斯大林同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会谈。按照当时的惯例这种性质的会谈一般不做会议记录，不过根据后来的事件及相应的回忆录来判断，很有可能谈的正是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国家制度，针对贝奈斯来访捷共应采取的措施等内容。科佩茨基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次会谈，据他讲此次会谈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告诉他的："哥特瓦尔德在前半夜去拜访了斯大林，那次会谈持续了 6 个小时，一直到早晨 7 点"，斯大林带着某种好感谈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称赞他们有民主政治性和心地善良，还谈了德意志人的情况。斯大林指出，斯拉夫人应该行动起来，"避免德国这架军事机器怪兽再次制造惨剧"。按照科佩茨基的话说，"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讨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②]

在组建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问题上，贝奈斯一直坚持伦敦流亡政府迁回国内，同时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的办法。早在 1943 年 12 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时，就同哥特瓦尔德谈到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制度及对外政策问题，哥特瓦尔德表达了"民族阵线在战后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和"同苏联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态度。[③] 1945 年 2 月 1 日，哥特瓦尔德和科佩茨基同联共（布）中央国际部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进行了会谈，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仅做了简要记述："商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和贝奈斯访问苏联的事情。"[④] 第二天，2 月 2 日，哥特瓦尔德就组建临时政府问题给贝奈斯的电报大致能反映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哥特瓦尔德在电报中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就成立共和国第一届政府问题进行谈判是时候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参加谈判"，随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邀请贝奈斯立即来莫斯科就成立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及捷苏关系中的重要

① 详见 *Марьина В. 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3，с. 41。

②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1945 год，с. 46 – 47.

③ 贝奈斯同哥特瓦尔德会谈记录，1943 年 12 月。ДМИСЧО，Т. 4，кн. 2，с. 16 – 18。

④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 332 页。

问题进行谈判，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① 显然，哥特瓦尔德能以如此口气说话，说明捷共目前的实力已非昔日可比了。

此后捷共国外局②立即着手草拟新政府纲领和章程的工作。2月23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递交了关于新政府组成的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新政府应由20人组成，其中捷克人14名，斯洛伐克人6名。新政府就其组成而言，应当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政府，并联合所有主要的政治集团。③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提交了拟定的政府纲领草案。哥特瓦尔德在附信中说："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们对总的提法是会表示同意的"，"我们在政府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会被贝奈斯接受"，哥特瓦尔德向季米特洛夫请求"以你们的建议和指示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④ 3月19日，新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佐林在就任前夕对捷共提交的政府纲领草案作了严厉批评，他说："全文都需要加以修正，使捷克斯洛伐克保持面向苏联和巩固斯拉夫人民团结政策的同时，还应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美国和法国等联合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消除关于对外政策中的斯拉夫路线和中、东欧斯拉夫人民团结等尖锐的表达方式。"这些意见在最终形成文本时都受到重视。关于民族政策也提出了意见，佐林认为："尽管谈到了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权利平等，但关于现今国家存在形式的问题说的模糊不清：既没有谈到斯洛伐克自治的问题，也没有谈到捷克与斯洛伐克联邦的问题。为了克服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特别是德国人的毒化教育影响，显然，应该明确谈到斯洛伐克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框架内存在这个问题。此外，必须谈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首先是乌克兰人和鲁辛人）。"这部分意见未被考虑，看来佐林作为新任大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

① 哥特瓦尔德给贝奈斯的电报，1945年2月2日。ДМИСЧО，Т. 4，кн. 2，с.295。

② 共产国际解散后，捷共驻莫斯科领导中心改称捷共国外局。

③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1945年2月23日。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17，оп.128，д.1082，л.55－57。*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Мурашко Г. П.*，*Носкова А. Ф.*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Москва-Новосибирск：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1997，с.159－160。

④ 哥特瓦尔德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附信，1945年3月10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2，л.75－76，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архивов，1944－1953，Том 1，с.170－171。

间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了解不够。佐林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意见，之后他把意见报送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佐林的报告作了简要批示："1. 斯拉夫联盟（联盟 + 中欧和东欧）；2. 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立即转交并合并到苏维埃乌克兰；3. 两个共和国（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① 从最后公布的文本来看，苏方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了。

1945 年 3 月 11 日，贝奈斯携带政府成员从伦敦出发，3 月 19 日抵达莫斯科。与此同时，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也应邀来到莫斯科，根据斯洛伐克共产党②和民主党的协议，双方共同组成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代表团参加谈判。③ 作为此次谈判的会议记录员，时任捷共驻贝奈斯伦敦政府代表的拉什托维奇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比较完整地叙述了谈判过程，此外，捷共国外局领导人科佩茨基和贝奈斯的私人秘书塔波尔斯基也都在各自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会谈情况。总统贝奈斯作为超党派代表不参加谈判，而去同苏联领导人就捷苏关系和战后合作问题进行会谈。3 月 22 日，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各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在捷驻苏联大使馆举行，参加谈判的各党派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主党）。会议共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主要议程有两项，一是讨论政府纲领，二是决定第一届民族阵线政府的组成。

经询问各政党均未准备政府纲领草案后，哥特瓦尔德向与会代表提交了由捷共起草的政府纲领草案。草案共 16 章，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六章关于捷克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上。原文表述为："建立在各团体和地区民族委员会基础上的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政府不仅把其看作是斯

---

① 佐林对捷共国外局制定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纲领的意见，1945 年 3 月 19 日。АВПРФ，ф. 06，оп. 7，п. 51，д. 822，л. 1 – 3，*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отв. ред.*）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4 – 1953，ТомI，1944 – 1948，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9，с. 175 – 177。

② 1939 年 3 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德国及其帮凶匈牙利肢解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组织上分裂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共产国际没有为斯共成立新支部。考虑到斯共事实上处在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机构的领导下，本文除非特别强调时才加以区分，一般统称捷共。

③ *Копец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2，с. 492 – 493.

洛伐克民族自治区的合法代表，也是斯洛伐克领土上国家政权的代表（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职责是在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和作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行机关的斯洛伐克民族执行委员会密切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共同的国家事务。”恰恰是这一表述方式引起国家社会党代表斯兰斯基、人民党（天主教）代表加拉和社会民主党右翼代表迈耶尔的坚决反对。加拉说：“政府不能承担属于选举出来的未来民族委员会的权力和责任。”斯兰斯基立即支持加拉说：“我现在要说，这种说法无法使我们信服，我们之间没有统一，这不是基于现今斯洛伐克形势的看法，而是把目前的结构以某种形式常态化了。”哥特瓦尔德反驳说：“是斯洛伐克人民想要这样，请不要忘记这一点。”斯兰斯基回答说：“如果斯洛伐克人民同捷克人民能达成协议的话，不排除把目前的形势最终常态化的可能，但是，我们不能承担为时尚早的责任。……解决未来国家联合形式的问题不能只由斯洛伐克人说，还要听捷克人的意见。”科佩茨基坚决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意见，他说：“政府应该清楚地声明放弃‘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一错误概念，斯洛伐克是个民族，而不只是文化上别具一格的人民”，“每个民族都应该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声明自己是斯洛伐克地区政权的唯一代表”。争论的实质在于捷克地区的中央集权主义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之争。二战期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庇护下获得独立地位，他们追求的目标是联邦制的共和国，不想恢复到慕尼黑之前的状态。在争论过程中，捷克地区各政党代表（捷共除外）以退场相威胁，谈判有破裂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贝奈斯对国家社会党人做了说服工作，最后采取了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表述方式，即“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着力以法律解决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的关系，确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作为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权机关（拥有司法权、执政权和执行权），由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选举出的司法代表解决中央机关和斯洛伐克机关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

在政府成员分配比例问题上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最后结果为：新政府 25 名成员有 7 位共产党代表，3 名社会民主党代表，3 名捷克社会党代表，4 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代表，3 名人民党代表，5 名非党人士。亲近共产党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领导内阁。捷共和斯共代表占有两名副总理的岗位（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以及内务部长、情报部长、农业部长、

社会保障部长和外交部国务秘书的岗位。这样，在政府组成中，捷共和斯共就控制了政府中的关键岗位，其深远影响在1948年二月政变时显现出来。塔波尔斯基指责说："为了进一步加强控制，捷共又借口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两个分开的党，硬让它们的领导人获得两个副总理的职位。"① 显然，塔波尔斯基并不清楚捷共同斯共在1939～1949年期间一直是组织上分立关系，另一方面，斯共是以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身份参加谈判的，同时也是斯洛伐克利益的代表者。

3月31日，贝奈斯及其政府随员离开莫斯科回国，4月4日抵达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4月5日在这里发表了关于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届政府成立及批准其纲领的声明，政府纲领被命名为科西策纲领。纲领规定，目前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并肩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至完全解放共和国，为全国大选作准备；在军队建设方面规定，按照苏军的样式迅速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经济领域规定，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决定剥夺敌人和卖国贼的财产，对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没收敌人和通敌分子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保护私人企业和一般商业；在民族关系上规定，政府将设法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享有国家法律保证的平等地位，使斯洛伐克语和捷克语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对外政策方面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以同苏联结成最亲密的联盟为基础，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同苏联实行广泛的合作。在斯拉夫兄弟关系的基础上，同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保持友好关系，同时也表示希望加强同英美的联系。②

总体看来，科西策纲领是一份性质比较温和的纲领，既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剥夺一切资产阶级财产的口号，体现了民族阵线各政治团体协商的精神。同时，捷共的政治观点是在联共（布）通过共产国

①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борьб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 с. 493－497; *Лаштовичка Б.* В Лондон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борьбе за новую Чехословакию, 1939－1945,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6, с. 214－242; 爱德华·塔波尔斯基：《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1960）》，何瑞丰、徐式谷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13～15页。

② ДМИСЧО, Т. 4, кн. 2, с. 345－348.

际的积极影响下形成的，这符合苏联当时追求“大国合作”、维持雅尔塔体系的战略，也是当时捷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真实反映，用哥特瓦尔德的话说：“我们不能单独执政，他们也不能单独执政，他们没有我们不行，我们没有他们也是一样，必须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政治集团合作。”①

按照苏联同英美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应立即着手举行自由选举，选出永久政府。在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是最先进行议会选举的国家。根据民族阵线各政党的协议——从政府和民族阵线到基层民族委员会的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各政党平均分配代表名额，即代表“均等制”——1945 年 10 月 28 日成立了临时国民议会，其中捷克人 200 名，斯洛伐克人 100 名，6 个党派所占比例人数相同。临时国民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命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制宪国民议会选举。② 到 1945 年末 1946 年初，随着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进行议会选举的时机基本成熟。1946 年 1 月和 3 月召开的民族会议通过关于“和睦地”进行选举的决定，规定各政党不能批评民族阵线和政府的政策，而只能宣扬他们的打算。在选举中不能利用总统的权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能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此外，还规定在选举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都将组建联合政府。③

尽管存在着上述协定，为了争夺选举的胜利，民族阵线共产党和非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思想和政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1945 年 12 月，苏美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后，资产阶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运动中开始积极起来。国家社会党致力于取代共产党成为国内第一大党，他们提出的竞选口号不够具体，主要是捍卫民主、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制，指控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非爱国者。国家社会党小业主部的报告谈到了该党的计划：“我党定将在其中有着巨大影响的新政府，将不得不从空话转到行动。这将是对一切革命的罪过的纠正。我们相信，这将会

①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1，с. 421。在俄文版的《哥特瓦尔德文选》中，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并未收入。*Годвальд 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Том 2，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с. 76－88。

② 阿诺德·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 608 页。

③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 44－45.

是逐步的和彻底的。科西策纲领是所谓的东方纲领，它不适合我们的情况。"[①] 为了同捷共争夺选民，国家社会党向被解散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农业党、畜牧业党和人民团结党）的骨干分子打开了大门，希望以此能扩大队伍并取得对共产党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内发生了分裂，左派致力于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推进革命，而右派则努力同国家社会党人合作。非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国家社会党坚信自己的实力，认为自己会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把共产党甩在身后。他们对选举结果是非常乐观的。[②]

斯洛伐克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斯洛伐克人同捷克人就国家政权体制的争论并未因科西策纲领的签订而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和人民党以维护斯洛伐克人利益的姿态出现，这种情况使得斯洛伐克共产党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支持联邦制的思想，它可能在捷克地区得不到足够的选票，如果放弃这一思想又担心会在斯洛伐克地区失去威信。为了筹备选举，捷共中央指示斯共采取分裂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办法来组建第四党，但没有成功。反倒是民主党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地位。[③] 这一时期在斯洛伐克成立了两个新政党：劳动党和自由党。前者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刚一成立就得到了斯共的认可。自由党是在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同意下成立的，主要由天主教教徒组成，该党成为前赫林卡党成员的庇护所。这两个政党的成员较少，影响力弱，主要是斯共同民主党争夺选民的产物。面对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斯共领导层显得缺乏信心。斯共领导人什米特克在同苏联驻捷使馆参赞奇恰耶夫谈到选举问题时说，他认为斯共获胜的前提条件是，中央政府"明确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单独民族，承诺斯洛伐克工业化和其他纯斯洛伐克的问题。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④]

---

① 捷共中央马列所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65 年印发，未刊，第 41 页。

②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46.

③ 1945 年 3 月末，斯洛伐克民主党同天主教徒达成协议，如果人民党在选举中支持它的话，那么它将拿自己在党内和国家与社会经济机关中的 70% 的阵地给人民党人。即所谓的"四月协定"。参见 *Клеванский А. Х.*, *Марьина В. В.*, *Поп И. И.* (*отв. ред.*),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Том 3, с. 462。

④ 奇恰耶夫同什米特克等人的会谈纪要，1946 年 3 月 6 日。АВПРФ, ф. 0138, оп. 27, п. 135, д. 10, л. 42 – 46,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ом 1, с. 381 – 384。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在议会斗争中拥有丰富经验的政党，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共和国议会选举斗争中就多次取得过好成绩，哥特瓦尔德曾任议会议员。捷共从国家解放伊始就已经在为议会选举做着积极准备。捷共还拥有比其他政党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一是慕尼黑事件给国家造成的民族创伤。捷共紧紧抓住这一有力武器，谴责非共产主义政党在慕尼黑时期的懦弱和西方的背叛行为，指出只有同苏联结盟才能为国家的独立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来自苏联的解放。苏联军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增强了捷国民对苏联的好感，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在国内非常流行，这种情绪为捷共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捷共非常注重自身组织的发展和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绩。1946 年 2 月 27 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和主席哥特瓦尔德就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的筹备情况向联共（布）中央国际部报告说："截至 1946 年 1 月 1 日，有党组织 13193 个，其中工厂党组织 2950 个，地方党组织 10239 个，党员数量为 82.6 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 100 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 101674 名新党员。我们相信，到 3 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 100 万人。"此外，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如青年组织、农民组织、妇女组织和工会等都陆续建立起来，捷共在这些组织中基本都处于领导地位。①

为了筹备选举和明确党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1946 年 3 月 28 ~ 31 日捷共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② 哥特瓦尔德在《今天的形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纲领》的报告中阐述了捷共的战略和策略，他指出："从劳动人民的观点来看，保持和巩固我们目前内外政策的方针，保持和

① 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准备情况的通报，1946 年 2 月 27 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901，л.6 – 8，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Том 1，с.378。

② 联共（布）中央没有派代表出席捷共八大会议，应捷共中央的请求，联共（布）中央给捷克发去了贺电。但电报在 3 月 30 日，即大会开幕之后才收到，而哥特瓦尔德的大会报告是在 29 日进行的。联想到早在捷共八大召开的前几个月，1945 年 11 月 14 日，斯大林在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和明茨会谈时，他们问该不该邀请联共（布）中央代表出席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回答说："最好不邀请，以免敌人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当时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谨慎可见一斑。参见 *Марьина В. В.* ВКП（б）и КПЧ 1945 – 1948 // *Чубарьян А. О.*（*отв. ред.*）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1997，с.127。

巩固这一政策的人民的、民主的性质，彻底地实现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所有东西，这是一切问题中的问题，一切任务中的任务。”具体行动纲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制定新宪法巩固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维护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让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在国家中处于平等地位；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清除战争后果，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开展国有化和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向边区移民工作；进行赋税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障体制，等等。① 根据八大会议决议，捷共为筹备议会选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第一，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开展工会运动。

4 月 19 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统一工会联盟代表大会开幕，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同斯洛伐克工会联盟合并，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国有化运动，制定新宪法和巩固国有化成果，在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强调斯洛伐克地区工业化的重要性等。②

第二，加强宣传，开展群众运动。

八大会议结束后，党的基层组织活跃起来，在各级群众组织中努力开展工作。提出“为祖国多工作”的口号，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党报党刊对此广泛宣传。利用五一劳动节群众集会广泛宣传共产党的竞选纲领，哥特瓦尔德呼吁：“人民应该给我们力量和全权，以便我们在民族阵线中起到重要作用，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民族阵线继续前进，而不是后退。”③

第三，争取有利于共产党的竞选规则。

在拟定选举法的过程中捷共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的目的，规定：所有的候选人必须是民族阵线各政党的代表，不能以私人身份参加竞选。这项规定限制了非民族阵线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被解散法西斯主义政党的骨干分子。所有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在现居留地投票，而不是依据先前的居住地。这项规定的意义在于，德意志居民被迁移后，许多迁移到边区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选举结果显示

① *Готвальд К.*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ом 2, 1939 – 1953 гг., с. 120 – 140.

②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с. 461.

③ *Снитил З.*, *Цезар Я.*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 – 1948 гг.,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с. 204 – 205.

边区移民基本都投了共产党人的票。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由 21 岁降为 18 岁。共产党在青年组织中拥有很强的影响力，降低选举年龄限制有利于争取青年选民。[①]

选举前夕，捷共从基层得到情报：共产党将会获得 41% 的选票，社会民主党：15% ~16%，国家社会党：22.5%，天主教人民党：21%。[②] 共产党对取得选举胜利充满信心。5 月 26 日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如下：在捷克地区，共产党得到 43.26% 的选票，国家社会党得到 25.21%，天主教人民党得到 16.27%，社会民主党得到 14.95%，弃权票为 0.31%。在大型企业，共产党对在这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得到了 60% ~70% 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得到 62% 的选票。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到 30.37% 的选票，劳动党和自由党得到 3.11% 和 3.73% 的选票，弃权票为 0.79%。[③] 这样，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占据了 300 席中的 151 席。尽管选举不能保证任何一个政党取得绝对的优势，但捷共作为最强的政党获得了组建民族阵线政府的权力。在当时，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和西方的一些观察员基本都同意 5 月 26 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是公正而自由的，是遵守了民主形式的。[④]

1946 年 7 月 2 日，在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组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26 个岗位中有 9 个由共产党人占据，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占 4 个岗位，天主教人民党占 3 个岗位，无党派人士占 2 个

① Чехословац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44 – 1948 гг.，с. 205 – 206.

②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 46.

③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 49 – 50.

④ 学术界基本认同这种意见，在探讨共产党选举胜利的原因时，也多半从捷克历史传统、慕尼黑经历等因素出发，认为苏联没有干预行动。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捷克档案的解密发现在选举过程中出现过这样一则事件。在大选前几天，苏联红军要求从奥地利苏占区过境捷克斯洛伐克到德国苏占区去，政府总理费林格和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就此问题未能同政府和总统达成协议。5 月 21 日，政府发生了争吵，副总理斯兰斯基坚持说在大选期间国内驻有外国军队是非法的，要求苏联改在其他时间过境。斯沃博达解释了红军换防的细节，红军需要在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换防，并且主要是在夜间过境，不会在居民点和火车站停留。马萨里克表示，英、法、美大使，以及外国记者对事件的发展非常关注。司法部长德尔蒂娜指出，居民中有传闻说，如果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红军将占领国家。政府为避免出现丑闻，采取了外交行动，请求莫斯科推迟换防，或者在大选期间停止换防。最后，苏联停止了换防。见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 48 – 49。由于没有进一步的俄国档案文件进行佐证，目前尚无法判断莫斯科在大选期间换防行动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实属偶然。

岗位。共产党除了得到副总理的岗位外，还得到7个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内务部长、农业部长、财政部长、对外贸易部长、情报部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外交部国务秘书。① 在政府和民族委员会中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开始进一步“从上层”推动社会变革，和以前一样，仍在人民民主的口号下进行，争取到国内各阶层广泛的支持。

议会选举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第一次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毫无疑问，民族阵线中的其他政党密切关注着捷共将要采取的施政方针，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7月8日，哥特瓦尔德向民族委员会提交的第三届民族阵线政府纲领被称之为《建设纲领》，这份纲领是根据捷共八大会议决议起草的，它是对《科西策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该纲领的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治方面，打算制定和通过新宪法，将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经济方面，制定和通过《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这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保障，等等。② 在议会讨论这个纲领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没有提多少反对意见，而社会民主党则表现得非常冷淡。③ 7月11日，略加修改后的纲领获得了通过。

在这种力量对比条件下，捷共把获得苏联的帮助与支持视作稳固自己在国内统治地位的外部保障，同时更需要就党目前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向斯大林进行请示。1946年7月，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新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在国际舞台协调行动、军事合作、交通联系以及签订贸易协定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苏捷双方7月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签订了《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战利品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拥有的一切战利品，其中包括上百个合成纤维厂、金属加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企业都转交给捷克所有。④ 这是政府

①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52.

②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 с. 256.

③ 斯兰斯基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1946年7月16日。РГАСП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ф. 17, оп. 128, д. 903, л. 74,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1944 - 1948, с. 321。

④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с. 214 - 215.

层面的谈判，而在哥特瓦尔德同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斯大林表达了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式道路的看法。斯大林说："正如经验和马列主义经典教导我们的那样，通过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因为在确定的条件下可能存在其他的道路。"接着斯大林指出："的确，在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场战争一方面付出了巨大牺牲，另一方面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具，广大群众的自我意识增强了。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具体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际情况，斯大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①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斯大林在此前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在捷共取得国内议会选举胜利之后的几次谈话更具意义。② 无疑，捷共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验证了斯大林的良好打算，使他确信东欧各国"以民族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策略的正确性。哥特瓦尔德正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制定捷共的策略和政府的施政方针的，即借助人民民主这个平台同民族阵线的伙伴继续合作，同时利用和平手段发展和深化革命。

实施建设纲领中的经济部分应从制定和批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两年计划》着手，《两年计划》反映了捷共发展经济的基本观念，即强调计划的作用，面向斯拉夫国家的对外贸易方针，着力解决市场和原料的问题。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①彻底恢复被占领者破坏的国有经济，到1948年底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10%，强调要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关键工业；②农业生产要达到战前水平，在农村要完成社会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③消除斯洛伐克地区的落后局面，依靠斯洛伐克地区的资源和把捷克地区的一些企业迁至斯洛伐克为工业化奠定基础；④完成向边区移民任务，彻底恢复那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与此同时，还提出政府打算采

①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ом 1, с. 579, 注释3。

② 如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答《每日先驱报》记者问。*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 *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жима, попытки его модификации, пречины крах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2, с. 46; 斯大林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会谈，1946年8月19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55, л. 76-85,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ом 1, с. 456-461。

取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住宅条件，进行有利劳动人民的赋税改革，等等。①

民族阵线中的各党派围绕计划的思想和计划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产生了争论。《两年计划》的制订者——共产党人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纲领的基础，打算通过成立中央经济部来实现对私有资本的监督。非共产主义政党认为中小企业、手工作坊和农业生产是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捷共被迫向自己的同路人作出让步，如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事实，维护私有者的利益，银行的监督功能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等。②

1946 年秋天，朱里什领导的农业部制定了深化土地改革的六项法律：关于重新审查 1919 年的土地改革；关于清除地主占有的分散土地；关于巩固农民在土地改革时得到土地的所有权；关于土地所有者的继承权的问题；关于在完成两年计划过程中向农民提供帮助的问题，等等。③ 共产党人在没有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政府和民族委员会进行讨论的情况下就把这些法律草案的内容告诉了农民，组织各农民委员会对这些法律草案进行讨论，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些法规。共产党的做法和法律草案的内容引起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不满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捷共发动农民进行集会、游行和选派代表团向国会请愿，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到 1947 年夏天，共产党成功地迫使国会通过了这六项法律。④

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中的老问题是原料和市场，不管以什么观念发展经济，这两个问题都是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两年计划的设计者指望首先通过来自东方的投资以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其次进口原料和从西方购买先进设备。这种观念的倡导者主要是基于国际市场对重工业品的稳定需求，同时对消费品的需要逐渐下降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捷共领导层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把两年计划看作是经济行动，而首先是政治行动。它的实现是同“在国内深化革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党内的一些激进势力早

①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с. 464.

②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48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 127.

③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с. 465.

④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54 – 55.

在制订两年计划时就把它看作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梯”。[①]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的贸易额显著提高。1945年贸易额仅为2.65亿卢布，而1946年上半年就达到了24.52亿卢布，提高了将近10倍。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出口从1945年的580万卢布增长到13.7亿卢布，苏联对捷出口由2.07亿卢布增长到10.82亿卢布。[②] 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各国也签订了五年贸易协定。同欧洲其他工业国家相比，1945~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47年国内工业增长指数达到战前水平的92%，战后欧洲对商品的需求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品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1947年年中，捷克斯洛伐克出口占1937年出口水平的83.6%，而进口达到94.7%。[③]

非共产主义政党指责这种经济发展观念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苏联和苏联集团国家的‘机床厂和钢铁厂’，它们指出：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签订的经济协定所承担的责任超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能力；维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有利于国内生产现代化，保障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变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结构是有害的，这将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世界技术革命而处于落后状态。它们还认为：经济发展应“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考虑到国内原料不足和工人技工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经济改革应主要集中在消耗能源最少，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工程师、工人技工的领域”。[④]

的确，经济发展的成就掩盖了潜在的弊病，这种情况在1946~1947年冬天开始反映出来，初期的征兆是对外贸易出现了困难。到1947年下半年，同各国的贸易出现了15亿克朗的债务，并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再

---

① *Милякова Л. Б.* Поиск конце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отв. ред.*）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8, с. 88–89.

②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с. 214–215.

③ Поиск конце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с. 92.

④ Поиск концеп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с. 91.

加上 1947 年出现的旱灾，导致粮食供应不足，必须立即进口粮食和饲料。正在这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宣布了向欧洲国家进行援助的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各政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希望参加马歇尔计划。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莫斯科的态度就成为捷能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关键。

三　苏联禁止捷参加马歇尔计划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根本改变了国家受资本主义围攻的局面，苏联直接参与雅尔塔体制的创建，成为体制的直接受益者，在战后推行大国合作战略符合国家安全利益。尽管在战后和平调解过程中，苏联同西方出现了许多争吵和分歧，双方敌对情绪增加，但并未破坏大国合作的基础——雅尔塔体制。斯大林相信继续推行大国合作战略是可能的。[①] 因此，尽管苏联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但仍反应积极。在弄清楚马歇尔计划有损害苏联经济安全以及侵蚀苏联在东欧利益的真实动机后，斯大林才果断地采取了抵制立场，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莫斯科的命令在东欧各国得到了贯彻，但意外的情况还是发生了。1947 年 7 月 7 日，捷政府已经通过了接受会议邀请的决定，并见诸报端。在东欧各国中，为什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敢于第一个响应英法的倡议？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道路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需要从捷克斯洛伐克本国特殊国情的角度去观察。

当 1947 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传到捷克斯洛伐克后，国内的资产阶级政党深受鼓舞，他们在报刊上营造舆论，声称“捷克

① 这一时期发生了影响美苏关系走向的三个事件：希腊危机、土耳其危机和伊朗危机，从斯大林对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宣言的反应来看，斯大林并未放弃大国合作战略。1947 年初发生了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事件，斯大林开始着手成立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从斯大林的构想来看，最初他只赋予新国际机构以“情报”性质，直至在抵制马歇尔计划之后才赋予其“协调”功能。这表明马歇尔计划事件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变的关节点。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吕雪峰：《从“人民民主”到“准斯大林体制”的建立：战后初期捷克历史进程中的苏联因素》，博士论文，2008 年，未刊，第 75～87、111～119 页。

斯洛伐克的经济问题只能在美国的亲自参与下才能解决"，纷纷建议政府参加马歇尔计划。人民党机关报指出："如果旨在免疫共产主义威胁的'杜鲁门主义'成为盟国之间的障碍，那么，在马歇尔的倡议中这种危害性就不大，我们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一个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如果提出要求就会得到必需的援助。同其他国家明智的政治家一样，我们也要严肃认真地响应这一倡议……"① 6月6日，正在奥斯陆访问的捷外交部长马萨里克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个计划是为了欧洲的团结，发展贸易，改善取得贷款的条件，美国的计划将会得到支持。但是，如果这一计划导致欧洲分裂，如果经济援助以某种政治让步为条件，捷克斯洛伐克就反对参与该计划实现。"②

新的形势要求捷共明确立场和制定行动策略。面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如果抵制马歇尔计划无疑会使捷共在政府中陷于被围攻的境地。马歇尔计划的具体内容还不为所知，更主要的是不了解苏联的态度，因此，捷共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提出坚定的反对意见。

6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大使馆都收到了指示，要求搜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情报，并责成大使们弄清楚各国政府的态度。当天，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参赞甘奇就同美国副国务卿托尔普进行了会谈。托尔普把对欧洲的援助说成是纯经济性质，主要是要强化欧洲各国自身的经济合作。大使馆向布拉格汇报说："美国准备援助那些不打算消极地等待外国援助，而肯于用自己的力量为复兴而奋斗的国家。托尔普指出，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为自己的复兴做出更大的努力。"在把这份情报发往布拉格时，斯拉维科大使阐述了下述立场："根据美国的意见，美国援助的条件是欧洲各国在伦敦先组织合作。意思是说，如果参与欧洲合作，援助是可能的。"③

6月22日，苏联发来电报说："我们认为友好盟国为确保参与关于美

①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гг., с. 233.

② *Кратки К.*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с. 117.

③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16－117.

国的援助计划，从自己的一方提出相应的倡议并提出请求是合适的，我们注意到一些欧洲国家（荷兰、比利时）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建议。"① 苏联的态度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深受鼓舞。

6 月 24 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第 93 次会议上第一次研究了对美国计划应采取的立场问题。共产党人、外交部国务秘书克列门蒂斯做了报告，他说，苏联领导人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类似于荷兰和比利时的倡议观点是合适的"。因此，他建议组建部际委员会来起草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愿望的文本。至于愿望本身，按照他的观点，有一个原则性声明就足够了，即美国的政策不能具有歧视性质。对此，哥特瓦尔德总理补充说，应明确"我们不需要的和不想要的"，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了苏联的立场"。最后会议通过决议案，接受了克列门蒂斯的报告，批准成立由"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卫生保健部、交通部、政府副总理费林格和外交部国务秘书联合组成的部际委员会，任务是关注事件的进展情况，与外交部长合作，快速地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和建议，以便为捷克斯洛伐克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合适的时间，就这一建议有关的所有问题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会议结束时，政府责成马萨里克立即同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盟国政府进行协商。②

此后，布拉格陆续收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驻外大使馆的情况报告。驻巴黎大使馆报告说，南斯拉夫、波兰和意大利均表明了自己对复兴计划的兴趣，准备参加巴黎会议。驻土耳其大使馆汇报说，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在返回伦敦后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说，西方正在等待布拉格的意见。在这些消息的基础上，外交部长指示驻英美大使通知所在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尽快制订方案。③ 当天，7 月 1 日，他们就转交了照会，照会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完全同意美国的建议，愿意同美国合作来加速欧洲各国的经济复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准备为接受美国援助创造条件，将在合

①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отв. 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с. 69.

②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第 93 次会议记录，1947 年 6 月 24 日。转引自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17 – 118。

③ *Шедивый Я.*, *Коржакова К.*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 – 1960 гг.,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с. 44.

适的时候提出自己的建议。"①

就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参加马歇尔计划做积极准备的时候，传来了巴黎三国外长会议破裂的消息，尽管苏联代表退出了会议，但会议仍声明说，下一次讨论美国经济援助问题时仍会邀请苏联参加。波兰代表还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了关于自己的观察立场。所有这一切对 7 月 4 日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议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7 月 4 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事件的下一步发展问题。马萨里克在会议上说："在许多领域我们对同西方进行合作感兴趣，特别是出口和原料。"斯兰斯基说："政府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对外交部长来说就更为困难——从政治角度来看，捷克斯洛伐克在对外政策路线上要同苏联保持协调，同时在经济上我们又不能完全断绝同西方的联系。"在谈到对苏外交问题时，马萨里克说："我们的愿望是，以合适的和恰当的方式向苏联解释我们的立场。……我的朋友佐林不在岗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他是事务代办，但毫无疑问，他可以很好地向莫斯科讲述这些事，这种交流还不够，必须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谈判。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成功地这样做。"会议决定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马萨里克于 7 月 8 日去莫斯科进行短暂访问。③

7 月 5 日，马萨里克收到了英国驻布拉格大使尼科尔斯转交的正式邀请信，信中谈道："1. 英法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限制国家主权；2. 对欧洲的贸易不能有任何限制，后果是任何一方都必须废止双边贸易协定；3. 对美援的期待要有节制，众所周知，捷克斯洛伐克需要的，其他国家也会需要；4. 这个建议是吸引更多的国家在商业的基础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尝试。……按照我们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把欧洲划分为东方和西方。"④ 这 4 项规定中的第三项要求废止双边贸易协定的内容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非常棘手，因为这意味着必须废止同苏联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

---

①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18.

② 参见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гг., с. 235 – 236。

③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扩大会议记录，1947 年 7 月 4 日。转引自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19。

④ 尼科尔斯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信，1947 年 7 月 5 日。转引自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20。

7月6日，马萨里克收到了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代办博德罗夫向他转交的苏联政府关于莫洛托夫退出巴黎三国外长会议原因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行动不抱有什么信任，因为早在会议召开之前，英国人和法国人，可能还有美国人，就背着苏联达成了协议。在马歇尔的方案中既没有提出贷款的条件，也没有谈到贷款的规模，因此，它实现的可行性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同时，苏联政府指示出席会议的苏方代表，让他们弄清楚得到贷款的义务、条件、规模和现实性，然后再明确自己的观点。三国外长会议共举行了6天，但关于贷款的条件和规模却没有任何情报。备忘录指出，苏联代表团把成立“领导委员会”的要求看作是试图干涉参加国的内部事务，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的纲领，阻止它们出口剩余物资，同时使它们的经济从属于美国的利益。自然，苏联代表团不能同意这一纲领。苏联代表团认为，首先应该弄清楚贷款的现实性，它的条件和规模，然后再确定欧洲国家所需的规模，拟定它们要向美国贷款的计划。这样，欧洲各国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经济，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设备和剩余物资。由于英法同苏联在观点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此未能达成协议。备忘录在结尾部分强调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必须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报巴黎会议的进程情况。此外，英法号召欧洲国家7月12日召开会议，多半讨论巴黎外长会议讨论过的那些问题。① 从苏联备忘录的表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莫斯科在暗示捷克斯洛伐克不要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但是，马萨里克装作看不懂电报的含义，坚持要博德罗夫代办给出直接答复：苏联政府是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还是不参加这个会议。博德罗夫重复了三次说：“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参加定于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问题，他不能说什么，因为对此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接着他又补充说：“也许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可以参加会议，只是要得到不干涉参加国内部事务的保障。”② 其实，马萨里克要的就是这句话，以此作为苏联不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的证明。

当天，博戈莫洛夫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了联共（布）中央的电报，此封电报也发给了东欧其他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电报中说：“你们可能已经收

① 博德罗夫给马萨里克的备忘录，1947年7月6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70，л.96，转引自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c. 16。

②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1941－1947，c. 237.

到了我们关于巴黎三国外长会议的情报。你们从这些情报中不难判断苏联的立场。7月12日，英国人和法国人邀请欧洲各国代表参加会议，讨论在巴黎外长会议上研究过的那些问题。苏联政府打算不参加此次会议。看来，一些对苏联友好的国家也想拒绝参加此次会议。……我们认为，最好不拒绝参加此次会议，而派代表团与会，此举是为了在那里证实英法的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能就这一计划达成协议，尔后退出会议，同时尽可能多地把其他各国的代表团带离会场。"① 这是莫斯科以党际联系渠道给捷共领导人的指示，希望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影响促使政府拒绝马歇尔计划，具体策略是参加会议，同时要破坏会议。

7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主席团为了讨论与参加马歇尔计划有关的问题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们是现在就决定关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问题呢，还是等到7月9日与苏联外交家的会谈有了结果时再决定。马萨里克坚持参加巴黎会议，他出示了英国大使尼科尔斯的信，尼科尔斯在信中竭力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意识到接受英法邀请的重要性，他强调马歇尔计划仅仅是一个"经济方案"。贝奈斯支持马萨里克的意见，他说："我们政府决定接受会议邀请，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和必要的，理由是：1. 共和国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活动至少60%～80%依赖来自西方的援助，依赖同它们进行经济合作；2. 我坚信，或早或晚苏联将会以某种形式加入到这种合作中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合作，那么美、英、法就会联合起来。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要是它们以某种形式把德国也吸收进来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因为我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波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能允许以自己不参加为代价来帮助德国。"政府副主席费林格则表示："马歇尔计划——这是一个骗局，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因为它的倡导者企图绕开联合国来实施这一计划。"外交部国务秘书克列门蒂斯也指出："接受邀请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要承担一定的义务，根据外交部收到的材料，瑞典、瑞士、匈牙利，可能还有挪威都不参加巴黎会议。鉴于目前的形势，最好推迟做出决定，要同盟国，首先是苏联进行协商。"哥特瓦尔德尝试以"德

①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ом1, с.668, 注释2。

国威胁”来反对政府参加巴黎会议，他说：“现有情报还无法弄清楚巴黎会议到底要做什么，多半是谈复兴德国的事，这会给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带来直接危害。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参加巴黎会议的斯拉夫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马萨里克立即表示：“根据他的情报，波兰是准备参加的。”马萨里克并不反对与苏联协商，他指出：“事情本身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对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盟国义务是最高指针，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意见，最后才能考虑其余办法。”他在会上出示了同博德罗夫的会谈备忘录，并解释说，根据备忘录，苏联的态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可以独自解决关于是否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问题”。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一致支持马萨里克的意见，最后政府成员一致同意接受英法的邀请，并委托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国大使诺塞克出席会议。捷共代表也表示同意接受邀请参加会议。[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所以能够通过参加会议的决定在于，以马萨里克为首的非共产党部长打了个时间差，他们担心捷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第二天）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议的问题出现变故，而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当天，7 月 7 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英法大使就向英法政府转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接受邀请参加巴黎会议的照会，任命捷驻法国大使诺塞克为会议代表。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在收到自己代表关于马歇尔计划更为详细的情报，以及在得到作为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前提条件的纲领后再决定。[②]

根据档案文献来看，大概是斯大林对东欧参加巴黎会议并破坏会议的策略是否可行有所担心，7 月 7 日凌晨，莫斯科急电驻东欧各国和芬兰大使，向所在国共产党领导人转告如下指示：“苏共中央政治局建议他们在 7 月 10 日以前不要对英国、法国做出任何回答，因为有些国家中的朋友鉴于苏联不打算出席而反对参加 7 月 12 日召开的会议。”[③] 鉴于 7 月 7 日捷政府已经召开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问题，因此，很可能博德罗夫收到电报后

---

①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с. 238 – 239.

② 捷克斯洛伐克给英法政府的照会，1947 年 7 月 7 日。转引自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21。

③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 年 7 月 7 日。АПРФ, ф. 3, оп. 63, д. 270, л. 142，转引自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8。

没有及时地转告哥特瓦尔德。

7月7日，莫斯科对东欧国家参加巴黎会议——特别是因为苏联不在场——时是否能抵御住美援的诱惑愈加担心。当天晚上，斯大林又急电驻上述国家大使立即转交联共（布）中央建议拒绝参加巴黎会议的电报，电报中说："苏联政府得到的有关7月12日召开的巴黎会议性质的材料证实了两个新情况。首先，会议组织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打算对他们那个不尊重小国主权和经济独立的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作出什么修改。其次，会议组织者们实际上试图以制定欧洲经济复兴计划为幌子建立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鉴于这两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撤销7月5日发出的电文，并且建议拒绝参加会议，亦即不要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各国可自己斟酌提出拒绝与会的理由。"[①]

然而，克里姆林宫在7月4～7日犹豫不决的态度使局势复杂化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芬兰政府接受了这一指示，但在布拉格遇到了困难。当苏联驻捷临时代办博德罗夫于7月8日拜见哥特瓦尔德，递交电报时，哥特瓦尔德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改变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了，因为"政府不会支持我们（共产党）"。[②]

以上事实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非是未经苏联同意就擅自决定参加巴黎会议，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领导层在东欧各国出席巴黎会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这一点，正好被捷政府非共产党部长抓住了时机，成功地促使政府通过了接受英法邀请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7月6日布拉格收到博德罗夫转交的苏联政府照会，7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通过了出席巴黎会议的决定，而莫斯科禁止捷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是在7月7日晚上做出的。此外，还应该注意到，7月7日和8日莫斯科给哥特瓦尔德的两封电报，是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致捷共领导人的，而不是以苏联外交部的名义致捷政府的。如果说在东欧各国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基本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其他国家政府较容易地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却有所不同。捷共在政府中未取得绝对的主导

① 莫洛托夫给列别杰夫的密电，1947年7月8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58，转引自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79。

② 彼得罗夫给莫洛托夫的密电，1947年7月9日。АПРФ，ф.3，оп.63，д.270，л.183－184，转引自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с.17。

地位，或者说主导地位不那么明显，共产党同非共产主义政党基本上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如外交部长、总统和对外贸易部长均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担任，正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导致捷政府通过了接受会议邀请的决定。由此可以判断，为避免被人指责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哥特瓦尔德是不会把莫斯科的指示转告给政府中非共产党部长的。因此，在7月9日捷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之前，政府中的非共产党部长不会知晓莫斯科禁止捷参加巴黎会议的命令。

7月9日晨，捷政府代表团飞往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抵达莫斯科后，哥特瓦尔德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而其余成员则休息等待。哥特瓦尔德在克里姆林宫停留了近两个小时，他向斯大林转交了贝奈斯总统致斯大林元帅的两个备忘录：一个强调签订捷法条约的重要性，另一个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由于没有留下会谈记录，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除了谈到让捷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外还谈了些什么，现在仍无从知晓。几个小时后哥特瓦尔德回到政府成员住处，对他们说："孩子们，一切 OK 了！我只是同斯大林聊了一会，你们今晚就去他那里。"[1]

关于斯大林与捷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苏方和捷方的档案目前都已公布，苏方档案收录在档案集《俄国档案中的东欧》中，捷方档案被俄国学者译成俄文刊登在《消息报》（1992年1月9日）上。[2] 两者相比较，记录的侧重点不同，苏方注重记录斯大林的话，而捷方记录本国领导人的话更多些。

会谈在当天夜里11：00开始，持续了两个小时，至7月10日1：00结束。

哥特瓦尔德说："虽然我们对此事（指参加马歇尔计划）持积极态度，但我们在答复巴黎会议邀请时提出了保留意见，这样我们可以相机行事。现在出现了新情况，因为我们——唯一的斯大林的人和唯一的东欧国

① 1991年4月7日，捷克斯洛伐克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廖伯尔发表的关于访问莫斯科一事回忆录。转引自 Кремлен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22－123。
② 斯大林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47年7月9日。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93, л. 101－105,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ом1, с. 672－675; Известие, 1992. 1. 9。

家——收到了巴黎会议的邀请信，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想知道苏联的态度。”（捷方记录）

斯大林首先解释了因收到新情报而改变态度的原因，接着他说：“我们对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吃惊，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友谊的问题。你们是在客观上帮助别人孤立苏联，不管你们主观上是否愿意，但的确是在这样做了。请看看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所有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都不参加会议，而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参加。那么，他们就会判定，既然那么轻易地就能够把捷克斯洛伐克接到孤立苏联、反对苏联一边，那就是说，它同苏联的友谊已经不那么牢固了。这将被看做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不能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取消这一决定，应当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并且这件事你们做得越快越好。”（苏方记录）

在捷克方面的记录中，除了上述内容外，还记录了斯大林说了这样几句话：“参加会议使你们陷于复杂的境地，‘阵线突破’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成功。瑞典和瑞士还在动摇，而你们要参加，很明显，这就影响了它们做出决定。我们知道，你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当中任何人对此都没有疑虑。但你们参加会议的行为会被当作反苏的工具来使用。无论苏联，还是它的政府都不允许这样做。”

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包括哥特瓦尔德，都试图以捷克斯洛伐克对西方贸易的依赖来解释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必要性。马萨里克说：“有这样一个事实，我们60% ~80%的企业都依赖于西方，为了不错过得到某种贷款的可能性必须去巴黎参加会议，这样，本国企业的领导人才不会停止对我（马萨里克）的信任。”德尔蒂纳说：“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斯拉夫国家相比是另一种情况，生活水平依赖外贸，而外贸，很遗憾，依赖西方。”德尔蒂纳提醒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致通过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要求苏联政府能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一下自己的立场。（捷方记录）

斯大林明确表示准备购买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如石油工业管道等重工业品，而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业品，而苏联暂时还不购买这些产品。”斯大林回答说：“为什么不买？我们要买的。”哥特瓦尔德还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联合公报中写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来访苏联将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斯大林再次做出将给予捷克

斯洛伐克经济援助的承诺。斯大林强调指出：“至于你们，在巴黎会议上将会得到如下验证：随后会变得很明显，接受邀请可能被解释为反对苏联的先锋，特别是因为，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和东欧国家都没有接受邀请”。（双方记录基本一致）

会谈结束时，斯大林再次提醒哥特瓦尔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必须在今天，即在1947年7月10日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7月10日清晨，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致电贝奈斯：“无论斯大林，还是莫洛托夫，都没有隐瞒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接受巴黎会议邀请一事非常惊讶”，同时，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贝尔格莱德、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都向苏方询问关于参加巴黎会议的事。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决定参加会议前都未向莫斯科询问过，如果7月6日马萨里克向苏联代办询问一下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电报的结尾部分，哥特瓦尔德、马萨里克和德尔蒂纳一致同意这样阐述：“立即召集政府中能召集到的所有成员，向他们通报我们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的内容。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接受关于废止参加巴黎会议的决议，并就此事发表声明，其中官方声明于第二天下午（也就是同一天，7月10日）在这里（莫斯科）发布。此外，把自己的决定立即通过电话告诉我们。”[①]

当天12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钟。但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参加巴黎会议的问题，而是讨论在决议案中如何表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接受英法邀请这件事。捷共坚持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拒绝参加巴黎会议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的基本理由，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则坚持在政府公报中应写明，捷克斯洛伐克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会议开了一整天，双方争持不下，到了晚上精疲力竭的部长们终于一致通过了如下方案：“由于一系列国家都拒绝参加巴黎会议，其中包括斯拉夫各国和东南欧各国，这样，同这些国家保持紧密经济政治联系，并依据条约义务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参加巴黎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巴黎会议会被解释成旨在违反同苏联和其他盟国友谊的行为。据此出

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给贝奈斯总统的电报，1947年7月10日。转引自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прет: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 122 – 124。

发，政府一致通过决定不参加上述会议。"①

7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在当天发表的公报中并未提及"马歇尔计划"的事，只是模糊地说，"双方代表讨论了与捷苏双边关系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这次会议显示了双方观点的一致，并通过了统一的决议案。"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由苏军解放并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贝奈斯和马萨里克的设想，战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在对外政治方面应该"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但在经济方面要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确保国家参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这种战略设想存在的前提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能维系到战后，而在战后美苏关系逐步进入冷战的情况下，这一设想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继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推行失败——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苏联对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动机变得更为审慎，而共产党并非占有压倒性地位的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正是东欧战线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得到捷政府通过准备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消息后，斯大林向捷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强令捷政府取消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苏联在东欧的军事政治存在是战后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为加强对东欧各国的经济控制，防范西方利用经济援助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危险，苏联同东欧各国陆续签订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协定，被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③ 两年后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独立于西方市场之外的苏东社会主义经济集团。

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道路的转折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共在国内围绕经济发展观念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此后，哥特瓦尔德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坚持面向苏联和斯拉夫国家的方针，对内进一步推行国有化改革和土地改革，用计划经济观念

①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1947, с. 244.

②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МИСЧО), Том 5,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с. 358－359.

③ 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情况，详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38～239页。

发展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苏东军事政治集团的“机床厂”。结果，使这个战前就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失去了参与新的工业革命的机会，并逐步落后于西方。在莫斯科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实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此后，无论是联共（布）中央，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都把实现政治转轨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只是在实现的时间和方式上捷共同莫斯科存在着一定分歧。

四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

1947 年是美苏冷战战略确立和冷战格局形成的一年。1947 年 3 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斯大林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在西欧随之破产。针对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在经过短暂的犹豫后，认清了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向东欧进行经济渗透的企图，不仅自己抵制，也禁止东欧各国参加马歇尔计划。这一事件的重要影响是斯大林决定把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的职能，从仅仅交换情报，沟通情况，转变为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方针，这表明苏联对外战略思想发生了改变。由此，苏联战后初期推行的大国合作战略就转变为集团对抗战略。在 1947 年 9 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宣布了“阵营对抗理论”，并通过批判法共和意共，训导东欧各国共产党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随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陆续完成了建立垄断政权的任务，而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显然落后了。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明显折射出国际舞台斗争的影子。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联合政府的“协议机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围绕国家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双方都坚持以自己的民主观念来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谁战胜谁”的问题变得迫切起来。为了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联合政府中的各政治力量进行了分化组合，并逐渐形成两大政治集团：一方是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首的左翼集团，它们得到了莫斯科的外部支持；另一方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右翼集团，它们努力向西方寻求支持，但它们得到的只是一些空洞的口头承诺。

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比较棘手的有

两个：一是1947年夏末的旱灾造成的粮食歉收，由此引起的粮食供应问题；二是捷克中央集权主义与斯洛伐克分离主义的斗争。哥特瓦尔德政府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和民族问题。

1947年夏末，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各类农作物的收成与预计产量比较，粮食只达到63%，土豆48%，饲草1/3。[①] 政府被迫降低了供应标准，这引起了黑市猖獗。资产阶级政党借经济困难之机向共产党发难，把困难归咎于哥特瓦尔德政府推行的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针，说这是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的结果；同时唆使农民拒不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建议他们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形势越坏，对我们就越好”。[②]

为了解决粮食危机，哥特瓦尔德政府向苏联和美国政府都提出了援助请求，对此，美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回绝了捷政府的请求。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特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灾难“非常有好处”。“我认为今后约三四个月时间内就要摊牌了，那里真正紧要关头就要到来，形势将发展到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条件”。“我们最好是听其自然”，“在我看来，目前阶段靠后站和对求援的呼吁充耳不闻，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马萨里克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十分失望，他说：“华盛顿对我（没有参加巴黎会议）的处境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不答应我们所请求的贷款和援助是极严重的错误。”[③]

而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援助请求非常重视。在接到哥特瓦尔德的求援信后，11月29日，斯大林通知哥特瓦尔德：“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60万吨粮食，而不是我们先前答应的40万吨和你们要求的55万吨”，并保证“在年末就向你们供应10万吨粮食”。斯大林还同意可以捷克方面提出的价格购买苏联的重工业设备，并建议在最近四五天内就签订贸易条约。[④] 斯大林不仅满足了哥特瓦尔德的援助请求，而且还主动增加

①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9, с. 260.

② *Веселый И.*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евод с Чешского, 1960, с. 35 – 36.

③ 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37页。

④ 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信，1947年11月29日。ДМИСЧО, Том 5, с. 394。

了援助的数量。其实这一时期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也发生了因干旱而引起的饥荒。按照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说法，由于饥荒，在苏联国内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况。[①] 苏联的援助改善了因莫斯科禁止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导致的苏联在捷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美国的做法则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阁员和普通居民非常失望。捷共对苏联的援助广为宣传，同时攻击美国对捷饥荒所采取的行为是“利用饥荒扼杀人民民主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企图”。[②]

在寻找外部援助的同时，捷共集中力量做农村工作。根据哥特瓦尔德的提议，在政府中组建了粮食问题特别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克服粮食供应困难，说服农民履行交售义务，同时揭发地主、富农和其他不履行义务的人。粮食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主要由工人、有觉悟的农民、各政党和全国性群众组织的代表构成。[③] 为了扶助遭到歉收损害严重的小农和中农，捷共建议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同时对受灾农民提供物质援助。政府各党派一致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在这笔款项筹集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捷共建议向地主、企业家、商贩和其他一些拥有资产达100万克朗的人征收特别税，非共产党部长则要求这些款项应由国库支出。在9月2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12名非共产党部长否决了捷共提出的关于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建议。[④]

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捷共转而寻求群众支持，把非共产党部长的行为公诸于众，提出了“让富人出钱！”的口号。随后全国各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和各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向政府呈交要求通过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呼吁信。捷共的建议得到费林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9月11日，捷共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就征收百万富翁税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还规定两党就其他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共同承担巩固民族阵线的责任。最后，非共产党部长被迫做出让步，在10月21日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一致通

---

①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第334页。

② *Поп И. И., Россовская М. М.*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Я.* (*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 – 1949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с. 105.

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中册，第59页。

④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с. 471.

过了征收百万富翁税的决议。[1] 在这场围绕经济问题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中，苏联及其支持下的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及它们指望的西方则名誉扫地。这次胜利为捷共即将开始的夺权斗争增加了胜利的筹码。

1947年秋天，捷共还取得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胜利，即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成功地击溃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事件的过程比较简单。1947年9月中旬，国家安全机关公布了“斯洛伐克密谋”的官方消息，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民主党知名活动家布加尔、肯内被指控与旨在从事谋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镇压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者的地下反动分子有联系。[2] 目前还很难判定，这种指控是否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东欧其他国家的反共分子均已被除掉，一些领导人，如米科拉伊奇克（波兰）、纳吉（匈牙利）逃亡西方，另一些人，如马尼乌（罗马尼亚）则被捕受审。“斯洛伐克密谋”事件被揭露出来后，斯洛伐克各工厂委员会展开宣传活动，要求改组民族执行委员会。10月31日，执委会主席胡萨克和15名执委会部长中的5名成员提出辞职，并向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提出执委会全体成员集体辞职的要求，遭到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拒绝。布拉格中央政府责成哥特瓦尔德同各党派就改组斯洛伐克执委会的问题进行谈判。在11月17～18日召开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民族阵线会议上，经过协调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党丢掉了执委会中的全部席位，而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执委会中占有了主席和4个部长席位，被斯洛伐克民主党合并的劳动党和自由党各获得2个席位，无党派人士获得2个席位。[3] 对捷共来说，通过揭露“斯洛伐克密谋”沉重打击了斯洛伐克民主党，巩固了斯共在斯洛伐克地区的实力。对布拉格中央政府来讲，这一事件暂时解决了捷克人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捷共似乎看到了通过这一手段打击对手的良好效果，捷共领导人、农业部长朱里什打电话给《红色权利报》主编诺维说，需要经常地揭露密谋，而

---

①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ом 3, с. 472.

② 捷克学者卡普兰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文件，指出这一事件是在苏联情报机关顾问的参与下制定的。这一说法还没有为俄国档案所证实。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59－60。

③ 参见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60－61。

且不只是几天一次。[1]

在1947年末各党派围绕经济问题进行的斗争中，捷共取得了全面胜利。从斗争的手段来看，既使用了议会斗争方式，也使用了议会外的斗争方式。但从斗争的目标来看，这还不是最后的夺权，捷共把建立对政权垄断的目标寄托在定于194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上。在此之前，东欧各国共产党均完成了夺权任务，只有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左转，这种情况令莫斯科非常恼火。

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后，莫斯科最为担心的就是捷共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有着比较浓厚的议会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又很强大，斯大林对捷共能否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忧心忡忡。1947年6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古利亚耶夫来到布拉格。他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向哥特瓦尔德转交一份日丹诺夫致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关于法国共产党不参加政府的信的复印件。斯大林的意图是想让捷共知道联共（布）中央对法共的不满，同时了解一下捷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回到莫斯科后，古利亚耶夫准备了一份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分别呈送给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文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之间斗争尖锐，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的反动分子异常猖獗。他们的活动带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反苏联的性质，还大肆宣扬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不存在的功绩，并吹嘘美国和英国的民主是多么美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政策，古利亚耶夫指出，共产党人揭露反动派及其“外国朋友”的宣传具有局限性，因为共产党“并不总能对敌人的宣传和反动党派的群众性集会所造成的危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报告认为，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善于掌握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关的渗入不够。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48个司、局长中仅有14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75名，其中只有5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131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3名共产

[1]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年12月29日。АВПРФ，ф. 0138，оп. 29，п. 146，д. 4，л. 2－21，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 517。

党人；在外交部的51名干部中仅有7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2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根据这些事实，古利亚耶夫得出结论："共产党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去夺取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中占有重要阵地。结果是，一个组织严密和拥有上百万党员的党却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①

在苏联抵制并禁止东欧各国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后，斯大林决定赋予拟建中的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以协调职能。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集整理了大量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的材料。9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呈交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文件指出："共产党领导人满足于议会活动，对巩固党组织的政治问题和党在广大群众中影响的问题关注不够。共产党在民族阵线活动期间对阵线中对手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错误地认为同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政党合作是可能的。"随后文件分别举例说明了捷共在民族阵线、国有化、群众组织、军队、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最后得出结论说："从对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银行进行的改革，在农村经济采取的措施，两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人和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以及共产党在大选中的获胜，都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和民主力量的实力，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巩固。但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紧张，国内形势也反映出这样的特点，国内反动派在国外反动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下，变得非常活跃。民族阵线中的形势也变得紧张和严重。斯洛伐克反动派积极活动的结果，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共和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薄弱的环节，斯洛伐克的局势非常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沿着民主道路前进，条件是如果它能够快速地消除错误，在利用议会斗争形式的同时，为了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而广泛地利

① 古利亚耶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1947年6月22日。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83，л.213－221，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1953 гг.，Том 1，с.649－655。

用其他形式。"[1]

显然，对陆续收到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的报告引起了联共（布）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注意。为了筹备共产党新国际机构会议，8 月 27 日，日丹诺夫在致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对东欧各国共产党所犯错误进行批评的问题，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2] 只是后来考虑到内部团结的问题，最后日丹诺夫从批判名单中删掉了捷共。

在 9 月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各国共产党代表都清楚，批判法共和意共走议会道路的错误旨在影射捷共。在会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波兰代表哥穆尔卡对捷共夺权太晚提出指责。南共代表卡德尔批评捷共对和平的、议会的、选举的道路存在幻想。[3] 敏感的斯兰斯基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4]，他以"阵营对抗理论"为指导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前形势。斯兰斯基在发言中坦承"我们法国同志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法国事件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我国的反动派"。斯兰斯基论证说，"他们（英美帝国主义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肥肉，失去它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甘心的；第二，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法西斯德国战败后，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中欧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商品投资者和工业制品供应者；第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仍未死心，仍打算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动力量拼凑反动阵线和反共集团，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毫无疑问，国内所有政治阴谋，所有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的企图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美、英间谍，他们插手班杰拉分子的土匪行动和斯洛伐克地下法西斯组织的活动。"说到对策，斯兰斯基向与会者保证："在日丹诺

---

①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经济形势的报告，1947 年 9 月。РЦХИДНИ，ф. 575，оп. 1，д. 39，л. 21 – 30，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ах，1944 – 1953 гг.，Том 1，с. 496 – 503。

② *Бьяджо А. 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 М. и др.*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с. 32.

③ 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卡普兰、布切克在自己的专著中引用了上述内容，但笔者在已公布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中只找到了卡德尔不点名地批评捷共的部分。参见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张金鉴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28 页；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с. 291，注释 230。

④ 斯兰斯基回到布拉格后向自己的同事报告说，好几个代表团都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比任何斯拉夫国家都更易受形式上的议会民主的束缚"。《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 28 页。

夫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充当旨在反对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碎反动派，在这一过程中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① 从斯兰斯基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捷共总书记已经接受了"阵营对抗理论"，决心通过议会外的斗争方式进行夺权斗争，斯兰斯基的发言成为近期捷共的战略和策略纲领。

斯兰斯基回国后，捷共领导人制定了向资产阶级政党势力展开进攻的一些措施：第一，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取得 51% 以上的选票，这样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可以拒绝同其他政党合作；第二，分裂资产阶级政党，把"右派"领导人清除出去，从而使其驯服于共产党；第三，改变民族阵线的结构（共产党占据主导地位）。② 随后，在 11 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了这些措施的细节。③

尽管捷共根据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指示，制定了向敌对力量展开进攻的方针，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把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列为首选政策。12 月 29 日，苏联斯拉夫委员会工作人员斯梅罗尔在向苏联外交部提交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报告中介绍了这种情况：党的领导同志说："过两年，那时反动派将被迫认输"，"现在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招募人员入党上，当我们获得了 51% 的选票后，那时再从事其他的事情"。斯梅罗尔谈到了捷共接收党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什威尔莫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纪检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党员是群众党员：我们党是群众性质的党，而在苏联则是由那些精选上来的人组成党。因此对所有的人来说，通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需要吸收 50 万名党员，接收所有的人，在选举结束后再进行清洗。"④ 捷共在招募党员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从 1947 年 9 月到 12 月，约有 15 万名新党员加入捷共和斯共，其中包括从其他党派转入的党员。到 1948 年初，捷共计有

①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с. 188 – 192.

②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с. 103.

③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 265.

④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0138, оп. 29, п. 146, д. 4, л. 2 – 21,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 I, с. 516 – 517。

126.6 万名党员，斯共计有 15 万名党员。[①] 然而，何时开始向对手展开进攻的问题则被拖延下来。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政党集团也在为夺权做着积极准备。11 月，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以 283:182 压倒多数的选票解除了费林格的党主席职务，反共势力控制了中央委员会。[②] 贝奈斯知道此事后说："对他来讲，这是自从回到布拉格后最幸福的一天。"[③] 12 月末，5 名国家社会党人和 5 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德尔蒂纳家里秘密集会，商讨夺权计划。国家社会党人努力把社会民主党人拉到自己一方，使该党同共产党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会议一致决定，双方共同保卫"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④]

社会民主党右转对捷共的影响非常大，这意味着捷共指望通过联合社会民主党获取议会选举 51% 以上的选票组建政府的计划无法实现。劳什曼回忆说："1947 年底 1948 年初，哥特瓦尔德曾对我说：'假如大选在今天举行，那么他不排除失去选票的可能。但是，他坚信依靠底层的农业资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东正教徒，为争取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新的和激进的法律而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所争取的法律的确令人民感兴趣，这就可以防止选票下滑的局面。'他已经不提 51% 了。"[⑤] 1948 年 1 月，共产党控制的情报部所辖的舆论研究所举办了一次盖洛普型民意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捷共只可能获得全部选票的 28% 左右，而 1946 年时则是 38%。考虑到测验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持的，而且 1946 年选举前进行的一次类似测验的误差仅有 0.5%，捷共有些领导人对 1948 年春天将要进行的选举也感到不安。[⑥] 1948 年 1 月，朱里什在致联共（布）中央的信函中，担心捷共有可能遭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战友同样的下场。[⑦]

---

①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н. 2, с. 65.

②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 18 页。

③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 264 - 265.

④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 54.

⑤ *Мурашко Г. П.*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3, с. 56.

⑥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 18 ~ 19 页。

⑦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с. 55.

由朱里什、萨波托茨基、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以及一些区党组织的主管干部组成的激进派认为，关于政权的问题应该在选举之前解决。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上，也就是组织那些把改善自己物质处境的前景与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实行彻底的农业改革——联系起来的社会贫困阶层的大规模行动。[①] 斯梅罗尔向莫斯科报告说：“党员的数量和同情我们的非党员人数在下降，党针对反动派的斗争还不够，对反苏的反动派的攻击还不够大胆。甚至一些领导同志——诺塞克、涅德雷和朱里什对我说：‘太多的让步’。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评论：‘党应该承认，反动派之所以那么强大是因为提供给反动派太多的自由权’，‘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言论‘春天时不得不拿起武器，否则将是他们逮捕我们’。”[②] 在内外压力下，哥特瓦尔德逐渐成为这些激进党员的支持者。1948 年 2 月，哥特瓦尔德在同苏联驻捷代办博德罗夫会谈时表示，在事态这样发展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也将采取极端措施，也就是借助于共产党人现有的内务部和军队的绝大多数的支持，以武力彻底夺取国内的全部政权，并对反动派进行彻底的镇压”。[③] 此后，内务部长诺塞克开始了清洗公安军的行动，这一事件成为二月事件的导火索。

诺塞克早就打算对本部门进行清洗，只是被斯兰斯基制止了。诺塞克向斯梅罗尔抱怨，他没有在自己机关进行清洗的可能，因为要受到法律制约，还不能触动任何人。当他向斯兰斯基说这种情况时，后者答复说“不可以破坏法律”。[④] 当哥特瓦尔德同意以议会外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时，诺塞克终于得到了机会，成功地更换了 8 名公安部队军官。2 月 13 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案。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指责诺塞克擅自用共产党人来代替布拉格区的 8 名警官。哥

①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с. 56.

②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0138, оп. 29, п. 146, д. 4, л. 2 – 21,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16。

③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с. 57.

④ 斯梅罗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47 年 12 月 29 日。АВПРФ, ф. 0138, оп. 29, п. 146, д. 4, л. 2 – 21,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16 – 517。

特瓦尔德认为这是属于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诺塞克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予以反驳。国家社会党纠合各非共产党部长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务部长关于抽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务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①]

2月17日，国家社会党领导、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达成了三党联合行动的一致意见。在当天举行的政府会议上，他们坚持要求执行13日会议关于撤销抽换警官的决议。会议不欢而散。[②] 当天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在现形势下，所有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所有的民主力量和进步分子（不分党派），所有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必须准备以一切力量摧毁反动派的阴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③]

2月18日，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前往总统贝奈斯那里寻求支持。总统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指靠我。"[④]

2月1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和美国驻捷大使斯坦哈特先后抵达布拉格。斯坦哈特一下飞机，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信贷。他还向记者声称，他坚信共产党人统治政府的丧钟敲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国建立紧密联系，布拉格政府"将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直接参加欧洲复兴计划"。接着，他同一些右翼政客接触，向他们保证美国政府对他们同"共产主义毒蛇"进行斗争给予真挚的同情和广泛的支持。当晚，在一个中立国家大使馆的招待会上，斯坦哈特公然声称，当前的政府危机"将提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美国的威信。遗憾的是，它没有在一年前发生"。[⑤]

①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②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③ *Орлик И. И.（отв. ред.）*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Том1，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2，с.221.

④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86.

⑤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с.90－91.

而佐林的造访相对比较低调。他一下飞机就说自己此行是为了检查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供应小麦的情况，并参加捷苏友好会议。显然，以佐林的身份，如此任务显得微不足道。佐林在机场接见了捷副外交部长克列门蒂斯，随后就去探望有病在身的马萨里克。佐林同马萨里克交谈不多，只是告诉他斯大林对他完全信任。同时要求他理解苏联的立场，苏联政府不能不参与捷克斯洛伐克各政党之间的争斗。会谈结束时，他以生冷的语气说："我们对你们国家发生的事件非常担心，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佐林在捷交通部长那里的讲话更为直接，他对交通部长秘书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危机非常严重，苏联政府不知道贝奈斯总统持何态度，要知道，事实上他处于同"人民的意志"相对抗的状态。佐林非常惊讶总统不明白最简单的道理——苏联是站在哥特瓦尔德一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方的。[1]当天，佐林就同哥特瓦尔德举行了会谈。佐林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要坚定些，不能向右派让步，不能动摇。"[2] 在佐林看来，哥特瓦尔德无疑是领会了他的意图的。[3]

哥特瓦尔德指定的 2 月 20 日政府会议没有召开，因为非共产党部长都拒绝参加会议。他们致信哥特瓦尔德说，在政府 2 月 13 日决定未得到执行的情况下，三个政党的部长就不能参加会议。当天，捷政府中的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 12 名部长向贝奈斯总统递交了辞呈，同时也向哥特瓦尔德总理通知了这一情况。[4]

在三个右翼政党的部长递交辞呈后，佐林同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再次举行了会谈。佐林在会谈后向莫斯科汇报说，当他提醒捷共领导人"必须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可能要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中的一些空洞条文"时，"我感觉到他们非常害怕。哥特瓦尔德说，他们暂时不能去反对总统，但是，如果他们不得不反对他，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回答说，他夸大自

---

①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с. 105 – 106.

②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Ⅰ, с. 551, 注释 1。

③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с. 57.

④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 年 2 月 27 日。АВПРФ, ф. 21, оп. 2, п. 25, д. 397, л. 21 – 25,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Ⅰ, с. 539 – 551。

己的困难是没有意义的，总统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他们的支持。哥特瓦尔德似乎表示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但是，他想让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动荡地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仍然控制着他”。哥特瓦尔德还提出，如果驻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苏联军队开始朝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推进，就可以对贝奈斯和所有右派产生影响。他请求佐林把这一要求报告给莫斯科。我答应转达。[①] 莫洛托夫答复佐林说，2 月 22 日，《真理报》将发表对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的评论文章，这样做是可以的，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移动一事，这是不合适的。此外，佐林还得到指示，不要单独去拜访贝奈斯，代表团成员也不要拜访朋友。[②]

当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制定了如下行动方案：不能让全体内阁成员都辞职，同时，给反动派部长返回内阁设置障碍，维持民族阵线的存在，用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新人补充进入内阁，发动群众支持这一计划。主席团还讨论了关于筹备工厂委员会和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于 2 月 21 日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在集会上将发表关于政府情况的演说。在广播演说中，将把三个政党联合定性为反人民、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集团，其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把政权转到反动派手中。[③]

2 月 21 日，布拉格天气奇寒（零下 25 度），约有 10 万名布拉格市民聚集在老城广场。集会参加者声明：“我们要共和国总统坚决接受部长——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成员——辞职，他们试图以自己不负责任的行动改变民族阵线，已经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④] 集会一小时后，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内务部长诺塞克拜会了总统，向他转达了大多数劳动人民关于接受三个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问哥特瓦尔德：“如果我不接受辞呈呢?”哥特瓦尔德随即以总罢工相威胁，还意味深长地说：“这里还有苏联呢。”贝奈斯表示要同这三个政党的部长谈一谈，同时他希望共产党能同这三个政党达成协议。[⑤]

---

①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51, 注释 1。

② 莫洛托夫致佐林的电报，1948 年 2 月 22 日收到。АВПРФ, ф. 048, оп. 57, п. 478, д. 2, л. 134,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52, 注释 3。

③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ом 2, с. 67.

④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Том1, с. 222.

⑤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39 ~ 551, 注释 3。

贝奈斯采取了拖延策略，希望能出现转机。他连续同哥特瓦尔德和其他政党的代表进行谈判。捷共决定进一步向贝奈斯施加压力。2 月 22 日，在布拉格召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工厂委员会和工联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明说："为了尽快实现我们的要求，支持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于星期二召开代表大会，2 月 24 日在国内所有工厂举行 1 小时总罢工，交通中断 5 分钟。"①

2 月 23 日晨，美、法驻捷使馆人员同贝奈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他们转达了上司的指示，要贝奈斯"不退让，要顶住"，并答应西方马上给予支持。② 西方的支持没有到来，而捷共却继续加强攻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别的行动委员会和人民武装警察队伍。在民族行动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发表了演说，公开表明了军方支持共产党的态度。③ 哥特瓦尔德和诺塞克面见总统，要求他接受 12 名部长的辞职要求。贝奈斯坚持政府应该与辞职的部长重新进行谈判。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已经准备好了新政府候选人名单，政府将在肃清民族阵线中的反动派后重新组建。总统拒不接受这个建议。稍晚些时候，贝奈斯接见了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领导人，总统让他们相信，他不允许组建没有全部政党参加的政府。贝奈斯鼓励他们说："我再一次重复我告诉过你们的话。我将要像 1938 年 9 月一样行动。我决不投降，请你们相信这一点。"④

2 月 24 日 12 点，捷共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大罢工，大约有 250 万工人和职员参加。群众高呼"哥特瓦尔德新政府万岁！""要求反动部长辞职和批准新的民主政府！"一小撮追随国家社会党的大学生进行示威，但被布拉格工人纠察队驱散。这时，国防部和内务部揭露出国家社会党正在筹备反政府的武装叛乱，目的是让辞职部长恢复权力，随后在布拉格 12 区进行逮捕。面对危机，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人民党召开会议，党内反对制造"政府危机"的人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国家

---

①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 – 1953, Том1, с. 539 – 551, 注释 3。

② Хроника февральских дней 1948 года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 143.

③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с. 106.

④ Josef Korbel, *The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Czechoslovakia, 1938 – 1948: The Failure of Coexist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29.

社会党人、议员什列赫塔和奈曼宣布脱离国家社会党，并向全体党员发表呼吁书。当天晚上，捷共中央决定，如果2月25日总统不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2月26日将组织全国范围的总罢工。[①]

2月25日，布拉格举行了20多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民武装警察也列队游行。上午11点，捷共代表向贝奈斯递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并要求他当天作出决定。下午4点，贝奈斯签署了接受国家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部长辞职的命令和任命哥特瓦尔德建议的新政府的命令。此时，贝奈斯已是重病缠身。二月事件后，贝奈斯在给西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在关键时刻，我孤立无助，当需要采取积极行动的时候，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性和坚定性。"[②]

2月27日，新布拉格政府宣誓就职。与第一届内阁相比，无论从组成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共产党都拥有了绝对控制权。24名部长中有11名共产党人，3名社会民主党人，2名革命工运代表。清洗了反动派后的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各获得2个部长职位，非党人士获得2个部长职位。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执委会也进行了重组，15名成员中有11名是共产党人。[③]

3月10日，哥特瓦尔德向司法委员会提交了政府纲领。纲领致力于完成建设纲领中未完成的任务，以及实现由捷共提出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主张。5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新宪法，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实行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一个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均享有平等权利的统一国家。6月7日，贝奈斯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④]

美国和英国事先都预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但在外交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表明西方尽管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右转，但恪守同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原则，他们不想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2月26日，美、英、法政府对布拉格二月事件发表了一项奇特的声明：

---

① 诺维科夫关于捷政府危机升级的报告，1948年2月27日。АВПРФ，ф.21，оп.2，п.25，д.397，л.21－25，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Том1，с.539－551。

②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2－73.

③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

④ 参见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Том 2，с.76、78－81。

"美国、法国和英国政府注意到了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威胁到所有民主国家都信奉的自由生存原则的事件。他们注意到，以人为的和蓄意制造的挑衅性危机为手段，使用一些在其他地方实行过的某些方法阻止了代议制的自由，实现和建立了打着民族统一招牌的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他们谴责其结果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说只能是一种灾难的事件的发生，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时期曾经再次表明它忠于自由事业。"[①] 这一宣言不仅遭到莫斯科的否定，就连西方国家的报刊对西方三国在布拉格事件中的立场也提出了指责。2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危机被一些报刊和政治家看作是新的慕尼黑、苏联扩张的威胁，前途一片黑暗正等待着美国。"[②] 4 月 30 日，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斯坦哈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辩解，他说："1943 年的苏捷条约就意味着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对捷事务进行积极的干涉，美苏就会爆发战争。"他建议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道义上的支持，缩减与捷的贸易规模，制定在捷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③] 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快了西方军事集团的组织化进程。3 月 17 日，在美国的号召下，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以此为标志，美苏冷战开始步入军事集团对抗的阶段。

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是贝奈斯所倡导的使捷克斯洛伐克充当"东西方桥梁"的观念的失败。贝奈斯幻想让捷克斯洛伐克在经济上保持同西方的经济往来，在政治上充当东西方的调节角色，在军事上同苏联结盟来防范德国威胁，这一理论实践存在的外部条件是苏美英反法西斯盟国战后能够维持合作，内部条件是吸收共产党进入政府共同承担国家责任，而外部条件是内部条件的基础。1945 ~ 1947 年期间，苏美在形式上维持着合作关系，为捷克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政党同共产党合作创造了外部基础。同时，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也需要持不同政见者

① *FRUS*, 1948, Vol. 4,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 738.

② Центрально-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ека, ТомⅠ, с. 225.

③ *FRUS*, 1948, Vol. 4,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p. 738.

彼此合作。当美苏冷战格局形成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也就结束了。于是，世界向两极世界体系发展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而归属苏联势力范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左转的关键因素。在俄国学者波普看来，贝奈斯最大的悲哀在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是在东西方之间，而是在德俄之间”。[①]

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的具体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把自己的意图明确转达给捷共领导人，利用对法共和意共的批评训导走议会道路的危险，暗示捷共不要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在布拉格政府危机的关键时刻，莫斯科担心捷共不够坚定，又派遣佐林前往布拉格进行监督。文献表明，莫斯科拒绝了哥特瓦尔德关于苏联驻德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动的请求，仅以《真理报》发表对捷政府危机的声明提供精神支持。[②] 有了东欧其他国家共产党夺权斗争胜利的经验，莫斯科有理由相信捷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左转，东欧各国共产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向敌对势力展开进攻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苏联对东欧政策调整的完成。此后，按照莫斯科教导，并以派遣专家顾问的方式，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至此，东欧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

---

①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1941 – 1947 гг., с. 114.

② 苏联情报军官苏多普拉托夫在回忆录中提供了一条关于苏联在布拉格事件中发挥具体作用的新资料，他写道：“在 1948 年贝奈斯政权向哥特瓦尔德政权过渡的前夕，莫洛托夫把我召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命令我去布拉格与贝奈斯秘密会见，并建议贝奈斯体面地离职、把政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袖哥特瓦尔德。……我们于 1948 年 1 月乘火车来到布拉格。……我们的特殊使命小分队——400 名换了便装的人——已经在布拉格了。这一批人被暗地里分派到各处去支持和捍卫哥特瓦尔德。”根据苏多普拉托夫所说的，他的同伴祖博夫成功地在贝奈斯的官邸里与贝奈斯会见了 15 分钟，并向贝奈斯表示：“国家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不取决于现在的领导人是不是会保留下来，但是，他认为，贝奈斯是唯一一位能够保证政权平稳地不流血地转交的人。”（*Судоплатов П.*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 Москва: Гея, 1996, с. 277 – 299）捷克学者瓦连塔对这则史料提出质疑，因为在 1948 年 1 月总统办公厅会客簿中不曾登记过一位带俄罗斯姓的造访者。俄国学者穆拉什科对瓦连塔的观点评价说：“可以赞同或者不赞同瓦连塔对苏多普拉托夫所写书的批评态度，要知道像苏多普拉托夫和祖博夫那样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安排与贝奈斯的秘密会晤，从而绕开了总统办公厅。”（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 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 57）

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博弈：苏联与战后对朝鲜的托管政策

北京大学　董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朝鲜实施国际托管的政策，最早是由美国提出的。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华盛顿官方和亲官方的科学界、新闻界就开始宣扬建立在美国保护下的国际托管体系。美国的活动家坚持要把朝鲜列入这个托管体系，因为他们认为朝鲜人民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独立管理自己的国家。自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开始，经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的一系列协商，朝鲜托管政策终于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正式确定。而莫斯科协定中的“四强托管”在实际执行时则演变成美苏两国对朝鲜的托管。

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到确认，再到实施，苏联始终参与其间。为了建立远东的“安全据点”，苏联在朝鲜半岛的角色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即由托管政策最初的接受者、合作者，转变成朝鲜托管制的坚定执行者。苏联对于托管政策的态度及实施，既反映了其对朝政策的变化，也是苏联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和研究苏联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如何认识对朝鲜的托管政策并加以实施的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朝鲜半岛问题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及苏联战后的远东政策，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目前国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中国，尽管有关于朝鲜问题的档案文献陆续问世，但对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多是作为战后美国对朝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而以苏联为中心的朝鲜托管政策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① 西方关于战后朝鲜托管政策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过，由于利用的主要是当时解密的一批美国外交文件，因此其研究对象也是以美国的政策为中心的。② 作为托管政策的直接对象和实施地，韩国学者以朝鲜托管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较多，但研究的角度或者聚焦于以托管政策为中心的美国对朝政策及美国军政府在朝鲜南部的统治，或者集中于托管政策与当时朝鲜南方政局间的相互作用，而对苏联在托管政策实施中的角色则很少涉及。③ 在90年代中

① 有关的中文文献有《朝鲜问题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2；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3卷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本，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相关的研究成果见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美国研究》1991年第2期；王春霞《杜鲁门政府对朝政策及朝鲜的分裂》，《丝路学刊》1993年第4期；王媛《美国对朝占领政策述评》，《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6期；余伟民、周娜《1945～1948年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政治变动》，《史林》2003年第4期；张民宪、萧石忠《1943～1950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所谓美国档案主要是指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的系列文件。西方的研究成果可见 William George Morris, "The Korean Trusteeship, 1941 - 1947: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Ph. D. dissertation,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1974;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 - 194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James Irving Matray, *The Reluctant Crusad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Korea, 1941 - 194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③ 崔相龙，《美軍政의 初期占领政策：信托统治案과 分割占领의 现实》（美国军政初期的占领政策：托管制与分割占领的现实），《서울평론》（서울），제40 호，1974 년 8 월 15 일，pp. 14 - 26；崔相龙，《미군정의 초기점령정책 연구》（美国军政的初期占领政策研究），《고대문화》（서울），제22 호，1983 년，pp. 120 - 128；崔相龙，《美军政期 韩国의：아시아 冷战의 초점》（美国军政时期的朝鲜：亚洲冷战的焦点），《한국사회연구》，제1 호，서울：한길사，1983，pp. 351 - 367；李东炫，《韓國信託統治研究》，서울：평민사，1990；李愚振，《独立运动에 대한 美國의 태도：루즈벨트 行政府의 信託政构想을 中心으로》（美国对于独立运动的态度：以罗斯福政府的托管制构想为中心），韩国政治外交史学会（编），《韩国独立运动 과 列强关系》论议 第2辑，서울：평민사，1985；李完范，《한반도 신탁통치안과 국내정치：1943 - （转下页注）

期大批俄国档案解密之后，韩国也缺少跟进性的研究成果。总之，目前学术界以苏联为主体的有关对朝鲜实行国际托管政策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

本文拟利用最新披露的一批以俄罗斯国防部档案中心所藏档案为主的俄文文件，同时结合其他中、英、俄第一手材料，在综合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二战后朝鲜托管政策提出到执行的过程，特别是苏联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梳理，从而对朝鲜分裂悲剧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究。①

一　战后对朝鲜托管政策的提出与苏联的反应

美国托管政策构想的提出及苏联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浪潮再次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

最早对战后殖民地处置问题进行思考的是美国。作为《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发起国之一，美国需要维护其支持民主和民族自决的一贯立场，避免被指责继承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衣钵。因此，美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传统殖民主义的方法实行统治。但同时，美国基于其在西半球及远东地区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有必要在战后控制一定的殖民地及委任统治地区，以维护美国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政府认为，法西斯战败后，其占领的许多地区将出现“权力真空”，那里的人民按照美国的标准，尚不具备独立和自治的能力，如不加以控制，将会导致持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会因大国的介人而引起国际冲突，其结果势必会影响这一地区的稳

（接上页注③） 1948》（朝鲜半岛托管制与国内政治：1943 - 1948），연세대 대학원 정치학 석사논문，1985；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 研究》（莫斯科托管协定与朝鲜半岛政治变化相关的研究），东国大大学院 정치학 박사논문，1987；申福龙，《한국 신탁 통치의 결정 과정에 관한연구：미국의 구도와 변질을중심으로》（朝鲜托管政策的决定过程研究：以美国主导与变化为中心），한국정치학회세미나논문，1993；沈之渊，《미-소공동위원회연구》，서울：청계연구소，1989。

① 本文使用的俄文档案文献及其中译文，均由沈志华老师提供，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定，危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罗斯福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托管制度的构想。①

美国提出的托管制构想很快引起苏联的关注。对于托管制，苏联的态度是矛盾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苏联认为托管不过是殖民地宗主国为掩盖及维护殖民权益行径而构想的资产阶级统治机构，因此对托管制本身是持反对立场的；但从国家利益层面来看，苏联为了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在针对托管制进行讨论的国际会议中又采取了积极参与和合作的立场。苏联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由于苏联没有殖民地及占领区域，因此莫斯科需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使殖民地既脱离原殖民国家，又能让自己参与到该地区政治事务中。纵观 1943～1945 年期间苏联在托管制问题上的立场，将托管原理作为苏联在殖民地使其主张及影响进一步合法化的手段，为实现苏联的国家利益而被苏联很好地加以利用。②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早就意识到战后朝鲜接受外部势力间接统治的必要性，1942 年 2 月 20 日美国国务院官员兰登在其所递交的报告书中就明确指出："朝鲜独立过程中的难题很多。朝鲜国民在 37 年中缺乏统治经验及自主国防相关的意志。此外，接受过现代经济组织及管理等相关培训教育的人寥寥无几。一般来看，等朝鲜人自己具备统治及防御能力时，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此期间国际保护及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由于国内情况不佳，独立须借助外部力量。"③

1943 年 3 月，罗斯福在白宫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盘托出了对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委托统治地和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设想，其中关于战后朝鲜的前途问题，罗斯福明确提出由美中苏三国实行托管。④ 相关内容在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于 1943 年 4 月 2 日发回的外交文书中也有所反映："朝鲜问题，英、美军认为应独立，但暂时须由同盟国负

① 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 50 页。

② 参见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研究》，pp. 27－28。

③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 Group (RG) 59, 895. 01/79, "Memo," Feb. 20, 1942. Gregory Henderson,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72，转引自李在都《모스크바信托统治协定과 韩半岛政治变化에 관한研究》，pp. 31－32。

④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 658 页。

责监护之责。”①

于是，战后朝鲜将由大国托管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对于强烈渴望独立的朝鲜人民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朝鲜的政党及团体纷纷对此表示反对，并寄希望借助苏联力量阻止托管制在朝鲜的实施。1943 年 5 月 10 日，由流亡在重庆的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党、朝鲜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朝鲜妇女爱国者联合、朝鲜青年联合发起的自由朝鲜人民群众大会主席团给斯大林写信，向斯大林表达了朝鲜人民要求独立、反对托管的诉求：“一、为保障我们的人民永远生存和全人类真正的和平与幸福，我们要求完全独立。二、我们坚决反对战后对朝鲜进行所谓国际托管或监督的任何建议，因为这不仅违背我们的意愿，从战略的观点观之也不利于对日作战的事业，并且违背罗斯福—丘吉尔宣言的精神。”②然而在目前公布的相关文档中，并没有找到苏联或斯大林本人对此信的回应。笔者推测其原因，许是当时苏联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力求借托管制以扩大其在殖民地影响力，因此在处置战后殖民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主张。总体而言，在美国提出托管政策的构想后，苏联基本采取了一种默认接受并且试图参与合作的态度。

战时国际会议对朝鲜托管政策的讨论

1943 年 11 月 22 ~ 26 日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议了划分日本殖民控制权的问题，但对朝鲜的控制权问题却采取了搁置态度。会议最终的“开罗宣言”仅就战后朝鲜的独立发表了一个原则性声明，而没有提到托管问题。③ 开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之所以回避战后托管朝鲜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本着合作的立场，认为在托管问题上需征求苏联意见，并寻求苏联的合作，而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在托管问题上还未与苏联进行沟通。

开罗会议结束后，为及时与斯大林商议开罗会议结果，罗斯福与丘吉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 159 页。

② 旅居中国的朝鲜政党和团体致斯大林信，1943 年 5 月 10 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0，оп. 30，п. 225，д. 9，л. 61 – 62。

③ C. L. Hoag，한국분단보고서（상），申福龙、金元德옮김，서울：풀빛，1992，p. 35。

尔随即前往伊朗。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开会。在11月30日下午的三方见面会上，丘吉尔主动就拟发表的开罗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宣言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回答说，他看过了内容，他完全赞同这个宣言及其全部内容，虽然他现在不能做出任何承诺。斯大林强调，朝鲜应当独立，满洲、福摩萨（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应当归还给中国，这都是正确的。① 德黑兰会议期间，尽管没有发表任何有关朝鲜问题的书面宣言，但美苏两国首次就朝鲜独立达成口头共识，并且在托管制问题上，罗斯福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并获得了斯大林的首肯。

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中，苏联和美国第一次就战后托管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正式而原则性的协商。2月8日下午，罗斯福与斯大林在利瓦吉亚宫举行会谈，罗斯福主动提出，希望同斯大林讨论托管问题。罗斯福称，他考虑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中国三国代表共同托管。罗斯福说，美国对此类事件的唯一经验是菲律宾，总共费时约50年，菲律宾人民便可组成自主政府。他想，朝鲜可能要费时20~30年。斯大林说时间越短越好，并询问是否将有外国军队驻留朝鲜。罗斯福作否定答复，斯大林表示同意。②

从斯大林与罗斯福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认为，朝鲜人民还不具备自我管理能力，因此需要长期监管，而这一期限不少于20年。苏联原则上没有反对建立托管体制，但强调托管是短期的，且“越短越好”。有苏联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反对托管朝鲜，是因为苏联对托管这个概念的理解完全与美国不同：苏联是将监管看作全面帮助朝鲜人民获得民族独立的一种方式，使朝鲜在准备自我管理时不受外界干扰。实行苏联概念下的这种监管，将有助于朝鲜培养民族干部，建立民主机构，并相应的加速国家完全独立的进程。③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在笔者看来，苏联之所以认同托管制的原因在于：一来苏联渴望通过托管朝鲜这一案例，“分享”欧

① 《德黑兰 雅尔塔 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57~58页。

② [illegible]

洲及亚太其他托管区域的参与权；二来苏联也有信心对朝鲜实施影响，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

雅尔塔会议虽然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托管制的地区案例，实际并未对战后朝鲜处置问题作出确切承诺。罗斯福在会谈中谈到战后可能要托管朝鲜，只是为了向斯大林解释托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说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托管的原则。而斯大林对托管制的口头认可，则被罗斯福视为战后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某种口头声明。

1945 年 7 月 17 日到 8 月 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最后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在讨论远东地区对日作战、赔款等问题时，苏联主动提及朝鲜问题，然而美国却没有给予回应。据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后来回忆："在我同斯大林和英国首相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上，莫洛托夫曾经提到朝鲜问题，但没有进行讨论。"[①] 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为防止苏联借参加对日作战机会要求在"处理朝鲜事务中占主要地位"[②]，美国国务院和军部曾分别向杜鲁门提交报告，建议将朝鲜作为"联合国属下的托管地"[③]，"加紧要求实行托管，在托管期间，至少要有一批象征性的美国军队或海军陆战队驻在朝鲜"。[④]

然而出于减少美军伤亡、早日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杜鲁门政府急于取得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因此在远东事务上，杜鲁门对落实托管朝鲜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避免因朝鲜问题引起苏联的反感。反倒是苏联人主动打探起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在波茨坦，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告诉马歇尔将军，苏联在对日宣战后将进攻朝鲜。他问美国是否可以为配合这个进攻，在朝鲜海岸实施军事行动。马歇尔告诉他说，在日本未被摧毁，日本在南朝鲜的军事力量未被消灭以前，美国不准备对朝鲜实施两栖作战。[⑤]

---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 - 1953）》，李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 370 页。

② *FRUS*, 1945, vol. 2,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 313.

③ *FRUS*, 1945, vol. 2,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p. 313.

④ *FRUS*, 1945, vol. 2,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p. 631.

⑤ 施纳贝尔：《美国兵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第二卷，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第 9 页。

从战时会议美苏交涉朝鲜问题的情况来看，美苏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种相互合作而避免刺激对方的态度。罗斯福本着与盟国协商解决战后殖民地的原则提出托管制，并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实施托管制，也是由于美国自恃战后实力雄厚，坚信能将托管控制在可操控的范围内，从而占据更多的主动权。美国在托管朝鲜问题上寻求苏联的首肯和合作，是希望借托管制减小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防止朝鲜被一国单独控制。苏联在托管朝鲜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也让美国进一步信心大增，将托管制视为战后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方案。

二　对朝鲜托管政策的确立与苏联占领北朝鲜

苏联对日作战与三八线划分

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明确表示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是恢复日俄战争前沙皇俄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波茨坦会议上，苏联继续重申对日作战立场，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兵日期。1945 年 8 月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局势发生突变，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在远东的地位。在中苏谈判尚未结果，参战的政治条件尚未得到明确保证的情况下，苏联宣布 8 月 9 日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苏联总部制定的对日作战方针规定，苏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日本的关东军，"把中国东北和北朝鲜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攻取南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为执行这一方针而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东北西三个战略方向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纵深推进，分割关东军的主要战略集团，担任东线作战的苏远东第一方面军在中朝邻接地区采取的作战行动是辅助性的，目标是控制这一地区，切断日军向朝鲜撤退的通道，为尔后向朝鲜推进创造条件。[①]

8 月 9 日、10 日两天，由列麦什科空军中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对雄基、罗津和清津进行密集轰炸、扫射，摧毁了日舰和岸上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鱼雷艇也向日本的港口和基地实施了突击。在太平洋舰队

① 马·瓦·扎哈罗夫编《结局（1945 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历史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72，第 88、90、91 页；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第 39、45 页。转引自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 54～55 页。

的协助下，苏联第25集团军在8月10日占领了庆兴市，并开始追剿沿朝鲜东海岸的道路撤退的敌人。太平洋舰队司令尤马舍夫海军上将做出决定并经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同意：部队在罗津和清津登陆。[①]

8月10日，苏军进入朝鲜半岛，与此同时，美国离朝鲜半岛最近的部队还在数百公里外的冲绳岛。面对大批苏军正“涌进”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心急火燎地责令陆军部当天提出一项关于堵住苏军南下的办法。8月10日至11日深夜，陆军部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即与助理国务卿邓恩、海军部高级官员巴德等人在五角大楼麦克洛伊的办公室里连夜举行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会议。会上，国务院代表出于政治考虑，提出“美国军队应赶到尽可能北面的地方去受降”，但是军方认为，由于“面临着缺乏立刻可资调遣的美国部队的局面，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因素，这些都会使美国部队很难抢在苏军之前抵达北部纵深地区”。[②] 于是麦克洛伊就紧急命令迪安·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上校到隔壁房间去搞出“一条尽可能向北推进”但又不致“被苏联拒绝”的界线，换言之就是一个既能满足国务院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衷方案。就在这样匆忙的会议上，腊斯克提出了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分界线。[③] 腊斯克和博尼斯蒂尔选中三八线，是因为他们认为把朝鲜首都汉城划入美国部队的受降区是很重要的。[④]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给斯大林发出密电，通报了已经由他批准的给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的“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的内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了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8月16日，斯大林复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对命令的内容”，对于有关朝鲜分界线的问题也没有提出异议。9月2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总命令第一号”，其内容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驻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

① *Ачкасов В. 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 – 1945, Том 11, Москва: ВИМО СССР, 1980, c. 276 – 277.

② *FRUS*, 1945, Vol. 6,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 1039.

③ *FRUS*, 1945, Vol. 6,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p. 1039.

④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9页。

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朝鲜、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①

苏联第25集团军进入朝鲜后，进展迅速。8月19日进驻平壤，8月23日越过三八线南下到达开城。8月24日，苏联空降兵在咸兴和平壤登陆。登陆之后，部队马上开始接受这些城市中的日本驻军的投降。同时苏军地面部队继续向南推进，解除日本军队、宪兵队和警察的武装。8月底，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全境得到解放。② 当受降命令传到战地时，分兵进击的苏联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正沿着公路向汉城运动。但他们一接到关于分界线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③ 9月8日，美第24军在仁川登陆，随后不久，军长霍奇中将即接受了三八线以南的日本部队的投降。三八线作为美苏两国在朝鲜受降和实行军事占领的分界线便被明确地规定下来，朝鲜半岛形成美苏分区占领的格局。

美国提出三八线的原因，杜鲁门的解释是"日本战争机构的突然崩溃，在朝鲜造成了真空局面，我们提出三八线，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在那里没有军队，没有可供我们部队在这个半岛的南半部好几个地方登陆的船只。美国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鉴于斯大林已经同意共同托管的主张，我们希望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两部分只是为了便于接受美国投降，随后再使整个半岛受到共同的管制。"④

如果说美国仓促提出的以三八线划界的建议是出于限制苏联在朝鲜半岛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考虑，那么斯大林痛快地接受三八线的方案，却令美国人惊诧不已。苏联的举措固然表示了一种继续谋求与同盟国合作的态

---

① 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第262－264页；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中共军参战及联合国军重新反攻》，固城等译编，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第23页。

② *Ачкасов В. 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с. 282.

③ 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第10页。

④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0页。

度，但更重要的原因确如沈志华教授所说：斯大林的目的在于用出让对朝鲜南部的占领来换取苏联对日本本土的占领权。①

苏联对北朝鲜的占领政策

苏联自8月10日进入朝鲜境内后，在逐步清除日本殖民势力的同时，着手恢复城市秩序及企业和机关的工作，但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对北朝鲜的占领政策。

直到9月20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给执行占领任务的第25集团军发去密电，苏联才算有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对朝占领政策："1. 不要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2. 帮助北朝鲜在广泛联合各抗日民主政党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3. 不要干涉在被红军占领的朝鲜各地区建立抗日民主团体和政党，并在他们的工作中向他们提供帮助。4. 向当地居民解释清楚：红军进入北朝鲜，目的是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而不是为了在朝鲜实施苏联的制度，也不是为了获取朝鲜的领土。"② 斯大林的这个指令非常清楚地表明，苏联并不要对朝鲜实行长期占领，该指令成为驻北朝鲜苏军指挥部活动的原则基础。

为根除北朝鲜日本殖民势力③的影响，帮助北朝鲜建立民主政府，苏联从一开始就通过朝鲜人来管理地方政府，1945年8月25日，"朝鲜人民执行委员会"成立。在苏联军队占领北朝鲜的头几个月中，各级人民委员会被赋予很大权力，提出诸如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等计划。"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多精力充沛、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热情，但他们没有从事行政工作的经历、缺少领导经验，还不能找到解决朝鲜面临重要问题

①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35~36页。

②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中心），ф. 66，оп. 178499，д. 4，л. 632~633。该指令的前两条最明确地突出了苏联在占领朝鲜初期的基本原则，但在1981年公布时这两条被删节了。见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отв. редактор*）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народной Кореей 1945~1980，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1，с. 13。

③ 与美国人在南部地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相对比，北部的情况对苏军来说是较为有利的。首先，苏联在推进占领进程中马上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了控制权。其次，苏联没有关于处置日本官员的问题。在苏联对日宣战后，所有比较重要的日本人，不是早已住在南部地区，就是已经从北部逃往南部。详见 F. C. 琼斯、休·博顿、R. B. 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语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645页。

的有效方法。”①

为了解决朝鲜人行政能力欠缺的问题，第25集团军司令奇斯佳科夫向时任滨海军区司令的梅列茨科夫元帅提出建议，建立一个特别机构来负责内政事务，奇斯佳科夫认为：“我们对朝鲜民众的生活状况知晓越多，沉重感就越强烈。我们为可怕的贫穷、无安身之所、文盲众多和瘟疫不断所震惊。经过对朝鲜现状的研究，我们认为解决这项民事任务远比行军打仗困难得多，国家生活建设需要时间和有经验的领导者。我和我的同事毕生从戎，对处理这些问题并无准备。应当创建支持朝鲜人民的专门机关。”②

在奇斯佳科夫的建议下，苏联于1945年9月在北朝鲜成立了由罗曼年科主持的民政局，主管北朝鲜民事工作。③ 苏联民政机关局的职能是向新成立的朝鲜各人民委员在恢复国民经济、组织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安排好朝鲜人民的文化生活方面提供帮助。苏联民政局机关的人员是来自第25集团军的军官，这些军官具有各种民事和军事专业知识，建立了一系列的处：工业处、当地居民工作处、出版处、文教处、司法处、医疗管理处、农业处、通讯处、财政处、军事通信处等。④“在这个集体中，为朝鲜建设投入巨大精力的苏联军官和文职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日常同朝鲜同志交往，总是表现得极为主动、有坚定的信念、扶持朝鲜朋友尽快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残余、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活”。⑤

这样，到1945年年底，北朝鲜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就由苏联军事指挥部通过各地方的自治机构实施领导：在里是里长，在面和郡是人民委员会，在市是市政委员会。⑥ 人民委员会是在各民主团体协议的基础上成

①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с. 99.

②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 с. 51 - 52.

③ 苏联民政局成立时间说法不一。1945年9月之说，参见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 - 1950 - 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 145。1945年10月的说法，见 Lee In Ho, 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 *Korea Observer*, 1992, Vol. 23, №4。本文经比较后选取了1945年9月的说法。

④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 - 1950 - 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 145 - 146.

⑤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оре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и статьи, с. 94.

⑥ 朝鲜的行政区划分为道（相当于省）、市、郡（相当于县）、面（相当于乡）、里或洞（相当于村）。

立的。整个6个道的人民委员会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苏联军事指挥部审批的。当局的这些地方机构的总人数有1万多人。第25集团军司令员拥有一名民政管理方面的助手，其下设有一个不大的机关（50名军官），负责领导民事方面的工作，在每个道派有全权代表，在各个市和郡都驻有军事警备司令部。在北朝鲜境内，还成立了10个负责某些经济和行政部门工作的单独的部，隶属于第25集团军司令员，这些部的负责人都是朝鲜人，但是，如同在每个道人民委员会里那样，这些部都驻有苏联军事指挥部的代表。①

尽管苏联在占领北方的几个月内，便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在苏军民政局支持下由朝鲜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但斯大林真正关注的是未来的朝鲜统一政府的性质，考虑到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利益，苏联的基本要求同其战后对其他周边国家一样，就是要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使其不致成为一个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② 于是，在朝鲜培养亲苏干部、选择政府领导人即成为苏联占领工作中的又一重要环节。正如1945年12月一份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军区和第25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应该更加关心关于选拔和培养对苏联友好的、并能够确保加强我们国家在朝鲜政治地位的新民主主义干部的问题。"③ 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在另一份报告中也提到，"我们主要的任务是采取措施使朝鲜政府成员和工作性质有助于使朝鲜成为我们在远东的一个安全据点，使朝鲜不变成某个对我们不友善国家手中的反苏工具。"④

当时北朝鲜境内的主要党派有以朴海南、金元凤为首的共产党，以曹晚植为首的民主主义党和以金策为首的社会民主党。⑤ 苏联最终选择了一个北朝鲜境外的政治集团——在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服役的金日成和其战

① 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1945年12月），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1页。

② 参见 Lee In Ho, The Soviet Military Government in North Korea, *Korea Observer*, 1992, Vol. 23, №4, p. 523；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1～48页。

③ 关于北朝鲜政治局势的调查报告（1945年12月），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5页。

④ 马立克关于建立朝鲜统一政府的报告（1945年12月1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9页。

⑤ 北朝鲜政治党派的具体情况详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42～43页。

友们。[1] 1945 年 9 月中旬，在第 25 集团军的帮助下，金日成率领少数朝鲜人乘“普加乔夫”号船从海路自海参崴到元山港。[2] 金日成佩戴着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 1945 年 8 月 29 日授予他的红旗勋章。[3] 回到平壤后，金日成担任该市的副警备司令；他的战友分别担任北朝鲜各道、各郡的相应职务。根据远东军区司令 1945 年 10 月 12 日命令，第 88 旅被解散。[4]

苏联支持金日成和他的战友们，是因为这些曾经在苏联战斗过生活过的朝鲜人主观上亲苏，回国后能成为苏联政策的积极传播者。为了树立金日成威信，所有部署在北朝鲜领土上的苏联军队的政治部、政治处都在为将其树立成“朝鲜人民的传奇英雄、争取朝鲜自由和独立的斗士”而开展工作。[5] 1945 年 12 月起金日成领导北朝鲜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从 1946 年 2 月开始领导临时人民委员会，一年后领导国家的人民委员会。[6]

从苏联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占领政策来看，苏联是克制的，目标仅是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其所有占领行动均未越过三八线，并且从一开始苏联就试图淡化其军事占领的色彩，避免在朝鲜建立苏联政府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而是通过成立人民委员会让朝鲜人自己来管理。此时，苏联依然持与美国合作的态度，力图避免和美国发生冲突。

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朝鲜托管协议

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实施分区占领原本只是暂时性的受降举措，但却对南北朝鲜的政治、经济、生活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分裂影响，为此，美国政府提议朝鲜统一问题应由美苏两国共同商议解决。1945 年 12 月的莫斯

---

① 第 88 独立步兵旅是一支侦察破坏部队，隶属于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第 88 独立步兵旅各部队和分队的人员中有中国人和朝鲜人，还有中国出身和朝鲜出身的苏籍公民。独立步兵旅的人员按照苏联方式装备并成为红军军队的一个部分。第 88 独立步兵旅的旅长是周保中。其中一个营的战士主要是朝鲜人，包括金日成（金成柱）、姜健（姜信泰）、崔庸健（崔石泉）、金策（金天民）、崔贤、安吉、金一、崔用珍、金光侠、徐哲、许凤学、崔忠国等。

② 另一个说法是：金日成一行乘坐第 25 集团军后勤铁路快车回国。见 1993 年 7 月 27 日俄国《独立报》。

③ ЦАМОРФ，ф. 238，оп. 1589，д. 6，л. 86 – 90.

④ ЦАМОРФ，ф. 2，оп. 12378，д. 1，л. 68 – 69.

⑤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 – 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 – 1950 – 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с. 149 – 150

⑥ ЦАМОРФ，ф. 142，оп. 429025，д. 1，л. 1 – 3.

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美苏在会议上表述了各自的立场。

12月16日第一次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首先提到朝鲜问题，他把哈里曼大使11月8日给莫洛托夫的一封信的副本交给了其他外长，在这封信里面，哈里曼请求授权驻扎在朝鲜的苏军司令官同美军司令官进行商谈，以便就交通、商务、货币和有关朝鲜的其他悬而未决的事项等这类共同的问题作出安排。[①] 贝尔纳斯说："据我了解，你们全都同意应该对朝鲜建立托管。我们清楚，我们不能立即达成建立独立自主的朝鲜政府的协议。但是我们认为，在11月8日的这封信中谈及的建议将是这个方面的第一步。"贝尔纳斯接着阐述："我们建议把关于建立朝鲜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认为11月8日的信中提及的建议是为在朝鲜建立共同的行政机构的第一步。在朝鲜成立统一行政机构将有助于走向下一个阶段——帮助建立对朝鲜的托管。"贝尔纳斯强调："我尽力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讲清楚。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希望朝鲜有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并认为为了这一目的最好的方式是授权美国指挥官和苏联指挥官谈判在朝鲜成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②]

莫洛托夫并不接受美国的建议，他认为"在11月8日的这封信中无论是有关朝鲜政府的问题，还是对朝鲜建立托管的问题都没有提到"，因此与议程上的题目无关。[③] 他希望把讨论的内容限于行政机构和托管方面的问题。[④]

对于托管朝鲜，莫洛托夫重申不存在任何协议文本，"只不过是对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无论是美国方面抑或是苏联方面都表示过赞成在朝鲜必须建立托管制度的意见"。贝尔纳斯也承认："这里所称作的协议，实际不是协议，而只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交换的意见。"[⑤]

12月20日的第六次会议上，贝尔纳斯提到，尽管在会晤前美国制定

---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2页。

②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1~64页。

③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2页。

④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2页。

⑤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16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4页。

了成立朝鲜独立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也反映了美国对朝鲜的真实态度。但“会晤之后，美国代表团决定更改自己提案的名称和议程中相应的名称。我们拟定将关于成立朝鲜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同时规定有关今后朝鲜独立政府的问题”。莫洛托夫则建议将建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交由双方的指挥官去解决。谈到朝鲜未来长久秩序时，莫洛托夫重申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不变——同意托管朝鲜，并声明：“苏联政府同意对朝鲜实行托管，并将这种托管委托给四国——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①

针对朝鲜问题，美苏两国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美国提议四国托管朝鲜5年，并可以再延长5年，在托管制建立之前由美苏两国占领军司令统治朝鲜。美国草案规定由四国的代表组成行政机构，该机构代表联合国和朝鲜人民行事。在朝鲜政府成立之前，这一行政机构应行使有效治理朝鲜所必需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权力。苏联则主张尽速成立朝鲜民主政府，并建议托管期应限于5年。② 12月26日，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了以苏联草案为基础的莫斯科协定。《苏美英三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中有关朝鲜部分的内容如下：“（一）为重建朝鲜成一独立国家，创造各种依据民主原则发展朝鲜之条件及尽速清除日本在朝鲜长期统治之恶果起见，将设立一临时朝鲜民主政府，该政府须采取各种必要步骤，以发展朝鲜之工业、运输、农业及朝鲜人民之民族文化。（二）为协助组成临时朝鲜政府，并为筹划初步适当办法起见，应由朝鲜南部之美军司令部及朝鲜北部之苏军司令部组织一联合委员会。在准备各项建议时，该委员会应与朝鲜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咨商。该委员会制成之建议应先交送苏、中、英、美四国政府考虑，然后由参加联合委员会之二国政府作最后决定。（三）联合委员会协同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及朝鲜各民主政党，制定各种方案，以提携及协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之进步，建立民主自治及朝鲜之国家独立。委员会于咨商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后，应将建议送交苏、美、中、英四国政府联合考虑，俾关于四强在朝鲜以五年为限之托管制，得以成立协定。（四）为考虑各种有关朝鲜南北两部之紧急问题，并为订立方案，以

①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第六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66～67页。

② 《朝鲜问题文件汇编》，第52页。

期建立朝鲜南部美军司令部与朝鲜北部苏军司令部在行政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系，苏美二司令部之代表应于二星期内举行会谈。"①

美苏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的表现实则反映了美苏两国政府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不同考虑。

美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为了避免美国背负"破坏战后国际合作"的骂名，不得不继续延续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达成的口头协议，战后对朝鲜实施托管。另一方面，美军通过近4个月的实地占领，已深深感到托管制在朝鲜的不可行性。11月20日，美国国务院驻南朝鲜代理政治顾问兰登在给国务卿贝尔纳斯的报告中，强调必须放弃托管的做法。他说，"根据我一个月来在解放了的朝鲜的观察，相信我们应该放弃它（托管）……托管看来是行不通的，因为朝鲜人肯定不会接受，恐怕要用武力才能实行"。美国驻朝占领军司令霍奇在给麦克阿瑟盟军总部的报告中，也承认南朝鲜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认为朝鲜人要独立的愿望高过一切，而且要求现在就实现独立。由于托管在一切朝鲜人的心目中是一把当头的利剑，他认为如果仍然执行托管原议，那么朝鲜人有可能真的起来造反。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如顺水推舟，采取积极行动，清除三八线这个障碍，以便统治朝鲜，发表放弃托管的明确的声明。② 美国作为托管制的构想国，此时却真真切切地感到：在朝鲜实施托管成了手中的"一块烫手山芋"。

因此，尽管美国认可在朝鲜建立托管的协定，但在莫斯科会议上一直避免谈与"托管"直接相关的议题，甚至在会议中更改提案及议程，转而谈建立统一行政机构的问题。而美国最终作出让步并接受了一个以苏联草案为基础的有关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笔者推测其动机在于：①苏联的草案提出通过临时政府实施托管，这样借托管制之名，美国可以牵制苏联在朝势力的扩张；②以苏联草案为基础，可以让苏联承担"主张托管制"的罪名，从而引发朝鲜民众的反苏情绪。在决议公布当天，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就转播了如下通报："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根据苏联的建议，

①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25页。

② *FRUS*, 1945, Vol. 6,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pp. 1130－1132、1144－1148.

通过了关于对朝鲜建立期限为 5 年的托管制的决议。"[①]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南朝鲜报纸立即出现了苏联主张托管朝鲜、美国坚持反对立场的报道。[②] 这进一步凸显出美国在托管制问题上的变化，以及在宣传上的导向。

应该说，到莫斯科三外长会议，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一直未有大的变化，即通过托管制促使朝鲜独立，在美苏合作协商的前提下解决朝鲜问题，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亲苏的朝鲜政府。苏联政府加入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磋商，其意图是制造一个统一的朝鲜政府，因为如果在基本要求上与朝鲜人和美国人背道而驰，在政治上是不适当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又非常关心应缔造怎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政府才能维护苏联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③]

苏联在为参加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准备的多个方案中，有一个方案在会议前就制定出来了。这个方案的内容有三：第一，对成立独立临时朝鲜政府、朝鲜民主宪法、地方自治机关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成立由苏美英中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的建议交四国政府审议；第三，在明确对日本的联合管制后，苏美政府应命令驻扎在朝鲜的苏美军司令，责成他们派代表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④] 苏联的这个方案虽然未谈及托管问题，但并未放弃四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第三款表明，苏联非常关心与美国共同参加对日本的管制。苏联建议成立由苏、美、英、中组成的对日理事会，由理事会决定和实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又一次证明了苏联试图通过托管制扩大势力范围。为讨论朝鲜问题，苏联代表团准备了多种方案。[⑤] 这些方案彼此相近，都谈到了成立临时朝鲜政府问题。除一个方案是

①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 年 5 月 31 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69 页。

② 1946 年 1 月 27 日《新华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 1131 页。

③ Kathryn Weathersby, "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8, 1993.

④ АВПР（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 013, оп. 7, п. 4, д. 46, л. 17－18，转引自 *Ки Кван Со* Москов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декабрь 1945г）и раскол Кореи //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7, №5, с. 99－100。

⑤ *Ки Кван Со* Московск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декабрь 1945г）и раскол Кореи //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7, №5, с. 99－101.

在会前制定出来之外，余者都是在会议期间制定和修改的。多数方案主张：成立由苏美统帅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委员会协助下成立临时朝鲜政府。这表明苏联竭力争取在托管朝鲜上单独与美国打交道的意图。最后一个方案确定了苏联托管朝鲜的方式：苏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交苏美英中政府审议，在与临时朝鲜政府协商后，达成四国托管朝鲜 5 年的协议。① 此外，在苏联方案中还谈到，托管应以朝鲜人积极参加并尽早加以落实为重要条件，也反映了政权交由朝鲜人后，苏联仍具有对朝鲜施加影响力的信心。

莫斯科协定公布后，1946 年 1 月 18 日，莫斯科电台评论员对三国外长会议关于朝鲜的决定进行点评，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朝鲜经历托管的必要性，“因为朝鲜达到独立的相当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迅速消灭日本长期统治恶果的条件尚未具备时，马上宣布朝鲜独立是一空谈”。② 为驳斥南朝鲜报纸散布的苏联主张托管朝鲜而美国坚持反对立场的报道，苏联塔斯社又于 1 月 24 日发布关于朝鲜问题的公报，对原来的美国草案和莫斯科协定作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以此说明苏联的草案才是真正符合朝鲜人民利益、促使朝鲜民族独立的方案。③

莫斯科实际上是借托管制确保苏联在远东的整体利益，斯大林的目标是在保证统一后的朝鲜执行对苏友好政策的前提下，参与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和管理。但绝不仅仅于此，苏联在远东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参与对日本本土的占领和管理，这从斯大林轻易同意三八线划分的背后企图便可窥见一斑。当苏军在日本北部地区登陆的计划失败后，斯大林只能采取更为精细和迂回的策略了。

三　联合委员会与苏联对托管政策的坚定立场

北朝鲜对莫斯科协定的拥护

莫斯科协定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战时会议上达成的托管朝鲜的

---

① АВПР, ф. 0430, оп. 1, п. 2, д. 11, л. 7.

② 1946 年 1 月 20 日《解放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 1123～1125 页。

③ 1946 年 1 月 26 日《新华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 1131～1132 页。

口头协定落实到书面，朝鲜人对莫斯科协定的态度也就直接反映着其对托管制的态度。苏联占领下的北朝鲜对莫斯科协定是一片拥护声。

1946年元旦，金日成在《新年献辞》中提到了莫斯科协定对撤销三八线的意义。[①] 1月6日，高举与莫斯科决议团结一致大旗的全城游行在平壤达到了高潮，示威者高举宣传口号“三国外交部长的莫斯科决议能保障自由，独立，和民主朝鲜的建立。”[②] 据莫斯科10日广播报道：约10万群众参加了示威游行，表示欢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定，参加游行者都手持朝鲜、苏、英、中、美各国国旗及列宁、斯大林、朝鲜英雄崔庸健的画像，并高举标语，表示完全赞成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以及朝鲜人民感谢红军及其领袖斯大林元帅，并努力为建立民主的朝鲜而奋斗。[③] 1月29日，在新义州又举行了群众示威大会，约有两万人参加游行示威。群众高举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决议的标语。示威群众在中央大街举行群众大会，有8位代表发表演说，热烈欢迎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的决议，并且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力量恢复国家的经济。[④]

北朝鲜的政党及群众普遍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态度和苏联民政局的大力宣传和正确引导不无关系。1946年1月3日，驻朝鲜苏联民政局的伊格纳季耶夫召开北朝鲜报纸编辑和书刊检查员会议，阐述了莫斯科协定的实质，向与会者布置了实际工作任务，即通过报刊向居民正确宣传莫斯科决议，与企图歪曲该决议精神的亲日派斗争，培养朝鲜人民对莫斯科决议的信任感，号召人民解决当前的问题等。[⑤] 1月18日起，平安南道共产党宣传部为“继续加强当地居民对莫斯科会议关于朝鲜问题决议的理解”而向地方派出宣传队。[⑥] 黄海道警备司令部的政工人员则将向地方党的领导人和人民委员会领导人讲解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作为自身义务。[⑦]

---

① 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42页。

② *Петухов В. И.* У истоков борьбы за единства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Кореи, с. 41～42.

③ 1946年1月12日《解放日报》、1月13日《晋察冀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18页。

④ 1946年2月1日《解放日报》，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中卷，第1138页。

⑤ ЦАМОРФ, ф. УСГАСК, оп. 102038, д. 2, л. 27－28.

⑥ Чонно, 16 января, 1946.

⑦ ЦАМОРФ, ф. УСГАСК, оп. 106546, д. 1, л. 203.

第25集团军军事委员、时任美苏联合委员会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什特科夫在5月31日发给莫洛托夫的工作报告中称："迄今为止，北朝鲜的所有政党都支持莫斯科决议。在北朝鲜有以下政党：北朝鲜共产党、民主党、新人民党、天道教党、妇女联盟、民主青年联盟、农民联盟、工会以及一些别的组织，共计约50个组织。"①

正是由于苏联的引导，北朝鲜所有政党及组织对托管制的支持，使得苏联仍可以一如既往地维持其主张托管朝鲜的立场。苏联清楚，按照北朝鲜占领区内的政治发展趋势，苏联很有希望通过托管制在朝鲜建立起一个亲苏政府，以实现其对朝政策的最优化目标。

与北朝鲜压倒一片的拥护声相反，南朝鲜在托管问题上则分化成两个阵营：由依附于美军司令部的民主议院联合在一起的右翼反动政党阵营反对莫斯科决议并反对苏联。参加民主议院的政党和组织主要有：李承晚领导的争取独立中央政治委员会、金九领导的朝鲜独立党、金性洙领导的朝鲜民主党、朝鲜国民党及一些小党和社会组织，共有近百个。联合在民族民主阵线中的左翼政党阵营完全支持莫斯科决议，主要政党有：南朝鲜共产党、人民党、新人民党、民族革命党，以及妇女联盟、农民联盟、工会、民主青年联盟等，共15个组织。②

朝鲜半岛南北的政党及组织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及政治利益，分化成亲美、亲苏两大阵营。美苏在对待托管制态度上的分歧，为日后的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最终破裂埋下了隐患。

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苏联主张政治问题先行

根据莫斯科协定内容，美苏商议决定召开美苏联合委员会，以帮助朝鲜组建临时政府。美苏联合委员会分为三个阶段，即：1946年1月16日至2月6日的预备会议，1946年3月20日召开至5月9日苏联代表团撤离的第一次会议，以及1947年5月21日至10月18日重开的第二次会议。

①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8页。1948～1951年什特科夫出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②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7～78页。

美苏联合委员会预备会议作为讨论包括会议意向、会议日程等相关基础性问题的准备会议，引起朝鲜人的极大关注。1月16日，美苏代表团在汉城举行会谈，会议进行了三周，到2月6日，共举行15次正式会谈。

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即指示参加预备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要讨论政治问题，将会谈主题局限在经济、行政方面的问题。[①] 因为美国预计一旦南北朝鲜间经济—行政性的永久合作体制建立，那么在美苏联合委员会统治下的南北民政统合就会很快形成。[②] 为此，美国出于其机能主义原则，试探性地提出了几大议题：由满洲通过北朝鲜向南朝鲜输送煤及农产品、建立单一财政体制、南北朝鲜商业机构间的通信等问题，美国分析苏联是不会加以讨论的。[③] 苏联代表团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但主张把讨论仅局限于电力的输送，货物与设备的交流，以及铁路与公路的交通等生活方面的紧迫问题。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是：政治问题先行，政治问题不解决就只能继续维持日本投降后的二元体制，换言之，在未解决政治问题前，苏联希望保留两个地区，只是使它们能协调行动。这与美国代表团积极开放三八线，使南北的交通、公共设施联合，从而使半岛成为经济—行政统一的单位的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预备会议中，美苏双方仅试探了对方的立场，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④]

1946年2月6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仅仅确立了美苏各5人组成美苏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本部设在汉城，委员会也将访问平壤及其他地方，与南北朝鲜的政党、民主团体及社会团体相合作。苏联代表团于2月7日返回平壤。苏联方面在总结此次会晤成果时认为：双方就恢复铁路和公路交通、国内各海港之间的近海运输、邮政通讯以及广播清晰度和无线电波的分配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还就朝鲜公民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达成了调动准则，不过后来苏联方面单方面限制了被准许调动对象的范围。至于朝鲜人预料的这次会议关于沿“三八线”确定国界的决议将会被取消，未能实现。甚至会晤时就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也因为没有准许商品交换和人员流动而

① *FRUS*, 1946, Vol. 8, *Far East*, p. 607.
② *FRUS*, 1946, Vol. 8, *Far East*, p. 624.
③ *FRUS*, 1946, Vol. 8, *Far East*, p. 612.
④ *FRUS*, 1946, Vol. 8, *Far East*, p. 634.

成为一纸空文。①

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联强调委员会协商对象必须支持莫斯科协定

3 月 20 日，美苏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开幕仪式在汉城的德寿宫举行。美方首席代表是阿诺德将军，苏方的首席代表是什特科夫将军。美苏代表团讨论了同朝鲜各民主组织咨商建立临时民主政府等问题。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共举行了 24 次会谈，没有结论，5 月 8 日，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3 月 20 日，什特科夫在演说中将苏联立场具体化：他指出临时政府必须建立在那些支持莫斯科协定的民主政党及社会团体的基础上，他希望将会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出现，“以使它将来不至于成为进攻苏联的据点”。② 换言之，苏联代表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及其利益的朝鲜政府。而美国方面则强调在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问题上，美国代表不希望有某一派或某一翼的人来组成政府，而希望看到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政府。③ 美苏代表团立场上的分歧，使得委员会刚一开始工作就陷入了僵局。

美国代表团要求将南朝鲜的行政体系作为将要建立的临时政府的行政体系并加以扩大。④ 而从苏联的立场来看，只有北朝鲜的人民委员会及南朝鲜的民主主义民族战线才是朝鲜半岛的唯一民主团体，因此只有这两个团体才能成为未来临时政府的主导势力。⑤

为了使自己支持的政治势力能成为未来临时朝鲜政府的主导势力，美苏代表团的争论焦点最终聚焦于：在制订成立临时朝鲜政府的计划时，委员会是否应与那些曾反对过托管和莫斯科协定的人士进行咨商。苏联代表

①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 – 1950 – 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 148 – 149.

② *FRUS*, 1946, Vol. 8, *The Far East*, p. 653.

③ F. C. 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 ~ 1946 年）·1942 ~ 1946 年的远东》（下册），第 652 页。

④ *FRUS*, 1946, Vol. 8, *The Far East*, p. 672.

⑤ HQ XXIV Corps, G – 2 Summary No. 24，《美军政情报报告书》（日月书阁，1986），第 11 卷，p. 328，转引自沈之渊，《미-소공동위원회연구》，p. 10。

团提出的建议是："联合委员会不应与反对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会议决议的政党和团体协商。"苏联代表团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既然联合委员会是为执行莫斯科决议成立的，自然，联合委员会就应当只与同意并支持莫斯科决议的政党和组织协商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而不可能是其他。[①] 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代表团的建议，美国人认为所有的朝鲜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而联合委员会应当听取朝鲜的任何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的代表所愿意提出的意见。[②] 美国代表团认为，莫斯科决议第三条讲的是关于托管的问题，对这一条的不友好态度是每一个朝鲜爱国者完全自然的反应，只要他对联合委员会的决议效忠服从并愿意贯彻这些决议，就不应该对他要求更多的东西。[③]

美国人坚持自己的建议。在确信美国代表团绝不同意将反对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排除于协商对象之外以后，为打破僵局，苏联代表团决定作出妥协，建议联合委员会可以与所有政党协商，其中包括曾反对过莫斯科决议的政党，条件是他们的领导机关应通过一个支持莫斯科三国外长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并刊登在报纸上。对此，美国代表团试图辨明，没有必要向政党和社会组织提出要求它们支持莫斯科决议的任何条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最后终于达成了一项决议，规定所有希望参加与联合委员会协商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必须签字声明支持莫斯科决议。这份决议公布在1946年4月18日发表的"第五号公报"中。当联合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美苏双方代表又在言论自由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美国主张：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认为，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它们有对于托管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言论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赞同或不赞同托管。签字即表示它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则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托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议。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李承晚等

---

①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1～72页。

②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373页。

③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年5月31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2页。

右翼）的个人进行商议，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托管的立场。5 月 6 日，美国代表团在大会上提出了以下建议：“停止讨论与组建临时政府有关的问题，转而解决关于朝鲜经济统一和消除‘三八线’的问题，声称，如果苏联代表团不同意讨论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休会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样，美国代表团又回到了莫斯科协定签订之前的谈判立场，即通过经济、行政方面的统一完成统一体制的建立，再考虑政治方面统一政府的建立。[①]

5 月 8 日，什特科夫在汉城美军司令部与霍奇举行会谈。在谈话中，什特科夫直言朝鲜对苏联安全的意义和苏联在朝鲜的目标，“苏联直接与朝鲜接壤，非常关心与苏联友好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如果反对莫斯科决议、对抗和诋毁苏联的人混入政府，就会对苏联不利、会使朝鲜人民敌视苏联”；“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执行莫斯科决议，并无在朝鲜建立苏联秩序或苏联体制的想法”。对于美国借口言论自由纵容南朝鲜反托管势力，什特科夫加以反驳，“阿诺德将军在谈判过程中多次说，我们两国在管理体制、民主观念上存在差异，因此联合委员会无法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达成一致。苏联代表团对此无法理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两国在反法西斯德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共同语言，打败了军事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并取得了胜利。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执行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我们在开会时向美国代表团详细阐述了苏联代表团并非根据自己的民主观和体制来执行莫斯科决议”。什特科夫告诉霍奇，他已接到命令，让他返回北朝鲜。[②]

5 月 9 日委员会休会，美苏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建立临时朝鲜政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苏联要求协商对象必须排除反托管委员会成员

联合委员会休会期间，美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与苏联对决的重要性与艰巨性。1946 年 6 月，美国总统代表保莱在巡视北朝鲜后，

---

①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问题苏美联合委员会工作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6 年 5 月 31 日），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 76 页。

② ЦАМОРФ, ф. Устаск, оп. 614631, д. 30, л. 109 – 123.

给杜鲁门写的一封信中说，朝鲜“是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场，而我们在亚洲的整个胜利就决定于这场战争。就在这个地方将测验出来，究竟民主竞争制度是不是适宜于用来代替失败了的封建主义，或者其他制度——共产主义，还更强一些”。[①] 有观点认为：如果未能在南朝鲜建立临时政府，美军即撤出朝鲜半岛是对苏联的一种投降，这不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而且有损美国的国家声誉。正因为如此，在与苏联的协商中，美国绝对不能有任何的示弱表现，一定要采取强势的立场和态度。[②]

美国驻南朝鲜政治顾问兰登访问北朝鲜期间，曾向苏联政治顾问巴拉塞诺夫指出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允许成立一个为共产党所统治的临时政府。针对美国的担忧，苏联明确表示：苏联没有意图要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只是不能接受一个由李承晚或者金九领导的临时政府。[③] 但同时，苏联亦通过各种途径开始扩大在北朝鲜的影响力。梅列茨科夫元帅和什特科夫就向斯大林论证了加速派遣专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此举“将加强我国将来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因为“美国人在朝鲜的影响的增强必然会给我国的利益造成损失”。斯大林批准了这一要求。[④]

这样，美苏双方一方面为了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复会，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以及美苏驻军司令部之间不断地进行书信往来，另一方面各自也在加紧制订在朝鲜半岛扩大影响力的计划。[⑤] 1946 年底，尽管有关美苏联合委员会复会的交涉进入轨道，复会的可能性也在逐步增大。但美国与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却在加剧，尤其是美国，美国的对朝政策在 1946 年底至 1947 年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那种将朝鲜半岛作为与苏联协调关系的地区的初衷，转而越来越多地从遏制苏联出发来考虑朝鲜问题。[⑥]

尽管分歧加大，对立加剧，但美苏双方依然尝试着以合作的态度解决朝鲜问题。经过马歇尔将军与莫洛托夫间的书信交涉，美苏一致决定于

---

①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第 374 页。

②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612、616.

③ *FRUS*, 1946, Vol. 8, *The Far East*, p. 744.

④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46, л. 4－6.

⑤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pp. 613－614.

⑥ 牛军：《战后美国对朝鲜政策的起源》，第 61 页。

1947 年 5 月 20 日在汉城重开美苏联合委员会，由于苏联代表团晚到了一天，美苏联合委员会比原定计划推迟了一天，于 5 月 21 日复会。两星期的时间里，美苏双方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 6 月 12 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①]

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美苏双方立即就出现了分歧。苏联方面称在第五号公报上署名之前的反托管运动可以不追究，但加入反托管委员会[②]的政党和团体必须在脱离反托管委员会之后，才能够成为美苏联合委员会的协商对象。与之相对，美国方面则主张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事实并不能作为反对莫斯科协定的行为，在问题出现时需要逐个地加以解决，如果苏联方面一味固执的话，只会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苏联代表团反驳道，即便可以成为协商对象，目前仍是反托管委员会成员的团体必须被排除在外，苏联并不是反对言论自由，也不是偏向左翼政党。由于有关反托管委员会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南朝鲜，因此只有公开宣布退出该组织才能进入协商对象名单。美国代表团则认为相关的反托管示威并不是希望协商的团体所为，而是李承晚、金九等人的追随力量主导，主张在没有有力证据之前不能把任何团体排除在外。美国还主张，对于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政党或团体，经美苏商议达成一致后，将其从协商对象中删除。[③]

就协商团体资格的具体条件，两国代表团各持己见。在 463 个申请团体中，苏联代表团坚持将不符合莫斯科协定定义的社会团体、郡及郡以下的纯粹的地方性团体、反对莫斯科协定而成立的政党或团体排除在外。与此相对，美国代表团则声称莫斯科协定中并没有有关社会团体的定义，不能接受将中央没有本部的团体排除在外的主张，但会员未满 1000 名的团体

① F. C. 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 ~ 1946 年）· 1942 ~ 1946 年的远东》（下册），第 696 ~ 697 页。

② 反托管委员会指的是 1947 年 1 月 21 日由赵素昂、金俊渊、梁又正等 9 人在金九寓所结成的反托管独立斗争委员会，由金九任委员长，有 35 个右翼阵营的政党和社会团体加入该组织。反托管委员会以“坚决反托、自主独立”为旗帜，以排斥托管为决议，后成员增加到 2 个。

③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pp. 693 – 694.

可以被排除，所有参加申请的政党和团体都有资格成为协商对象。在美国代表团反对苏联的主张中，言论自由问题决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对象，因为美国断定一旦对试图排挤右翼势力的苏联让步，那么朝鲜半岛必将出现一个左翼政权。[①]

在此期间，什特科夫坚持认为那些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正在试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利。美国人坚持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8 月 2 日，什特科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实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②]

会谈再次陷入僵局时，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为了打开僵局，准备了一个新的提案：举行一次符合美式民主概念的全国大选，通过大选选出政治领袖，由他们组建立法机关并担任临时政府的要职。因此在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 53 次会议中，美国代表提出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通过选举选出，建议举行选出代表及政府要员的大选。[③] 针对美国提出的通过选举组建临时政府的提案，苏联主张先组建类似咨询会议的机构，并且坚决将指责苏联非民主的政党、会员未满 1 万名的政党及团体以及反对莫斯科协定、反抗美苏联合委员会及联合国军的团体排除在外，在南部人口是北部人口的两倍这一事实下，仍要求南北双方以一比一的比例人数参加立法机构。[④] 假如南朝鲜的左右翼以同样比例参加，由于北方已被苏联化，那么整个朝鲜半岛将建立起左翼占优势的政权，因此苏联的提案是试图组建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临时政府，这是美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⑤]

美苏在选举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由于朝鲜问题无法在美苏联合委

① *FRUS*，1947，Vol. 6，*Far East*，pp. 698、699、703、705.

② F. C. 琼斯等：《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 年）·1942～1946 年的远东》（下册），第 698、699 页。

③ *FRUS*，1947，Vol. 6，*Far East*，pp. 718～719、752.

④ *FRUS*，1947，Vol. 6，*Far East*，pp. 777－778.

⑤ 《美军政情报报告书》第 14 卷，p. 133，转引自沈之渊，《미-소공동위원회연구》，p. 21。

员会内部解决，美国政府遂向苏联政府提出将朝鲜问题交由美英中苏四国会议解决。[1] 对此，苏联政府指出美苏联合委员会毫无进展，是由于美国力主将反托管团体包含在协商对象以内，并且打压南朝鲜的民主政党、逮捕政党领袖所致。遵循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决定，应在美苏联合委员会范畴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以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解决是违反三外长会议决定的，因此苏联是无法接受的。[2]

在苏联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将朝鲜问题交由四国会议处理的提案后，美国称只有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于1947年9月16日通报了苏联。[3] 1947年9月17日美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题为“朝鲜独立问题”的书面申请，正式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意味着美苏联合委员会工作彻底破裂，意味着美苏通过托管制帮助朝鲜建立统一政府的设想宣告失败。

四 简短的结论

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关对朝托管政策的研究论著中，苏联仅仅是一个“配角”，被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参照物加以描述的。苏联在处理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其出发点何在，其动机何在，仿佛一直是“雾里看花”，不甚清晰。本文通过对苏联接受美国提出的朝鲜托管政策构想、到与美国协调合作确定朝鲜托管政策，直至因美苏对朝鲜临时政府人选各持己见，导致美苏联合委员会以破裂告终，托管政策“流产”这一完整过程的梳理，比较清楚地确认，其实，苏联的每一步举措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莫斯科从托管政策的接受者、合作者变成朝鲜托管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其根本动机就在于托管政策本身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托管制实质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战后继续维护其殖民权益而特制的一件“合法外衣”，与苏联所倡导的世界革命理念是完全不符的。然而苏联初始即对战后托管朝鲜政策表示赞同，是因为苏联通过托管政策可以参与战后朝鲜事务，这将有利于苏

---

①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p. 773.

②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pp. 779 -781.

③ *FRUS*, 1947, Vol. 6, *Far East*, p. 790.

联将朝鲜变为自己的安全缓冲地带；同时，苏联也试图以在朝鲜托管问题上的合作向美国换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正是国家利益的驱使，促使苏联在朝鲜问题上最初采取与美国协调合作的态度，甚至接受了杜鲁门政府提出的“三八线”划分。随着事态的发展，苏联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提高。当杜鲁门政府意识到在美苏对决中美国已力不从心，从而转变其对朝政策，由最初的与苏联协调转为遏制苏联时，苏联随即转变立场，针锋相对，毫不示弱。最终，双方的利益分歧在美苏联合委员会期间全面暴露。苏联和美国之所以对临时朝鲜政府的人选坚决不肯让步，是因为双方都明白，无论是占领还是托管都是暂时的，朝鲜最终仍要交给朝鲜人管理，要想保住各自的朝鲜半岛的控制和影响，就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和寻找合适的代理人。

大体来说，自二战后到 1947 年初，苏联先是试图通过托管或其他方式，与美国合作在朝鲜建立一个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统一的朝鲜政府；与美国矛盾日渐加剧后，又转为加强北朝鲜的政治、经济力量，并在此基础上促进朝鲜民族的统一，从而保证通过全朝鲜普选建立的统一政府实行对苏友好的政策。苏联为保障其在远东的安全，试图在朝鲜建立一个亲苏政府，从而使朝鲜不至于成为日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据点”。

解禁的历史叙事：苏联核计划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1945～1949）

东北师范大学　刘玉宝

长期以来，在苏联和俄罗斯，由于苏联核计划被列为国家高级机密严禁涉猎，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国，情况更是如此。虽然也有零星的介绍性文章见诸报刊，在并不多见的专著里也辟有专门的章节，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作支撑，鲜有科学性。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解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苏联核计划的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尤其是1995年2月17日和1995年5月24日《关于筹备出版苏联核武器研制官方档案文献资料汇编》的第160号俄罗斯联邦总统令和第728－p号俄罗斯联邦政府令的分别出台，在俄罗斯及欧美等国的史学界掀起了一场苏联核计划史研究的高潮。

苏联核计划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时间跨度较大，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一直延续至今，涉及内容较多，包括核理论研究和实验、核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制以及核能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应用等。苏联核计划史研究同样也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绝非一本书所能容纳。限于篇幅，我们将只截取苏联核计划史中的一个片段，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重点考察苏联核计划的出台与实施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

试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

一 战前苏联物理学家的努力

人类社会在跨出19世纪之际，尤其是在迈进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先后问世。

1895年，时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校长的威廉·康拉德·伦琴教授发现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奇异光线，X射线也即伦琴射线就这样诞生了。X射线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极有力的工具，有人称它为现代物理学的“开门钥匙”，它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即将进入原子时代。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教授发现了铀盐矿石的放射性。1898年，波兰裔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斯克罗多夫斯卡娅·居里与其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新的化学元素钋和镭。他们一道成为放射学的创始人。1905～1916年，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和先后创立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不仅开辟了人类认识物质世界波粒二象性的新时代，而且还为原子能的研究和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欧洲各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热潮，波兰、法国、英国、瑞典、丹麦、德国等地相继建立了实验室和研究院。

1907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在曼彻斯特创立了原子核理论，提出了原子结构的“行星”模型。此外，卢瑟福还发现了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第一次实现了原子核的人工转变，建立了放射性蜕变学说，对核物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13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在与卢瑟福一道创立的原子核理论的基础上将量子力学理论应用于原子结构研究，建立了氢原子模型和原子结构理论，标志着原子核物理学的真正诞生。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发现了不带电荷的中性核粒子——中子，并测出中子的质量，为物理学家们找到了轰击原子核的新“炮弹”，为大规模开发核动力提供了途径。1935年，他还发明了首台加速器。1933年，斯克罗多夫斯卡娅·居里的女儿伊琳娜·居里和丈夫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发现了人工β放射性，亦即一种新型的放射性，为制造新的放射性元素提供了条件。1934年，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费米发现用中子轰击铀时能生成放射性元素，即超铀元素。他已采用该方法先后制造出了37种新的人造元素。1942年，他还启动了首座核反应堆。1938年，德国物理学

家哈恩与同事施特拉斯曼在实验中发现，把钡元素加到中子轰击过的铀元素中时，它可以带出一些新的放射性元素。1939 年，曾与哈恩一道从事研究的奥地利物理学家麦特娜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将这种现象称为“裂变”。1939 年，玻尔等人从理论上阐述了原子核裂变反应过程，论证了裂变过程中释放大量能量的基本原理，从而为日后原子弹的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俄国尤其是新生的苏联，不仅积极参与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热潮，而且贡献出了许多新的发现和发明。就此，我们同样可以按大事记的形式列举如下：1922 年，В. Г. 赫洛平等人从苏联镭矿中成功提炼出了首批镭样品。1932 年，Д. Д. 伊万年科提出了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结构假说。1934 年，Н. Н. 谢苗诺夫发表了链式化学反应理论。同年，П. А. 切连科夫和 С. И. 瓦维洛夫发现了基础物理现象之一——由于电子的高速运动引起的液体发光现象。1936 年，В. Я. 弗伦克尔提出了原子核的水滴模型说并将热力学概念引入核物理学，首推原子核分裂理论。1939 年，Ю. Б. 哈里顿和 Я. Б. 泽利多维奇从理论上证明了实现铀－235 原子核链式裂变反应的可能性。1940 年，Г. Н. 弗廖洛夫和 К. А. 彼得扎克发现了铀核的自发裂变现象。同年，哈里顿和泽利多维奇对铀核链式裂变反应过程进行了数学计算，从而阐明了实现铀核链式裂变反应的可能性。

上述发现和发明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家们多年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核研究体系。

在贝克勒发现放射性后，俄国马上开始了放射性研究。И. И. 博尔格曼（1900 年）和 А. П. 阿法纳西尼耶夫对放射性射线特性，尤其是其医疗特性进行了研究。В. К. 列别金斯基（1902 年）和 И. А. 列昂季耶夫（1903 年）对放射性对火花放电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是最早对伽马射线的特性做出界定的科学家之一。Н. А. 奥尔洛夫对镭对金属、石蜡、易熔有机物的作用进行了研究。Л. С. 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进行的放射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从 1906 年起，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工作 5 年，研究 β 射线并写出了《放射性物质常数表》。在居里的专著和卢瑟福的《放射性物质及其射线》一书中都曾对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的研究成果有所论述。

在众多科学家中，В. И. 韦尔纳茨基院士是最早意识到发现放射性衰

变意义的人之一，他曾在1908年将俄国的放射性和放射性矿物研究纳入国家优先资助的科学院研究课题。1910年12月29日，韦尔纳茨基在俄罗斯科学院年会上的发言《镭研究领域当前的任务》中指出："出于对亲爱的祖国的责任感，我决定在此庄严的年会上做以下发言，以提请大家对我们面临的具有全人类和国家意义的重要事业给予关注，这项事业便是对俄罗斯帝国的放射性矿物的特性及其储量的研究。这项事业刻不容缓。"俄国科学院采纳了韦尔纳茨基的建议，积极寻求资金用于放射性矿物的研究。然而，直到1911年，国家拨给的资金和商人的私人赞助才到位，俄国科学院才得以在后贝加尔、高加索、乌拉尔和费尔干纳成立了考察队。1914年，俄国科学院镭考察队成立。该考察队于1914～1916年在俄国多个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并未发现新的矿藏，但却促成了韦尔纳茨基领导的地球化学、矿物学及放射学派的形成。①

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

1918年9月24日，列宁格勒X射线学和放射学国家研究所成立。该所的物理技术部由А.Ф.约费领导，光学部由Д.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领导，镭学部由科洛夫拉特—切尔温斯基领导，生物医学部由Л.М.涅梅诺夫领导。约费被选为该所第一任所长。该所的物理技术部后来发展成为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1902年，约费在圣彼得堡工业学院毕业后前往慕尼黑伦琴实验室工作，并跟随诺贝尔奖得主威廉·罗恩特教授从事科学研究。1905年，约费因对介电晶体导电性的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1915年，又因对阴极射线磁场的研究获俄国科学院颁发的奖励。1918年被科学院选为通讯院士，两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1919年，约费在母校成立新系——物理技术系，讲授物理和技术，成为培养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的重要基地。②

1922年1月1日，X射线学和放射学国家研究所改组为三个独立的科

---

① *Ветров В. И.*, *Кротков В. В.*, *Куниченко В. В.* Создание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по добыче и переработке урановых руд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170.

② 参见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1939－1956 (Пер. с англ.), Новосибирск: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1997, с. 25－27。

研机构：X 射线学和放射学研究所，由涅梅诺夫任所长；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镭研究所，由韦尔纳茨基任所长。以约费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为基础，苏联建成了由 14 个研究所和 3 所工业技术高等院校组成的科研体系，共有研究人员 1000 多名，其中有近百人为著名学者。[1]

1920 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及核物理的研究，许多研究成果被应用于电力和冶金工业。在量子力学引发物理学革命的年代，物理技术研究所是当时欧洲主要的物理研究中心之一。物理技术研究所代表了苏联物理学流派，培养了大批苏联核物理研究人才，如 A. П. 亚历山德罗夫、A. И. 阿利汉诺夫、Л. A. 阿尔齐莫维奇、A. И. 阿利哈尼杨、A. Ф. 瓦尔特、Б. M. 武尔、И. K. 基科因、П. П. 科别科、Ю. Б. 科布扎列夫、B. H. 康德拉季耶夫、Б. П. 康斯坦丁诺夫、Г. B. 库德留莫夫、И. B. 库尔恰托夫、П. И. 卢基尔斯基、Д. A. 罗然斯基、谢苗诺夫、Д. B. 斯科别利岑、A. B. 斯捷潘诺夫、弗廖罗夫、弗伦克尔、哈里顿、A. A. 切尔内绍夫、A. И. 沙利尼科夫等。之后，他们都成为参与苏联核计划的科研骨干力量。[2]

1931 年，物理技术研究所一分为三：列宁格勒化学物理研究所，由谢苗诺夫任所长；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由约费任所长；列宁格勒电物理研究所，由切尔内绍夫任所长。在约费的积极倡议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托木斯克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物理技术研究所。[3]

1930 年代初，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开始转向核物理研究，成为当时苏联主要的核物理研究中心。1932 年 12 月 16 日，研究所作出成立原子核科学特别研讨小组的决定，由约费担任组长，库尔恰托夫担任副组长，M. A. 叶列缅夫、斯科别利岑、П. A. 鲍格达谢维奇、B. A. 普斯托沃伊琴科、C. A. 鲍布科夫斯基、И. П. 谢林诺夫、M. П. 布罗什切因及伊万年科为成员。研究所责成库尔恰托夫在 1933 年 1 月 1 日前制订出原子核研讨小组 1933 年工作计划。1935 年，库尔恰托夫、Л. B. 梅索夫斯基、Л. И. 鲁西诺夫等人联合发现了人工放射性溴的同质异能现象，这一发现开辟了原

[1]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с. 33.

[2]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с. 30.

[3]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с. 30.

子核物理学的一个新方向——原子核同质异能素的研究。[①] 在卡温迪什实验室从事同样研究的莫里茨·戈尔德施米特对当时几个著名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卡温迪什实验室，我认为是最出色的；以费米为首的罗马，我认为是一流的；巴黎有约里奥—居里等人；还有库尔恰托夫及他的同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始终认为，库尔恰托夫是俄国原子能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因为我曾读过他写的文章，他并不比我们差多少。库尔恰托夫学派经常发表一些颇有价值的文章。"[②]

莫斯科镭研究所

于 1922 年 1 月 1 日成立的镭研究所下分地球化学和矿物学研究室，由研究所所长韦尔纳茨基院士直接负责，化学研究室由赫洛平负责，物理研究室由兼任镭研究所学术秘书的梅索夫斯基负责。韦尔纳茨基曾在谈到镭研究所的基本任务时指出："目前，镭研究所的工作应集中于掌握核能的研究。核能是最大的能源，人类已进入核能时代。"[③] 镭研究所是苏联最早进行放射性、放射性元素、地球化学、放射化学及核物理学研究的研究所之一，形成了以赫洛平为首的世界著名的放射学派。

1932 年，查德威克发现中子后，镭研究所物理研究室成为苏联唯一的中子源制作机构，中子源为镭研究所研究人员进行人工放射性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化学特性研究创造了条件。同年，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根据梅索夫斯基和理论物理学家 Н. А. 加莫夫的提议，开始建造欧洲最大的带电粒子加速器——作为强中子源用于生产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回旋加速器，它比美国的劳伦斯研制的加速器的功率还要大，达到了 400 万电子伏。1937 年 3 月，在这台回旋加速器上获得了能量为 2.1 千电子伏的质子束，同年 7 月，又获得了能量为 3.2 千电子伏的质子束。自 1937 年 8 月，库尔恰托夫开始担任镭研究所回旋加速器实验室主任。镭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有如一所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核物理学家，阿利汉诺夫、М. Г. 梅谢里亚科夫、

① 参见 С. 斯涅戈夫《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胡丕显、吴莹、照宇译，原子能出版社，1991，第 18 页。

②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с. 63.

③ *Бутона С. В.*, *Синицына Г. С.*, *Шашуков Е. А.*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ути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40 – 50 годы), Т. 1, М.: ИздАт, 1997, с. 42.

А. П. 维诺格拉多夫、С. Н. 韦尔诺夫等都曾在回旋加速器上先后进行过学术进修。[①]

1938年，赫洛平曾这样描述镭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镭研究所的研究活动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可称之为'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他把对"原子核及其附属物问题"的研究分为如下6个方面：①基本粒子的核力和特性研究；②核反应和人工放射性元素提取方法研究；③生成大强度和高能离子束的大型装置的设计和使用；④天然和人工放射性元素研究；⑤自然界中的核反应现象研究；⑥放射性元素和基本粒子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②]

铀问题委员会

1939年初，德国科学家发现铀核裂变的消息刚一公布，苏联科学界便作出积极响应。1939年3月7日，梅索夫斯基和А. П. 日丹诺夫向苏联科学院提交了首篇有关核裂变研究的论文。1940年，韦尔纳茨基和赫洛平向苏联科学院地质地理学部学术秘书斯捷潘诺夫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1939年，中子作用下铀核裂变及同时释放大量能量现象的发现……首次将人类利用核能的可能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因而，我们提议地质地理学部讨论铀矿勘探现状问题，制订铀矿勘探计划，建议政府根据该计划采取相关措施。"[③] 1940年7月1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成立铀问题委员会事宜。1940年7月3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如下决议：①为在苏联科学院进一步开展铀研究及探讨利用核能的可能性，成立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的铀问题委员会。委员会承担如下主要工作：其一，确定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铀研究选题；其二，组织开展铀同位素分离或浓缩方法的研究及对放射性衰变过程的控制研究；其三，整体协调与全面领导苏联科学院的铀问题研究。②确定铀问题委员会组成人员

---

① *Бутомо С. В.*, *Синицына Г. С.*, *Шашуков Е. А.* Исто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ути, с. 43.

② *Синицына Г. С.*, *Бутомо С. В.*, *Шашуков Е. А.*, *Куракина Т. И.* В. Г. Хлопин и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40 – 50 годы), Т. 2, М.: ИздАт, 1999, с. 123.

③ *Синицына Г. С.*, *Бутомо С. В.*, *Шашуков Е. А.*, *Куракина Т. И.* В. Г. Хлопин и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с. 125.

为：赫洛平院士，任委员会主席；韦尔纳茨基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约费院士，任委员会副主席；A. E. 费斯曼院士；瓦维洛夫院士；П. П. 拉扎列夫院士；A. H. 弗鲁姆金院士；Л. И. 曼德尔施塔姆院士；Г. M. 克日扎诺夫斯基院士；П. Л. 卡皮察院士；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研究员库尔恰托夫；苏联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Д. И. 谢尔巴科夫，任委员会秘书；苏联科学院生物化学实验室副主任维诺格拉多夫教授；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哈里顿。③1940 年 9 月 20 日前向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提交苏联科学院 1941 年度铀问题研究计划。④设立国家铀基金，组织进行铀矿研究。为此，决定在 1940 年秋向中亚各大铀矿派出苏联科学院勘察队。⑤鉴于铀问题研究需要大功率回旋加速器，建议：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在该年内完成对正在运行的回旋加速器的改造；苏联科学院物理技术研究所在 1941 年第一季度前建造新的回旋加速器；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 1940 年 10 月 15 日前准备在莫斯科建造大型回旋加速器的必要材料（计划、设计等），并列入苏联科学院 1941 年度基本建设计划。①

1940 年 7 月 12 日，韦尔纳茨基、费斯曼和赫洛平在写给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布尔加宁的信中表示，苏联科学家意识到了掌握新能源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虽然在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面临着重重困难，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不过，我们认为，这些困难并不是难以克服的。显而易见，如果核能利用在技术层面上得到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利用能源的面貌。国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国外信息表明，美国和德国正在大力研究，力争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政府充分认识到核能利用的重要性并采取措施保证苏联在此方面不落后于国外的时候了。”② 也许此信根本就未寄出，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证明布尔加宁对此信作出反应的材料。

多年来，虽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掌握核能的重要性，已经为掌握核能付出了努力并做好了准备，但他们的积极呼吁并未引起政府应有的关

① 参见 *Трифонов Д. Н.* К истории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роблеме ура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 1996, №2, с. 97 – 98。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М.: Наука, 1998, с. 121.

注和支持，核研究仍处于纯学术性理论研究阶段。虽然如此，苏联战前的核研究仍为日后苏联政府实施核计划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基础。

二　二战期间苏联政府的推动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背信弃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到了苏联。1941 年 6 月 30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宣告成立，身为联共（布）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斯大林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任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及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为委员。战争爆发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成为苏联战时的首要任务。工厂、企业和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转向保证前线的需求，大批人员和设备被转移到东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中亚和哈萨克地区。科学院以及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全都迁到了喀山，铀委员会停止了工作，远离战争需求的核研究一时中断，许多研究人员或应征入伍或从事与国防直接有关的研究。库尔恰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转向战舰的消磁工作，开始从事对抗磁性水雷的研究。哈里顿和泽利多维奇则转向“喀秋莎”火箭炮炮弹装药和反坦克榴弹及炸药的廉价替代物的研究。①

然而，出于高度的职业敏感和责任心，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并未因战争放弃他们对核问题一贯的关注，而且，明确指出了核研究与核武器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 1940 年，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便给化学工业人民委员写报告，提出应当全面开展核武器研究。1941 年 10 月 12 日，卡皮察在苏联学者反法西斯委员会倡议举行的群众集会上所做的发言中指出：“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是炸药。科学表明，炸药的威力原则上可以提高 1 到 2 倍。最近，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就是核能利用。此前，核能利用只在幻想小说中才有描述……理论计算表明，假如现在最具威力的炸弹能够炸毁一个街区，那么，一个体积不大的原子弹则能轻易摧毁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首都城市……我个人认为，在通往核能利用的道路上还存在着重重困难。目前，人们对它还心存疑虑。但可以肯定地说，机会很大。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的问题已经被提到

① 参见 *Холловэй Д.* Сталин и бомб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с. 108 – 109。

议事日程。”[①]

弗廖罗夫的呼吁

自愿申请参军入伍的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年轻的物理学家弗廖罗夫虽身在军营，却念念不忘战前一直从事的核研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和掌握的国内外研究情况，他断定用铀作为炸药可以制成威力无比的炸弹，必须提醒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高度的关注。1941～1942年，弗廖罗夫先后写信给自1941年7月6日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和加强与国防有关的化学研究的全权代表一职的苏联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主席C. B. 卡夫塔诺夫、库尔恰托夫、斯大林的秘书及斯大林本人，一再呼吁恢复核研究。[②] 1941年11月，弗廖罗夫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陈述了引起自己深思和担忧的一个异常现象：“国外所有的杂志都不再刊登任何与铀问题有关的文章。这绝不意味着铀问题研究中止了，本该连续发表和预告将要发表的文章也都没有了下文。总之，就铀问题只字不提，这充分证明国外的铀问题研究目前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③] 同时，他还呼吁立即恢复核研究：“人们正在战场上书写历史，但不应忘记，推动技术进步的科学是在科研实验室得到发展的。应当时刻牢记，最先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将主宰世界。目前，能弥补我们的过错——半年无所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铀问题研究，而且要比战前更加广泛和深入。”[④] 1941年12月21日，弗廖罗夫又写信给库尔恰托夫，再次呼吁恢复核研究，信中还附有一篇写在练习本上的题为《论核能利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弗廖罗夫表达了自己对产生核爆炸条件的思考，描述了原子弹“枪击式”构造的基本原理，还绘制了草图。然而，无论是卡夫塔诺夫还是库尔恰托夫，都未对弗廖罗夫的呼吁作出答复。1942年4月，弗廖罗夫毅然决定直接给国防委员会主席

---

①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1，1938－1945，Ч. 1，с. 245－246.

② 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发现了弗廖罗夫写给库尔恰托夫、卡夫塔诺夫、斯大林的秘书及斯大林本人的信，它们或为原件复印件，或为弗廖罗夫在库尔恰托夫在世时复制的复印件。这些文件是库尔恰托夫于1946年2月1日应弗廖罗夫的请求提交给专门委员会的。

③ *Смирнов Ю. Н.* Г. 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1996，№ 2，с. 114.

④ *Смирнов Ю. Н.* Г. 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с. 115.

斯大林写信，因为"铀问题目前所处的状况只有在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才能有所改观。"[①] 弗廖罗夫以略带"威胁"的口气坦诚地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最后一次呼吁："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伤心。也许我做的不对——科学研究中总有风险存在，铀问题研究中的风险更大。在写给卡夫塔诺夫的信中我说有 10% ~20% 的可能，我对此深信不疑……不过，军事技术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参加这场革命，我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也许由于身在前线，我对科学目前应该做些什么感到茫然，类似铀问题这样的研究应当放在战后。约费院士便持此观点。他大错特错了。我认为，如果说在核物理学的某些研究领域我们并不落后于其他国家甚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话，而现在我们却犯了大错，将我们的优势拱手相让给了他人。一年或两年后，我们将大大落后，约费院士将在从军事研究转向科学研究时束手无策。愿望很好，却常常会酿成大错。"[②]

核情报

苏联政府一向重视国外情报的搜集工作，从 1930 年代开始便特别关注对科技情报的搜集，情报部门受命对国外研制新军事装备的科研和生产中心进行间谍渗透。战争爆发后，驻伦敦情报机构最先搜集到了有关核武器研制的情报。1941 年 9 月 25 日和 10 月 3 日，驻伦敦情报机构先后向国内通报了 1941 年 9 月 16 日和 9 月 20 日英国铀委员会会议的情况及铀委员会呈报给战时内阁报告的内容。[③] 1941 年 10 月 10 日，基于上述两份情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处处长 B. A. 克拉夫琴科向贝利亚提交了关于国外原子能军事利用研究及建议在苏联开展该项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经过对所获情报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 材料证实了英国正在进行铀原子能军事利用的重大研究工作。2. 现有材料尚不足以使人得出各种原子能利用方法是现实可行的。鉴于实际利用原子能问题（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科学家一直致力于此项研究）的顺利解决意义重大，因而，有必要：（1）责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局驻外情报机构搜集有关仪器

---

① *Смирнов Ю. Н.* Г. 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с. 120.

② *Смирнов Ю. Н.* Г. 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с. 121.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с. 240.

设备的生产和铀弹实验厂建设的详尽可靠的情报；（2）成立由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工作的苏联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苏联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探讨在苏联进行军事利用原子能的可行性。在苏联，从事原子核裂变研究的科学家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卡皮察，列宁格勒物理研究所斯科别利岑院士及哈尔科夫物理技术研究所的 A. A. 斯卢茨基。"[①]

同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克拉夫琴科报告的基础上拟定了致国防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关于驻外情报机构所获情报内容及建议在苏联开展核武器研制的报告并由贝利亚签署。[②] 不过，该报告并未及时呈报斯大林，只是在 1942 年 10 月国防委员会作出恢复核研究的决定之后，该报告才在修改后呈报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③]

国防委员会第 2352cc 号决议

1942 年 4 月，卡夫塔诺夫得到一个蓝色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公式和注释，与核能利用问题有关。这是游击队在敌占区从被打死的一名德国军官身上找到的。卡夫塔诺夫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大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正研究那个笔记本和弗廖罗夫的信，希特勒大肆叫嚷德国正在研制'超级武器'。万一这不仅仅是宣传呢？万一这个恶棍指的是核武器呢？我找到几位物理学家商议。我最重视的是约费的意见。约费认为，链式裂变反应或核爆炸在原则上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应当着手研究。我请约费与我一道起草一封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关于应当成立核武器问题研究中心的信。他同意了。我们两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字……"[④]

另据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 M. Г. 别尔乌辛回忆："1942 年春

---

①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с. 243.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с. 244 – 245.

③ 有学者认为，贝利亚未及时向斯大林呈报该计划的原因在于："他将其视为德国散布的假情报，试图将苏联用于作战的人力和物力引向别处。" 参见 *Барковский В. Б.* Участ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в созд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 – 50 годы）, М.: ИздАт, 1997, с. 52。

④ *Гончаров Г. А.*, *Рябев Л. Д.* О создании пер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Т. 171, № 1, Январь 2001 г., с. 85.

天，战争进行得最困难的时候，莫洛托夫召见了我，亲手将国外学者关于核能研究的详细报告交给我让我看。报告中介绍了有关在铀—石墨反应堆中可以产生链式核反应的情况，还介绍了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铀－235 同位素的情况……我认为，应当让物理学家们也看一看这份报告并作出评价。莫洛托夫同意了我的建议……我选出了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经莫洛托夫同意，我将上述三人请到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们当时都很年轻。我将报告拿给他们看，并让他们写一份书面鉴定，看报告中有多少信息是准确真实的。看了报告后，库尔恰托夫、阿利汉诺夫和基科因写了一份鉴定，肯定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他们建议在苏联的各个物理研究所广泛开展核物理研究，建造铀—石墨反应堆，制造采用扩散法和电磁法分离天然铀的设备。苏联也曾进行过链式核反应的研究，尤其是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后来因战争中断了。我将科学家们写的鉴定交给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①

1942 年 9 月 27 日，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签署了由卡夫塔诺夫代表人民委员会高校事务委员会和约费代表苏联科学院共同起草的《开展铀研究》的决议草案。② 1942 年 9 月 28 日，斯大林批准并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 2352cc 号《开展铀研究》的决议，责成苏联科学院恢复核能利用研究，并在 1943 年 4 月 1 日前向国防委员会提交制造铀弹或铀燃料的可行性报告。为此，苏联科学院应成立专门的原子核实验室，科学院相关研究机构应开展铀－235 制备方法的研究，政府各部委应向科学院提供相应的场地、材料和设备。莫洛托夫代表国防委员会和政府全面负责这项工作。③ 这样，在科学家们的不断呼吁和国外核研究情报的刺激下，出于对希特勒德国率先拥有核武器的担忧，苏联政府终于做出了恢复战前开始的核研究的决定，是为苏联政府战时直接干预核研究的一个重大举措。

---

① *Первухин М.* Как была решена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 Родина, 1992, № 8－9, с. 53.

② 参见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1, с. 268－269。

③ 参见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1, с. 269－271。

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

时隔不久，1943年2月11日，莫洛托夫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2872cc号决议，责成别尔乌辛和卡夫塔诺夫负责铀问题研究的日常领导工作，并向苏联科学院原子核专门实验室提供经常性的帮助，由“集优秀的组织者和著名学者于一身”[①]的库尔恰托夫担任铀问题科研负责人并在1943年7月5日前向国防委员会递交制造原子弹或生产铀燃料的可行性报告，准予科学院主席团将有关研究人员自喀山调往莫斯科的原子核实验室以完成重要的铀研究任务，指定政府相关部委向苏联科学院提供各种必要的设备和材料。[②]

1943年3月10日，根据国防委员会1943年2月11日决议，苏联科学院副院长A.A.拜科夫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秘书H.Г.布鲁耶维奇签署了苏联科学院第122号决定，任命库尔恰托夫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主任[③]，成员包括：阿利汉诺夫、M.O.科恩菲尔德、涅梅诺夫、П.Я.格拉祖诺夫、C.Я.尼基京、Г.Я.谢普金、弗廖罗夫、П.E.斯皮瓦克、M.C.科佐达耶夫、B.П.杰列波夫。[④]其后，第二实验室人员逐渐扩大。1944年初，第二实验室共有74名工作人员，其中，25人为科研人员，6人为工程技术人员，12人为工人，31人为服务人员。1944年末，第二实验室的人数达到了100人，其中，研究人员占半数左右。到1945年末，第二实验室已有科技人员180名。研究方向分别为：铀—石墨反应堆——由库尔恰托夫领导，采用扩散法进行同位素分离——由基科因领导，重水反应堆——由弗廖罗夫领导，采用电磁法进行同位素分离——由阿尔齐莫维奇领导，采用新方法生产重水——由科恩菲尔德领导，核爆炸工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及原子弹构造技术要求——由哈里顿领导。第二实验室最

---

① *Иойрыш А. И.* Бомба, 2-е изд., доп., М.: ФГУП ЦНИИАТОМИНФОРМ, 2004, с.152.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1938-1945, Ч.1, с.306-307.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1938-1945, Ч.1, с.321.

④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1938-1945, Ч.1, с.382-383.

初是在位于莫斯科佩若夫胡同的苏联科学院地震研究所及位于卡卢加街的苏联科学院普通化学和无机化学研究所两地开始工作的，1944 年 4 月迁入位于莫斯科市郊的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尚未完工的实验医学研究所。[①]

第二实验室的成立是苏联政府战时直接干预核研究的另一重大举措。从此，第二实验室成为苏联战时恢复的核研究中心。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前，虽然政府向第二实验室提供了支持，但力度有限。核研究虽得以恢复，但并未被视为国家首要任务。政府（包括某些学者）对短期内能够研制出原子弹并不抱有希望，只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自主研究的平台，为他们对不断从国外获取的核情报进行理论验证进而形成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创造了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从 1941 年起，苏联便开始搜集国外核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到 1945 年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及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共搜集了近万页的绝密文件。[②]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机构仅在其提供的一份《美国铀问题研究目录》中便包括了 286 个项目的内容。[③]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情报机构仅在 1945 年 8 月 22 日提供的科技情报资料目录中便包括了如下诸多内容：①慢中子透射——12 张胶片；②对六氟化铀质谱仪的介绍——52 张胶片；③栅格对反应堆实验的影响——43 张胶片；④对填充有四乙基铅的盖革计数器的介绍——16 张胶片；⑤对放射性及放射性元素的概述——9 张胶片；⑥对新型鉴别器的介绍——16 张胶片；⑦对脉冲分析器的介绍——21 张胶片；⑧快中子俘获截面的确定——28 张胶片；⑨对慢中子光谱仪的介绍——34 张胶片；⑩慢中子共振吸收时释放的能量——6 张胶片；⑪关于确定慢中子源释放的中子速度的报告——14 张胶片；⑫使用磷酸铋对 48 号还原物质再沉淀的研究——20 张胶片；⑬确定铀－238、钍和碘原子俘获热中子截面的报告——18 张胶片；⑭对从钍中提炼 13 号物质

① *Петросьянц А. М.* Решение яде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1943 – 1946 гг.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46.

② *Барковский В. Б.* Участие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в создан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 с. 54.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с. 354.

的介绍——10 张胶片；⑮对各种元素俘获慢中子截面的介绍——92 张胶片；⑯对含钍盐等的质谱分析介绍——7 张胶片；⑰获取中子的报告——18 张胶片；⑱少量测热分析报告——3 张胶片；⑲裂变的稳定产品——25 张胶片；⑳核物理在医学和生物学中的应用备忘录——15 张胶片。[①] 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1942 年获取的情报资料共计 138 页，1943 年为 449 页，1944 年则为 3868 页。[②] 其中，仅核情报主要来源之一——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一人在 1941～1943 年期间便提供了 570 多页的重要情报资料。[③]

有关国外核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情报对苏联核计划的出台和实施以及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重大意义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促使苏联政府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恢复核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苏联科学家修正核研究方向的重要参考之一，还是苏联政府最大限度地缩短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间的重要保证之一。然而，正如苏联原子弹之父之一的哈里顿所言："不过，情报尽管意义重大，但在证明它真实可靠之前却一文不值。因而，苏联原情报机构人员所谓的正是情报使得库尔恰托夫在没有进行任何实验的情况下便建起了生产车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④] 他又说："情报机构获取的信息无论怎样可信，仍需对之进行仔细验证。当然，苏联的专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他们首先从技术上对情报的真伪进行了鉴定。因而，某些核情报人员所谓的苏联科学家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⑤]

1944 年 5 月 19 日，在库尔恰托夫致斯大林《1944 年 5 月 20 日前的铀问题研究状况》的报告中对第二实验室成立后一年多的工作做了总结汇报，既回顾了第二实验室成立初期遇到的困难，也汇报了第二实验室取得

---

①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ФТИ, 2002, с. 362 – 363.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1, с. 380 – 381.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 – 1945, Ч. 2, с. 467.

④ *Харитон Ю. Б.*, *Смирнов Ю. 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Арзамас – 16: ВНИИЭФ, 1994, с. 12.

⑤ *Харитон Ю. Б.*, *Смирнов Ю. 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с. 60.

的研究成果。他指出："1942年末，苏联政府获悉国外正大规模开展铀研究，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国防委员会于1943年2月11日作出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专门实验室——第二实验室，秘密进行铀问题研究。第二实验室的组建是在战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既缺乏研究人员，也没有场地和设备。第二实验室的组建没有得到科学界的支持。由于保密的原因，科学家们不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对实际利用核能持怀疑态度。始终对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的建设给予关注和支持的是莫洛托夫同志，负责直接和日常领导的是别尔乌辛同志，卡夫塔诺夫同志也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第二实验室借此克服各种困难，发展壮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① 在此，应当强调的是，无论是科研人员进行的分离铀－235同位素和制备钚－239的方法的研究，还是1944年9月25日启动的能提供强大中子源的回旋加速器，都远不及库尔恰托夫对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能性问题做出肯定答复的意义重大。在报告的最后库尔恰托夫作出如下结论："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情报资料的分析和第二实验室进行的理论计算与实验表明，我国普遍认为的铀问题不可能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利用核能制造原子弹和建造核锅炉的途径已经十分明确。可作为原子弹炸药的有铀－235——一种特殊的铀（同位素），在自然条件下与普通铀混杂在一起；另外还有利用回旋加速器制备出来的人造化学元素钚－239。钚－239在地球上早已不存在了，但可以在核锅炉中生产。必须将两块铀－235或钚－239迅速聚拢才能产生爆炸。爆炸是在炸药产生的气体对两块铀－235或钚－239产生压力并使其产生相对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数据表明，原子弹只有在以下条件才能爆炸，即铀－235的重量须保持在2～5公斤左右。美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性能与铀－235类似的钚也需要同样的数量。这样的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用1000吨梯恩梯炸药制造的炸弹。"②

尽管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行性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负责核研究日常工作的别尔乌辛，还是作为核研究首席科学家的库尔恰托夫，都对他们

①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75.

②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75－76.

的直接上司莫洛托夫的领导不力表示不满。1944 年 5 月 19 日，别尔乌辛在致斯大林的题为《铀问题》的报告中请求斯大林就下面四个问题作出决定："1. 为第二实验室补充物理研究人员……2. 建设实验基地，为第二实验室特殊设计院充实设计人员以加快铀－235 分离设备的设计工作。3. 着手制造规模化生产重水的设备……4. 广泛开展铀矿地质勘探工作……成立国防委员会铀委员会，负责铀研究的日常指导和扶持工作，其成员可为：（1）贝利亚同志（任铀委员会主席），（2）莫洛托夫同志，（3）别尔乌辛同志（任铀委员会副主席），（4）库尔恰托夫院士。"[①] 此时，别尔乌辛还暂时保留了莫洛托夫铀委员会成员的位置。但是，相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 1944 年 7 月 10 日草拟国防委员会《开展铀问题研究》的决议时，别尔乌辛和库尔恰托夫便将莫洛托夫排除在了铀委员会之外："国防委员会视全面开展铀问题研究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兹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铀委员会，负责铀研究的日常指导和扶持工作，其成员为：贝利亚同志（任铀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同志（任铀委员会副主席），库尔恰托夫同志。"[②] 1944 年 12 月 3 日，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第 7069cc 号《为保证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所采取的紧急措施》的决议，正式批准贝利亚全面负责铀问题研究。[③]

至此，在苏联政府的干预下，因战争中断的核研究已经恢复，核研究的核心科研机构已经建立，核研究的高层行政和业务负责人已经确定，实际利用核能的可行性问题已经解决。以上，为战后核计划的正式出台和成功实施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三　战后发展核武器的全民总动员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史称波茨坦会议。其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漫不经心"地向斯

①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72－74.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94－96.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169－171.

大林透露了一个消息：美国已经拥有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①] 时隔不久，美国先后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名为"小男孩"和"胖子"的原子弹。在苏联看来，美国的上述举动"与其说是为了迫使日本投降，不如说是为了向全世界显示美国的威力。核武器应该引起恐怖。美国试图借用核武器来迫使苏联屈从于它的蛮横政策，强迫苏联在极端恐怖的战争面前放弃捍卫祖国的斗争。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人应该统治世界——这是批准对日本实施核轰炸的美国掌权者的真实目的。"[②]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日益明显地意识到，与苏联的结盟只是暂时的，与苏联在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却是长久的，在消灭法西斯的战争中表现出实力和潜力的苏联将是美国战后推行世界霸权的巨大障碍，因而，要震慑和敲打苏联，要借军事实力的展示让苏联变得更规矩一些。[③]

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第一管理总局

在上述信号的强烈刺激下，苏联做出了从未有过的积极反应。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签署国防委员会第9887сс/оп号决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④] 1945年8月20日和国防委员会第9887сс/оп号决议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

---

① 对此，杜鲁门、莫洛托夫和朱可夫分别做过如下描述："7月24日，我迅速地向斯大林说明了我们拥有一种毁灭威力非同一般的新式武器。苏联元首对此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很高兴地得悉此事，并希望我们对日本人恰到好处地使用这种武器。"［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原子竞争（1939～1966）》，高强、路汉恩译，原子能出版社，1984，第97页］"在波茨坦，杜鲁门打定主意要让我们吃惊。据我的记忆，这是在美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之后，他神秘地把我和斯大林引到一旁，告诉我们，他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武器，一种超级武器……很难替他说出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想让我们惊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对此很冷静。杜鲁门以为他什么也不懂。虽然没说出'原子弹'，但我们一下子就猜到了他说的是什么。"（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第98页）"我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在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之后，杜鲁门向斯大林透露说，美国有一种威力异常大的炸弹，但他并未把它称为原子弹。"（朱可夫：《回忆与思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第854页）

② C. 斯涅戈夫：《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第212页。

③ 参见 *Иойриш А. И.* Бомба，2-е изд，с. 127，172。

④ 参见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11-14。

成为苏联正式出台和启动核计划的标志性事件。从此，核计划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地位，苏联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和直接领导核计划的实施。苏联核计划进入战后全民总动员阶段。

身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内务人民委员（1945年12月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1945年）、苏联元帅（1945年7月9日）的贝利亚任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主席。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林科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弹药人民委员 Б. Л. 万尼科夫，内务副人民委员 А. П. 扎维尼亚金，库尔恰托夫院士，卡皮察院士，国防委员会副委员 В. А. 马赫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别尔乌辛。在上述人员中，贝利亚主要负责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等侦查机关有关核工业和原子弹技术及经济情报的搜集工作，马林科夫主要负责党政干部问题，沃兹涅先斯基主要负责经济问题，万尼科夫主要负责工业生产问题，库尔恰托夫主要负责科研问题，别尔乌辛主要负责与相关部委的协调工作，马赫涅夫担任委员会秘书工作。专门委员会享有特权，负责领导与核能利用有关的所有工作，包括科学研究、在苏联境内外勘探和开采铀矿、建设核工业、制造核能装置及研制原子弹。1945年9月，国防委员会撤销后，专门委员会归人民委员会领导；1946年4月起，又转归苏联部长会议领导。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在苏联核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最为基本的组织问题。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修改、通过或否定了一系列与核方案的实施有关的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及部长会议的决议、决定和命令，所有决议、决定和命令都由斯大林本人最后签字确认。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专门委员会共召开过84次会议。1945～1949年，专门委员会共出台1000个与苏联核计划有关的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部长会议决议、决定和命令。专门委员会部门齐全，经济独立核算，在国家银行设有往来账户。为保证专门委员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国家计划委员会特设第一局，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 А. 鲍利索夫任局长。专门委员会的财政支出在苏联预算中的“国防专项支出”里单独立项。专门委员会的所有活动都严格保密。专门委员会会议议事日程安排及包括会议记录和决议、决定及命令草案等从不散发。提交例会研究讨论的问题由专门委员会秘书在会议召开前两天内电话通知专门委员会各个成员，为

此，只有秘书可以事先接触有关材料。与会人员的名单由专门委员会主席事先确定。[①]

专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由万尼科夫任主席，阿利汉诺夫院士任学术秘书，其他成员有：И. Н. 沃兹涅先斯基通讯院士，扎维尼亚金，约费院士，卡皮察院士，基科因通讯院士，库尔恰托夫院士，马赫涅夫，哈里顿教授，赫洛平院士。技术委员会负责审议与核能利用有关的科技问题、科研计划和科研报告及技术设计方案并提交专门委员会讨论。技术委员会下设三个常设分委员会，分别为：由约费院士领导的离子方法研究委员会，先后由卡皮察和化学工业副人民委员 А. Г. 卡萨特金领导的重水生产委员会，由赫洛平院士领导的钚制备研究委员会。1945 年 12 月 10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 3061－915сс 号决议批准成立专门委员会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对核能利用企业的设计和建设及核能利用专用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提供工程技术指导。工程技术委员会下设五个分委员会。[②] 1946 年 4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第 803－325сс 号决议《苏联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问题》决定改组第一管理总局机构，将专门委员会的技术委员会和工程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③] 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主席由万尼科夫担任，副主席由库尔恰托夫、别尔乌辛、В. А. 马雷舍夫、扎维尼亚金担任，成员有阿利汉诺夫、基科因、卡皮察、В. С. 叶梅利亚诺夫、С. Л. 索伯列夫、亚历山德罗夫、梅谢里亚科夫、赫洛平、И. Ф. 捷沃相，学术秘书由 Б. С. 波兹尼亚科夫担任。科技委员会下设四个分委员会：核反应堆委员会，由别尔乌辛任主席；采用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委员会，由马雷舍夫任主席；采用电磁法分离铀同位素委员会，由 И. Г. 卡巴诺夫和 Д. В. 叶夫列莫夫任主席；金属冶金和化学委员会，由叶梅利亚诺夫任主席。库尔恰托夫负责铀—石墨核反应堆，阿利汉诺夫负责铀—重水反应堆，阿尔齐莫维奇负责采用电磁法分离铀同位素，基科因负责采用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④]

---

① *Иойрыш А. И.* Бомба，2－е изд，доп.，с. 274－275.

②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415－419.

③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848.

④ 参见 *Первухин М.* Как была решена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с. 54。

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局长由万尼科夫担任，扎维尼亚金任第一副局长，其他副局长为鲍利索夫、П. Я. 梅什克、П. Я. 安特罗波夫及卡萨特金。第一管理总局的副局长均为与核计划的实施密切相关的各部委负责人。扎维尼亚金是内务副人民委员，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包括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在内的所有工程建筑单位，将负责核工业设施的建设。安特罗波夫是苏联地质部部长，将负责铀矿的地质勘探和加工。梅什克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负责人事和保密工作。卡萨特金为化学工业副人民委员。第一管理总局负责对参与核能利用研究和原子弹研制的科研和设计部门及生产企业的直接领导，负责分配和划拨供专门委员会使用的资金、人员和技术物资。第一管理总局及其下属企业机构受专门委员会领导，只向专门委员会汇报工作。不经国防委员会特许，任何组织、机构及个人不得干涉第一管理总局的行政事务和业务活动，不得过问其下属及协作单位的工作。第一管理总局成立后，各部委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部门配合其工作，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九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业建筑工程总局、地质委员会第一勘探总局等。第一管理总局还从其他部委接收并成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所和设计院及生产企业。第一管理总局的地位相当于国家中央机构，享有特权，所需的物资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单列计划并优先供应，组织结构机动灵活，极大地简化和缩短了各部委间协调工作的程序和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此，斯大林亲自指定的核计划决策机构——专门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第一管理总局、技术委员会和工程技术委员会及二者合并后的科技委员会的成立首先解决了苏联实施核计划的组织和管理问题。[①]

铀原料

尽管早在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时期便已开始勘探和开采铀矿，但由于发现的铀矿资源有限，且品位极低，含量极少，铀原料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始终困扰着苏联的核研究人员，也是苏联实施核计划的重大障碍之一。

柏林刚刚被攻克，一架飞机便从莫斯科起飞，上面乘坐的是由苏联内

① 参见 *Иойрыш А. И.* Бомба，2－е изд，с. 273－274。

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和第二实验室科研人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准备去德国完成特殊使命。数日后，国防委员会作出第8568cc号决议，布置特别行动小组把在德国找到的重要物资和人员运回苏联。[1] 1945年6月18日，苏联内务副人民委员扎维尼亚金和马赫涅夫向贝利亚报告："根据国防委员会决议及您的命令，已在德国将下述设备和物资拆卸并装运回苏联：运往苏联的设备和物资有7个专列，共380个车皮。7个专列将在布列斯特换装。第一个专列已在布列斯特换装完毕并运抵莫斯科。随同物理研究所和化学冶金企业的设备抵达苏联的还有39名德国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及其61位家属，共99人，名单附后。在德国不同地方发现的约250～300吨铀化合物和约7吨金属铀，已经全部运回苏联。在红军进入柏林之前，大量的设备、技术资料及专家被转移到了图林根及其他地区，现为盟军辖区，不久将被解放并由我军接管。稍后，需派工作小组前来德国对上述设备、技术资料及专家进行核实并运回苏联。"[2] 1946年初，库尔恰托夫曾这样写道："1945年5月前，铀—石墨反应堆点火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因为我们总共只有7吨氧化铀。要在1948年前弄到反应堆所需的100吨铀显得非常渺茫。去年年中，贝利亚同志向德国派出了以扎维尼亚金、马赫涅夫和基科因同志为首的由第二实验室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寻找铀和铀原料。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特别小组找到了300吨氧化铀及其化合物并将其运回苏联。这不仅大大改善了铀—石墨反应堆的境况，而且也大大改善了整个铀研究的境况……"[3] 在德国发现并运回苏联的这批铀原料解了苏联的燃眉之急，为苏联第一座物理实验堆的点火和启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后来，苏联政府除了大力开发本国的铀矿资源外，还分别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签订长期协议，共同开展铀矿勘探和开采并将加工后的铀产品供给苏联，以满足苏联核计划对铀原料的需求。1945年11月23日，苏联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亚希莫夫铀矿并向苏联企业提供开采出的铀矿石。1946年

---

① 参见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292。

② 参见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323－324。

③ 参见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293。

10月，苏联政府又同东德签订同样的协议。随后，在东德成立了苏德股份公司“维斯穆特”，开采铀矿，运往苏联。第一管理总局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内，苏联的铀矿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下面所引表格基本上反映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期间的铀原料来源情况。①

年份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铀矿石总计（千吨）	18.0	110.3	338.2	634.4	1267.3	2056.8
苏联	18.0	50.0	129.3	182.5	278.6	416.9
东德、捷、波、保		60.3	208.9	451.9	988.7	1639.9
金属铀精矿（吨）	14.6	50.0	129.3	182.5	278.7	416.9

铀原料问题解决后，随之而来的是从天然铀中分离出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同位素的问题。天然铀中共含三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其含量分别为0.006%、0.72%和99.27%。也就是说，每1000个铀原子中只有7个是铀-235，也只有铀-235经高度浓缩或纯化后才可用来制造原子弹。要获得足够数量的铀-235，必须对天然铀进行同位素分离，然而，分离工艺相当复杂，且周期长、投入大。虽然铀-238不能直接用于制造原子弹，但可以在核反应堆中经过一系列裂变反应蜕变成与铀-235一样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239。要获得钚-239，在核反应堆中直接使用天然铀即可，其成本要比分离和浓缩铀-235低得多。库尔恰托夫决定走这条捷径。他曾在写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制造核炸药的实际工作应当集中于铀—石墨反应堆，应将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并不是说铀—石墨反应堆是最佳方案（就原材料的消耗及其他指标而言），但就科技研究状况而言，它却是唯一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出钚-239的方案。”②

物理实验堆 Ф-1

在库尔恰托夫的直接领导下，第二实验室开展了对核反应堆的研究。

① *Белоусов Р.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ИздАт, 2003, с. 309.

② *Князькая Н. В.* И. В. Курчатов 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работ первого этапа решения атом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СССР, 1943 - 1946 гг.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40 - 50 годы), М.: ИздАт, 1999, с. 102.

И. И. 古列维奇、泽利多维奇、И. Я. 波梅兰丘克和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Е. Л. 法因贝格、И. М. 弗兰克等人进行了核反应堆的自持链式裂变反应的理论计算，库尔恰托夫、弗廖罗夫、В. А. 达维坚科和 И. С. 帕纳修克等则进行了裂变反应过程中中子的增殖实验研究。1945 年末，第二实验室开始了核反应物理实验堆 Ф-1 的施工建设。在新建的厂房里，地下挖了一个直径为 10 米、深度为 7 米的基坑，用混凝土浇灌而成。包括反射层在内的实验堆活性区的直径为 6 米，均由 10 厘米 ×10 厘米 ×60 厘米的直角型高纯度石墨砖堆砌而成，外观为球型结构。活性区石墨块的间距为 20 厘米，层层叠加，每块石墨砖上都钻有一个圆孔，里面装着直径为 32 毫米和 35 毫米的高纯度金属铀块。1946 年 12 月 25 日，库尔恰托夫亲自启动了苏联第一座物理实验堆，实验堆达到临界状态并产生链式反应。[①]

1946 年 12 月 28 日，贝利亚、库尔恰托夫、万尼科夫和别尔乌辛共同起草了致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1946 年 12 月 25 日，在库尔恰托夫实验室建成并启动了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在铀—石墨锅炉运行的最初几天（12 月 25 日、26 日和 27 日），我们首次在苏联实现了半规模化链式核反应。同时，我们也实现了对锅炉的调整和对链式核反应的控制。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共装载了 34800 公斤纯金属铀、12900 公斤纯二氧化铀和 420000 公斤纯石墨。铀—石墨物理实验锅炉的启动为我们解决工业化生产及利用核能等重要问题创造了条件。"[②] 1947 年 1 月 9 日，物理实验堆 Ф-1 启动两周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专门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苏联核计划的主要科研人员，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奖励库尔恰托夫等人的决定。[③]

苏联物理实验堆 Ф-1 的启动是苏联核计划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它不仅检验并证实了苏联核物理学家所掌握的可控链式裂变反应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为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钚－239 的制备和研究及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和依据，而

① *Жежерун И. Ф.* Первы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атомный реактор Ф－1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50 годы），Т. 2，М.：ИздАт，1999，с. 73.

②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631.

③ *Гончаров Г. А.*，*Рябев Л. Д.* О создании перв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с. 99.

且还大大增强了苏联政府和领导人及全体研究人员对成功实施核计划的坚定信心。正如别尔乌辛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反应堆的成功启动表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参与核计划的专家对我们是否能取得成效还心存疑虑。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不仅加快了各项工作的进展速度，而且也使各项工作的进展变得更加顺利。"[①]

817 综合厂

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的泰勒曾说："裂变材料的生产是制造原子弹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一旦攻克这一难关，原子弹在几个月之后便可以制造出来。"[②] 苏联高度重视用于制造原子弹的裂变材料的生产。核计划刚刚开始实施，物理实验堆尚未启动，苏联便已着手筹建生产裂变材料钚－239的综合厂——817综合厂。

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第802－324cc/оп号《关于筹建817厂及817厂施工和投产期限》的决定。[③] 817综合厂厂区位于苏联重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市西北80公里、克什特姆市以东15公里处，坐落在水域为17平方公里、水容量为8400万立方米的克孜勒塔什湖南岸。厂址是由曾任克什特姆地区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扎维尼亚金在1945年末选定的。为保密起见，817综合厂曾先后被称为车里雅宾斯克－40、车里雅宾斯克－65等，是苏联最大的核军工企业，堪比美国的汉福德核军工企业，现为俄罗斯"灯塔"联合公司。817综合厂下设三个分厂，分别为А厂、Б厂和В厂。А厂即工业堆，主要进行在反应堆中辐照金属铀块的工作；Б厂即放射化学厂，它的主要任务是溶解在А厂辐照过的金属铀块，分离并制备钚浓缩溶液，然后交付В厂进入下一道工序；В厂即化工冶金厂，主要对分离出来的钚进行纯化和加工并生产供制造原子弹用的金属零部件。1946年4月24日，在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由第11国营联合设计所和第二实验室提出的817综合厂总体建设设计方案，确定了反

---

① *Петросьянц А. М.* Решение ядерной проблемы в 1943－1946 гг.，с. 66.

② *Круглов А. 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к первому промышленному ядерному реактору в Челябинске－40－Комбинат № 817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М.：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1995，с. 57.

③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115.

应堆、循环水冷却系统、给水及化学净化处理设施、生活区等的布局规划。第二实验室负责工业堆的工程建设及科技指导，科学院镭研究所负责对放射化学厂的科技指导，第9研究所则负责对化工冶金厂的科技指导。①

生产裂变材料钚－239的第一个环节是反应堆。早在1945年春，第二实验室便在库尔恰托夫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功率为10万千瓦的工业堆的研究和设计工作。经过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铀—石墨反应堆的方案，决定采用普通水作为冷却剂。1946年1月28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229－100сс/оп号决定，库尔恰托夫被任命为工业堆建设项目科技负责人，莫斯科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所长Н.А.多列扎利被任命为工业堆总设计师。政府决定在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液压设计室，人员从其他设计部门调入。钢结构设计院（Н.П.梅利尼科夫任院长）、航空工业部设计院（А.С.阿布拉莫夫任院长）、航空材料研究所（А.В.阿基莫夫任所长）、物理化学研究所（弗鲁姆金院士任所长）、全苏液压机械制造研究所（В.В.米什克教授设计室）等也参与了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的设计工作。进入化工机械制造研究所的全体设计人员被分成5个小组，同时进行设计。1946年2月，多列扎利提出了由立式结构的工艺管路取代卧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立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是全新的和独创的，它的最大优点是可以避免反应堆的许多构件发生变形的问题。卧式结构的工艺管路的设计方案是美国在曼哈顿计划中所采用的，虽已得到成功的验证，但存在着诸多弊端。1946年7月10日，第一管理总局科技委员会最终确定了立式结构的方案。②

1946年5月，817综合厂建设工程动工，开始平整场地、铺设道路、修建工棚。1946年9月，举行了工业堆奠基仪式，工人们用锄头和铁锹挖掘出一个用于建造生产堆的40米深的基坑。负责817综合厂工程建设的扎维尼亚金在提到工业堆主体工程的施工量和投入的人力时曾给出下面一组数字："土方工程为19万立方米，多为硬土层。浇灌混凝土82000立方米，

---

① *Новиков В. М.*, *Сегерщталь Б.*, *Меркин В. И.*, *Попов В. 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аяк" (1946－1949) //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40－50 годы), Т. 3, М.: ИздАт, 2003, с. 350.

② *Новиков В. М.*, *Сегерщталь Б.*, *Меркин В. И.*, *Попов В. 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аяк", с. 349.

砌砖6000立方米……在第一管理总局的建筑工地，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总人数为45000人。"① 这些人中还包括大量的犯人。1947年末，工业堆的外体工程竣工。1948年1月，在总设计师代表В.Ф.古谢夫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堆的内部装配。工业堆的内部装配工作是由第21建筑安装管理局、第11建筑安装管理局、第71设计安装局、"热控制"建筑安装管理局、"乌拉尔卫生设备"建筑安装管理局等共同承担和完成的，共安装了5000吨金属构件和基本设备及5745个调节阀门和3800个仪表，铺设了230公里长的不同直径的管线及165公里长的电缆。1948年3月，开始堆砌工业堆的活性区和石墨块反射层，共用去150吨高纯度金属铀块和1000吨高纯度石墨。反应堆的活性区位于零刻度以下的混凝土井里，井壁厚达3米，壁外是里面盛满了水的钢制贮水池。活性区直径为9.4米，里面铺设了1168个工艺管路。每个管路上都装有显示器和信号系统，用以测定数据的变化并显示水流的增加和减少、水温的急剧变化及石墨管路进水等紧急情况。除紧急保护系统外，工业堆还有控制系统、冷却系统及核燃料换装系统等。1948年5月末，工业堆主体装配完工。为筹备和进行工业堆的启动工作，第二实验室专门成立了由40多人组成的分部。第二实验室第6研究室主任В.И.梅尔金被任命为工业堆总工程师。1948年6月8日，库尔恰托夫下达了启动反应堆的指令，在工艺管路未注水的情况下进行了物理点火。6月10日，工艺管路中注满水的反应堆达到临界状态。工业堆的启动工作在6月19日接近尾声，首次达到10万千瓦的设计功率。从1948年7月起，工业堆开始不间断地全功率运行。尽管在点火启动阶段和后来的正常运行阶段，工业堆曾发生过大大小小的各类故障，出现过诸如铝质外壳腐蚀、渗漏等情况，但在所有参与工业堆建设的人员共同努力下，817综合厂首个分厂的建设和投产任务完成，开始规模化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钚-239。②

在进行工业堆设计施工的同时，817综合厂的其他两个分厂也进入了紧张的设计和建设阶段。放射化学厂的设计方案首先由苏联科学院镭研究所提出，列宁格勒国家联合设计所又做了进一步完善。1946年12月，放射化学厂主体厂房建设动工，生产设备的安装和干线的铺设及墙体的垒砌

① *Круглов А. 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с. 81.

② *Новиков В. М.*, *Сегерщталь Б.*, *Меркин В. И.*, *Попов В. 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аяк", с. 351.

同时进行。1948 年 8 月末，放射化学厂开始安装遥控装置，进行投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48 年 12 月 22 日，在工业堆中辐照过的首批金属铀块被送到放射化学厂。1949 年 2 月 26 日，在金属铀块经去除铝质外壳、在硝酸溶液中溶解以及铀、钚分离和纯化等工序后，放射化学厂将首批成品——钚浓缩液送往化工冶金厂。[①]

化工冶金厂最初设在海军部仓库，位于克什特姆市和塔特什火车站附近。1948 年 3 月 3 日，在与工业堆和放射化学厂相联的一片生产场地上建起了一栋三层楼房，这便是化学冶金厂的新厂房。化学冶金厂最先是由第九研究所设计室设计的，第十二国家联合设计所最终完成了设计方案。1949 年 2 月 26 日，在收到放射化学厂送来的最终产品钚浓缩液后，化工冶金厂投产运行。1949 年 2 月 27 日，第九车间生产出首批钚硝酸溶液。1949 年 4 月，在尚无生产工艺规程的情况下，第九车间又完成了高纯度二氧化钚的生产任务。1949 年 6 月，冶金车间生产出了足够用来制造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金属钚。1949 年 8 月，半球体钚装料制作完成，从而保证了 1949 年 8 月 29 日在谢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进行的苏联首个原子弹试验。[②]

为建设 817 综合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建设施工和设备配套等一应费用无须事先提出预算，全部按实际支出拨付。全国有数十家工厂和研究所参与了 817 综合厂设备、仪器和装置的生产制造与安装和调试，数以万计的工人、军人及犯人参与了 817 综合厂的施工建设。[③]

---

① *Круглов А. К.* Первый радиохим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Комбината № 817 по выделению плутония дл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111.

② *Новиков В. М.*, *Сегерштaль Б.*, *Меркин В. И.*, *Попов В. К.*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Маяк", с. 354.

③ 根据 1950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数据，著名的美国苏联核计划史研究专家霍洛维认定，参与苏联核计划的总人数在 33 万～46 万人，其中，建筑人员为 5 万～6 万人，生产人员为 2 万～3 万人，科研和实验设计人员为 5 千～8 千人。参见 *Новиков В. М.*, *Сегерштaль Б.*, *Попов В. К.*, *Князькая Н. В.* Создан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ерв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Маяк》（1946 - 1949）// Наука и общество: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40 - 50 годы），М.: ИздАт, 2003, с. 348。俄罗斯学者则认定，截止到 1948 年，包括工程技术人员在内，参与 817 综合厂各分厂和车里雅宾斯克－40 建筑工程的人数为 45000 人。参见 *Круглов А. К.* Первый радиохим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 Комбината № 817 по выделению плутония дл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с. 104。

在一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核计划的行政和科技负责人万尼科夫和库尔恰托夫就住在离817综合厂施工现场不远的一座芬兰式住房里。苏联核计划的核心领导机构专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及扎维尼亚金、别尔乌辛等其他成员也都定期前来工地察看施工进度、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及安装情况。[①]817综合厂的建设和投产是苏联在实施核计划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一步，此时，离苏联核计划的阶段性成果——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完成与成功试验仅咫尺之遥。

813综合厂

1943年，第二实验室自成立起便开始探讨对气体相的铀同位素进行分离的可行性问题，并将同位素分离确定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战争期间，化学工业人民委员部第42研究所首次获得了可用于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铀化合物——六氟化铀。战争结束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科因开始同数学家索伯列夫和理论物理学家 Я. А. 斯莫罗金斯基埋头进行气体扩散理论的研究。他们让气态六氟化铀通过带有大量小孔的挡板，以此获得了高纯度的铀－235轻质同位素。1945年12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第3007－892cc号决议，在原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第261厂的基础上建设采用气体扩散法生产铀－235的813综合厂。[②] 813综合厂位于上涅伊文斯克村，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80公里。这里曾先后被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4和新乌拉尔斯克。813综合厂建设工程负责人为 И. П. 博伊科夫，总工程师为 Б. М. 谢尔久科夫，设计单位为第十一国家专业设计所。813综合厂于1946年动工建设，1949年竣工投产。基科因担任813综合厂科技总负责人，索伯列夫院士领导理论计算工作，著名的液压机械专家沃兹涅先斯基领导生产工艺研究。列宁格勒基洛夫厂和装备部高尔基机械制造厂的设计院参与了铀浓缩扩散分离设备的研制。经实验，列宁格勒基洛夫厂设计院设计制造的扩散分离设备不符合要求被淘汰，装备部高尔基机械制造厂设计院设计制造的扩散分离设备被采用。813综合厂共安装了6000台压缩机，每128台分为1组。1949年11月，813综合厂Д－1厂

① *Круглов А. К.* От опытного реактора Ф－1 в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с.* 81.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45－52.

生产出首批纯度为75%的浓缩铀-235。从1950年起，813综合厂每年生产数十公斤浓缩铀，纯度达到了94%。[①]

除气体扩散法外，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还同时组织开展了采用电磁法和离心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研究，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45（即列斯诺伊市）建起了高浓缩铀-235电磁分离厂，列宁格勒基洛夫厂设计院总设计师H. M. 西涅夫在以施腾贝克为首的德国专家的参与下研制出了气体离心机。[②]

不过，由于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技术上的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无论是813综合厂还是电磁分离厂及气体离心机，都未能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浓缩铀，未能在苏联核计划实施初期——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作用。

第11设计院

第二实验室早在成立之初便将核爆炸和原子弹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由哈里顿负责。1946年4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专门的设计院承担核爆炸研究和原子弹设计任务。第805-327cc号决议《第二实验室问题》规定：①将第二实验室第6研究室改组为第二实验室设计室，承担原子弹的设计和生产任务；②设计室的正式名称为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③任命运输机械制造部副部长П. M. 焦尔诺夫为设计院院长，哈里顿为总设计师；④接受万尼科夫、扎维尼亚金、哈里顿等人的建议，将农业机械制造部550厂厂址及附属用地划归第11设计院；⑤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承担核爆炸理论研究任务；⑥第一管理总局负责向第11设计院和化学物理研究所提供物质技术支持。[③]

550厂原为生产体育用品的小厂，后被改造为机器制造厂，1939年开始生产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为国防企业，代号550。1942年末开始生产新的产品——“喀秋莎”火箭炮M-13型炮弹零部件。1946年1月，550厂划归农业机械制造人民委员部。550厂位于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与高尔基州结合地带的萨罗夫村，地处俄罗斯腹地，树木繁茂，人口稀

① *Андрюшин И. А.*, *Чернышев А. К.*, *Юдин Ю. 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 Саров: Красный Октябрь, 2003, с. 299.

② *Андрюшин И. А.*, *Чернышев А. К.*, *Юдин Ю. 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 с. 299-300.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01.

少，居民 2000~3000 人，有 17 条乡间土路与外界相通，一条窄轨铁路支线与沙特基车站相连。萨罗夫村曾以萨罗夫修道院闻名，一度被奉为东正教的耶路撒冷。十月革命后，萨罗夫修道院被苏联政府查封，用作少年和成年犯人的劳动改造营，渐渐被人们淡忘。第一管理总局派专人考察了萨罗夫村。之后，因符合"偏僻之地、远离大道、距莫斯科 400 公里之内"等选址条件，既便于进行秘密核爆炸试验又距核计划管理中心不远，萨罗夫村被确定为第 11 设计院所在地。从此，萨罗夫在苏联各类地图上"消失"。为保密起见，这里曾先后被称为"550 工程"、"112 基地"、苏联城市建设总局伏尔加沿岸办事处、"莫斯科中心－300"、阿尔扎马斯－75、阿尔扎马斯－16 等。[1]

1946 年 4 月 13 日，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第 11 设计院建设工程分两期完成：一期工程从 1946 年 6~7 月开始，进行 550 厂旧房改造和新房建设；二期工程在 1946 年底前结束，完成旧房改造和新房建设。[2] 1946 年 6 月 10 日，专门委员会确定一期工程竣工期限为 1946 年 10 月 1 日前。[3] 1947 年 3 月 24 日，在苏联部长会议第 652－227сс/оп 号关于《第 11 设计院问题》的决定中再次确定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在 1947 年 4 月 15 日前和 9 月 1 日前竣工并交付使用。[4] 第 11 设计院建设工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成立的第 880 建筑局承担。

第 11 设计院首批基本建设投资为 3000 万卢布。截止到 1947 年 1 月，第 11 设计院的建设资金已达 8800 万卢布，仅安全保卫系统的投入就超过了 600 万卢布。[5] 最初几年，第 11 设计院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主要依赖飞

① *Харитон Ю. Б.*, *Смирнов Ю. Н.*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с. 25.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02－103.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39－140.

④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243－245.

⑤ *Михайлов В. Н.*, *Негин Е. А.*, *Цырков Н.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КБ-11 и опытной базы для завершающей стадии создания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в Сарове Мордовской АССР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206.

机，政府曾先后调拨3架飞机供第11设计院使用。第11设计院的部分实验室于1947年春开始工作，同年秋天，全部实验室投入工作。[1]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6年6月22日第1286－525cc号决议，第11设计院下设10个实验室，分别是：1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核炸药；2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爆炸及球形核装料中金属芯压缩的瞬间反应过程的超高速X射线照相技术，炸药运动速度的测量方法，完善研究方法和研制新的仪器；3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超高压（球形核装料冲击波）下物质平衡状态的确定，核装料中心部位的模式；4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核爆炸的效能和威力；5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进行核装料物理实验；6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发光问题；7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裂变冶金和机加工问题；8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原子弹核材料钚和铀的物理机械性能；9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裂变材料铀和钚的质量检验；10号实验室，主要任务是研究安全保险系统。[2] 第11设计院的设计部门是从1947年逐渐建立起来的。起初，设计工作由B. A. 图尔比涅尔负责。1948年夏，第11设计院设计部门开始改组，成立了两个研究设计室——1室和2室。1室由原车里雅宾斯克基洛夫厂总设计师Н. Л. 杜霍夫少将任主任，2室由原里海鱼雷制造厂厂长В. И. 阿尔费罗夫上校任主任。两年后，决定将两个设计室合而为一，由杜霍夫担任主任，下设11个分设计室，主要进行下列研究：原子弹弹壳及技术文件；核装料；原子弹自动化系统；核装料的电引爆系统；自动化系统控制仪器及放射性检测仪器等。在成立一系列研究、实验和设计部门并进行相关研究、实验和设计的同时，第11设计院还建起了两个生产实验基地——1厂和2厂，А. К. 别萨拉卜科和А. Я. 马利斯基分别担任两个厂的厂长。第11设计院人才济济，包括爆炸过程、核物理、分析化学、无线电技术、X射线照相、放射化学、真空技术工程设计、火炮系统、高压仪器、精密机械、信号弹制造技术、机器制造、机械、金属、弹药制造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还有炸药锻压、炸药铸造、万能车工、造型工、研磨工等各个工种的技术工人。他们

---

① *Михайлов В. Н.*, *Негин Е. А.*, *Цырков Н.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 КБ-11, с. 206 – 207.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46 – 148.

有的来自包括高级军校在内的军事部门，有的来自地方党组织，有的则来自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上述人员必须经过安全部门的专门审核，只有审核合格后他们才可以进入第11设计院工作。①

在苏联部长会议1946年6月21日第1286-525cc号《关于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工作计划》的决议中首次明确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并规定了研制原子弹的期限：第11设计院接受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库尔恰托夫）的科技指导，研制两种型号的“C系列喷气发动机”（简称PДC），PДC-1使用重燃料（钚-239），PДC-2使用轻燃料（铀-235）。固定式PДC-1和PДC-2各1台，分别于1948年1月1日前和1948年6月1日前研制完成并交付地面试验。机载式PДC-1和PДC-2各1台，分别于1948年3月1日前和1949年1月1日前研制完成并交付空中试验。农业机械制造部第6和第504研究所及第47设计院、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装备部第88厂设计院、运输机械制造部基洛夫厂设计院以及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和设计机构协助第11设计院的工作，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和设计。②

苏联对原子弹构造基本原理的认识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1942年12月21日写给库尔恰托夫的信中，弗廖罗夫就已提出了原子弹构造的初步设想。他描述了原子弹“枪击式”构造的基本原理，还绘制了草图加以说明。③ 不过，这仅仅是设想而已。1992年8月11日，PДC-1的总设计师哈里顿在接受《红星报》记者采访时曾公开表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美国原子弹的复制品。”④ 事实也是如此。1945年3月6日，在库尔恰托夫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提供的情报资料所做的鉴定中就包括原子弹构造的内容。库尔恰托夫对原子弹的内爆式构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材料极有价值，其中包括许多我们尚未研究过的问题：1.用氢化

---

① *Михайлов В. Н.*, *Негин Е. А.*, *Цырков Н. 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филиала Лаборатории № 2 – КБ-11, с. 209.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46 – 148.

③ *Смирнов Ю. Н.* Г. Н. Флеров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атомного проекта, с. 152.

④ *Михайлов В. Н.*, *Негин Е. А.*, *Цырков Н. А.* Основные задачи, решаемые КБ-11 и привлечен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в ходе разработки перв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218.

铀－235替代铀－235作为原子弹的炸药；2. 采用内爆法引爆原子弹……内爆法要求在爆炸过程中具备巨大的压力和极高的速度。材料中指出，如果压力对称，内爆法可以将粒子的相对速度提高到1万米/秒。因而，内爆法大大优于枪击法。目前还不能做出最终的正确结论，然而，毫无疑问，内爆法更值得关注。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应当进行细致严密的理论和实验分析。"① 1945年7月2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向国内提供了美国准备进行原子弹试验的情报，其中也提到了原子弹的构造：原子弹的放射性物质为94号元素（即钚——笔者注），没有使用铀－235。在重量为5公斤的球形钚中央装有起爆器，即铍－钋α粒子源，钚周围是铀。这些都被包裹在一个11厘米厚的铝壳里，铝壳外面是一层46厘米厚的炸药。原子弹外壳内径为140厘米，总重约为3吨。预计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为5000吨当量的梯恩梯炸药。② 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于1945年7月16日进行。1945年10月19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B. H. 梅尔库洛夫向贝利亚报告了更为详细的美国原子弹的构造情况。美国成功试爆的原子弹外观呈梨型，最大直径为127厘米，包括尾翼在内的总长度为325厘米，重量为4500公斤左右。原子弹由中子源、裂变材料、减速剂、铝层、炸药、炸药透镜系统、引爆装置、硬铝外壳、装甲钢壳及尾翼等部件构成，选用δ相钚－239作为裂变材料，采用内爆法引发裂变。爆炸高度为30.5米，当量为1万吨梯恩梯炸药，准确数字为2万吨。爆炸温度为摄氏7千万度，914米范围内的放射性达1000伦琴。③ 应当承认，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确是以美国试验成功的钚弹为原型仿造的，这使得苏联在研制РДС－1的过程中少走了弯路，缩短了时间，节省了经费。然而，这并不等于低估甚至否定了苏联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为了验证情报的准确性，科技人员必须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验工作。

1946年7月1日，哈里顿和焦尔诺夫向万尼科夫提交了《原子弹战术技术任务书》，首次规定了РДС－1和РДС－2两种型号的原子弹的基本构

①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245－246.

② *Рябев Л. 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1938－1945, Ч. 2, с. 329－330.

③ *Андрюшин И. А.*, *Чернышев А. К.*, *Юдин Ю. А.* Укрощение ядра, с. 63－65.

造。钚弹将采用内爆法达到临界，铀弹将采用枪击法达到临界。钚弹和铀弹的外形为机载炸弹，重量不超过5吨，长度不超过5米，直径在1.5米之内。钚弹和铀弹将用于空投。[1] 1946年7月1日这一天被苏联核计划史研究专家们视为苏联РДС系列原子弹研制的起始时间。从此，在第11设计院展开了紧张的原子弹设计和实验工作，其他研究和设计机构也积极参与和配合。第11设计院集中研制核装料，选择炸药配方，制订核装料部件生产工艺，研究收敛球面爆轰波，设计原子弹弹体，等等。农业机械制造部第6研究所承担了同步引爆电雷管的研制任务，第504研究所承担了自动高空无线电传感器和同步电雷管供电系统、第47设计院承担了机载原子弹弹体、稳定器及固定件的研制任务，第二实验室承担了与临界质量、核装料外形、核爆炸、中子源及枪击式原子弹射击时的同步等问题有关的研究，装备部第88厂设计院承担了枪击式原子弹的枪管及射击机械的设计任务，运输机械制造部基洛夫厂设计院承担了核装料零部件及个别自动化仪器仪表的设计任务，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承担了包括炸药的收敛球面爆轰波、爆轰波对金属的作用、爆炸威力的测定及临界质量的确定等理论计算工作。

尽管第11设计院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所有部门和人员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原子弹的研究和设计工作量极大、研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比预料的多、原子弹零部件的生产不能及时完成、为第11设计院选派科技人员的工作滞后、第11设计院的必要设施和场地不能如期交付使用等多种原因，苏联部长会议于1946年6月21日批准执行的原子弹研制计划未能如期完成。有鉴于此，1948年2月8日，斯大林签字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234－98сс/оп号《关于苏联科学院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工作计划》的决议，对1946年6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286－525сс号决议中规定的原子弹研制期限做出了新的调整，即：РДС－1的研制在1949年3月1日前完成并交付试验、РДС－2的研制在1949年12月1日前完成并交付试验。然而，由于817综合厂和813综合厂不能及时提供钚装料和浓缩铀，РДС－1直到1949年8月才得以交付试验，而РДС－2

---

[1]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52－154.

则更推迟到了1951年。[1]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

苏联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弹的同时便已开始为原子弹试验做准备，积极筹建原子弹试验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要决议。1946年11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第2493－1045сс/оп号《关于筹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管理总局采矿场的措施》的决议规定，采纳第一管理总局的建议，修建РДС系列原子弹专用试验场。为保密起见，试验场将使用"第一管理总局采矿场"这一名称。决议规定，试验场的设计任务由第一管理总局下属的国家特种工程设计院承担，执行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装备部、电气工业部、武装力量部、国家光学研究所、全苏电工研究所、空军研究所等部门和机构承担总体设计方案中相关的任务。[2] 1947年4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1092－313сс/оп号《采矿场（905工程）问题》的决议，将试验场的代码"905工程"改为"310工程"，由工程兵承担试验场的工程建设任务，1948年第一季度完成包括试验场、机场、住房、安全保卫设施等在内的施工装配任务，财政部向工程预支建设费用1500万卢布。任命工程兵少将М.И.切尔内赫为"采矿场"建设施工负责人，炮兵中将П.М.罗扎诺维奇为"采矿场"场长，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的М.А.萨多夫斯基为科技负责人。[3] 1947年6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又在一天内接连出台两个决议。第2141－563сс/оп号《905工程问题》的决议确定了"905工程"的施工地点为谢米巴拉金斯克以西170公里处的额尔齐斯地区，占地半径为10公里。[4] 第2142－564сс/оп号决议《采矿场问题》则明确了原子弹试验的主要目的：①测定裂变物质的有效系数，检验原子弹构造的合理性；②测定

①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390－393.

②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198－203.

③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250－251.

④ *Рябев Л.Д.* （*общ. ред.*） 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284－286.

核爆炸的破坏能力。[1]

试验场原址为苏联武装力量部（后为苏联国防部）的2号靶场，地处哈萨克斯坦干旱的草原地带，三面环山。建成后的试验场分为14个区域，包括防御和物理测试区、民用建筑和设施区、地上和地下军用建筑和设施区、生物区等，用于进行观察、测试及实验。物理测试区安装的记录仪器达200多种，铺设的电缆长560公里，都配有专用供电设备和自动控制装置。民用建筑和设施区建有各种砖结构和木结构建筑，还有铁路和桥梁以及深度分别为10米、20米和30米的仿地铁坑道。军用建筑和设施区有战壕、堡垒以及飞机、大炮、坦克、枪支等轻重武器装备。生物区的各类动物数量达1500多只（头）。试验场中央建有一座33米高的金属塔，上面安装了电控客货起重机，用于运送原子弹和人员。金属塔附近修建了一个组装车间，原子弹的最后组装将在这里进行。据统计，截止到1949年，试验场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85亿卢布（按1945年价格计算）。[2] 1949年4月22日，苏联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向贝利亚提交了书面报告，表示化学物理研究所已经做好了原子弹爆炸测定的准备工作。[3] 1949年8月5日，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试验场验收委员会向贝利亚提交了书面报告，表示试验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进行原子弹试验。[4]

此时，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已接近尾声。1949年4月15日，第二实验室第11设计院总设计师哈里顿和第一副院长К.И.晓尔金向贝利亚提交了简要的书面报告，表示РДС－1所有的理论和设计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5] 1949年5月27日，在第11设计院院长焦尔诺夫和总设计师哈里顿

---

①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287－289.

② 参见 *Михайлов В.Н.*, *Негин Е. А.*, *Цырков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полигона и испытание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 Создание первой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М.: Энергоатомиздат, 1995, с. 230。

③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558－559.

④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617－623.

⑤ *Рябев Л.Д.*（*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547－550.

共同签字的致贝利亚的书面报告中表示，第11设计院正在积极准备РДС－1的试验准备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7人特别小组，由晓尔金任组长，杜霍夫和В. И. 阿尔费罗夫任副组长，成员有В. К. 勃伯列夫、别萨拉卞科、马利斯基和И. А. 纳扎列夫斯基。试验拟在1949年8月15～25日进行。[①] 1949年6月4～9日，全面负责РДС－1试验筹备工作的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哈里顿等人在第11设计院举行会议，审议了与РДС－1研制的收尾工作和即将进行的试验有关的问题，最后形成致贝利亚的书面报告，由万尼科夫和库尔恰托夫共同签字。[②] 会议期间，第11设计院提交了按1:5的比例由杜霍夫和别萨拉卞科制作完成的РДС－1金属模型。模型得到肯定，会议决定将其送交专门委员会审核批准。1949年8月5日，第11设计院举行了核装料验收仪式，哈里顿、А. А. 博奇瓦尔、В. Г. 库兹涅佐夫在验收书上签字，Е. П. 斯拉夫斯基、库尔恰托夫、博奇瓦尔等人则在核装料零部件合格证书上签字。1949年8月8日，经特殊包装的核装料零部件由专列运抵第11设计院。组装后的检测表明，核装料中子增殖系数正常，符合技术要求，可以进行试验。1949年8月21日，载有核装料零部件和四个中子源的专列抵达试验场。从1949年8月10日起开始进行原子弹试验演练，至8月26日，共进行了10次。1949年8月22日，举行原子弹试验总演练。在演练过程中，原子弹的组装和引爆及部门之间的协调动作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原子弹试验程序得以更加完善。[③]

1949年8月26日，有贝利亚、马林科夫、万尼科夫、别尔乌辛、扎维尼亚金、库尔恰托夫、马赫涅夫参加的专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万尼科夫、库尔恰托夫和别尔乌辛草拟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原子弹试验》的决议并提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审批。根据专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局长万尼科夫、核计划科技总负责人库尔恰托夫院士及原子弹总设计师哈里顿通讯院士的建议决定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试验时间为1949年8月29～

---

①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570－572.

②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2，с. 595－601.

③ *Михайлов В. Н.*，*Негин Е. А.*，*Цырков Н. 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полигона и испытание ядер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м в Казахстане，с. 239－240.

30日，试验地点为第二试验场，试验方式为距地面33米高的金属塔固定爆炸。任命库尔恰托夫为原子弹试验的科技总负责人，哈里顿、焦尔诺夫和梅什克为科技副总负责人，分管原子弹试验的设计与科技、组织与行政、安全与保卫工作。[①] 尽管斯大林并未在该决议上签字，但原子弹试验仍按计划进行。[②] 参加原子弹试验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贝利亚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其他核计划和核试验负责人亲临试验现场。1949年8月28日傍晚，核装料和中子源被送到组装车间进行组装。1949年8月29日凌晨，核装料的最后组装完毕。1949年8月29日当地时间早7时，哈萨克斯坦的荒漠上闪起了一道从未有过的耀眼光芒。1949年8月31日，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在原子弹试验后第二天共同签字的试验报告由贝利亚亲自呈递给了斯大林。报告中称，初步测定的数据显示，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10000多吨梯恩梯，半径1500米内的工业设施和民用建筑全被冲击波毁坏，强核辐射形成了距爆心1200米范围内的生命死亡地带，25000度的高温造成距爆心2公里范围内的建筑起火。[③]

1949年9月25日，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两天前发表的关于苏联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塔斯社受权在《真理报》上发表公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苏联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已经拥有了核武器。[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美国的核威慑，百废待兴的苏联出于维护和加强国家安全、巩固和扩大胜利果实的目的，出台了耗资巨大的核计划。[⑤] 在1945年8月20日至1949年8月29日四年的时间内，苏联以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手段，采取军事化的全民总动

①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629 – 631.

②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能够说明斯大林拒绝在决议上签字的原因的档案文献。苏联核计划史专家们猜测，斯大林对原子弹试验成功与否缺乏信心应该是他拒绝签字的主要原因。

③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644 – 645.

④ *Рябев Л. Д.* （*общ. ред.*）Атомный проект СССР: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2, с. 644 – 645.

⑤ 莫斯科历史学家西蒙诺夫称，美国研制原子弹共投入2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的30亿卢布），而苏联仅在1947、1948和1949年的三年里就为实施核计划投入了145亿卢布。参见 *Алексеев В. В.* Атом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в контексте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Банк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1999, с. 26。

员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阶段性地实现了核计划目标。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成功试验不仅打破了美国借以推行和确立单极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军事政治实力，而且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苏联的核计划和原子弹研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有力工具，同时也是促使延续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两极世界最后形成的重要因素。

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原因的历史考察

北京大学　肖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东地区[1]作为国际政治焦点一直为世人瞩目。宗教分歧、民族仇恨、领土纠葛、经济摩擦、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至武装冲突，都使得这一地区处于随时可能爆炸的状态。

中东问题的起因源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众所周知，犹太国以色列是在苏美两大国的支持下建立的，特别是苏联的支持更具有实质意义。

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这个问题上，苏联领导人的态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莫斯科一直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敌视政策；战后1947～1949年，苏联一反常态地给予

① 这里所说的中东，是指亚、非、欧三大洲相连接的地区。这个名称是过去欧洲人的说法，他们按照距离欧洲的远近，把东方各国分别称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中东地区的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特别是“中东”和“近东”没有严格界线。本文提到这一地区时一般统称为中东地区，但是对所转引档案文献中的称谓，则保留其原有的译法——近东。

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全方位的支持，保障了以色列国的顺利成立。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以色列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此外，在苏联的默许下，大批东欧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拥入巴勒斯坦，保证了犹太国的人口数量和充足兵源。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正是依靠这些武器装备和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当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观察家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直到今天，历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依然众说纷纭。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支持犹太建国是出于对劫后余生的欧洲犹太人的同情①，就连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果尔达·梅厄也是这么认为的。② 不过，人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动了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为代表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政治诉讼案件。这就使得同情论很难站住脚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希望借此机会拉拢犹太人，把英国人逐出中东，进而达到进军中东的战略目的。③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苏联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仆从国。④ 这些观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档案文献的支持，因而尚欠说服力。总之，对于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动机，学术界长时间未能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关这一问题的档案文献一直未能公布。

2000年，由以色列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以色列国际档案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等6家政府和学术机构在莫斯科和伦敦联合出版了《苏以关

---

①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刘竞、张士智、朱莉著《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26页；邵丽英：《俄国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36页；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第25页。

②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章仲远、李佩玉译，新华出版社，1986，第217页。

③ 参见车效梅《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西亚非洲》2003年第4期，第39页；姜天明：《美英苏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的政策及影响》，《西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78页；徐娅囡、吴建章：《苏联支持犹太建国动机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第70～71页。

④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итянин, 1996, с. 268.

系档案集（1941～1953）》。[①] 公布了495件有关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原始档案文件，这其中包括苏联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②]之间的书信电报往来、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人员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信件和书面报告等，为研究分析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一历史事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苏以关系档案解密后，俄国和西方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一些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高质量论文。俄国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梅德维杰夫的《斯大林与"医生案件"（新材料）》[③]、伊萨耶夫的《历史的教训：苏以关系（1948～1951）》[④] 等。在西方史学界，法国学者劳伦特·拉克尔在这一领域无疑是走在前列的。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意想不到的同盟：1940年代的苏联与以色列》[⑤]、《莫斯科的意外之举：1947～1949年的苏以同盟》[⑥] 等。

梅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并非是要把以色列变成苏联的仆从国，而是希望通过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给英美关系打入一个楔子，换句话说就是离间英美特殊关系。[⑦] 伊萨耶夫的文章详细叙述了1948～1951年苏联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对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原因论证得并不充分。劳伦特·拉克尔认为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有这样几重目的：①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苏俄势力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就退出了中东地区。二战结束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为了重新加入中东地区的角逐，同英美争夺中东地区。②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斯大林战后依然站在原有的

---

①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 1941 – 1953гг.,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Documents on Israeli-Soviet Relations* 1941 – 1953 (*DISR*), London: Frank Cass, 2000.

② 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之前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

③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1, с. 78～103; №2, с. 99～119.

④ *Исаев Г. Г.*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1948 – 1951 гг. // Журнал политэкс, 2006, №3, http://www.politex.info/content/view/274/30/, 2008年9月8日。

⑤ Laurent Rucker, "The unexpected Alliance USSR and Israeli During the 1940's", *Russia and Jewish world*, 2004, №2, http://www.russkiivopros.com/index.php?pag=one&id=77&kat=6&csl=19, 2008年9月8日。

⑥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46, 2005.

⑦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1, с. 97.

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国家采取敌视态度。而英帝国主义是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支持犹太建国有利于削弱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和影响。③支持犹太建国有利于提高苏联在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巩固和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的影响。[①] 劳伦特·拉克尔在研究苏联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显然受到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在冷战研究中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学派”（Traditional School）的影响，认为苏联对外政策及世界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要摧毁整个“自由世界”的体制与价值观，建立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霸权。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或者不能苟同，或者认为不足。比如，关于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为了离间英美特殊关系这种观点，到目前为止，档案文献并未提供任何有力证据。英美两国的确在犹太难民问题和阿犹分治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是斯大林离间所致。恰恰相反，斯大林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的矛盾，通过支持犹太建国，扩大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一句话，是英美矛盾给了苏联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而离间英美特殊关系并非莫斯科的目的和主旨。

那么，战后苏联为什么支持犹太建国？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莫斯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是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笔者拟在详细研究和解读近年来公布的俄国和以色列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发展变化为线索和切入点，逐步分析这些问题。

一　战前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众所周知，沙皇俄国存在着浓厚的反犹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苏联时代。这就使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犹太人中颇为流行，然而苏联政府从一开始就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视为大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更加成为了苏联领导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与苏联领导人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大多源于犹太教。根据犹太教

① 参见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p. 39 - 42。

的教义：犹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选民”，他们的子民散居于世界各地，只是暂时停留，他们的目标是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带领他们回到故国——巴勒斯坦。而马列主义者则认为，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国家也就自然消亡了。

（2）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苏联政府关于解决犹太问题的方式有着根本不同的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解决反犹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而苏联领导人认为，犹太问题是阶级矛盾与民族压迫的产物。只有消灭了剥削阶级，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犹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复存在了。

（3）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犹太民族必须保持其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反对其同化于当地民族。而按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依据这一定义，尽管犹太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所以并不构成一个民族。[②] 因此，苏联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强调的是同化，而这种同化政策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相悖的。

（4）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作为对欧洲反犹太主义的回应出现的。而在苏联成立之后，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苏联领导人都拒绝承认在苏联社会存在排犹主义或歧视犹太人的问题。1931 年，斯大林在答复犹太电讯社关于反犹主义提问时说：“民族的和种族的沙文主义，是野蛮残暴时期所特有的仇视人类的性情的残余。反犹太主义只能对剥削者有利……因此，作为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们，不可能不成为反犹太主义的毫不妥协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在苏联，反犹太主义作为强烈敌视苏维埃制度的一种现象，会受到最严厉的批判。根据苏维埃的法律，积极的反犹太主义分子会受到死刑的处罚。”[③] 照此推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存在就显得多余了。苏联这样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至高无上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 64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28、29、30 页。

③ *Шварц С.*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Нью-Йорк: Изд-во им. Чехова, 1952, с. 100.

的，任何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都有可能被视为和当局争夺效忠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苏联的存在也会被视为和苏联当局争夺犹太群众，这是苏联领导人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要坚决镇压。

（5）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多年以来苏联和大英帝国关系不正常的体现。1917 年 2 月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公爵颁布了《贝尔福宣言》，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大批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这里实际上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革命，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和英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因此，苏联领导人直观地认为，由英国人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大英帝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代言人，换言之，是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工具。于是，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就顺理成章地被安上了反革命或英国间谍的罪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的传播是绝对被禁止的，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因此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苏联境内遭到逮捕、流放甚至杀害。[①]

二 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莫斯科的接触

1939～1940 年，苏联兼并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新占领的领土上生活着 200 万犹太人。其中包括德占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 30 万犹太难民。[②]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对于这些犹太人的命运非常关心。从 1941 年起，他们开始就这个问题和莫斯科方面进行接触。

1941 年 1 月，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主席魏茨曼在伦敦会见了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在会谈中，魏茨曼谈到了欧洲的犹太难民问题。迈斯基指出：“要让欧洲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必须把当地的阿拉伯人迁到别处去。”对此魏茨曼回答：“如果能把巴勒斯坦地区的 50

① Shimon Redich, Propf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1941 – 1948, Boulder: Colorado, 1982, p. 13.

②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2.

万阿拉伯人迁出去的话，这一地区足够200万犹太人居住的。……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迁出去比起苏联的民族迁徙来说要容易得多。因为只要把他们赶到伊拉克和外约旦就可以了。"[①]

尽管此次会谈双方并未就任何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档案材料中所能看到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与苏联外交官的第一次直接对话。而接下来爆发的苏德战争也迫使苏联逐渐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

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侵苏联。同年10月，苏联西部大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纳粹随即对那里的犹太人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在苏德战争的头5个月里，苏联境内就有大约5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杀害。[②] 1941年底，苏联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下简称"犹委会"），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和呼吁国外犹太人对苏联进行援助。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犹太人大会，并向全世界做了电台转播。[③] "犹委会"在苏联情报局的领导下，采取各种形式，包括开办希伯来文报纸、向国外寄送材料，组织犹太人大会等，用大量事实，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惨无人道的罪行；报道了苏联红军同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并通过和欧洲、北美的犹太人组织（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进行的联系，为苏联政府赢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苏联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敌视态度开始有所改变。

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引起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注。因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看来，犹太人能否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的立场至关重要。拥有数百万犹太人口的苏联的支持对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主席大卫·本-古里安曾预言："在战争结束后，俄国将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三个大国之一。"[④] 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继续加强与苏联外交人员的接触。笔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有两个：①希望莫斯科能够同意滞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犹

---

① 30 January 1941, *DISR*, Part I, p. 12.

② Nora Levin,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 401.

③ 第一次世界犹太人大会是在犹委会成立之前（1941年8月）召开的。

④ 9 October 1941, *DISR*, Part I, p. 12.

太人移民巴勒斯坦。② 让苏联领导人相信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1941 年 10 月 9 日，本－古里安在伦敦会见了迈斯基。他向迈斯基介绍了巴勒斯坦犹太居民定居点伊舒夫（Yishuv）所取得的成就，并突出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色彩。本－古里安希望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和苏联领导人协商巴勒斯坦的未来命运；同时希望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帮助。迈斯基对这些问题并未作出直接答复，只是建议本－古里安先做一个备忘录。[①] 苏联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接触的目的是为了借此推动美国对苏联的援助。迈斯基对本－古里安说："如果您能让美国人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对我们进行援助，这对我们就是最大的支持了。我们需要大量的坦克、枪炮和飞机。"[②]

1942 年 3 月 2 日，魏茨曼寄给迈斯基一份有关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备忘录。在给迈斯基的信中，魏茨曼写道："战后，对于东欧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移民巴勒斯坦是他们唯一的机会。"[③] 魏茨曼试图让苏联人相信，过去的误会不应该成为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障碍，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关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注犹太人问题。[④]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们除了和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进行接触，也在尽一切可能与苏联驻中东地区的外交使团进行联系。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帮助下，1942 年 1 月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开罗代表伊利亚·爱波斯坦拜会了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爱波斯坦向苏联大使提出了三点请求：①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一个野战医院编制的医生携带药品到苏德前线去。[⑤] ②由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派遣 1～2 名代表常驻莫斯科以便处理目前苏联境内犹太难民的移民申请问题。③请求苏联政府释放关押在苏联监狱中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⑥] 事后在爱波斯坦写给犹太巴勒斯坦

① 9 October 1941, *DISR*, Part I, p. 11.

② 9 October 1941, *DISR*, Part I, p. 13.

③ 9 Match 1941, *DISR*, Part I, p. 28.

④ 9 Match 1941, *DISR*, Part I, p. 28.

⑤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4, п. 13, д. 1, л. 2－3,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6.

⑥ 25 January 1942, *DISR*, Part I, p. 21.

代办处政治部主任谢尔托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大使对犹太问题表现得非常无知。爱波斯坦同时还指出，与苏联外交官接触，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即便这种对话暂时无法引起他们对我们事业的兴趣。[①]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1942 年 8 月，两名苏联外交官第一次访问了巴勒斯坦。他们是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秘米哈伊洛夫和使馆的新闻专员佩特连科。米哈伊洛夫和佩特连科会见了伊舒夫的领导人、英国高级专员以及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阿拉伯人代表。两名苏联外交官对于巴勒斯坦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赞叹不已，但是，他们对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敏感问题却只字未提。即便如此，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对苏联人的这次访问依然感到满意。犹太民族社会委员会主席贝茨文说："我们与苏联人的交往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苏联代表第一次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工作和战斗。"[②]

从 1943 年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苏联之间的来往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43 年 5 月，全世界犹太代表大会创始人古尔德曼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统贝奈斯给莫斯科方面递交了一份苏联与犹太复国主义关系备忘录。备忘录中谈到了苏联敌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两点历史原因。①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苏联内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斗争，沙俄时期在俄国犹太人的生活中影响最大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最终解决犹太问题是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而犹太共产主义者认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是世界革命。②苏联方面始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国在近东地区统治的工具，是大英帝国在这个地区的代言人。古尔德曼在备忘录中指出，这两点历史原因现在都已经消除了："苏联已经存在了 20 年，俄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与犹太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执早已成为了过往云烟。……而在当前，苏联和英国已经不是敌人，而是战时的盟友了。"所以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完全应该达成谅解。[③] 而在这时，苏联方面似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努力也开始有了一些积极的回应。1943 年 9 月 12 日，魏茨曼在伦敦与迈斯基的又一次会谈中，迈斯基告诉

① 25 January 1942, *DISR*, Part I, p. 21.
② 31 August 1942, *DISR*, Part I, pp. 41 - 42.
③ 27 May 1943, *DISR*, Part I, pp. 61 - 62.

魏茨曼：俄国人理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目标，并确信将和他们站在一起。但是他依然有些担心，因为巴勒斯坦的面积太小了。①

这次会谈之后，迈斯基从伦敦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埃及做了停留并访问了巴勒斯坦。他与妻子在本－古里安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基布兹。② 在与本－古里安的谈话中，迈斯基说："犹太问题是战后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人告诉我，巴勒斯坦没有足够的空间，我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了解巴勒斯坦的潜力究竟如何。"迈斯基对于基布兹具有浓厚的兴趣。这让本－古里安感到振奋。本－古里安在给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的报告中写道："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另外一个国家（指苏联）开始对我们的问题感兴趣。"③

但是直到战争结束，苏联官方并没有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战争时期，苏联人的策略主要是利用"犹委会"来打犹太这张外交牌——通过该委员会向西方国家索要援助。1943 年 5 月，苏联政府派遣"犹委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访美时，曾严格规定了他们的权限和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这个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使得苏联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并在美国发起援助苏联红军的运动"。由于巴勒斯坦仍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而英国是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因此"犹委会"代表团被禁止在建立犹太国问题上发表任何意见。④ 由此可见，苏联在对德作战期间尽量不想破坏与其盟友的关系。既然英国是盟友，那它对殖民地的主权就是不容置疑的。苏联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莫斯科对其在巴勒斯坦建国计划的支持。而在战争时期，苏联方面认为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作出任何承诺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⑤

总之，苏德战争期间莫斯科对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非常暧昧，一方面利用"犹委会"与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内的国际犹太人组织进行

① 14 September 1943, *DISR*, Part I, p. 41.

② 基布兹是犹太人建立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

③ 4 October 1943, *DISR*, Part I, p. 71.

④ АВП РФ, ф. 07, оп. 4, п. 29, д. 30, л. 3－5,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75.

⑤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7, п. 4, д. 5, л. 26 － 28,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09.

合作，为苏联政府赚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为了不得罪英国，又不愿意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表示明确的支持。

三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形成

在1945年2月举行的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雅尔塔会议上，巴勒斯坦问题并没有被列入会议议程。然而，苏联官方已经开始研究战后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年7月，“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报告。李维诺夫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情况，并分析了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原因。报告的结论部分指出：由于苏联方面既不受阿拉伯人影响，也不受犹太人影响，因此，在有效的解决方案出笼之前，苏联政府应提出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来代替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如果这个要求被英美拒绝，苏联政府可以要求苏美英三国对巴勒斯坦进行集体托管。① 但是这个提议被伦敦和华盛顿拒绝了，英美两国是不可能把巴勒斯坦这么重要的战略地区交给苏联或让苏联参与托管的。在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提出建议：希望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这个提议同样也遭到了贝文的拒绝。②

伦敦方面并不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化，因为这将意味着英国在中东地区霸主地位的终结，同时也给莫斯科介入中东事务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存在，英国无法拒绝美国参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在此问题上英美又存在严重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

1945～1947年，设在德国和奥地利难民营里的犹太难民数量从7000多人增加到25万人，其中大多数来自波兰。③ 根据苏联和波兰1945年7月所签署的协定，所有在1939年9月19日进入苏联的波兰公民（包括犹太

① АВП РФ，ф. 07，оп. 12а，п. 42，л. 1，30－38，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 121－122.

② 1 January 1946. *DISR*，Part I，p. 118.

③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 12.

人和非犹太人）将被允许返回他们的祖国。在苏联与波兰签署协议之前，就有大约5万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回到波兰。[①] 1945年7~12月，又有22058名波兰犹太人离开苏联返回波兰。1946年1~8月，离开苏联的波兰犹太人数目增加到了173420人。在德国统治期间，由于纳粹的宣传，波兰国内的反犹主义情绪激增，战后，波兰境内的反犹排犹事件时有发生。1946年6~9月，就有63000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波兰，进入盟军控制的德国和奥地利地区。[②]

面对日趋严重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政治家们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杜鲁门总统支持这些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移民到巴勒斯坦去，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关闭了大量接纳犹太难民的难民营。而英国政府担心这样做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故此坚决反对。

1945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英国首相艾德礼，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增发10万张移民许可证，允许10万名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③] 作为对美国总统的回应，英国首相艾德礼提议组建"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对欧洲犹太难民问题展开调查。该委员会于1946年1月成立，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向英美两国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由于阿犹双方的敌对状态，目前不可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应继续由英国保持委任统治；立即给欧洲10万名犹太难民发放移民许可证，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限制等。[④]

这份报告显然是英美两国立场的折中产物。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利用巴勒斯坦问题插手中东事务，排挤英国势力，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了与英国显然不同的政策。英美在犹太难民问题上的矛盾对于苏联来说是进入中东地区角逐的大好机会。于是莫斯科开始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

---

① Yaacov Ro'i, *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 – 1954*, New Brunswick,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80, p. 28.

② Yosef Litvak, "Polish-Jewish Refugees Repatri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orman Davies and Antony Polonsky (eds.), *Jews in Eastern Poland and in the USSR, 1939 – 1946*, London: Macmillan, pp. 232、235、230.

③ 参见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4页。

④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26~33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商务印书馆，2004，第118页。

在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苏联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不再保持沉默。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捷卡诺佐夫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苏联继续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是危险的，这种沉默会被美国、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看作是对英美调查委员会报告的一种妥协。对这个问题他提出了4点意见：①没有联合国参与而组建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无权讨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②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③英国必须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巴勒斯坦撤军。④在建立民主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成熟之前，巴勒斯坦应该由联合国托管。最后，捷卡诺佐夫建议：我们不应该在联合国讨论的时候提出该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阿拉伯国家提出，然后我们表示赞成。[①] 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苏联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国家。

伦敦方面在1946年7月31日抛出了一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Morrison-Grady Plan），建议把巴勒斯坦分成4个部分：一个阿拉伯自治省、一个犹太自治省和两个英国直辖省（耶路撒冷和内盖夫），这些地区均由英国高级专员管理。阿犹双方均拒绝了这个计划，美国杜鲁门政府也表示不能接受英国人的计划。[②]

1946年9月6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副司长马克西莫夫在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捷卡诺佐夫的报告中表达了苏联对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的态度。苏联重申了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即英国必须从巴勒斯坦撤军，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之前应由联合国出面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③]

1947年1月27日，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代表）在伦敦与英国政府就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谈判。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于29日开始分别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进

---

① АВП РФ, ф. 018, оп. 8, п. 7, д. 92, л. 7－10，转引自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 p. 14。

②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2, п. 2, д. 6, л. 167 － 172,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57－160.

③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2, п. 2, д. 7, л. 9－1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64.

行非正式会谈。最后贝文提出了一项折衷建议：在5年内实现阿犹自治，5年之后巴勒斯坦过渡为一个独立国家，过渡期内继续由英国实行委任统治。[①] 这个提议又被阿犹双方所拒绝。于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1947年2月18日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②]

对于英国人的这一举动，苏联外交人员很快就作出了分析。1947年3月6日，苏联外交顾问什泰恩在给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指出：伦敦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解决是出于以下原因。①英国人和阿犹双方的谈判都陷入了死胡同，提出让两个民族都接受的计划已经是不太可能了。②维持巴勒斯坦的现状需要大量的军队和物资，这对于英国人来说目前是比较困难的。③1946年英国和外约旦签署了条约，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其中东地区的主要战略基地由巴勒斯坦转移到外约旦。④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什泰恩认为："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绝对不意味着放弃巴勒斯坦，也不意味着它要将自己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离。这只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外交手腕，因为贝文推断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都绝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英国人认为自己依然是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所以，任何一个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没有英国人的同意都是不可能通过的。殖民大臣柯里奇·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英国人并不打算放弃委任统治。'英国人保留了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地位以及军队的同时，把责任抛给了联合国，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在报告中，什泰恩还分析了美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巴勒斯坦对于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还具有经济利益。英国人留在巴勒斯坦对华盛顿来说就意味着通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管道终端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占有巴勒斯坦，就意味着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地。众所周知，美国在地中海地区还没有基地。"[③]

关于苏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什泰恩指出："在未来联合国的讨论中，苏联应该坚决主张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④]

---

①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47～49页。

②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50～52页。

③ АВП РФ, ф. 018, оп. 9, п. 17, д. 77, л. 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88－189.

④ АВП РФ, ф. 07, оп. 12а, п. 42, д. 6, л. 134－14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90－191.

英国决定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为苏联介入巴勒斯坦事务提供了机会。1947 年 4 月 12 日，马克西莫夫对于未来苏联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讨论时的立场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①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必须结束。②英国军队必须从巴勒斯坦撤离。③由联合国出面组织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保证巴勒斯坦境内的各族人民享有平等权利。④欧洲的犹太问题不能靠移民巴勒斯坦来解决。只有在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实现欧洲民主化的同时给犹太群众一个正常的生活条件，才能解决犹太问题。[1] 1947 年 4 月 15 日，马克西莫夫在给近东司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这 4 点意见。[2]

直到 1947 年 4 月中旬，莫斯科依然没有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提出明确看法，官方的意见只是强调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对于欧洲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一问题，苏联方面也并未表示赞成。真难想象 1 个月之后，苏联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著名演说

1947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5 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做了发言，葛罗米柯在演说中提到了犹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民族遭受到非常的不幸和苦难。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不幸和苦难是不能用笔墨所能尽述的。……在希特勒分子统治领土内的犹太人几乎全部遭到肉体上的灭绝。死在纳粹手中的犹太人估计约有 600 万。西欧只有大约 150 万犹太人在战后幸存了下来。……在欧洲，大量犹太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的生活来源。几十万犹太人正在各国流浪求生和寻找安身之所。其中很多人目前依然滞留在难民营里。"

随后葛罗米柯在演说中讲述了为什么犹太民族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事实证明，西欧国家并不能保护犹太人的生存和权利，使他们免受希特勒分子及其盟国的暴力迫害。……这说明犹太人渴望建立自己国家的

---

①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2, п. 2, д. 8, л. 107 - 109,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93 - 195.

② АВП РФ, ф. 018, оп. 9, п. 17, д. 77, л. 6 - 1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199 - 200.

愿望是合理的。不考虑这个事实而拒绝犹太人有建国的权利是不公正的。不把这个权利赋予犹太民族是没有理由的。"

葛罗米柯还谈到了巴勒斯坦的前途问题："在关于巴勒斯坦将来的行政组织问题比较著名的几个计划中，我愿意提一提下列几个计划：

> 一、建立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
>
> 二、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
> 三、不顾及犹太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
>
> 四、不顾及阿拉伯居民的权利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

葛罗米柯在演说中逐一分析了这几种方案。他指出：

> 无论是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也好，还是建立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也好，都不会使这个复杂的问题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也不会使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
> 建立一个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被认为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可行性方案之一。……但是由于阿犹关系恶化而导致这个方案难以实现，那么就必须考虑第二个方案。该方案就是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

在这里葛罗米柯强调：

> 只有证实了阿犹居民关系确已恶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并且不能保证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和平共处时，这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才是妥当的。"①

---

①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иные отчёт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Том I.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й.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 28 апреля – 15 мая 1947 года. ·Нью-Йорк, 1947, с. 83 – 87, 转引自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15、216、217 – 218。

葛罗米柯在1947年5月14日的演说是苏联外交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它标志着历史上曾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苏联开始站在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边。他在发言中不止一次提到了犹太民族（ев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这个概念。众所周知，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所以葛罗米柯的这次演说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本-古里安对葛罗米柯的演说作出了如下评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大国的领导人（杜鲁门总统除外）谈论有关犹太民族悲惨命运的话题。这些话，葛罗米柯是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讲的，葛罗米柯讲话的重要性和意外性不在于叙述了犹太人的悲剧和苦难，而在于他对目前犹太人问题作出分析后而得出的结论。……全世界第一次听到了苏联代表对我们的认可：犹太人民对建立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①]

值得注意的是，葛罗米柯在演说中并没有对支持分割巴勒斯坦的计划作出任何承诺，这也让犹太人感到了一丝不安。对此，本-古里安说："我们也不能过于看重那些国际领袖对我们表示友善的一些讲话。"[②] 美国外交人员甚至认为，苏联在最后时刻依然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③]

1947年5月15日，联大巴勒斯坦特别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一个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11个国家组成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调查并提出建议。

1947年9月初，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首先建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在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后让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但在独立后建立什么国家这个问题上，特别委员会摆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由加拿大、乌拉圭等7个国家提出的多数派方案，一种是由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澳大利亚对这两种方案都不赞成，故此没有投票）。多数派方案赞同巴勒斯坦实施分治，即委任统治期结束后经过两年过渡期，分别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人国家，圣城耶路撒冷由联合国出面实

① 29 May 1947, *DISR*, Part I, pp. 198－199.

② 29 May 1947, *DISR*, Part I, p. 199.

③ Yaacov Ro'i, *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p. 83.

行国际托管。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仍由联合国委托英国代为管理。少数派方案则主张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包括一个阿拉伯实体和一个犹太实体的联邦国家。由于特别委员会内部无法取得一致，这两个方案同时提交联合国大会。[①]

1947 年 9 月 19 日，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伊利亚·爱波斯坦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查拉普金和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一秘瓦维洛夫。爱波斯坦询问苏联方面是否会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由伊朗、印度和南斯拉夫等国提出的少数派方案。查拉普金说："你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②] 查拉普金的回答打消了犹太人的疑虑。

1947 年 9 月 30 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给纽约的副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应该反对大多数国家都赞成的多数派方案。同一天，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了第二封电报，强调："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多数派方案"符合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葛罗米柯同志所提到的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犹太联邦国家只是我们的一个策略，我们不能主动提出成立犹太国这样的建议。我们的态度是：第二种意见要更好一些，这是特别委员会经过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方案。我们应该遵循大多数意见，这是值得肯定的。"[③]

1947 年 10 月 13 日，苏联代表查拉普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确认了苏联将投票赞成多数派的方案。10 月 15 日，维辛斯基从纽约给莫洛托夫发来电报："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声明使得犹太人非常赞赏，阿拉伯人则显得失望，尽管他们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对我们改变态度还抱有些许希望。叙利亚人在查拉普金发言之前对我说，他们更赞成少数派计划，那个多数派计划，阿拉伯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尽管阿拉伯人对我们的态度不满，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美国人。"[④]

此时，联合国大会关于犹太难民问题的讨论也在紧张进行。

---

①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 71 页注 1。

② 19 September 1947, *DISR*, Part I, p. 222.

③ АВП РФ, ф. 059, оп. 18, п. 17, д. 116, л. 10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51、252.

④ АВП РФ, ф. 059, оп. 18, п. 41, д. 301, л. 351 – 352,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52.

1947年10月16日，莫洛托夫给维辛斯基发电，指示苏联代表团应该支持乌拉圭和哥伦比亚代表提出的建议。[1] 莫洛托夫在电报中还指示，苏联代表团也应该支持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即允许设在塞浦路斯岛的犹太难民营中的所有犹太难民都移民巴勒斯坦。[2] 苏联人这时已经完全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了。

1947年10月26日，莫洛托夫给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由维辛斯基起草的备忘录。其中谈到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结束委任统治后的过渡时期以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备忘录的大意是要求从1948年1月1日起取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军队将在委任统治取消后的3～4个月内从巴勒斯坦撤出，委任统治取消后的1年为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由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托管。维辛斯基在备忘录中指出，所有这些意见都征得了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的同意。[3]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苏联已经和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就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后的一些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讨论之后，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是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大会最终以超过2/3多数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即联合国181号决议）。分治决议的主要内容是：①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应尽快结束，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委任统治国的武装部队应逐步撤离巴勒斯坦，并应尽快撤完，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8月1日；阿拉伯独立国和犹太独立国以及耶路撒冷国际特别政权，应于委任统治国武装部队撤退完毕后两个月内在巴勒斯坦成立，无论如何不得迟于1948年10月1日；大会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到阿拉伯和犹太两独立国成立的时期，应视为过渡时期。②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两个月内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和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犹太国的总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4%），阿拉伯国面积为1.1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2.8%）。③圣地耶路撒冷及其附

① 乌拉圭代表团在联大提出立刻允许3万名犹太儿童移民巴勒斯坦；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立即允许15万名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

② АВП РФ, ф. 059, оп. 18, п. 17, д. 117, л. 60,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53.

③ АВП РФ, ф. 06, оп. 9, п. 22, д. 267, л. 72－73,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60－261.

近郊区村镇（约158平方公里）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由联合国管理，指定托管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担负管理当局的职责。[①]

在表决过程中，苏联的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大林控制了联合国5个成员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的票。如果苏联集团投反对票或者是弃权票，那么建立以色列所必须的2/3的选票就不能得到。尽管得到了苏联集团的支持，但是分治决议能否通过表决依然充满变数。此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对多数派能顺利通过表决起了关键作用。在联大表决前，"依照来自白宫的命令"，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幕后游说活动。白宫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直接参加了对一些国家的游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一些原先对分治态度未定或反对分治的国家施加了各种形式的压力。例如，原先在联合国公开表示反对分治的菲律宾和海地迫于压力投下赞成票，美国威胁法国说如果反对分治就会终止对其援助，于是法国代表在距投票前不到两小时收到巴黎的指示：投赞成票。[②] 在冷战开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反而在支持犹太人建国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默契。

在分治问题上美国的反复和苏联的坚持

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一通过，立刻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反对。阿拉伯联盟会员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1947年12月8~17日在开罗召开了一次会议，发布了一项声明，宣称：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志，决战至最后胜利"。声明说，阿拉伯联盟已经同意"采取决定性的手段"，以防止巴勒斯坦的分治。[③]

分治决议在联合国刚刚获得通过，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立即陷入暴力冲突，冲突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非正规武装也开始介入。阿拉伯国家反对分治的态度非常强硬。1948年2月，他们向杜鲁

---

①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71~92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第126页。

② Michael Cohen, *Truman and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170.

③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3~94页。

门建议，如果联合国无法实施分治决议，而又无法提出能为双方都接受的替代方案，就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某种形式的托管。[①]

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表现得犹豫不决。从本意上讲，美国也并不愿意看到巴以分治计划顺利实施，因为美国人担心这样会给苏联开启进入中东地区的大门。苏联势力扩展到中东地区将直接威胁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1948年1月给国内发了一封长电报。凯南提出，美国应该改变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策，因为分治政策将为苏联向中东地区派驻军队提供方便。苏联军队将会被用来在巴勒斯坦地区维持秩序。苏军进入巴勒斯坦将有利于苏联政府在当地派遣间谍、开展宣传、颠覆当地的阿拉伯政权，并用所谓的人民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驻军则意味着苏联将从侧翼包抄希腊、伊朗和土耳其，并对美国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范围构成潜在的威胁。根据凯南的判断，苏联暗地里将会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提供武器，使得当地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强。最后，凯南得出结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有利于苏联实现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该计划将动摇当地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基础。[②]

乔治·凯南这位美国遏制政策理论之父的电报，显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加之巴勒斯坦的局势不断恶化，杜鲁门总统感到有必要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调整。1948年3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向安理会建议："鉴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日益恶化，我国政府认为应由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在巴勒斯坦建立临时托管以维持和平。"[③]

美国代表的这项建议意味着美国在分治政策上的倒退。1948年3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75次会议上发言，谴责了美国阻挠联大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实施。葛罗米柯指出："美国并不关心巴勒斯坦前途问题以及阿拉伯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公正解决，而只是关心它自己在近东的石油利益和军事战略地位。"[④]

尽管苏联方面反对，但是联合国安理会依然决定在1948年4月1日召

① *FRUS*, 1948, Vol. 5, Washington, D. C.: GPO, 1975, pp. 637-640.

② *FRUS*, 1948, Vol. 5, pp. 546-554.

③ *FRUS*, 1948, Vol. 5, p. 743.

④ 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98页。

开特别会议，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进行讨论。4月9日，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汇报了他给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下达的最后指示：苏联代表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捍卫巴以分治计划，反对美国提出的托管方案。[1]

当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出现反复的时候，只有苏联依然坚持支持巴以分治决议。从1947年5月14日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起，苏联已经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了。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转变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苏联的支持下，犹太代办处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的建议，犹太代办处耶路撒冷政治部领导人果尔达·梅尔松[2]宣称："我永远也不会同意托管，除了建立独立的犹太国之外，我也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定。"犹太恐怖主义组织伊尔贡（Irgun）对"背叛了犹太人事业的美国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宣称："如果美国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来实现托管的话，我们将与之决一死战，我们对待美国人就像对待英国占领者那样。"[3]

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飘扬了30年的英国国旗被降了下来，委任统治正式宣告结束。当天下午4点，犹太民族委员会在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了简短的立国仪式。执委会主席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犹太国以色列正式成立。11分钟以后，美国政府即宣布"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4]

5月15日，以色列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谢尔托克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了电报："我满怀敬意地通知您，请求您向您的政府汇报，昨晚，由各个犹太组织选出的犹太国家民族委员会举行会议，在英国的委任统治结束后，以联大1947年11月29日决议为基础，独立的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宣告成立，这个国家被称为以色列。……我以以色列临时政府的名义请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以色列国给予官方承认。我希望你们应该尽快地

① АВП РФ, ф. 06, оп. 10, п. 15, д. 160, л. 4 - 7,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90 - 291.

② 果尔达·梅尔松就是后来的首任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梅厄夫人。

③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2, п. 3, д. 11, л. 123 - 130,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293 - 294.

④ 参见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204页。

承认以色列国。我相信，它一方面将巩固苏联和苏联人民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在整体上看将有助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与公正。我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苏联人民的感谢。"①

5月18日，莫洛托夫给谢尔托克回电："我在5月16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我宣布，苏联政府决定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希望，犹太人民主权国家的建立将有助于巩固巴勒斯坦和近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苏联政府确信苏联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②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5月24日，谢尔托克给莫洛托夫发电："我们收到了你们在5月18日的电报，我们非常感谢苏联政府承认以色列。……希望以色列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建立更加深厚的友谊。我请求你们答复，你们是否同意以色列国立即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建立公使馆或者临时代办处，同时请求苏联方面派遣同级别的代表团前往特拉维夫。"③

5月25日，莫洛托夫的回电：我在5月24日收到了你们的电报，苏联政府同意以色列向苏联派遣公使或者临时代办。同时，苏联也准备向特拉维夫派遣代表团。④

1948年8月17日，苏联驻以色列公使叶尔绍夫向以色列临时政府总理本-古里安递交了国书。⑤ 8月2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也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国书。⑥ 苏以两国正式建交。

四 苏联对以色列的援助和支持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苏联政府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给以

① 15 May 1948, *DISR*, Part I, p. 281.

② АВП РФ, ф. 89, оп. 1, п. 1, д. 4, л. 5,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305.

③ 22 May 1948, *DISR*, Part I, p. 285.

④ АВП РФ, ф. 89, оп. 10, п. 46, д. 622, л. 17,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308.

⑤ АВП РФ, ф. 089, оп. 1, п. 1, д. 3, л. 14-15,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348-349.

⑥ 26 August 1948, *DISR*, Part I, p. 327.

色列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这对于刚刚诞生的以色列是否能够站住脚跟并生存下去，无疑具有关键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

在武器方面的援助

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的第二天，即 1948 年 5 月 15 日，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这 5 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对以色列发动圣战，并相继派兵进入巴勒斯坦，于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阿以战争或者巴勒斯坦战争，而以色列人则称其为独立战争。

战争初期，犹太武装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军火。早在 1947 年春，联合国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本－古里安就开始派人前往欧洲和美国搜集和采购军火，进行战争准备。然而，由于联合国在 1947 年 11 月就宣布对巴勒斯坦及其邻国施行武器禁运，军火采购工作并不顺利。于是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欧，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据解密的苏联和以色列的档案来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起初是拒绝卖给犹太人武器的。因为当时埃及和叙利亚也正在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订购军火的谈判。①

1948 年 2 月 5 日，谢尔托克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希望苏联方面能够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②

1948 年 6 月 5 日，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在给副部长佐林的报告中说：必须通过我们驻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用适当的方式让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明白，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购买火炮和飞机并运往巴勒斯坦的请求是合理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实行武器禁运，但是约旦、伊拉克和埃及是完全有机会从英国人的仓库和基地得到他们所必须的武器的。③ 佐林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在适当的时候必须让哥特瓦尔德注意到，他们出售给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将会使巴勒斯坦的局势更加恶化。英美帝国主义将会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反对苏联和

① АВП РФ, ф. 0118, оп. 2, п. 3, д. 11, л. 60 - 61,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280 - 281.

② 13 February 1948, *DISR*, Part I, p. 264.

③ АВП РФ, ф. 098, оп. 1, п. 1, д. 6, л. 3.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 с. 314.

人民民主政权。[1]

由于苏联方面的介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终止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军火贸易谈判，答应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军火。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提供了价值1300万美元的轻重武器。1948年下半年，以色列又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购买了900万美元的武器。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和以色列政府先后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价值22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捷克斯洛伐克还为以色列训练了大批飞行员和伞兵。捷克斯洛伐克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2] 首任以色列驻莫斯科公使果尔达·梅厄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独立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我们主要依靠（虽不是完全）哈加纳[3]在东欧买到的炮弹、机枪、大炮、弹药，甚至飞机。那时连美国也宣布对中东禁止出售和运送武器。……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国对我们有巨大意义。"[4]

以色列一直希望莫斯科方面能够直接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援助。以色列外交官一到莫斯科，就希望能同苏联方面的权威人士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1948年10月6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馆武官拉特涅尔上校会见了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犹太人）。拉特涅尔提出：希望苏联方面能够帮助以色列培训军官并向以色列提供一些苏联缴获纳粹德国的武器装备。安东诺夫建议以色列方面就所提要求列出一个详细清单。[5]

11月7日，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给拉特涅尔上校发了一封电报，就以色列要求苏联提供的武器列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其中包括45辆T-34坦克、50架战斗机等。[6] 拉特涅尔把这份清单交给了巴库林。巴库林表示，他将把这份清单转交给上级。但是巴库林指出，由于联合国要求对巴勒斯坦施行武器禁运，苏联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会很困难。

---

① *Mezhdunarodnaya Zhizn'*, No. 10, 1998, p. 87, 转引自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2。

②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2.

③ 哈加纳，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军事组织的简称。

④ 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自传》，第217页。

⑤ 6 October 1948, *DISR*, Part 1, p. 376.

⑥ 7 November 1948, *DISR*, Part 1, p. 400.

巴库林说："的确是有一些国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但是如果我们向你们提供武器被发现了，那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1] 1948 年 11 月 24 日，巴库林就这个问题给佐林提交了一份报告。巴库林在报告中写道："针对以色列政府提出要求我们提供重型武器的问题，我建议作以下答复：苏联政府十分关注以色列的命运以及他们所享有的独立和自由的权利，但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我们不能对巴勒斯坦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关于类似问题的答复我们已经通过葛罗米柯同志转达给了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2]

总之，苏联方面不愿意直接出面和以色列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而更愿意站在幕后，由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出面对以色列提供武器装备。

在移民方面的支持

移民是以色列的立国之本。以色列能够顺利建国，来自东欧国家的大量犹太移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犹太人能够顺利移民巴勒斯坦，是和苏联的默许态度分不开的。

以色列建国之前，受英国政府在 1939 年颁布的《巴勒斯坦问题白皮书》[3] 的制约，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都是非法的。尽管起初莫斯科官方声明不支持欧洲犹太难民移居巴勒斯坦，但实际上仍对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在东欧吸收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

早在 1945 年 4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古尔德曼就给当时的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写信，希望苏联政府

---

① Yaacov Ro'i, *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 - 1954*, p. 155.

② АВП РФ, ф. 089, оп. 1, п. 1, д. 5, л. 17,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1, с. 433 - 434.

③ 1939 年 5 月 17 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其主要内容是：1. 英国政府明确宣布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犹太国家并不是它政策的一部分，它认为这种政策是违反《委任统治书》所规定的对阿拉伯人的义务的，是违反它从前对阿拉伯人的保证的；2. 英国的目的是在十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英国有条约关系的巴勒斯坦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按人口比例参加政府，以保护双方的利益；3. 五年内允许犹太人移民 75000 人入境，五年后如果没有阿拉伯人同意，不再允许犹太人入境；4. 过渡时期内，给予英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切权力来限制和禁止土地的转让。参见《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第 14 ~22 页；肖宪：《中东国家通史 · 以色列卷》，第 102 页。

能够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自由移民巴勒斯坦提供方便。①

从1946年开始，在莫斯科的允许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和罗马尼亚政府就移民问题展开谈判。布加勒斯特方面同意5万名犹太人离开罗马尼亚移民巴勒斯坦，但是前提是放弃他们在罗马尼亚的财产，此外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还不得不为这些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支付人头税。②

1946年5月，第一艘载有1700名犹太人的轮船离开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港前往巴勒斯坦。1947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还试图组织15000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流产。③

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方面的谈判也在进行当中。1946～1948年，犹太巴勒斯坦代办处一共接纳了6万名犹太非法移民，其中80%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④

1948年5月，犹太国以色列的成立为全世界犹太人合法的移民巴勒斯坦打开了方便之门。大批犹太人拥入巴勒斯坦造成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极大恐慌，一些国家希望继续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在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代表发言指出："犹太移民问题是以色列的内部事务，有些安理会的代表曾就犹太移民威胁到周边阿拉伯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过讨论。我想要指出的是：除了以色列本身的自卫行为，我们还不知道任何一起由以色列军队发起的对他国的武装入侵，相反以色列是被迫去击退来自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自卫行为。"⑤

1948年12月，以色列外交部长谢尔托克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就东欧国家的移民问题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谈话中谢尔托克一再强调了移民对于以色列国的重要性。谢尔托克指出："在一战期间，俄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中占据了举足轻重

① 30 May 1945, *DISR*, Part I, p. 98.

② Uri Bi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 - 195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0.

③ Idith Zertal, *From Catastrophe to Power: Holocaust Survivors and the Emergence of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chapter III, p. 238.

④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5.

⑤ Yaacov Ro'i, *Soviet Decision-Making in Practice. The USSR and Israel, 1947 - 1954*, p. 238.

的地位。在我们的政府中，一些重要部门和岗位，许多人都是来自俄国。一战以后，大量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移民到了巴勒斯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主力军。所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使得东欧国家的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来。"① 维辛斯基回答："你们的意见我会转达给我的政府，转达给莫洛托夫，甚至是更高级别的领导人。"② 显然，维辛斯基在这里指的这位更高级别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了。由此可见，莫斯科高层对于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移民是相当重视的。

从 1948 年中到 1951 年，东欧国家先后向以色列输出了近 30 万名犹太移民。其中：罗马尼亚移民 117950 人，波兰移民 106414 人，保加利亚移民 37260 人，捷克斯洛伐克移民 18788 人，匈牙利移民 13424 人，南斯拉夫移民 7661 人。③

尽管苏联对于以色列在东欧国家吸收移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对于本国犹太人的移民要求则给予了严格限制。1948 年 9 月 15 日，以色列驻苏联公使果尔达·梅厄在会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时指出：要解决犹太问题，只有靠大量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一途径。佐林说："绝大多数犹太人都会留在自己的国家，而不会移民以色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犹太人在苏联从未受到歧视和压迫，要最终解决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只有在该国彻底实现民主化。"④ 同一天，果尔达·梅厄在会见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巴库林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巴库林说："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应该仅限于'非民主国家'，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⑤

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资料，1945～1955 年，仅有 500 名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⑥ 而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材料显示，1948～1955 年，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有 131 名，这其中只有 9 名犹太人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离开苏

① 12 December 1948, *DISR*, Part I, p. 414.

② 12 December 1948, *DISR*, Part I, p. 419.

③ Marie-Pierre Rey, *Juifs et émigration juive dans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soviétique: handicap ou atout ?*, 1917 – 1991, 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 No. 322, 1991, p. 254, 转引自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5。

④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 АВП РФ, ф. 089, оп. 1, п. 1, д. 2, л. 8, 转引自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8。

⑤ 15 сентября 1948, АВП РФ, ф. 089, оп. 1, п. 1, д. 2, л. 8, 转引自 Laurent Rucker, "Moscow's Surprise: 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 – 1949", p. 38。

⑥ Источник, №1, 1996, с. 154 – 155.

联的。[1] 1952 年 4 月 6 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波德采罗布给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1948～1951 年，苏联移民局一共收到了 65 份苏联犹太人要求移民巴勒斯坦的申请，其中只有 10 份获得了批准。[2]

由此可见，苏联方面的态度很明确，就是限制苏联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官方的说法是苏联不存在反犹主义，也不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因此苏联犹太人没有必要移民巴勒斯坦。但在笔者看来，实际情况是由于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人口急剧下降，百废待兴，因此在战后实行了限制人口外流的政策。总体上来说，犹太人在苏联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莫斯科方面希望犹太人能留在国内为苏联的建设服务。因此，以色列的移民政策与战后苏联的人口政策是相悖的，这也是后来以色列倒向美国及苏以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新生的以色列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于苏联犹太人移民这个敏感问题，以色列领导人一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裔以色列公民的亲属能够移民以色列。[3]

在其他方面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后，苏联对以色列的支持还体现在其他诸多方面。例如，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期间，联合国调解员瑞典人伯纳多特提出了一个解决停火的新方案，把巴勒斯坦这块委任统治地和外约旦合并为一个经济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有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双方可以通过一个中央议会协调它们的共同利益。遇到分歧时（例如在移民问题上）有向联合国申诉的权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有返回家园并收回其财产的权利。此外，伯纳多特还建议对 11 月的分治计划作某些领土方面的调整，使其符合目前的军事形势。他建议把内盖夫（南巴勒斯坦）的全部或者一部分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作为交换，把加利利西区的全部或一部分划入犹太领土；把耶路撒冷城划入阿拉伯领土之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自治地则享有市政自治权；在海

---

① Uri Bia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Israel's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1948－1956*, p. 146.

② АВП РФ, ф. 022, оп. 5а, п. 66, д. 9, л. 131 － 133,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I, с. 342－343.

③ АВП РФ, ф. 089, оп. 1, п. 1, д. 2, л. 17－19,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ом II, с. 411－412.

法建设一个自由港（包括输油管终点和炼油厂），在卢德设立一个自由航空站等。[①] 在苏联的支持下，以色列方面拒绝了这个计划。[②] 此外，1948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苏联又一次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否决了联合国大会的 194 号决议。[③]

五 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原因

如前所述，战后苏联给予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斯大林的这个决定几乎出乎所有西方观察家的预料。就是在苏联领导层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理解。那么，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1947 年 11 月 5 日，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对巴以分治决议进行投票的前几天，苏联驻伊拉克临时代办 A. Ф. 苏尔塔诺夫给苏联外交部近东司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苏尔塔诺夫分析了苏联支持犹太建国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是：会使全世界犹太人对苏联抱有好感，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的犹太人。如果犹太国从英美银行和美元外交中脱离出来，可以成为中东地区的一个革命因素。对于不利因素，他谈了六点：①支持犹太人将会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疏远我们。②将会使英国人和反动的阿拉伯联盟高层联合起来，这对于阿拉伯国家中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利益是很不利的。③这将刺激阿拉伯联盟、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反苏的穆斯林同盟。④这将会对人民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带来不利影响。⑤犹太国将有可能成为美国人向中东地区扩展的基地。⑥在英国的挑唆之下，阿拉伯国家将不再相信苏联人是支持他们的。[④] 总的来说，苏尔塔诺夫认为

---

① 参见乔治·柯克《1945～1950 年的中东》，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 456～457 页。

② 16 октября 1948，АВП РФ，ф. 07，оп. 216，п. 49，д. 39，л. 86，转引自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 38。

③ 该决议允许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家园，同时阿拉伯难民有权对自己的财产损失进行索赔。参见 Laurent Rucker，"Moscow's Surprise：The Soviet-Israeli Alliance of 1947－1949"，p. 34。

④ АВП РФ，ф. 0118，оп. 2，п. 3，д. 11，л. 62－64，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Том I，с. 265.

苏联支持犹太建国是弊大于利的。

然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斯大林，还是采取了支持犹太建国的立场。这里尝试分析一下战后苏联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原因。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其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苏联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经济恢复和发展是苏联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任务。就苏联的实力而言，在当时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其次，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得战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障。总的来说，莫斯科对雅尔塔体系基本上是满意的，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①

尽管奉行大国合作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的地区，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这突出体现在了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均属于中东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一直是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 19 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一直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1917 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而自顾不暇，无力再争夺这块战略要地，于是苏俄的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中东地区。

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之一的苏联重新开始关注中东地区。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土耳其、伊朗和巴勒斯坦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些均是雅尔塔体系尚未确定或有待调整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在伊朗问

① 1944 年 10 月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把希腊让给了英国。有关“百分比协定”的俄国档案包括 1944 年 10 月 9 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和 1953 年 6 月 3 日马立克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Источник，2003，№2，с. 45～56），1944 年 10 月 10 日莫洛托夫与艾登的会谈记录和 10 月 17 日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Ржешевский О. 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 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 – 1945），Москва: Наука，2004，с. 429 – 438、476 – 480］。以上档案的中译文参见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3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 261～278 页；《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十六卷，第 721～726 页。对于斯大林与战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最新研究，见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0 期。

题上，苏联采取的是一种咄咄逼人的与西方对抗的姿态。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支持伊朗国内反对党，甚至陈兵边界对伊朗政府加以武力威胁。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要求对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作出重大修改。但是在英美两国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方面不得不选择退却和妥协。由于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连连受挫，苏联要想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有所作为的话，巴勒斯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巴勒斯坦是大英帝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却成了英国地区性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之一。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相互敌对，而且都希望摆脱英国委任统治的枷锁赢得独立。但是在巴勒斯坦，英国并不能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英美特殊关系也并不能给英国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尤其在犹太移民问题和巴勒斯坦的未来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矛盾。同时，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英国也很难在巴勒斯坦立足。

斯大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正是利用了英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1946年9月，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长电报。诺维科夫指出：战后，大英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其统治基础已经动摇，特别是在印度、埃及和巴勒斯坦这些地区。美国和英国尽管在远东地区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在近东地区，两国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这一地区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因此华盛顿对于支持英国在近东地区的统治完全不感兴趣，美国更愿意由自己来直接控制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这一战略要地。诺维科夫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将会成为英美矛盾在近东地区的焦点。美国要求英国允许10万名欧洲犹太难民移民巴勒斯坦，并非是出于对犹太难民的同情，而是美国垄断资本打算借此机会进入中东，把巴勒斯坦作为其石油管道的一个终端。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加强会直接威胁苏联的南部边界，但是英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强势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①

---

① 诺维科夫关于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给莫斯科的电报，1946年9月27日，АВПРФ，ф. 06，оп. 8，п. 45，д. 759，л. 21－39。这份解密文件最早发表在俄文杂志《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1990，No. 11，с. 148－154），不久后，美国杂志《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Vol. 15，No. 4，1991，pp. 527－537）翻译刊出了英文本。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这份电报的文献，不过，诺维科夫在电报中讲述的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估计和分析，是奉莫洛托夫之命而作，且在莫斯科受到极大重视。[①] 由此可以判断，在审视了电报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之后，斯大林完全有理由认为苏联重返中东地区的机会来临了。

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策略显然吸取了在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时的教训，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策略——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来处理。鉴于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地位，只要英国人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莫斯科就有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同时，斯大林也就有了介入中东地区其他问题的机会。斯大林当然不希望巴勒斯坦变成第二个约旦[②]，由于他无力直接阻止这类条约的签署，于是希望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斯大林的策略无疑是高明的，他想使苏联在中东地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又不付出任何代价。

1948 年 2 月 18 日，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转交给联合国大会之后，苏联就开始正式参与了有关未来巴勒斯坦问题命运的讨论。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有两个选择：或者支持阿拉伯人，或者支持犹太人。

当时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显然没有太多的外交活动空间，因为阿拉伯国家基本上都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如埃及仍处于法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伊拉克和约旦由哈希姆王朝统治，这些政权都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英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东的传统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和美国的排挤，比战前更需要加强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要求建国的热情很高，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冲突日趋激化。这在斯大林看来，支持与英国直接对抗的犹太人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于是，利用英美矛盾，通过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人终于重新返回了中东地区。

把英国逐出巴勒斯坦，削弱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是斯大林的目的，

---

① 详见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ИВИ РАН，1998，с. 6－7。

② 1946 年 3 月 22 日，约旦同英国签订伦敦条约，废除了英国的委任统治，英国承认约旦的独立，但保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特权。

同时也是美国人的目的，于是苏联和美国都采取了扶植和拉拢犹太人的政策。此后，莫斯科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以色列国能够在巴勒斯坦成立与美苏两个大国的支持密不可分，英国人撤出之后，巴勒斯坦这块战略要地自然成了美苏两国都觊觎的目标。而在这个时候，对于新生的以色列国来说，确定在两极格局之中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斯大林看来，如果以色列选择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那么苏联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就有了立足之地和代言人。如果以色列不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在美苏之间选择中立，它也会因为苏联对它的支持而采取对苏联亲善的政策，这同样也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退一步说，如果以色列倒向西方，那么与以色列势不两立的阿拉伯国家就会因此倒向苏联，美国也会因扶植以色列而深陷在中东地区的泥潭里。这样苏联则可以置身事外，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前提下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①] 尔后发生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可以说，在支持犹太建国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实际上做了一笔不输的买卖。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的外交战略目标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在最高地位。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缔造的雅尔塔体系保证了苏联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对此是十分满意的。不过，在雅尔塔体系所未明确其势力范围的地区（如伊朗、土耳其和巴勒斯坦），斯大林认为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获得更大利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斯大林支持犹太人建国并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同情，支持犹太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于新生的犹太国是否会倒向苏联，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目标中并无过多的考虑。由此也不难解释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支持犹太建国的同时，又发动了以“犹委会”案件为代表的大规模的国家反犹主义运动。

英美矛盾给了莫斯科进入中东地区的机会，莫斯科抓住这个机会，在将英国人逐出巴勒斯坦的同时，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扩展到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苏联的支持实现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夙愿。

---

① 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斯大林曾经说过：“以色列将会长久地成为美国身上的‘一根刺’。”参见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3, №1, с. 99。

悲剧的产生：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

陕西师范大学　宋永成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犹委会）[①]是苏联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1941～1953年）唯一重要的犹太人组织。二战期间，它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却沦为美苏冷战的牺牲品，遭到苏联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犹委会的悲剧命运就成为冷战时期苏联犹太人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成为斯大林冷战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探索苏联政府冷战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勾画斯大林在冷战时期的心路历程，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西方，一些学者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对犹委会历史的研究。[②]苏联解体后，随着涉及犹委会的档案文献不断解密、公布，有关犹委会问题的研究渐臻高潮，无论是俄国史学界还是西方史学界，都相继出版了大量有关犹委会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及建

① 俄文为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EAK），英文为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JAFC）。

② Yehoshua A. Gilboa, *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 1939－1953.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Shimon Redlich, *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in Wartime Russian: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1941－1948.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1982.

立在对这些档案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基础上的高层次学术论著。① 不过，中国学者对于犹委会历史的研究总的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深入。② 本文拟利用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对冷战时期犹委会的悲剧命运及其内在根源予以探讨。③

一 战争洗礼：犹委会在卫国战争中的诞生及其作用

犹委会是苏德战争期间建立的一个半官方的苏联犹太人反战组织。1941 年 6 月 22 日纳粹入侵后，苏联丧师失地，损失惨重。为了调动各族

① *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с. 41 - 59;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Translated by Antonina W. Boui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division of Randem House, Inc., 1994;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Последний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ад членам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4;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Australia: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 - 1948,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6;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Тай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талина, власть и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1;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The Red Book: The Trage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and the Soviet Jews*.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3; 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2003.

②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相关论文。见唐裕生《前苏联反犹政策和犹太移民潮》，《世界民族》1995 年第 1 期；张建华《简论苏联的犹太人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 年第 2 期；毛远臻《时代变迁中命运沉浮的苏联犹太人——评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对境内犹太人的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增刊；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 年第 3 期。不过，除毛远臻的文章之外，其余文章尚未能充分利用已解密的俄国档案资料。笔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有《埃利希 - 阿尔特事件及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陕西师大学报》2007 年第 2 期；《"克里木方案"与二战后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 年第 3 期。

③ 关于犹委会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活动及犹委会案件审判的俄国档案中译文，可参见沈志华总主编、丁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5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本文使用的俄国档案主要参考了该书的译文。此外，陕西师大外国语学院的徐华老师帮助笔者翻译和校对了大量俄文资料，杨存堂教授也对本文写作多有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人民的反法西斯热情，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苏联情报局[①]先后发动不同民族、不同团体的文化代表人物成立了犹委会、全斯拉夫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家反法西斯委员会。1942 年 4 月 23 日，在苏联战时首都古比雪夫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正式对外宣布了这 5 个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指出："犹委会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所有国家的犹太人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发起一个全力以赴援助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肩负重任的苏联及红军的运动。"[②] 苏联著名犹太人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受命出任犹委会主席，布尔什维克党的资深新闻人士沙赫诺·爱泼斯坦出任责任书记。其成员包括著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达维德·贝格尔森，著名诗人佩列茨·马尔基什、伊·费费尔，著名生物学家、苏联科学院唯一的女院士莉娜·什泰恩，电影界公认的大师阿·卡普列尔，莫斯科包特金临床医院主任医师鲍·希梅利奥维奇等七八十位苏联社会的犹太名流。犹委会还同时创办了自己的意第绪语机关报——《埃尼凯特报》（《团结报》）。犹委会的办公地址起初设在古比雪夫，1943 年 8 月底，迁回莫斯科市中心克鲁泡特金大街的一座二层大楼里。1944 年 4 月，根据苏联情报局的要求，犹委会内部成立了主席团，主席团成员起初有 15 人，后来扩大到 19 人。

犹委会成立后，立即在国内外积极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它充分利用犹太人问题的特殊性，通过向国外犹太新闻机构大量寄发有关纳粹军队残酷屠杀犹太人和苏联犹太人积极参加卫国战争及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资料，成功地打破了世界犹太新闻界此前对苏联实行的新闻"封锁"，在西方为苏联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③] 从 1942 年 5 月到 1944 年 4 月，犹委会先后在莫斯科召开了两次犹太人反法西斯群众大会、三次犹委会全体

---

① 苏联情报局（Советско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是 1941 年 6 月 24 日建立的负责掌管战时苏联情报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机构。局长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1901 ~ 1945．5）担任，副局长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担任，另外还包括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格·亚历山德罗夫等宣传部门负责人。

② 《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活动的声明》，转引自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p. 100 – 101。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168 – 170.

会议，并且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提出了“募集钱财购置1000辆坦克和500架飞机并把它们赠送给红军”的倡议，在国内外犹太人当中引起强烈反响。[①] 1943年6~12月，由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和主席团成员费费尔组成的苏联犹委会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了友好访问，不仅与这些国家的主要犹太人组织进行了广泛交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大大地推动了西方犹太人的援苏活动。这是犹委会对外宣传的高潮，也是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苏联情报局领导的5个反法西斯委员会中，犹委会的活动最活跃，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亚诺·拉斯廷格的统计，犹委会新闻通讯社在战争期间总共给国外通讯社提供了2.3万篇（册）文章和书籍、3000多张照片，这些材料“由8家通讯社发表在12个国家的264种期刊上。”[②] 在犹委会的努力宣传下，国外犹太人组织和个人对苏联红军和民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包括现金、食品、衣物、药品、机器设备、救护车等，不一而足。按照洛佐夫斯基的说法，仅美国的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委员会[③]就为苏联募集了9300万美元。[④]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战后的许多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卫国战争期间，犹委会“在抵制反苏宣传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⑤]，“在促进动员国外犹太人居民参加同德国法西斯斗争的工作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⑥]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苏联情报局“及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认为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策、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必不可少的。”[⑦]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具有代表性的合法的中央犹太人组织，犹委会在履

---

① Правда, 25 мая 1942г..

②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36.

③ 亦称俄国战争救济犹太分部，是1942年2月由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国际工人团犹太分部、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等美国主要犹太组织联合成立的战时对苏救济机构，主席由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犹太商人路易斯·莱温担任，荣誉主席由斯蒂芬·魏斯和爱因斯坦共同担任。战争期间在组织美国犹太人对苏援助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④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159.

⑤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26.

⑥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44 – 345.

⑦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王长荣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369页。

行对外宣传使命的同时，也对苏联犹太人的生存和犹太文化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为此，犹委会与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权机构反复进行交涉，通过各种途径为生计困难的苏联犹太人作家、犹太难民争取和提供救助；它还以保存和复兴犹太文化为己任，不仅把一大批意第绪语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和记者以及残存下来的犹太文化机构如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国家犹太剧院等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还通过组织“文学之夜”沙龙、出版意第绪语书籍等方式，为复兴犹太文化竭尽所能。为了解决疏散到苏联内地的犹太难民的安置问题，1944 年 2 月 15 日，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和费费尔联名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在俄国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克里木建立犹太族自治共和国的建议（简称“克里木方案”）。[1] 战争期间，反犹主义在苏联普通民众当中和一些苏联党政部门内部再次死灰复燃，不少犹太人被解除公职，犹太人被指逃避战争，甚至在许多公开场合遭到殴打和侮辱。为此，犹委会把与反犹太主义进行斗争列为自己的第二项重大任务，竭力维护犹太同胞的权益。

二战刚刚结束之际，苏联政府仍旧希望调动西方的亲苏力量特别是亲苏犹太人组织来为苏联的对外宣传政策服务，因此不断鼓励亲苏的美国犹太组织与苏联及犹委会保持关系。而犹委会也非常渴望能够维持与世界犹太人组织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来之不易的联系，以便让苏联犹太人重新回到世界犹太人大家庭中去。经过苏联政府精心安排，一批重要的西方犹太人组织及其领导人、著名记者先后来苏访问，其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 1946 年 1 月 11 日到 6 月 3 日美国犹太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委员会主席 B. Z. 戈尔德贝格对苏联的访问和 1946 年 9 月底到 1947 年 1 月初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晨报》的主编保罗·诺维克的苏联之行。他们都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受到苏联政府和犹委会的热情款待，不仅参观了苏联国内的许多地方，而且与各地政府官员和犹太人进行了座谈，收集了许多关于苏联犹太人的宣传资料。在这些接待活动中，犹委会均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是，随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的结束，特别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犹委会在国内的处境日趋严酷，其命运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

[1]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с. 136 – 139.

二　时乖命蹇：苏联国际战略的转变与犹委会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与西方从合作逐渐走向冷战。1946～1947年，是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冷战缘起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斯大林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变化而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国内外犹太人寄予厚望的“克里木方案”被抛弃。

1944年2月15日，犹委会把“克里木方案”提交给苏联政府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此事“不仅在莫斯科的犹太居民中公开谈论，在政权上层中也广为谈论”，并且受到苏联广大犹太民众以及各兄弟民族的优秀代表人物的普遍欢迎。[①] 1944年3月，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即将在克里木建立犹太族苏维埃共和国的事情。1944年5月12日，克里木半岛全部解放。不久，22.5万名土著人（其中主要是克里木鞑靼人）因被指控与德国人合作而在几天之内就被全部放逐到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无疑为犹太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时在莫斯科，犹委会、犹太文学界和文化界对“克里木方案”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与此同时，美国犹太人对此也极为关心。1944年6月，美国商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通知美国驻苏大使埃·哈里曼在拜会斯大林时，专门讨论了在白俄罗斯的主要犹太居民点恢复州的建制以及向克里木进行犹太移民的问题。“约翰斯通向斯大林描绘了一幅令人高兴的蓝图，如果达成这件事，苏联在战后可获得美国的长期贷款。”[②] 在筹备雅尔塔会议时，哈里曼还向苏方询问过关于建立犹太共和国以争取美国贷款的计划进展情况。犹委会领导人非常乐观。费费尔曾向米霍埃尔斯保证，“克里木方案”会得到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支持。[③] 贝利亚曾在秘宅接见费费尔，与他研究有关成立克里木犹太共和国的问题。[④] 洛佐夫斯基则明确通知犹委会领导人，苏联领导人有可能同意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共和国。1944年年

① 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小明、陆柏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第336页。

②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6页。

③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48.

④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6页。

中或1945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鲍里索夫的办公室曾收到指示，“审查用于筹建未来克里木犹太共和国的财政需求”。[①] 以至于当时传言米霍埃尔斯有可能担任犹太共和国苏维埃主席，爱泼斯坦将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犹委会领导人已经开始“分配部长职位”。[②] 了解内情的苏多普拉托夫指出，1945年，苏联官方散布传言说，“在克里木将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共和国，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到那里去，尤其是深受法西斯主义迫害的欧洲犹太人。”其目的是“想弄清是否可以借此从西方获取资本，以重建遭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③] 二战胜利后，斯大林还与美国参议员代表团就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和在白俄罗斯犹太人曾聚居的地区恢复戈麦尔州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并请求他们不要将贷款和技术仅限于这两个地方，不要受具体计划的束缚。“斯大林想通过这种方式从西方筹集100亿美元的资金以重建被战争破坏的经济。”[④] 一直到1946年年中，“克里木方案”都左右着犹太文学界和文化界，“犹委会的领导人天天都在等待正面回应”。[⑤] 但是，他们不知道，不幸正在悄悄降临。1946年6月2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将克里木自治共和国转为克里木州”的相关法律。在两年多时间里悬而未决的“克里木方案”就此终结。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放弃了“克里木方案”呢？

首先，二战结束后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和英美由合作开始走向对峙。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斯大林这时不得不谨慎对待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讲话中就已经暴露了对美苏未来冲突的隐忧。1946年5月1日，他在《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中更是明确宣布，“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克里木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那么，在美国闹得很凶的犹太复国运动就会在苏联取得立足点，万一

①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45.

②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5页；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49;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c. 280。

③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10、336页。

④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35页。

⑤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51.

⑥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4，第506页。

战争爆发，克里木就将会成为美国在苏联"南方的基地"。1956 年 8 月 29 日，赫鲁晓夫在接见来访的加拿大劳工进步党代表团时明确表示："我当时就反对这个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斯大林的意见。"[①]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一。

其次，由于冷战的来临，苏联吸引犹太人资本的愿望落空。美国犹太人，甚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敢贸然向苏联提供援助了。就连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等积极从事有利于苏联活动的美国进步人士也遭到美国侦察机关的调查。[②] "国家领导人开始明白，指望犹太商界提供援助和投资是不可能了"。苏多普拉托夫认为，"关于在苏联框架内建立犹太共和国的问题，像是一种对西方的试探，以便借此弄清西方在战后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到底能实施到什么程度。"[③] 现在，既然与西方合作的希望已经破灭，斯大林怎么可能继续支持"克里木方案"呢？

不仅如此，几年后，斯大林还利用这个早就放弃的"克里木方案"作为主要"罪证"之一，策划了震惊世界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二个重大打击，就是犹委会呕心沥血编撰的《黑皮书》被查封。《黑皮书》是关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特别是在暂时沦陷的苏联各地区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资料的汇编。编写和出版《黑皮书》是由爱因斯坦首倡的。它既是犹委会与西方犹太人组织合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也是犹委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一计划从 1942 年底开始酝酿，1943 年夏，经苏联情报局批准，在犹委会内部正式成立了由米霍埃尔斯、贝格尔森、费费尔等人组成的《黑皮书》编纂委员会。紧接着，这一计划就紧锣密鼓地实施起来。1944 年春，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爱伦堡、格罗斯曼、谢芙琳、克维特科等 24 人加入进来，其中还包括 3 名俄罗斯作家。经过犹委会和数十位作家的辛勤努力，俄文版《黑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历经坎坷之后终于于 1945 年秋完成。1946 年年初，经苏联文学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审查批准，《黑皮书》被列入该年度的出版计划，并且在同年 3 月交由承担该项出版任务的意第绪语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 26 卷，第 524 页。

②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91.

③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 341、355 页。

《真理报》出版社出版。[①]

但是，就在犹委会等待《黑皮书》印刷之际，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黑皮书》的出版发行。从苏联方面来看，《黑皮书》计划一开始就是为苏联的战时对外宣传政策服务的，其目的就是通过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唤起海外犹太人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而并非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同情。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当局本身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没有公开，所以，《黑皮书》计划得以继续运行。然而，当冷战爆发，特别是反犹主义已经成为苏联的官方政策之时，《黑皮书》的内容已经不合苏联当局的胃口，并且变成苏联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障碍。根据苏联官方的旨意，大量有关巴比亚沟大屠杀、对死亡集中营境况的描写、遍及苏联各地的当地人（特别是波罗的海共和国和西乌克兰的居民）与德国人合作残害犹太人、趁机掠夺犹太人的住宅和财物以及叙述苏联政权对已解放地区的犹太人幸存者漠不关心的内容都被删掉。与此同时，增加了大量讲述苏联公民是如何拯救犹太人的内容，但是到头来它还是不能合乎苏联领导人的要求。1947 年 2 月 3 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对《黑皮书》的内容重新进行了两个月的审查后做出结论：此书不宜在苏联出版。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该书在指导思想和内容方面存在两大严重问题：一是全书给人留下了德国人在对苏战争中劫掠和消灭的仅仅是犹太人的错误概念；二是格罗斯曼臆造了一个德国人屠杀苏联各个民族的某种次序。[②] 所以，无论犹委会领导人和《黑皮书》的编辑如何强调该书对于苏联读者的重要性，在苏联当局的眼里，它已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出版物。特别是当斯大林和苏联当局决定在国内开始掀起新的反犹浪潮并决定拿犹委会开刀时，出版《黑皮书》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它的出版“毫无疑问是与苏联的整个政策相冲突的”。[③] 1947 年 8 月 20 日，文学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62 – 263;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61.

②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61 – 262.

③ *The Black Book: The Ruthless Murder of Jews by German-Fascist Invaders Throughout the Temporarily-Occupied Reg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n the Death Camps of Poland During the War of* 1941-1945, Prepared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Ilya Ehrenburg & Vasily Grossman, Holocaust Library. New York, 1981, pp. XXIII-XXVI.

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发布命令，勒令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停止印刷《黑皮书》。尽管米霍埃尔斯在1947年9月18日致函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请求他"指示完成这个及时的、重要的出版物"，但当日丹诺夫就此征求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意见时，后者依然固执己见，认为《黑皮书》含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能出版"。[①] 日丹诺夫有点犹豫不决，遂交由斯大林最后定夺。斯大林明确表示："当我们所有的民族都在受难的时候，为什么要突出这些（犹太人）的苦难？"[②] 这就等于给《黑皮书》正式宣判了死刑。随后，尚未印完的《黑皮书》被遗弃在印刷厂潮湿的仓库里，无人问津。[③] 1948年底，随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查封，此书也被销毁了。[④] 俄文版《黑皮书》虽然没有面世，但是，当斯大林开始策划"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之时，它同样成为苏联当局指控犹委会的主要罪证。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三个重大打击是犹委会主席米霍埃尔斯被谋杀。1947～1948年，出于对外冷战和对内加强统治的需要，苏联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其"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⑤]，在苏联民众当中"灌输对西方的反感和敌意"，以便当预期的冲突发生时培养起一种好战的精神。[⑥] 苏联犹太人因为和西方联系最广、受西方影响最大，因而沦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著名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政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几乎就是同义词。"[⑦] 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几乎就是反犹太人运动。"[⑧] 在官方的支持下，不论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62－263.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04.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64.

④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第五部，秦顺新、冯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39页。

⑤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第365页。

⑥ Yehoshua A. Gilboa, *The Black Years of Soviet Jewry*: 1939－1953.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p. 147.

⑦ 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何宏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第966页。

⑧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94.

是政界，还是科技文化界，大批犹太人遭到开除或者免职。而作为犹太文化的领军人物、享有“苏联第一犹太人”[1] 美誉的米霍埃尔斯自然就成为苏联当局打击的首要目标。特别是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决议通过后，斯大林的战略是“决不允许在苏联境内出现一个公认的、享有世界声望和尊敬的犹太民族运动领导人。”[2] 而担任犹委会主席的米霍埃尔斯恰恰就是斯大林最为担心的那种苏联犹太人的精神领袖。苏联当局明白，“应该首先除掉米霍埃尔斯，因为不除掉他，就不可能清除犹太民族文化的残余，就不能有计划地从肉体上消灭受他支配的苏联的犹太人。”[3]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947年12月上旬，美国报刊上出现了受到严格保密的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细节报道。这件事在苏联被看作是泄露国家机密。[4] 斯大林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追查泄密者。国家安全部一时找不到真正的消息来源，于是便嫁祸于米霍埃尔斯，诬称米霍埃尔斯委派苏联科学院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家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从斯大林的妻嫂叶夫根尼娅·阿利卢耶娃及斯大林的犹太女婿莫罗佐夫处收集有关斯大林私生活的情报。[5] 因为米霍埃尔斯在战争期间访问过美国，与美国犹太人联系甚广，所以，国家安全部便向斯大林报告说，“全世界是通过米霍埃尔斯了解到他的私生活的。”[6] 斯大林随即命令阿巴库莫夫迅速干掉米霍埃尔斯。[7] 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伊·奥戈利佐夫、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拉·察纳瓦中将和费·格·舒布尼亚科夫上校受命负责此次行动。1948年

---

① Shimon Redlich, *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p. 82.

②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153.

③ 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张俊岩、魏卓丽译，中国盲文出版社，1988，第157页。

④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1, с. 88.

⑤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28.

⑥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354页。

⑦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58。贝利亚在这份文件中把米霍埃尔斯遇害时间误写为1948年2月。从时间上分析，斯大林是在1948年元旦做出最后处死米霍埃尔斯的决定的，也就是在这时确定由米霍埃尔斯前往明斯克出差的。1月2日米霍埃尔斯接到了出差通知。

1月12日晚饭后，在国家安全部的精心策划下，正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参加对获得本年度斯大林奖金提名的戏剧进行评审的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出行的国家安全部密探、戏剧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戈卢博夫一起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城郊别墅，然后被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用货运汽车轧死。夜深人静时，两人的尸体被装上卡车抛到明斯克市内离他们所住宾馆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大街上。[①] 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一副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散步回来死于车祸的假象。随后，斯大林高度评价了这一行动，并下令授予这一行动的参加者勋章和奖章。为了掩盖这一谋杀阴谋，苏联官方在1月16日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盛大的葬礼。《真理报》报道说，有数万人参加了追悼会。[②]

暗杀米霍埃尔斯是斯大林"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清算以及后来对其领导人和苏联－犹太文化精英清洗的序幕"。[③] 它是反对意第绪语文化和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是斯大林分子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预兆：先是对苏联的犹太文学和文化下手，然后是对有犹太血统的被同化的知识分子（取绰号'世界主义者'和'没有护照的流浪者'）下手。"[④] 这一事件标志着苏联犹太人历史上"黑暗年代的开始"。[⑤]

斯大林战略思想变化对犹委会造成的第四个重大打击是犹委会的活动陷于瘫痪。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斯大林的战略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主义出炉；6月5日，马歇尔计划发表。随后，斯大林彻底放弃了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美苏冷战正式爆发。9月25日，日丹诺夫在华沙召开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正式宣布，"世界舞台上现有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阵营，一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⑥] 苏联的内外政策日趋严酷，犹委会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58－359.

② Правда, 17 января 1948г..

③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29.

④ Benjamin Harshav, *Marc Chagall and His Times: A Documentary Narra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30.

⑤ Murray Friedman and Albert D. Chernin (eds.), *A Second Exodus: The American Movement to Free Soviet Jews*,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9, p. 2.

⑥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第449页。

冷战开始后，美英及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政治集团都开始加入了反苏大合唱。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进步的犹太组织又都在争取与犹委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便配合犹委会的活动。所以，犹委会认为，“在现阶段党和政府发动所有国家的犹太人进步民主力量对反动势力进行进攻的斗争中，犹委会可以发挥更广泛更积极的作用。”① 为此，米霍埃尔斯专门拜会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并向他提交了关于扩大犹委会活动的建议。② 不久，根据犹委会主席团的指示，米霍埃尔斯又向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提出了在向国外新闻界发送犹委会材料之外的六点工作计划，其中包括：帮助创建一个由犹太人反法西斯组织、苏联的友好联盟及其他进步民主组织组成的国际协会；不断地给国外进步民主组织派遣苏联犹太文学和艺术代表并把这些代表组成代表团派往海外；组织第四次莫斯科犹太人代表集会；用意第绪语出版反宣传的月刊杂志；派苏联犹太社团代表到国外向全世界宣传有关犹太难民们的悲惨状况；邀请美、法、波兰、保加利亚、巴勒斯坦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犹太进步民主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活动等。③ 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并未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认可。④

与此同时，犹委会的出访计划也屡屡碰壁。与战争期间犹委会代表团盛极一时、长达7个月的海外访问相比，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黯然失色。据笔者统计，战后犹委会的出访活动仅有一次，即1946年1月31日，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同意犹委会接受罗马尼亚犹太组织的提议，批准米霍埃尔斯出访罗马尼亚一个月。⑤ 此后，从1946年5月到1948年4月，犹委会先后总共提出了12次出访或者对外交流申请，不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包括亲苏的犹太人组织）的访问，还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人组织的交流，都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以各种理由或者借口驳回。经过一连串的挫折之后，犹委会领导人终于明白：苏联当局根本无意让苏联犹太人与西方犹太人建立密切的关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25.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26.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25 – 226.

④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29 – 230.

⑤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17 – 218.

系。所以，当犹委会在1948年4月再次收到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邀请其参加有关会议的通知时候，自己已经主动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谢绝与会的理由了。不过，它还是恳请能够派一位《团结报》的记者前去了解情况，但是也没有得到苏斯洛夫的恩准。[1] 犹委会处境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到1947年年底，苏联当局已经终止了利用犹委会加强与世界犹太界合作的计划。不仅如此，根据当时担任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调查处侦查员的留明后来的说法，在戈尔德施泰因被捕后（即1947年底），国家安全部在调查特别重要的案件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把犹太人看作苏联政府潜在的敌人。于是，犹太人逐渐成为苏联当局怀疑和打击的对象，许多被指控有反苏联行为和替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人被捕。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虽然没有立即下令解散犹委会，但是，也根本无意让它东山再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和宣传鼓动部显然没有洞悉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所以在1947年7月和1948年3月先后两次提出对犹委会进行彻底改组的方案[2]，以便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让其在对外宣传中重新焕发出活力。由于这一设想完全悖逆了斯大林的战略意图，结果自然就胎死腹中。斯大林之所以让犹委会继续保留下来，仅仅是出于中东政策的需要，因为这时他正在考虑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以便把苏联的势利扩展到中东。

三　两难抉择：以色列建国及其对犹委会的致命影响

在犹委会的历史上，以色列建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仅加速了犹委会的灭亡，而且对整个苏联犹太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战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从1947年5月14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演讲以来，苏联就坚定不移地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17.

②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49 –351.

为犹太人建国摇旗呐喊。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家成立后，苏联政府在 5 月 18 日就宣布"正式承认以色列及其临时政府"，成为第一个从法律上承认以色列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的鼎力支持，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建立，起码不会在 1948 年建立。俄国学者列昂尼德·姆列钦甚至把斯大林称为"以色列的缔造者"，并指出，"如果没有斯大林，犹太国家未必能在巴勒斯坦地区出现。"[②] 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动机比较复杂[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或者转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④] 然而，葛罗米柯在联合国的多次演讲给世人特别是犹太人留下的却完全是另一种印象：苏联在巴勒斯坦"没有直接的物质或者其他利益"，它对以色列的支持似乎完全是出于对犹太人在战时和战后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及痛苦的深切同情。[⑤] 苏联政府的这一"公正之举"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犹太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多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打压政策，于是，他们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一样欣喜若狂，在心中压抑多年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

作为苏联国内唯一的官方犹太人组织，犹委会自然就成了国内同胞倾诉心声的主要对象。苏联犹太人纷纷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并对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和感谢。M. Л. 车尔尼雅夫斯基将军听到莫洛托夫承认以色列的广播演说后非常激动，他在一封信中

---

①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б. док. Т. 1. 1941 – 1953, Кн. 1, 1941 – май 1949,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с. 305.

② *Млечин Л.*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создатель Израиля, Москва: ЯУЗА, ЭКСМО, 2006. с. 5.

③ 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可能有三重目的：一是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和中东；二是希望把以色列变成一个亲苏联的国家，进而与美国争夺对中东和地中海的战略控制权；三是如果前两个目标受挫，那么就把以色列作为一个不和的金苹果抛向中东，以便为苏联干预中东事务提供机会。见 Golda Meir, *My Lif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p. 188；*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с. 99。

④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71。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对犹太人同情，见赵伟明《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2006，第 25 页；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 126 页；赵克仁《试析苏联对以色列建国前后态度和政策的演变》，《西亚非洲》1993 年第 3 期，第 68 页。这一观点显然是片面听信了葛罗米柯的发言，忽视了对苏联国内这一时期反犹浪潮的研究。

⑤ 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上的演讲，参见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26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发言选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 180 – 181 页。

表示，"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坚定立场促进了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诞生。犹太民族永远都不会忘记苏联政府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全世界的犹太工人都把苏联视为他们从法西斯主义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救世主，并且对苏联政府给巴勒斯坦犹太人民的支持深表感谢。"① 爱伦堡、扎斯拉夫斯基、贝格尔森、阿杰米扬、祖斯金等许多苏联犹太名流也为此向《团结报》编辑部发出了致敬电函。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进攻也在苏联犹太人当中掀起了愤怒的浪潮。苏联犹太人群情激愤，或者亲自到犹委会办公室登门拜访，或者打电话、致函犹委会和《团结报》编辑部，纷纷敦促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代表苏联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紧急援助。他们既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各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也有来自一些企业、科研单位的职工、工程师和苏联军队的军官。其共同特点是都把犹委会和《团结报》的全体编辑视为"苏联犹太人的唯一代表"，要求犹委会率先垂范，立即开始动员所需资源去购买武器并运往巴勒斯坦，并向政府提出允许犹太志愿者前往巴勒斯坦和加入犹太军队的问题。列宁格勒高等院校的36名大学生在给犹委会主席团的信中说，"苏联犹太人正以极大的兴趣密切注视着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想知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帮助以色列与盎格鲁美帝国主义走狗进行斗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主要报刊上明确声明反对阿拉伯军队对以色列国家的侵略。"② 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达维德·德拉贡斯基上校等人向犹委会建议组编一个犹太师，派赴巴勒斯坦去反抗阿拉伯人的强霸势力。③

苏联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时也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从列宁格勒到敖德萨，从利沃夫到西伯利亚，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偏僻的乡村，从身居高位的官员到普通百姓，从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到普通群众，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到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所有的苏联犹太人都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认同感。许多人不仅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祖国，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表示不满，甚至直接要求移民以色列。乌克兰文尼察州日梅林卡市的500多位犹太人联名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说，"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新的以色列犹太国家建立了。我们现在将接受我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81.

②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82 - 284.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6.

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因为我们流落在世界各地受难的兄弟们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驱散、压迫、蔑视。”他们郑重请求苏联政府能够批准该镇所有的犹太居民移民以色列，以便“回到我们在以色列的祖国”。[①] 不仅如此，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在一些城市举行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1948 年 6 月，莫斯科犹太圣咏会堂组织了有上万人参加的隆重的礼拜仪式，会堂内外挤满了祈祷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犹太人民还活着”，“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塔什干、切尔诺维茨和其他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礼拜活动。[②]

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态度一下子把犹委会推向了潮头浪尖，并且迫使犹委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选择：到底是代表犹太同胞与政府进行交涉？还是屈从于政府的旨意明哲保身？犹委会领导人虽然在私下里和苏联犹太人一样感到兴奋，他们“对以色列的正面肯定态度是毋庸置疑的。”[③] 但是，由于没有收到苏联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们一时无所适从。事实上，自从 1948 年 1 月米霍埃尔斯被暗杀后，犹委会就一直处于阴影笼罩之下，噤若寒蝉。费费尔、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非茨等领导人除了把苏联犹太人的反应和要求呈报给上级部门，等待上级的指示之外，不敢自作主张采取任何行动。1948 年 5 月 18 日，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海非茨有关苏联犹太人要求支援以色列的报告后，在当天就做出批复，“苏联公民应当向苏维埃各级机关提出此类申请。”[④] 换而言之，这就等于剥夺了犹委会受理此类申请的权力。犹委会从此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

苏联政府支持以色列建国本来就是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所以，它既不希望国内犹太人因此增加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更不希望犹委会与以色列联系过密，甚至成为苏联犹太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代言人。根据现有资料来看，苏联政府当时分派给犹委会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帮助政府收集有关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情报。以色列建国之前，犹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89.

②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Эпоха Сталин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итянин, 1996, с. 270.

③ *Рейман М*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пер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3, с. 24－40, 34.

④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95.

委会就开始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按月提供相关情报。以色列刚一建立，它就提交了以色列临时政府成员的个人传记和有关阿以军事力量的报告。不论是国外犹太友人的来信，还是与国外犹太组织代表的会晤，只要是涉及以色列的有价值的情报，犹委会领导人都会向上级部门汇报。就在犹委会被查封的前5天，它还提交了最后一份关于“美国在以色列内部的经济和政治渗透”的报告。事实上，犹委会给苏联当局提供最多、最重要的情报还是有关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建国的反应。根据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的要求，海菲茨把所有打电话、来信或者亲自来到犹委会对以色列表示支持的人的姓名、职业、单位和住址都进行了详细登记，然后上报给中央委员会。从5月17日到31日，他至少汇报过3次，许多苏联犹太人给犹委会的呼吁和信件都被直接拷贝交给巴拉诺夫。[①] 同时，《团结报》代理主编日茨也把编辑部收到的相关信件和评论呈报给了巴拉诺夫。[②] 这些资料经对外政策部编纂后，迅速呈报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不仅如此，海菲茨和费费尔还把所有情况分头向国家安全部做了汇报。例如工程师罗加切夫斯基来到犹委会，邀请费费尔到他家里参加一些犹太人工程师对苏联歧视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并且请他把组建犹太志愿兵师派到以色列作战的倡议书转交给上级机关，而费费尔把这一切都报告了国家安全部的马尔丘科夫，并把那份申请书也转交给了国家安全部。[③] 巴拉诺夫明确指出，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是“为了全面揭露民族主义分子和敌对分子。”[④] 所以，海菲茨和费费尔不会不明白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什么。

二是配合政府进行必要的、受到严格限制的陪衬性宣传。1948年4月，费费尔和海菲茨曾向莫洛托夫建议：“犹委会应对联合国全体大会通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表示支持，以便增加世界犹太人对于苏联的同情。”结果遭到否决。[⑤] 5月19日，犹委会主席团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的问题。它所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就以色列的成立给以色列临时政

---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93 – 295;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308 – 314.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p. 392 – 393.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65.

④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14.

⑤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11.

府总统魏茨曼发去一封贺电，指出“这是犹太民族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这份寥寥数语的贺电，都要经过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苏斯洛夫、外交部副部长佐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层层审批，最后在签发时还删掉了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贺电末尾的签名。[①] 希梅利奥维奇在会上对只在犹太文报纸（即次日的《团结报》）上刊登这一贺电表示不满，为了扩大影响，他认为还应该在俄文报刊上发表。后来与有关部门协商后未获批准。由于苏联政府的限制，犹委会主席团对于苏联广大犹太人最为关注的有关支援以色列的要求和呼吁既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做出公开回应。

犹委会在援助以色列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引起了国内犹太同胞的强烈不满。从 1948 年 5 月 20 日开始，苏联犹太人对于犹委会的批评和责难汹涌而至。一位新西伯利亚的犹太人来电责问犹委会：“为什么你们不组织帮助新的以色列国家为其独立而战？”[②] 有 16 个犹太人联名致函爱伦堡说，“我们要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代表整个苏联犹太社团，大声疾呼捍卫犹太国家的合法权利，反对违反国际合约，反对侵略和干涉。……我们请求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大声疾呼，反对对我们犹太同胞的新的大规模杀害。”[③]

面对苏联犹太人的强烈呼吁和反复敦促，处于苏联政府严密监督下的犹委会进退两难，不知所措。而苏联犹太人在失望之余，也变得异常愤怒。一位犹太人在给犹委会主席的匿名信中愤然写道，“苏联全体犹太人就你们对巴勒斯坦事件漠不关心的态度深感气愤。如果你们还自称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那么您和您领导的委员会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号召犹太人武装起来……如果您在等待上级命令，那么您就不是一位好犹太人。”甚至指责“今天这个委员会绝不是犹太人的。”[④] 还有不少犹太大学生直接来找犹委会，对其消极态度表示不满。

犹委会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逐渐表现出与犹太同胞的期望和呼吁完全相左的倾向。在 1948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犹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与会者对犹太同胞的许多建议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费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5, 140.

②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85.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92 – 293.

④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91.

费尔指责来信者提出集资帮助以色列国战士和通过向巴勒斯坦派遣犹太志愿者的建议“非常愚蠢”，“未经政府批准是不能派遣志愿者和部队的。因为这将会引发中东地区的战争。”希梅利奥维奇认为“克服派遣志愿者和输送武器这一错误观念十分重要”。费费尔和克维特科指出，犹委会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正在复活的犹太复国主义。日梅林卡市犹太人的信件成为众矢之的。费费尔提出，犹委会还应该与苏联作家协会协商，选派几批作家前往日梅林卡市组织一系列文学晚会，并派遣作家前往敖德萨、日托米尔等地。因为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汹涌而来，所以犹委会显然把加强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看成了当务之急。费费尔就此提出了召开广播集会、对进步的犹太社会组织进行呼吁等四项建议，并宣读了关于召开广播集会给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的信。[1] 该集会拟于6月15日举行，但是因为“它的观点听起来太像为以色列而发起的同情性群众集会”[2]，所以最后未获当局批准。此次会议表明，犹委会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苏联犹太人发生了分裂。

在苏联政府的压制下，在犹委会的敷衍下，苏联犹太人要求声援以色列的第一次热潮逐渐消沉下去。

1948年9月，苏联在以色列问题上的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苏联侦察机关获得的文件显示，“以色列政府单一地采取了亲美和敌视苏联的立场”，正在抛开苏联，而“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秘密结盟”。这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政策。而最让斯大林担心的是，苏联一年多来的亲以政策不仅激活了国内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促使苏联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化，使他们‘突然感到自己是国际犹太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成千上万的苏联犹太人不但要求援助以色列，为以色列而战，而且许多人竟然直截了当地要求放弃苏联国籍，移居到自己真正的祖国以色列去。这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尽管苏联正在通过东欧国家为以色列提供秘密的军事援助，但是它却不能允许自己国家的犹太公民去公开保卫以色列，更不允许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那将是对早已宣称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讽刺。所以，从1948年9月初开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01 - 304.

②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p. 174 - 175.

③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с. 268.

始，苏联政府着手调整对以色列的宣传政策。1948 年 9 月 3 日，斯大林在去南方休养前夕，指示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要准备一些关于以色列国的文章。[①] 1948 年 9 月 7 日，《团结报》率先刊发了该报以色列问题专家列夫·戈尔德贝格的一篇文章，言辞犀利地抨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及他们与美国瑙姆·戈尔德曼博士的联系。戈尔德曼在战时极力倡导援助苏联，一直是苏联媒体的宠儿，现在却突然被指控为“进步主义事业的叛徒。”[②] 紧接着，《真理报》在 1948 年 9 月 21 日刊登了爱伦堡根据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授意撰写的文章——《关于一封信》。[③] 从表面上看，爱伦堡是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答复一个在战后欧洲继续受到反犹主义迫害、不知何去何从的德国犹太人所遇到的困惑：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其实，他是在和苏联犹太人谈话，并试图向犹太同胞表明，犹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引起的，“犹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全世界都实现社会主义”。面积狭小、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以色列根本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犹太人的问题。[④] 换言之，“以色列国家同苏联犹太人毫无关系，苏联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并不需要以色列”。[⑤] 对于苏联犹太人而言，此文无疑是一颗充满警告意味的子弹，同时也打响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枪。9 月 25 日，《团结报》再次发了这篇文章。苏联犹太人明白：这是警告他们不要同以色列公使馆的人员接近！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

1948 年 9 月初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抵达莫斯科后，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情绪再度爆发出来，莫斯科犹太大会堂成为亲以情绪的主要宣泄地。9 月 11 日，果尔达·梅厄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参加安息日祈祷，离开时许多人向她欢呼致意。[⑥] 10 月 4 日，是犹太教新年，以色列公使馆的全体人员再次来到莫斯科犹太大会堂。他们没有想到，平时假日只有 2000 左右犹太人来会堂，当天却一下子拥来了近 5 万人，等着他们莅临。[⑦]

①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 375.
② Shimon Redlich, *Propaganda and Nationalism*, pp. 165 - 166.
③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 375、383.
④ Правда, 21 сентября 1948 г..
⑤ Golda Meir, *My Life*, p. 205.
⑥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c. 399.
⑦ Golda Meir, *My Life*, p. 205.

参加集会的有红军官兵、青少年和怀抱婴儿的父母，除了莫斯科的犹太人外，还有从苏联最遥远的地方来的犹太人。[①] 在苏联，“没有一个礼拜场所曾经有如此众多、如此热情的出席者”。[②] 狂热的人群簇拥着梅厄，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犹太教首席拉比什洛伊梅·施利费尔试图制止狂热的群众，人们埋怨说，“我们等待这件事已经等了2000年，你怎么能不让我们表达自己的感情！”[③] 苏联犹太人以这种勇敢的方式向以色列外交使团表示了双方之间的亲属关系，表明了他们对以色列建国的庆祝，以及以色列对他们的重大意义。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犹太人与国外的犹太同胞已经分离了30多年，尽管饱经磨难，但是苏联当局的高压统治“仍然未能削弱他们的精神……犹太人还是犹太人”。[④] 10月14日是犹太人的另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成千上万犹太人再次涌向莫斯科犹太大会堂，同果尔达·梅厄在会堂待了一整天。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公使的狂热欢迎表明，“30多年的共产主义宣传也不能抹掉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情”。[⑤] 它不仅使苏联当局大为震惊，同时也使犹委会惊恐万状。

面对苏联犹太人愈燃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犹委会立即采取措施灭火。《团结报》一马当先，发表了大量针对性的文章：一方面批评以色列国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并没有享有真正的民主；一方面刊登了一系列同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作斗争、对犹太居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文章。文章引用苏联犹太人在生活和建设中的大量实例指出，“苏联犹太人唯一的祖国是苏联”，“只有在我们国家，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基础上，所谓的‘犹太人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苏联犹太人在一切方面与苏联其他民族都是平等的”。为了协助党对犹太人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日茨还致函马林科夫，要求加强《团结报》的编辑力量，增加报纸的发行量。[⑥] 1948年10月21日，犹委会主席团再次专门开会讨论有关以色列建国在苏联国内所引起的反响。这是犹委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主

---

①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с. 270.

② B. Z. Goldberg, *The Jewish Problem in The Soviet Union: Analysis and Soluti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61, p. 162.

③ Совет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399 – 400.

④ Golda Meir, *My Life*, p. 207.

⑤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75.

⑥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299.

席团会议。与会者认为，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只是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表现，“我们从未表达过对以色列国领导人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同情”。“苏联犹太人同情为自由而战的以色列工人，但并不同情准备把以色列变成美国实现扩张计划的忠实工具的以色列政府”。有人错误地认为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已经改变，事实上，苏联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态度从未改变。我们一直以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极其反动的运动”。几乎所有人都对爱伦堡和日茨在《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加赞赏。费费尔说，“爱伦堡的文章是基于深刻的原则并且是绝对正确的。现在苏联犹太人真的不再指望中东。这是对的。”克维特科表示，日茨“昨天写的文章非常好”。会上还有人抨击在犹太大会堂所发生的群众集会，指责果尔达·梅厄“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女人”。[①] 从与会者的立场可以看出，犹委会已经完全显露出其政府传声筒和打压犹太人的工具的本质。

由于犹委会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犹太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最终也被自己的同胞所唾弃。1948 年 10 月 8 日，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犹太老人在给费费尔、日茨等人的匿名信中对爱伦堡在《团结报》发表的鼓吹同化论的文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明确表示，“犹太民族不想听到爱伦堡的建议”。他对犹委会领导人赞同爱伦堡的观点感到难以置信，并且指出，“如果伟大的米霍埃尔斯读了爱伦堡在《团结报》上的文章，他会因愤怒和悲伤而在自己的坟墓中辗转反侧。”[②] 1948 年 11 月 25 日，一位名叫摩西·戈里德曼的犹太人在给日茨的信中把紧随爱伦堡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的日茨比作跟着一只“大狗”狂吠号叫的“小狗”，谴责他对犹太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到处从所有重要职位上被解雇、对许多机构拒不接受犹太毕业生的反犹现象视而不见，而为了一己之私利，阿谀奉承，“扮演白痴”。信的末尾说，“爱伦堡厚颜无耻地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讲话。他没有这个权利。而您也根本没有任何权利代表犹太人讲话。”[③] 从苏联犹太人利益的代言人到最后被犹太同胞剥夺了代表他们讲话的权力，犹委会在苏联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犹委会之所以对苏联政府惟命是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然而，这不仅未能挽救它的命运，

①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04 – 307.

②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08.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08 – 309.

而且毁掉了多年的声誉。

1948 年 5 月以色列建国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委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国内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如果说此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的打压更多的是出于担忧和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的想法则完全得到了证实。在苏联那样封闭的社会里，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狂热认同和支持被当局看成是对苏联的严重不忠，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背叛，“在斯大林看来，它就像危险的资产阶级犹太民族主义在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权威”。[①] 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②]，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③]，显然都是源于这一事件。1948 年 6 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冷战日趋白热化。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万一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仇视苏联、与美国和以色列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联系的苏联犹太人就会成为西方的“第五纵队”，从背后对苏联人民下手，直接威胁国家的生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犹太复国主义情绪不仅表现在苏联普通犹太民众身上，而且反映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某些人物的言行当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犹太人妻子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戈尔普曼在以色列国成立当天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激动地对自己的家人说：“今天我们终于有自己的祖国了。”[④] 在 1948 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30 周年的外宾招待会上，莫洛托夫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与以色列公使果尔达·梅厄和其他外交人员用意第绪语进行了倾心长谈，最后还意犹未尽地说，“祝你们一切安好！那样所有的犹太人事情就好办了。”[⑤] 在斯大林看来，这说明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苏联政权的心脏地带，威胁到了国家的基础。

为了消除苏联犹太人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斯大林随即在国内加强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运动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批判、降职、解雇升级到逮捕、流放和枪毙。“从 1948 年到 1953 年，数以千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96.
②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 359 页。
③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84.
④ *Платонов 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с. 264.
⑤ *Documents On Israil-Soviet Relations*: 1941 – 1953, Part Ⅰ: 1941 – *May* 1949.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377.

计的犹太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领袖、国家安全部职员和私营单位人员都遭到无情地审讯，丢掉职位，并且公开地受到嘲弄、奚落、恫吓和监禁。许多人被枪毙。"[1] 犹委会虽然对苏联当局忠心耿耿，但是，它与美国的联系最为广泛，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2]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消灭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英。于是，犹委会就在劫难逃了。

四　大难临头："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判始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美苏冷战时期的不幸产物。它的出笼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炮制过程，并且与冷战的发展历程几乎是亦步亦趋的。早在1946年10月12日，苏联国家安全部就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呈送了《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工作人员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报告。此后，国家安全部便盯上了犹委会。1947年12月，在侦办斯大林私生活泄密一案中，国家安全部通过严刑逼供迫使伊萨克·戈尔德施泰因在诬陷犹委会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该记录指出，"戈尔德施泰因曾听格林贝格讲，后来又通过他亲自同犹委会的领导人交往了解到，洛佐夫斯基、费费尔、马尔基什还有其他一些人利用犹委会作掩护，从事据说仿佛是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与国外的反动犹太人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并进行间谍活动。"1947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部据此逮捕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犹委会成员扎哈尔·格林贝格，然后使用欺骗的方法诱使格林贝格于1948年3月1日在事先编造的"审讯记录"上签了字[3]，其中详细供述了犹委会的民族主义活动以及米霍埃尔斯、费费尔、洛佐夫斯基在这种民族主义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证实了戈尔德施泰因的供词。1948年1月10日和3月1日，阿巴库莫夫先后把审讯戈尔德

---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94.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62.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89.

施泰因和格林贝格的笔录分别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正是这些假口供成为“有名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起因”。[①]

事实上，1948年1月12日国家安全部受命谋杀米霍埃尔斯后，阿巴库莫夫就明白：此举“必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案件’的开始”。[②] 1948年3月26日，他给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呈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把费费尔、马尔基什等一大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权威人士拉进犹委会，和他们一起“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用来作为进行反苏活动的掩护”。[③] 该报告与此前其他相关报告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叛国罪加到犹委会身上，从而“加速了1952年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的审讯乃至判决的步伐”。[④]

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二月事件”，4月，斯大林采取措施封锁了西柏林，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加剧，形成了第一次冷战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对犹太民族固有的敌视和疑虑日益加剧。为了在与西方的冷战中清除一切潜在的威胁和异己力量，苏联当局决定对国内这个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组织采取断然措施。1948年11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授权苏联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因为事实表明该委员会乃是反苏宣传的中心，并且经常向国外情报机关提供反苏情报。同时，据此查封该委员会的报刊出版机构。接管委员会的善后事务。目前不逮捕任何人”。[⑤] 次日，国家安全部秘密查封了犹委会办公大楼，所有档案与书籍都被打包用卡车运往国家安全部的仓库。在苏联历史上存在了7年之久、曾经辉煌一时的犹委会及其机关报《团结报》就这样一起被腰斩了。

斯大林关于解散犹委会但“目前不逮捕任何人”的决定非常短暂。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89；另外可参考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7。

② *Медведев Ж. А.* Сталин и “дело врачей”, с. 99.

③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59 – 360, 362.

④ Arno Lustinger, *Stalin and the Jews*, p. 184.

⑤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 371 – 372.

1948 年 12 月下旬，大规模的逮捕就已经开始。12 月 24 日，犹委会领导人费费尔第一个被捕，并且被直接关进国家安全部的内部监狱。阿巴库莫夫在当天夜里就对费费尔进行了审问，并威胁他说，如不招认，就要挨打。[①] 随后，费费尔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指示开始诬告犹委会的相关成员和其他与犹委会有关的人。12 月 24 日晚上，正在包特金医院住院的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祖斯金被捕。1949 年 1 月 13 日，犹委会主席团成员希梅利奥维奇和尤泽福维奇被捕。1 月下旬逮捕达到高潮。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 15 名被告中，有 9 名都是 1 月 24～28 日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被捕的。其中包括：犹委会主席团成员贝格尔森、伊·谢·瓦坚贝格及其妻子柴·谢·瓦坚贝格－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克维特科、洛佐夫斯基、布雷格曼、马尔基什、什泰恩、苏联情报局官员埃·伊·泰乌明。该案最后一个被捕的是苏联情报局官员列·雅·塔尔米（1949 年 7 月 3 日）。

新解密的档案表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副主席马林科夫的直接领导下炮制的。1949 年 1 月 13 日，马林科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马·费·什基里亚托夫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已经卸职的洛佐夫斯基。他以洛佐夫斯基曾经参与审订了 1944 年 2 月 15 日由米霍埃尔斯、爱泼斯坦、费费尔签名起草的有关“克里木方案”的信件为由，指控其进行犯罪活动。尽管洛佐夫斯基不承认自己犯有任何罪行，但在谈话结束后，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以“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联系和与中央委员行为不符”为名，建议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 年 1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以征询意见的方式通过了将洛佐夫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出党的决议，1949 年 1 月 26 日下令将其逮捕。[②] 随后，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和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利用犹委会被解散这一事实，以各种捏造的政治罪名和伪造的审讯记录，精心炮制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审理的整个过程来看，可以把它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两个阶段。

---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234.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7.

应该说，苏联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起诉阶段是从 1948 年 12 月费费尔等人被捕开始的，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拖延了近 3 年半之久，一直持续到 1952 年 4 月。这一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阿巴库莫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时期和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以后的时期。

在侦查起诉阶段，国家安全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所有被告罗织罪名。档案材料表明，国家安全部一开始就把犹委会打成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并认定这种犯罪活动是在莫洛托夫夫人、中央委员波莱娜·热姆丘任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的庇护下进行的。为了配合斯大林对于苏联犹太人的大清洗，尽快取得所有被告从事犯罪活动的供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亲自出马，专案重案调查处副处长、以残忍和反犹著称的科马罗夫上校具体领导犹委会案件审讯小组的侦讯工作。在该案的初审阶段，除阿巴库莫夫和留明之外，国家安全部还动用了利哈乔夫、希什科夫、库兹明等 34 位官员。这些工作人员按照阿巴库莫夫的罪恶指示，从一开始就“粗暴违反法律并采取违禁手段，以取得‘认罪口供’”。[①] 他们或者采取以施行肉刑进行威胁恫吓的手段，或者把犯人关进单人牢房进行精神折磨，或者“对被捕的人进行殴打和刑讯，经常不准他们睡觉，用这种方法迫使他们在侦查员们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名”。[②] 费费尔、洛佐夫斯基等人就先后遭到利哈乔夫、科马罗夫的威吓；而希梅利奥维奇、尤泽福维奇则惨遭毒打。希梅利奥维奇“在 1 个月（1949 年 1～2 月）的时间内每昼夜要被打大约 80～100 下”，总共挨打 2000 下左右，以至于后来不得不用担架抬着去受审。[③] 由于尤泽福维奇拒绝按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诬告洛佐夫斯基，阿巴库莫夫便把他转到列福尔托沃监狱去用橡皮棍进行毒打，他倒翻在地时还用脚踢他。[④] 其余被告虽未遭受皮肉之苦，但是却在精神上备受折磨。

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侦查工作主要集中在 1949 年 1～3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8.

②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390.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198－199.

④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235.

月进行。由于采用了各种非法侦查手段，除希梅利奥维奇外，所有人都被迫“承认”自己有罪，并招出了关于犹委会成员进行间谍和反苏活动的供词。1950年3月，所有被告都接到通知，“调查已经结束，审判不久就会开始”。[①]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此次审讯。在审讯的前两个月里有20份报告由阿巴库莫夫呈交给他”。[②] 毫无疑问，斯大林也一直等待着该案的审判。但是，所有计划都被一系列接踵而来的事件打乱了。

首先是1949年2月至1950年10月的“列宁格勒案件”。在这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清洗运动中，不仅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尼·亚·库兹涅佐夫（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党务工作的接班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曾被斯大林视为自己国务活动的接班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而且成千上万的党政干部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或者遭到流放。在马林科夫亲自监督和直接参与下，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这个案情更为重大的案件上，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被抽调过去参加“列宁格勒案件”的侦讯工作，这就不能不延缓“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进度。

其次是国家安全部本身遭到了清洗。尽管阿巴库莫夫在策划和指挥战后的反犹运动、暗杀米霍埃尔斯、逮捕和审讯犹委会成员以及“列宁格勒案件”当中死心塌地为斯大林卖命，但是，当斯大林谋划把对犹太人的镇压升级到全国规模的时候，阿巴库莫夫不但未能及时准确的领会主人长远的政治意图，而且因为对上层反犹内幕知道太多、贻误甚至妨碍了斯大林策划新的“医生阴谋”案件而沦为牺牲品。“斯大林既不信任内务部，也不信任国家安全部”[③]，他需要一套新的人马来推行新的政策。1951年6月12日，阿巴库莫夫被捕。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察处侦察员、病态的反犹主义者留明中校在马林科夫的授意下于1947年7月2日致函斯大林，对阿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04.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p. 147－148.

③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6, с. 6.

巴库莫夫提出了多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故意阻挠和中断对与医学教授叶廷格尔有联系的著名医生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证据进行调查、刻意隐瞒国家安全部工作当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欺骗政府等。[1] 1951 年 7 月 4 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以马林科夫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立即对此进行调查。7 月 11 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国家安全部里令人不满的情况的决议》，这份文件成为“对国家安全部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医生‘阴谋’的蓝图”。[2] 8 月，伊格纳季耶夫接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立即开始对国家安全部进行清洗。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奥戈利佐夫和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列昂诺夫、副处长利哈乔夫和科马罗夫、什瓦尔茨曼等一大批高层官员和资深侦查员相继被捕，其中包括不少“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主审官。这使犹委会案的侦查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51 年 8 月 24 日，伊格纳季耶夫致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在审查指控洛佐夫斯基、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3]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到当时国际冷战形势的影响，斯大林处理该案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

1951 年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理活动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这时，斯大林的意图已经清晰：在反对苏联犹太人的整体计划中，“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即使不能搞成一次公开的、作秀式的审判，也得为刚刚构思出来的即将令国人和全世界感到震惊、并且具有最大杀伤力的“医生阴谋”案件铺平道路。“犹委会事件将成为这个真正的、重要的案件的序幕。一个两幕血腥悲剧的第一幕。”[4] 即是说，必须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变成一个核心案件，大多数反苏间谍案件特别是有关犹太人的叛国案件都必须从这里找到“出海口”——因为只有这些被告与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犹太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为

---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p. 115 - 118.

②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53.

③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 ~ 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 65 页。

④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26.

清洗国家安全部立下汗马功劳的留明及时准确地领会了上层的意图，并因此赢得斯大林的青睐。1951 年 11 月，斯大林不顾伊格纳季耶夫的反对，把留明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擢升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察处处长，全权负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的审理工作，并且要求伊格纳季耶夫多听留明的话，与之搞好关系。[①] 留明走马上任后，立即下令对此前所收集的犹委会的全部档案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整理。从 1951 年秋到 1952 年春，在意第绪语翻译们的协助下，留明组织国家安全部的大批官员对犹委会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与国内外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往来的书信、犹委会寄往国外的稿件以及《团结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编目归类。不论是人名、组织，还是文章、出版物，根据目录索引一查便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材料不仅用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而且“由国家安全部系统提供给了正在对大量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审判的苏联其他地区。”[②] 留明虽然没有对被告采取强制手段，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侦察员们依旧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蓝图”编织、伪造、篡改所有被告的证词，以使其满足整个案情的发展需要。为了在客观上支持这些指控，留明在 1952 年 1～3 月还组织图书出版管理总局、苏联作协的文艺批评家等方面专家对犹委会寄到外国报刊上发表的材料的机密程度及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民族主义性质进行了所谓的法律鉴定，以便给整个审讯工作披上一件合法的、权威性的外衣。留明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富有“创造力”，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1952 年 3 月，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处和苏联检察部门最终炮制出 42 卷关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讯资料。为了把全部被告推上审判台，参与侦讯的所有侦察员和检察长极尽歪曲捏造之能事。例如，犹委会本是经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所有成员都经过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但在侦察员的笔下则变成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由洛佐夫斯基发起、按照事先深思熟虑过的怀有敌对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图谋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同资产阶级群体联络起来进行破坏工作的”。犹委会领导人和所有成员均是由洛佐夫斯基挑选和任命的，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35.

② 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p. 151.

是一群狂热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犹委会的旗号把苏联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①]《团结报》、犹太剧院等是他们在苏联和国外的犹太人中间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活动的工具。1943 年 5 月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受命赴美宣传募捐也变成了是受洛佐夫斯基派遣，去同美国的犹太资产阶级群体建立联系，以取得他们对在苏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而“克里木方案”就是犹委会领导人与犹太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罗森贝格相互勾结进行犯罪活动的最重要的证据。米霍埃尔斯和费费尔等人企图依靠美国犹太人提供物质援助，设法蒙骗苏联政府，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从而把克里木变成美国的“登陆场”。洛佐夫斯基、热姆丘任娜等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卷进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为揭露纳粹暴行而编纂的《黑皮书》也不幸沦为犹委会与美国犹太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进行民族主义活动的另一大罪状。为了给犹委会加上叛国的罪名，国家安全部颠倒黑白，竟然把著名的亲苏进步人士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称为美国间谍，指控他们 1946 年访苏期间从事反苏情报活动。于是，所有接待他们、与他们进行过会晤的犹委会领导人都因此获罪，被指控给他们提供关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机密情报。这些险恶用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证明犹委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②]

尽管这些所谓的犯罪事实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但是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在 1952 年 4 月 3 日把留明完成的起诉书呈送给斯大林，将起诉书副本分别寄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2 年 4 月 7 日，经苏联最高领导人批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被交付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③]

对于苏联当局而言，“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在该案被提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指示，由军事审判庭庭长亚·亚·切普佐夫担任审判长，与法院的另外两名法官德米特里耶夫和扎里亚诺夫一起负责对该案进行审理。4 月 21 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召开预备会议，“批准了此案的

---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149、59、98、152、275、376.

②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175、378、379.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8.

起诉书”，决定“将洛佐夫斯基及其他人等交付审判”。[1] 在审判开始之前，切普佐夫对有关审讯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不仅查明了该案的历史原委，而且还获悉，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此前已经对该案所有囚犯亲自进行了审问，检查核实了相关起诉材料。加上几乎所有囚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许多证人的证词，军事检察长对审讯过程的参与，有关专家的鉴定结论，以及政治局对此案所做的决议，所有这一切在开庭之前就给法官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此案已经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审查并且对所有囚犯的控告都是合理的。”[2]

1952 年 5 月 8 日至 7 月 18 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既无各有关方面参加，也未传唤证人出庭对质。当法庭逐一讯问所有被告是否承认对他们的犯罪指控时，15 名被告人中有 5 人完全否认自己有罪，8 人部分地承认自己有罪，只有费费尔和泰乌明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在接下来的庭审中，所有被告都推翻了他们预审时的供词，以言之凿凿的证据批驳了对他们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和向美国提供间谍情报的指控，并证实他们是在惨遭毒打或者不堪忍受的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在侦察员捏造出来的供词上签字的，他们期待法庭能够还自己以清白。作为苏联情报局领导人，洛佐夫斯基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犹委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批准的，是在相关部门监督之下进行的。他批评侦察员在 42 卷案卷材料当中伪造的证词是“把苍蝇变成大象，再去卖‘象牙’。为这根令人生疑的象牙要价 15 颗人头”。他表示，“如果法庭能够认定起诉书哪怕有一行得到了确证，你们哪怕有 5% 的把握能够认定我在 0.5% 的程度上背叛了祖国，背叛了党和政府，那么把我枪毙都是罪有应得。”希梅利奥维奇是所有被告当中唯一宁死不屈的人。他在法庭上说，“我过去没有承认过，现在依然不承认自己在思想上或者行动上犯了什么罪，也不承认我有任何反对党和反政府的罪行。”[3] 被告们的无罪陈述以及他们对于党和国家的忠诚对法官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以至于整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几度中断，难以继续进行下去。

---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21.

②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30.

③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216 – 218、342、196、198.

其实，整个审判过程从一开始就暗藏玄机。首先，按照此次审理组织者的意图，作为犹委会领导人的费费尔被列为第一个受审者。对费费尔的审问是“此案审理的关键部分”，其目的就是“为整个审理过程定下基调，以摧垮所有其他被告人的意志”。由于费费尔早就与国家安全部达成了合作协议，所以，他开始时不仅完全承认了起诉书上几乎所有的罪名，而且顽固坚持对其他被告，特别是对洛佐夫斯基所提出的各种严厉指控。但是，在审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案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转折。费费尔在一次秘密开庭（即其他被告回避）时推翻了自己所有的口供，并且供认自己是国家安全部的密探。他揭穿了国家安全部策划此案以及强迫他在法庭上作伪证的阴谋，明确指出，“我供说戈尔德贝格是苏联的敌人和间谍那全是捏造。……这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同罗森贝格之间所谓的间谍联系也是如此，他证实说，“控告我们这些犹委会的成员们进行间谍活动，也就是据说仿佛按照我们同一些反动群体达成的协议往美国寄送间谍材料这一条没有任何证据，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他在法庭上作最后补充供述时明确表示：“犹委会在工作中虽然也有个别的错误，但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中心。……对《团结报》的鉴定结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不能设想在苏联国内众目睽睽之下可能有像鉴定所形容的那样的敌对性报纸的存在。”①

其次，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一直在暗中干预此案的正常审理工作。在侦查的最后阶段，布雷格曼、希梅利奥维奇、什泰恩和马尔基什已经撤回了他们的供词并且否认了他们的罪行。留明却对上级机关隐瞒了这一事实。由于苏联最高法院没有自己独立的审判大楼，军事审判庭只好临时借用国家安全部的会议室作为审判庭，不料留明不仅在审判庭内部安装了窃听设备，而且在休庭期间，指使侦察员一直给被告施压。更为严重的是，当切普佐夫要求留明和他的助手格里沙耶夫上校给法庭提供指控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是间谍的证据时，竟遭拒绝。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还对鉴定结果进行了审查。结果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漏和弄虚作假问题。切普佐夫最后断定，没有证据证明犹委会蜕变成了一个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的中心，个别未获证实的事件也证明不了犹委会与美国勾结从事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 с. 138、153、234－235、365.

间谍活动的指控。因此，“显而易见，在该案当中，不可能用这样没有得到检查和不可靠的材料去判刑”。[1]

作为一个当时罕见的有良知的法官，切普佐夫试图把案卷退回国家安全部进行补充调查。为此，在审判过程中，他多次乘休庭之机去拜访伊格纳季耶夫，向他反映留明及其侦察员伪造证词的行为，但是没有得到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支持。事实上，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已经被正在同时进行的“医生阴谋”案件搞得焦头烂额，斯大林甚至威胁他：“假如你不揭露这些医生当中的恐怖分子和美国间谍，那么你就将呆到阿巴库莫夫现在所呆的地方。”[2] 在这种情况下，伊格纳季耶夫哪顾得上去理会他早就心知肚明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呢？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切普佐夫在1952年6月16日暂时中止了审讯工作，并且四处奔波，先后向苏联总检察长萨福诺夫、最高法院院长沃林、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什基里亚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米·什维尔尼克等领导人汇报了该案的案情，提出必须进行补充调查。但是，这些领导人在了解他的意图后不是拒绝接见他，就是建议他向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提出呼吁。不久，根据切普佐夫的请求，马林科夫接见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与留明在座。听完切普佐夫的陈述后，马林科夫让留明发表意见。留明对切普佐夫横加指责，指控他“在对待人民敌人的问题上犯了自由主义”，说他“故意将审判推迟了两个月以便被告得以推翻之前在侦察中所做的供词”，而且控告他诽谤国家安全部。切普佐夫原以为马林科夫会支持他的意见，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马林科夫声色俱厉地斥责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个案子的所有判决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批准，难道你还要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下跪吗？中央政治局已经讨论了3次，你执行政治局决议就是了！”[3] 所谓政治局决议，几乎就是1952年4月3日伊格纳季耶夫和留明将起诉书呈送斯大林时在附函中提出的建议：除什泰恩外，将所有被告判处极刑——枪决。除了把对什泰恩的判决从流放边远地区10年改为5年之外，国家安全部的建议立即得到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批准。因此，切普佐夫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除了执行马林科夫的指示外，他已经无力回天。

---

①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p. 231－233.

②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86.

③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35.

1952年7月11日，切普佐夫宣布犹委会案法庭调查完毕。7月18日，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按照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做出终审判决。8月12日，洛佐夫斯基、费费尔等13人被枪决。什泰恩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也被全部剥夺。布雷格曼因为心力衰竭1953年1月23日死于狱中。[①] 俄国学者雅可夫·拉波波特写道：“苏联犹太文化被置于行刑队面前，它最优秀的代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②]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不仅是一个多幕剧，而且是一个连续剧。悲剧的规模并不局限于洛佐夫斯基等15名被告。1948～1952年，受到此案件牵连而遭到逮捕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有110人。其中有10人被判处极刑，95人分别被判处5～25年的劳改或者流放，被捕后终止诉讼的仅5人。[③] 例如，犹委会代理责任书记海菲茨在犹委会被查封后不久，即被指控参加“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被捕，1952年8月，受到单独审判，判处在劳动集中营监禁25年，斯大林死后不久获释；《团结报》代理责任编辑日茨，1949年被捕，1954年10月死于狱中；犹委会的编辑瑙姆·列文（1950年11月22日）、记者马里亚姆·艾森施塔特（1952年7月30日）、武装部队授衔委员会副主任阿伦·托卡里（1952年8月1日）都因为被指控在犹委会的掩盖下，从事反苏间谍活动和民族主义活动等罪名先后被枪毙……不仅如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就像一股可怕的龙卷风，在苏联社会四处盘旋，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更多的无辜者。因为，斯大林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真正目的——驱逐整个犹太民族，并且在苏联掀起新的一轮大清洗。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初，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狂潮。这一政策显然是与那一时期国际冷战形势的恶化分不开的。当时，“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总体上处于下风”。[④] 1948～1949年，苏联在长达一年多的柏林危机中一无所获，与此同时，因为苏南冲突，苏联还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在欧洲最大的盟友。1949年9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

① *Наумов В. П.* Неправедный суд，с. 381－382、386.

② Brent and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p. 95.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2，с. 40.

④ 张盛发：《中长铁路归还中国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12页。

式建立，美国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弧形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达到新的高潮。就在此时，苏联一手扶持建立起来的以色列为了寻求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公开放弃了冷战初期的中立政策，支持美国出兵朝鲜，开始向美国靠拢，苏以关系逐渐恶化。这种形势对于苏联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当时已经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他希望通过新的战争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无疑将是美国。当时，两国不仅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双方的飞行员事实上已经在朝鲜战场上暗中交火。1951年10月6日，斯大林在关于原子弹问题答《真理报》记者问时说，“一旦美国进攻我国，美国统治集团就将使用原子弹。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苏联才不得不备有原子武器，以便有充分准备来对付侵略者。”[①]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发表了揭露“医生阴谋”的文章——《披着医生和教授外衣的卑鄙的间谍与谋杀者》，其中苏联方面就指责美英“在狂热地准备新的世界大战”。[②] 在美国，犹太人势力举足轻重。不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都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犹太人憎恨苏联是因为苏联对他们不公平，犹太人热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③] 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亲美、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真正的祖国的犹太人无疑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五纵队，成为苏联的背叛者。1951年10月，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在审问被捕的列·罗·舍伊宁时一语道破天机：美国“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所以，“在我们的时代，敌对的活动和计划均与美国难脱干系”。[④] 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讲话时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债。”[⑤] 因此，为了对付美国人，首先就要解决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这就是斯大林下令在国内制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策划“医生阴谋”等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593页。

② Правда 13 января 1953г..

③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51.

④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09.

⑤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359页。

一系列反犹案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斯兰斯基案件，以及把逮捕“犹太复国主义代理人”和“世界主义分子”的反犹行动扩大到东德、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根本原因。

按照斯大林最初的设想，准备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15名案犯进行公开审判，以便为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进行舆论造势，即是说，该案将发挥后来由“医生阴谋”案件承担的功能。但是，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调查结束多半年后，“到了1950年11月，斯大林开始担忧这一审判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1] 原因是当冷战已经进人第一次高潮之际，有关犹委会的犯罪指控根本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难以在舆论界产生震撼人心的轰动效应：在预定的审判中，对于犹委会从事反苏民族主义活动最严重的指控就是它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相互勾结，企图在克里木建立犹太共和国，而能够昭示给世人的最有力的证据仅仅是那封关于“克里木方案”的建议信；至于把苏联多年来最忠诚的友人戈尔德贝格和诺维克诬陷为美国间谍，并以此为由指控犹委会把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美国人则更是家丑不可外扬；另外，被告们的供词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洛佐夫斯基和希梅利奥维奇等四人在侦讯结束时就已经推翻了自己的供词。由于缺乏过硬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想法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以至于所有被告从开始被捕、侦查、审判到最后被枪决，苏联当局均未向任何媒体披露过任何消息。即是说，“这一案件并未实现它的更广泛的目的”。[2] 因此，要达到全面清洗苏联犹太人的目的，斯大林就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案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医生阴谋”案件。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首次把“医生阴谋”公诸于世。这一案件的公布立即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苏联社会的反犹情绪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从这一方面来讲，“医生阴谋”案件的确达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所不能达到的效果。根据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斯大林可能打算在1953年3月中旬对“医生阴谋”案件进行公开审判，并借机将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104.

② Joshua Rubenstein and Vladimir P. Naumov (eds.), *Stalin's Secret Pogrom: The Postwar Inquisition of the Jewish Anti - Fascist Committe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1.

犹委会案件的详情公之于众。[1] 届时苏联人的反犹情绪将会达到高潮，并会自发的对犹太人实施屠杀和酷刑。那时，苏联当局就会以从人民的怒火中解救犹太人为名将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到比罗比詹，然后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就是斯大林"彻底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的"地狱计划"。[2]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驾崩，苏联犹太人才免去了一场灭族之灾。

斯大林去世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有好几次平反机会都与之擦肩而过。一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才为这一历史冤案平反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1988年12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有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的平反问题，最后决定通过司法程序为本案被非法镇压者恢复名誉。[3] 这样，尘封了40年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终于真相大白。

五　结束语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犹太人当中的一批富有社会使命感的社会名流响应斯大林全民抗敌的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半官方的犹太人反战组织。它不仅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救助犹太同胞、复兴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在战争胜利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入对峙与冷战，犹委会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昔日的辉煌成为诟病，正义的事业变成罪行，正常的友好往来被视为出卖国家情报的间谍勾当。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竟被人为地炮制出一桩骇人听闻的叛国案。

纵观这一历史悲剧，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是1930年代大清洗运动在战后的重演，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是斯大林两极

---

① Brent and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p. 309; Arkadi Vaksberg, *Stalin Against the Jews*, p. 259.

② 利季亚、沙图诺夫斯卡娅：《克里姆林宫内幕》，第216页。1953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职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尼·亚·布尔加宁也证实了这一点。见 *Люкс Л.*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политике Сталин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с. 54。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犹委会案件的会议记录（1988年12月29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2, с. 34－35。

对立思维下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路线的结果。更具体地说，犹委会案件又是斯大林战后对外同美国进行冷战，对内加强专政的产物。

犹委会的悲剧命运是俄国的反犹传统在冷战年代的极端表现。布尔什维克虽然提出了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口号，但并没有根除反犹主义的毒瘤，并且从沙皇帝国那里继承了反犹主义，以镇压犹太复国主义来巧妙地对付人民的不满。美苏成为冷战对手后，斯大林把迫害犹太人公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在他的心目中，犹太人已经变成“最重要的敌人”。[1]“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和“医生阴谋”案件就是这种反犹主义思想的集中反映。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也变得日趋严重。他对周围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莫洛托夫是他最忠实的助手，协助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任务，晚年他竟怀疑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伏罗希洛夫一直是其忠实干将，但也被怀疑为英国间谍。把米霍埃尔斯置于死地，把犹委会打成出卖国家利益的间谍集团和反苏宣传中心，甚至把整个犹太民族视为美国的第五纵队，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斯大林对犹委会的镇压以及接踵而来的反犹行动对苏联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因为不满苏联当局的反犹政策而迁往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国家，使苏联丧失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和文化精英。[2] 反犹主义就像一个毒痈，削弱了苏联社会的民族凝聚力。在国外，一些西方犹太组织借机掀起了反苏浪潮，苏联一手扶持起来的以色列也倒向美国阵营，苏联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被严重抹黑，在外交上也陷于被动。今天，当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导致苏联这个强盛一时的超级大国在冷战的历史舞台上轰然瓦解、黯然落败的，并非被视为

---

① Louis Rapoport, *Stalin' War Against the Jews. The Doctor's Plot and the Soviet S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 81.

② 据统计，1954~1959 年，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人数是 776 人，60 年代上升到 8840 人，70 年代达到 225494 人，1987~1991 年，大约有 44.8 万犹太人移民国外，其中大多数去了以色列。见张倩红、葛淑珍《简论苏联政府对其境内犹太人的政策和态度》，《世界民族》2007 年第 3 期，第 17、19 页。另据统计，1991 年 10 月苏以关系恢复后，有 100 万犹太人申请移民以色列。到 1996 年，有 90 万俄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见杨曼苏《苏以关系发展的历程》，《俄罗斯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68 页。

第五纵队的犹委会和苏联犹太人，而是斯大林本人！或者说，是他一手打造的政治体制！当斯大林在精心炮制犹委会的悲剧之时，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他同时也在给自己亲手缔造的红色帝国炮制着一出更大的历史悲剧！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又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视民如土芥，绳民若盗贼，或许这就是苏联70年而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 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①] 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②] 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③] 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②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比较重要的有 Sheng 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转下页注）

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①] 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②] 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重新予以审视。[③]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

（接上页注③）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①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Мясников В. 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ХХ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②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③ 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1996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2000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和内战初起，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①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② 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③

---

① 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年8月。

②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③ 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①] 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②]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③] 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④] 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

---

① 转引自 Chares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 - 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82。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5, *Vol.* 7, Washington D. C.: GPO, 1969, pp. 338 - 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0, оп. 33, д. 14, п. 244, л. 120 - 125,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 с. 37 - 40。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5, д. 11, п. 237, л. 34 - 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д. 14, п. 244, л. 99 - 10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 с. 10 - 14、68 - 71。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1070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 *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 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д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с. 137、190、238 ~239。

的领袖”。[1]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道，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2]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

---

①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①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 月 20 或 21 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②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 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

---

① 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 8～9 页。

② 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 286 页）。据胡乔木回忆，在 1960 年 7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 22 日或 23 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 401 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 月 18 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c. 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615 页）注明为"22 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 19 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 20 日如故，21 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 20～21 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 308 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①]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 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②]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③]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

---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下卷，第 9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243～244 页。

②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519 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 758 页；《毛泽东文集》第 4 卷，第 1～2 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 年）》下卷，第 12 页。

③ 斯大林在 1945 年 12 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 45，оп. 1，д. 322，л. 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11。

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①] 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②]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③]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

① 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③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①] 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②]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③] 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

---

① 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②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③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昧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①]

10 月 10 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他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②]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要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其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③]

---

①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 年 9 月 6 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 年 9 月 7 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②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 年 10 月 10 日；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 年 10 月 5 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 4 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 851～856、840～843 页。

③ 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二 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①] 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②]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

① 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2～713页。

② 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 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с.322。

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 月 11 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 88 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 月 6 ~ 9 日，第 88 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 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①] 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会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②]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③] 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

---

① 详见 *Почтарев А.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 – 1950 – 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с. 141 – 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 473 ~ 475 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15 辑（1985 年），第 128 ~ 172、173 ~ 188 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56 辑（1996 年），第 32 ~ 49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 6 ~ 7 页。

③ 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以下简称《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 页。

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① 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②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部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③ 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③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64～67页；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年第28期，第1～7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页；РЦХИДНИ，ф. 17，оп. 128，д. 46，л. 12～18、19～21、22～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792、806、811～812页。

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 月 14 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①] 16 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古，“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②]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共军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③] 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

---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 年 9 月 14 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3～184 页；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15 辑（1985 年），第 71 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9 页。

② 中央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通报，1945 年 9 月 17 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07 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 231 页。

③ 《彭真年谱》，第 289 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0～11 页。

显：表面上国共军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共军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古、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① 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② 18日他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③ 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④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⑤ 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记录，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3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79页。

③ 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中共赴渝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1945年9月19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页。

⑤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16页。

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①] 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②]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③] 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④] 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⑤] 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⑥] 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

① *FRUS*, 1945, Vol. 7, p. 10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6页。

②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给林彪和山东局的指示，1945年9月27日。

③ *FRUS*, 1945, Vol. 7, pp. 973－974、979～980、981；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 п. 248, д. 7, л. 17－18、19－20；оп. 33, п. 244, д. 12, л. 50－51；оп. 33, п. 244, д. 13, л. 71－7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 с. 245－255、252－257.

④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 п. 248, д. 7, л. 86－88,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Ⅳ, с. 296－298.

⑤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2, л. 98－121. *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4, с. 119.

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 п. 7, д. 248, л. 120－1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840～843页。

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①]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②] 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留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③] 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共军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集会，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④] 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

①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刘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3～234页；《刘少奇传》上卷，第53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页。

②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③ 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彭真年谱》，第294页。

④ 毛泽东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彭、陈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0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9－302。

北"[1]；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2]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3] 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4] 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5]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6] 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7] 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② 《彭真年谱》，第300页。

③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82－283.

④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11页；《彭真年谱》，第30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彭真年谱》，第305页。

⑥ Gillin and Myers (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p.94－95；《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⑦ 《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① 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② 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③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④ 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⑤ 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

---

① 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②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Ⅳ，с.294－2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④ 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 558，op.11，d. 98，l. 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 Molotov “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 1，Issue 1，pp. 131－132。

⑤ 《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共军队一律退至铁路线 50 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 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①] 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②]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③] 24 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共军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④] 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⑤] 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 1946 年 2 月 1 日。[⑥]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 10 月 19 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⑦] 11 月 8 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

---

①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134 – 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06 – 307；《彭真年谱》，第 318 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20 日。

② 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30 – 32、40 页。

③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134 – 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06 – 307.

④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53 – 155、168 – 171 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216 页；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127 – 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05 – 306。

⑤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 126 – 127.

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57、168 页；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99 – 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313 – 314。

⑦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60 – 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 277 – 278.

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1] 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 17 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 1945 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2]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 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3] 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4] 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5] 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 11 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6] 在这样的背景下，12 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7]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 12 月 30 日与蒋经国

---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209～210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47、148～149、151～152 页；*FRUS*，1945，Vol. 7，p. 1044。

③ 详见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 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Х Х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 67－68、87－89、92－98、104－112。

④ 详见 *Егорова Н. 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с. 35；Fernande Scheid Raine，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Vol. 2，Issue 1，pp. 25－26。

⑤ 详见 *Кочкин Н. 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 68。

⑥ АВПРФ，ф. 017а，оп. 1，п. 2，д. 12，л. 62－62об，*Кынин Г. 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 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 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 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 118.

⑦ *FRUS*，1945，Vol. 7，pp. 844－845；*FRUS*，1946，Vol. 9，Washington：GPO，1972，p. 18.

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①]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 年 1 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②] 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③]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④] 11 月 19～20 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⑤] 但是，11 月 22 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 日和 29 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

---

①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 45，оп. 1，д. 322，л. 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 109－120。

②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2，л. 20－21；д. 20，л. 5а－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31、41－45；《彭真年谱》，第 362 页。

③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 7 页。

④ 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 年 11 月 13 日；《彭真年谱》，第 316～317 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第 429～430、431～432 页。

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①]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②]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③] 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④]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⑤] 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④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⑤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①] 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 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②] 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③] 1 月 26 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 51% 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④] 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 月 11 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⑤] 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

---

①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 – 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 – 108.

② 详见 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174 页。

③ 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 87～88 页。

④ 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 421、423～424、425～426、429～434 页。

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 – 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V，с.58 – 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1975 年 6 月，台湾“国史馆”。

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①] 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②] 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③] 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④] 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

① 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617～669页；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11～313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Том. V, с. 66－68。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页；《彭真年谱》，第402页。

③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3, л. 42－69，《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5卷，第996～1023页。

④ 《彭真年谱》，第376页。

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①] 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②] 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③] 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④] 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

① 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② 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 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405、422页。

③ 《彭真年谱》，第385～38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④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①]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②]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③]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② 《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③ 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①] 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②] 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③]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④] 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⑤]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⑥] 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

---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②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④ 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97.

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①] 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②] 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③]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 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④] 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⑤] 4月26日与苏联

① 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② 《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④ 《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 *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плыстно《Мысль》, 1977, c. 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⑤ 《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c. 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①]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 月上旬和 3 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 1 月的 13.4 万人增加到 28.5 万人。3 月 13 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②] 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③]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 5 月 3 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 月 8 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④] 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 月 14 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 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 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 1946 年 6 月全面开启。[⑤]

---

①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1，л. 43 – 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V，с. 105 – 107.

②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19 页。

③ 《彭真年谱》，第 417 页。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第 317 ~ 318 页；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 480 页。

⑤ 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21 ~ 22 页；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1，л. 91 – 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V，с. 147 – 149。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① 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 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② 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 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③ 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

---

① 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2 期，第 185 页。不过，认为 1946 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 1949 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② 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 1947 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第 172～187 页。

③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 134～135 页。

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①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② 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①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② 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